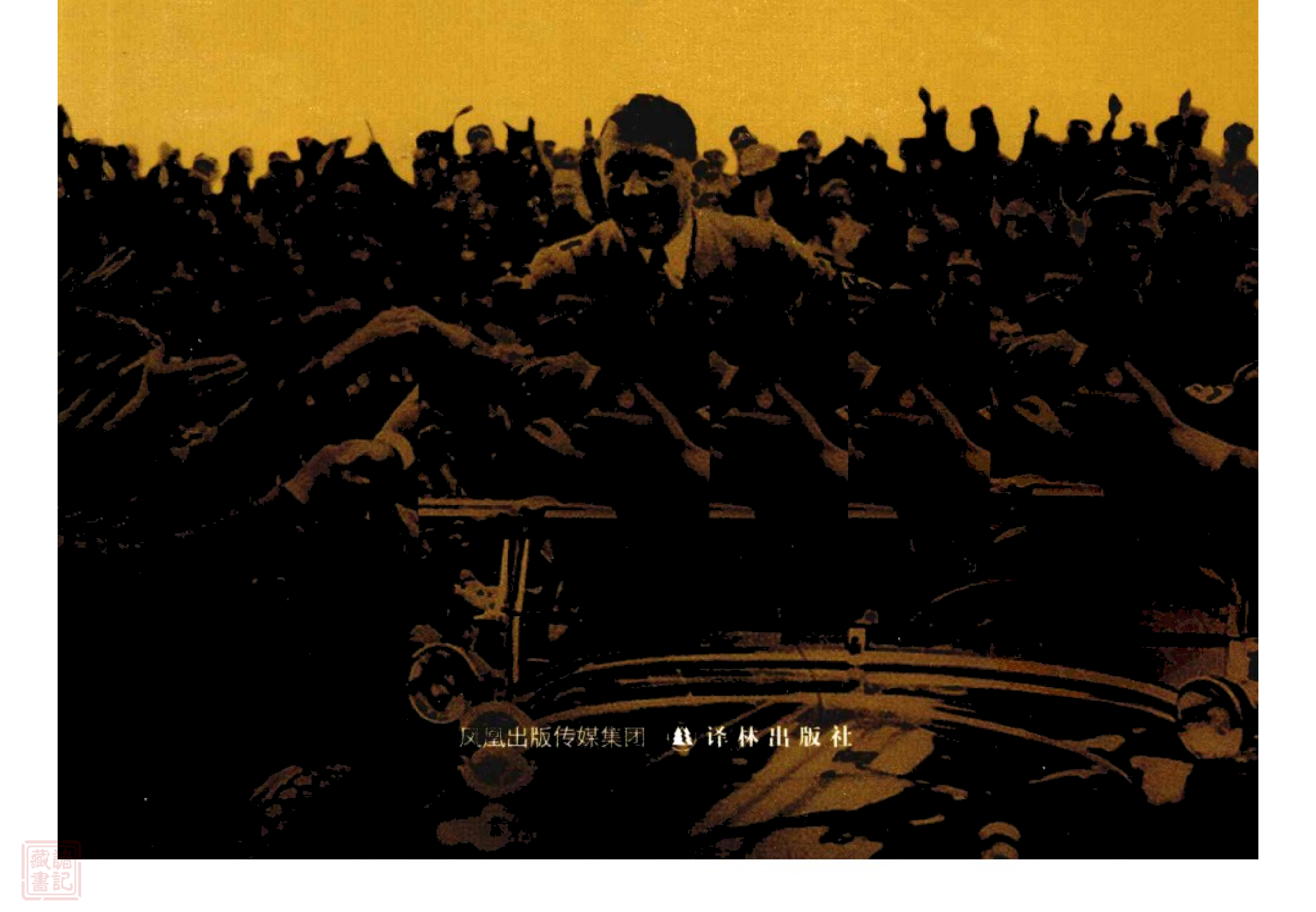
Hitlers Volksstaat

[德国] 格茨·阿利 著
刘青文 译

希特勒的民族帝国

劫掠、种族战争和纳粹主义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德国民众在二战中的生存状况比战前要好得多，他们把纳粹主义视为未来的生活方式。希特勒知道："当最穷的人成为德国最忠实的子民，它就会变得无比强大。"因此他用社会福利贿赂了整个德意志民族——以被抢劫了的犹太人和被占领地区的其他民族为代价。

谁若是不愿谈论数百万普通德国民众在二战中获得的利益，他就没有资格谈论纳粹主义与大屠杀。

从没有一部作品如此清晰地展示了"民族国家"与犯罪、纳粹主义的吸引力与罪恶之间的共生关系的本质所在。这本书使我们投向德国最黑暗的那段历史的目光变得更加敏锐。

——《时代报》

格茨·阿利是最有创造性的历史学家之一。本书总结了史学界迄今为止的研究成果，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阿利的研究为纳粹德国史的阐释注入了新的声音。

——《南德意志报》

读者也许会觉得纳粹的种族主义狂热突然变成了经过精确计算的税收政策与消灭通货膨胀的手段，其实事实恰恰相反。本书读来令人毛骨悚然，如同读一部推理小说。

——《法兰克福汇报》



Hitlers Volksstaat:
Raub, Rassenkrieg
und nationaler Sozialismus

希特勒的民族帝国
劫掠、种族战争和纳粹主义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希特勒的民族帝国：劫掠、种族战争和纳粹主义 ／（德）阿利著；刘青文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1
ISBN 978-7-5447-0834-0

Ⅰ.①希… Ⅱ.①阿… ②刘… Ⅲ.①德意志第三帝国-史料 Ⅳ.①K516.44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214151号

Hitlers Volksstaat. Raub, Rassenkrieg und nationaler Sozialismus by Götz Aly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Development GmbH, Germany

书　　名　希特勒的民族帝国
作　　者　［德］格茨·阿利
译　　者　刘青文
责任编辑　王　蕾
原文出版　S. Fischer Verlag, 2005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湖南路1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 yilin. com
网　　址　http:// www. yilin. 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 www. ppm. cn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2×960 毫米　1/16
印　　张　20.5
插　　页　4
字　　数　241 千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0834-0
定　　价　32.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025-83658316)



本书出版受到德语文学在线（Litrix.de）的资助。德语文学在线是一个由德国联邦文化基金会发起，与歌德学院和法兰克福书展合作的项目。

Publication of this work was promoted by funding from Litrix.de, a project initiated by the Federal Cultural Foundation, Germany,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Goethe-Institut and the Frankfurt Book Fair.

目 录
CONTENTS



第一部分

行动中的舆论政治家



民族帝国的梦想

大时代

本书将向您披露民族帝国何以会与犯罪行为共生于一体。为此我们要超越现下仍在流行的历史编纂的方式——它把国家社会主义如此昭然若揭的野蛮一页与其政治行动隔绝了起来，使得这样一个政权对于大多数德国人来说，竟然仍具有吸引力。本书的意图在于，对这些罪行作历史的评判，并将它们归置于20世纪的德国史中。大屠杀的起因并不仅仅是那些卷首印着“犹太人问题”的卷宗所记载的那样，因此对纳粹时代种种罪行的历史性描述和引证，仍是一项不容丝毫懈怠的工作。追问这些罪行产生的前提，依循的是笔者个人的路径，这也构成了本书内在的锋芒。

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NSDAP）建立在种族不平等的理论基础上，同时却向德国人保证，他们可以比在封建帝国时代以及魏玛共和国时代获得更多的机会均等。但在现实中这要其他人付出代价，那就是劫掠战争和种族战争。就内部观察而言，种族战争似乎显示出阶级斗争结束的迹象。因此，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才编织了一个社会与国家变革的20世纪乌托邦，并将其普世化。他们正是从这个乌托邦



中汲取了犯罪的能量。希特勒说要建设"社会的民族帝国",一个"福利国家",它应当成为国家的样板。在这个国家中,"所有[社会的]藩篱都会被一一拆除"。

12　和所有的革命者一样,那些非常年轻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追随者们坚信机不可失,时不再来。1933年政权交接时,约瑟夫·戈培尔年仅35岁,赖因哈德·海德里希28岁,阿尔贝特·施佩尔27岁,阿道夫·艾希曼26岁,约瑟夫·门格勒21岁,海因里希·希姆莱和汉斯·弗兰克32岁。赫尔曼·戈林,他们中比较年长的一位,也不过刚刚庆祝他的40岁生日。战争期间,戈培尔曾根据统计调查的数据得出一个结论:"纳粹党领导层的平均年龄和中层干部的平均年龄都是34岁,而当时全国的平均年龄是44岁。因此完全可以说,德国是由年轻人在领导着。"故而他要求"个人面貌焕然一新"。

对于多数年轻德国人来说,国家社会主义并不意味着独裁、言论管制和镇压,而是自由和冒险。他们从中看到了青年运动的延续,无论身体上还是精神上的反衰老计划。那些起主导作用的20到30岁的年轻人自以为比小市民们聪明得多。他们自视为现代的、反个人主义的、行动果决的人。他们嘲笑"市民的烦恼——因为伟大的明天属于我们"。1940年1月,他们错误地臆测了一个"伟大的战役",并以此推断,"无论谁在战争中倒下了,这个国家都会迎来一个幸福的光辉未来"。他们要在1944年3月初准备"战争的最后冲刺",尽管恐怖的气氛已经笼罩了这个国家。

一个时年33岁的德国人曾在日记中写道,他为什么要报名参加一个在短短数天内建立起来的迁徙部队,这个部队在1939年十分突然地奉命将德国侨民从中东欧"迁回帝国"。"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即将执行的任务是独一无二的;我希望他们会需要我,并接受我的报名。这一召唤同时会将我从办公室工作的窘境中解脱出来——那些工作是多

么无关紧要啊。"14天后,这位日记作者继续写道:"我为这项任务的伟大而感到震惊:之前我从来不曾被赋予过这样的责任。"当时,女大学生们被派去照顾那些从国外迁徙回来并被安置在德国占领区的德国侨民,有的被派往临时搭建起来的学校和幼儿园。这些青年女性们狂热地写道:"我们不管来自哪个系,都是一样的。一个伟大的、共同的任务把我们团结在了一起。也就是说,要在假期里把我们全部的力量和我们即便还很贫乏的知识都奉献给瓦特高(德占区)。坦白地说,我们感到非常的自豪,我们是第一批可以以学生身份从事这些前沿工作的人。"

生于1915年、后来成为雇主联合会主席的汉斯·马丁·施莱尔,在1942年(作为一个在布拉格的27岁的占领区官员)嘲笑那些还未离任的、既年老体衰又优柔寡断的行政和教育界的上层人物,在他看来,这些人影响了向"真正的国家社会主义"发展的进程:"我们年轻时在斗争中养成的积极主动性,就是要求任务而不是等它布置下来;在政权交接之后也不断投入运动之中,使我们比通常情形更早地肩负起责任。"在1970年代担任《南德意志报》主编的汉斯·舒斯特,是1941年5月在萨格勒布德国代表处的经济参赞,他们的工作是在那里建立一个卫星国克罗地亚。之前他因为在莱比锡的博士论文《罗马尼亚的犹太人问题》而在布加勒斯特的德国大使馆工作,并参与了密谋的政治活动。他同样属于1915年出生的这代人。1942年1月,时年26岁的他从萨格勒布写信给他那位后来同样极具影响力的朋友赫尔穆特·贝克:

"我现在的确希望马上离开,去年在这里我经历了很多;尽管处于极度的紧张和数周的危险中,但许多事都几乎成功得太容易了。刚刚是贝尔格莱德的政变,之后是战争,以及我们在萨格勒布这儿的政变。幸运的是,我们有一个像大使卡舍(冲锋队的高级领导!)这样杰出的

领导者。由于和当地政府在政变前就已经关系密切，我们的工作环境极其有利，在长达半年的美好时光里，我们一起怀着巨大的责任感参与了这个国家的艰苦建设。”舒斯特得偿所愿，这表现为他作为一名战士“对生活的多姿多彩、长期的工作负荷以及个人成就”都心存感激，虽然他“事实上并没有多大的决心”，并且“面对战争残酷的一面还抱有一定程度的幻想和自我安慰”。

14

以上这些男人和女人都找到了他们想要的，也是人们在他们这个年龄无论如何都会喜欢的东西：独立负责的精神和变动不居的社会关系。这要求这些先锋们要把压力转化为永不松懈的创造力，以及对精神和体能的不断考验。他们创造了一种生活，即他们可以不断打破刚刚产生的陈规。他们痛恨办公室的日常规则，寻找着自我检验的机会、快乐、不可预见的兴奋和在现代战争运动里的极端刺激。他们出于对表面上的绝对实力的自信，进行了后青春期的对自我本体的追寻。

1933 年，大学生和刚出校门的高校毕业生掌握了政权。他们中有老一代上层家庭的叛逆后代，也有在共和国时期社会民主党发动的起义中因捞到好处而变得自信的青年人。在社会浪漫主义和用现代手法加以阐释的国家社会主义的乌托邦中，他们克服了出身的差异。他们惺惺相惜，并自诩为“青年民众”的先锋。他们讥笑出于经验对此持怀疑态度的老人们是“长在墓地里的蔬菜”，按章办事、服务经年的老公务员则被他们嘲笑为“老掉牙的统治者”。他们远离现实但接近未来，描画出一幅生活的幻象。而这种生活，他们认为恰是经济萧条现状的反面。这场运动的积极分子和许多因好奇而随波逐流的人，心怀着全民美好生活的曙光来对抗着被束缚的今天。若用那个时代的一句话来表达，转瞬即变的日常生活所造成的巨大压力，放眼未来时也就变得无足轻重了。1941 年夏天，戈培尔考虑把他的战争言论以《在昨天与明天之间》作为书名出版，但事实上这本书后来被冠以《史无前例的时

代》之名。国家社会主义有足够的理由被理解为青年人的专政。这个 15
专政在短短几年里发展成了20世纪在破坏意义上最具成果的一代人的产物。

许多抄袭自左翼社会主义思想文库的国家社会主义观点,出现在这场运动的参加者的传记中。在魏玛共和国行将落幕的时候,不少后来成为纳粹积极分子的人总结了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经验。艾希曼在他的回忆录中一再表达:"我内心的政治定位是左倾的,社会主义至少和国家主义一样重要。"他和他的朋友在斗争时期把国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视为"一种兄弟姐妹的关系"。作家沃尔夫冈·希勒斯突然意识到,"人们必须把'我们'放在'我'之上,新的德国文化只能够来自'我们'这个源泉"。这位文化领域的代表性人物(同时人们也会想到阿诺尔特·布龙宁)之前曾和贝尔特·布莱希特以及约翰内斯·R.贝歇尔共事过,并曾负责排练颂扬斯大林主义残暴工业化道路的合唱本《伟大的计划》。1933年,希勒斯只需把这个唱本中的"无产阶级"换成"德国"就可以完全地照搬照用,此前他已经把"我的道路"改成了"我们的道路"。他认为,"一个全新的我们的感受可以首先通过合唱的形式"排演出来,他还可以继续使用原来的唱词:"前进并且不要忘记,我们的力量在于何处……"国家社会主义所造就的新德国,使那些在游行示威、思想交锋甚至会场斗殴时站在另一边的人,在第三帝国找到了个体的安宁。

下文中还要经常提到财政国务秘书弗里茨·赖因哈特和他的部长卢茨·什未林·冯·克罗西克伯爵。尽管这两人的家庭背景迥然有别,但他们可谓意气相投。1940年,躺在病榻上的赖因哈特在写给他上司的信中说:"我已为即将完成的伟大任务而感到振奋。……能够生

16 活在这个大时代里并且还能发挥影响力，我们是怎样的幸运啊！巴黎在德国人手中，法国投降在即！如此短的时间！真是让人难以置信！”

通过入侵中立国比利时与荷兰，德国的迅速取胜成为现实。但希特勒事先就已宣称这些胜利是“无关紧要的”。他再三提醒他的信徒，并逐渐地也向所有的德国人反复强调那个很快就使所有罪行皆成为可能的原则，这就是：“如果我们胜利了，就没人敢提出质疑。”

纳粹政权的任何一项计划，任何一个鼓动宣传的观点，是否都与后来的现实发展相吻合？或者，是否随着时间的推移被证明具有实用性？这类问题甚至不能唤起学术界的兴趣。因为它们容易导向分析上的混乱。不寻常的速度、年少轻狂、集体狂热、极度夸张的肆无忌惮，使短短十二年的纳粹时代在今天看来是那么的让人难以理解。德国社会通过领导层所维护的对立事物的统一，获得了特殊的能量，这些对立事物包括：理性和感性的政治需求、老的和新的精英阶层、人民和政党以及官僚。在政治机器将矛盾事物连成一体的地方，对所谓传统的维护与对技术可行性的兴趣、反独裁的颠覆的狂欢与在德意志太阳帝国上建立独裁乌托邦的主张共熔一炉并且剑拔弩张。希特勒则把国家的重生与灭亡的危机，把导向社会幸福的阶级和睦与源于社会分工的破坏力量结合了起来。

大动荡

纳粹领导人很难忍受法学家、职业外交官和世袭的军官，但为了自身的利益，他们还是给了这些人适应时代急剧变化的时间。这当中包括在后面的章节里不断提到的帝国银行、帝国财政部和帝国经济部的

17 公务人员，他们是一群老奸巨猾的人，他们的专业政治经验还是在皇帝

帝国时代或作为新生力量在魏玛共和国的初期积累下来的，他们中的大多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过兵打过仗。而在所有的专业政府部门、大多数高校研究所以及私立或(半)官方的经济研究所里的智囊部门、科学协会、报刊编辑部或大银行的国民经济部，他们所经历的落差和起伏中所积累的经验就有了用武之地。

1939年至1945年，帝国经济部第三处的公务人员在处长古斯塔夫·施洛特勒的领导下，以难以想象的苛刻侵蚀着欧洲。这个处是1920年为了履行《凡尔赛和约》而建立的。作为法国、比利时与英国债权的文职寄送人，这些当时还年轻的工作人员学会了征服、掠夺和勒索的初步伎俩。他们随后使用这些被动学来的伎俩来对付它们的发明者，并运用德国人在行政方面的智慧使其变本加厉。他们将对抢掠的助纣为虐视为是对过去耻辱的索偿。

当纽伦堡法案于1935年秋天在帝国党代会叫嚣嘈杂的程序中通过时，并未在《帝国法律公报》中公布。直到几周后，号称精英的行政法学家才把血统保护和所谓"人种特征遗传"转化成了行政机关可施行的规范。帝国民法的第一行政令规定了谁是完全的犹太人、半犹太人和被视为犹太人，哪些人的婚姻是混合婚姻或特许混合婚姻。作为成千上万个别判决的基础，法学家们没有采用任何人种研究者以理论的完整性空想出的、遗传学上会引发长期争议的尺度，而是只给出了简单可确定的、祖辈四人已经登记在案的宗教信仰作为标准。这就实现了分类的"自动化过程"。

据说对1938年的"犹太人赎罪金"也是这样，戈林出于反犹主义的狂热把它确定为十亿帝国马克。最初财政部是向他们征收20%的财产税，后来每年都有超过四次的征收，而且最终的征收所得远远超出了戈林原先意欲征收的数目。 18

因为工作细致，反犹主义的特殊措施，即在最初阶段就策划大量谋

杀欧洲犹太人，取得了他们所预想的必要成果。在这个意义上，德意志帝国的审计总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监控了对贝尔格莱德犹太人的征收、对荷兰犹太人的监管，并受帝国财政部委托接管了对罗兹里斯曼城犹太人隔离区的缺乏效率的管理。在华沙的帝国经济效益管理委员会（今天的“德国经济合理化管理委员会”），是通过企业经济中的成本—使用—核算法对犹太人隔离区进行经济管理的。但大量被人为修订过的报道，否定了这些类似于监狱且完全不经济的“犹太人居住区”的存在。

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行为方式不仅注重措辞上的煽动性，而且不时即兴而为，以此在循规蹈矩的官僚系统中有了立足之地。在完全服务于国家大业的准备中，公务人员没有放弃其税收和监督的职能。审计署和民事法庭在继续工作，领导签署各项文件，倾听建议，多层级的行政建设照常进行，所有这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高效运转着。纳粹党各省部头目厌恶官僚作风，想要贴近人民大众，但碰到坚持按帝国预算规章办事的财政官吏也不得不有所让步。这当中会有争执，也会有愤怒和冲突，但首要的还是依靠政治上或军事上的阴谋诡计所建立的平衡。纳粹国家的多重组织结构，当时并没有像人们常说的那样陷入混乱。相反，持续存在的发展可能性和博弈力量的产生以及最佳道路问题的提出，在在说明了这个政权令人费解的强势。激进主义的选择机会在不断增多，避免行政破产，使经常按照意识形态指导路线作出的决定有一个很强的适用性，这样最终从政治唯意志论和功能理性中产生了异常残忍的混合物。

专家、政治家和大多数民众之间的联合，在希特勒政府的筹备过程中也可以找到他们的共同基础，即出台人们长期盼望的能够对共和国内的利益纷争提出解决方案的改革法。渴望有所作为的纳粹行政当局

适时抛弃了许多长期无用和过时的东西。他们在 1941 年满足了雅各布·格林的要求,因为雅各布·格林曾在 1854 年把德国的文字描述为"畸形的和不堪入目的",为此他们通过《字体法令》废除了聚特林字体,而以拉丁文标准书写体取而代之。魏玛宪法第 155 条曾规定,对在德国东北部仍然盛行的阻碍现代资本主义的产业收益权这种封建性的财产权形式予以废除。然而,此时的共和国已不可能——按早在 1849 年保罗大教堂议会时就要求的那样——实施宪法规范。相应的帝国法律则有"1938 年 7 月 6 日,贝希特斯加登,阿道夫·希特勒"这样的签名。

纳粹统治促成了"全民汽车化"的第一步,它引入了当时几乎闻所未闻的"休假"概念,使休息日数量增加了一倍,并开始发展今天人们所熟悉的大众旅游。当时柏林的"德意志劳动阵线"的省部负责人,不遗余力地鼓吹道:"我们想在 1938 年采取更有力的措施,针对那些今天还在相信对于工人而言没有假期旅游的所有民族同胞。这种懦弱必须最终被彻底克服。"当时,一个 14 天的德国境内游全部花费仅在 40 至 80 帝国马克之间。

纳粹国家始终都在扶持家庭,压制不婚者和不生育者。并且,他们保护农民应对世界市场和气候的不确定性。今天的欧盟农业制度、配偶分割课税制度、道路交通规则、机动车强制责任保险制度、儿童补助制度、税率等级制以及自然保护的基础都源自那个时代。国家社会主义的社会政治家,发展了自 1957 年以后在联邦共和国变得理所当然的保险金计划,这个计划使年老和贫穷不再是同义词,因为它"使老年工人的生活水平和其他参加工作的民族同胞没有明显的差别"。 20

因为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许多领导本身就和法院的执行人员交情不浅,所以他们在上台后的第一周就非常关心如何减轻当时大多数德国人——尤其在困难时期——所饱受的来自征收和强制搬迁的折

磨。国家社会主义的第一批法律就包括了这样的内容:为了债务人的利益而限制债权人的权利。因为这些法律的目的是要遏止“人民的贫困化”。1938 年生效的《历史债务豁免法》,其法律名称就已表明它宣告了成千上万的债务归于无效。1934 年底的《防止滥用执行程序法》确立了反对过去那种“几乎无限制的债权人自由”的精神。所有这些改革,都赋予了法院各个执行人员以明确的自我负责的个案决定自由,并且这些都反映着国家社会主义的统治方式。

法院执行人员的中央机关报《德国法院执行报》马上发出了一个新的声音:“一个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法院执行人员,不会允许他的民族同胞中的最贫困者被抛弃在完全的贫困中,更不允许将他们最后的财产连同他们对保护他们的国家所寄予的信任和他们对祖国的爱一齐夺走。在这个国家他们有权相信,他们至少能够维系正常的生活。”由 21 “真正的人民国家”这个概念,法院执行人员发展出了一种“纯粹的社会意识”,即“在每个具体个案中避免僵化”。它意味着在国家社会主义时代,“既要不辞辛劳,又要不怕牺牲自我利益,从而才能够公正地实现社会福利的思想”。而且,当社会思想和国家思想紧密结合在一起时,这种社会意识还要肩负起一个民族的责任。

与此相应,希特勒(“我们的人民总理”)则早有预言:“如果她最贫困的人民是她最忠诚的人民,德国将是最强大的。”戈林也赞成道:“房屋的所有人如果冷酷地和毫无顾忌地让贫困的人民无家可归,那么他们在这样做的同时也将失去国家的保护。”即便他在违反“人民共同体的基本法律”时还有“一条法律条文”支持他,也不例外。当然法院执行人员也始终被要求,有时要把“恶意的债务人”也当做“德国人民的败类”,“对其采取所有严苛的措施”。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应征入伍者及其家庭的财产可以不再被扣押:“所有以强制拍卖不动产标的为目的的程序不再予以考虑,

不管强制拍卖是在法令生效(1939 年 9 月 1 日)之前还是之后安排的,都随法令的生效一律停止或取消。”纳粹政府同样也改善了对于应征者作为承租人的保护。尽管后来程序又变得强硬起来,但为了以此方式“向那些为了民族的存亡而艰苦奋战在第一线的人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对债务人的保护仍是每一个法院执行人员的中心任务。

同时还要提到的是 1940 年 10 月 30 日的《工资扣押法令》,它继续改善了对强制执行程序中的德国人的保护。它规定对于加班工资的一部分是不许扣押的,此外还有休假补贴、圣诞节补贴、儿童补贴和伤残退休金也是如此。它为每个人或每个家庭成员规定了较高的扣押免除额,并首次以净的工资额而不是总的工资额作为免于扣押的基数。在 22 追求德国公民间更高标准的平等这个意义上,在构建公民社会的早期所制定的法律被废止了,因为它对公务员和神职人员在扣押时予以特殊方式的保护。这就是为什么国家社会主义的法律广受欢迎,并且其中也可折射出之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影子。

宗教机构甚至国家机构在国家社会主义中,都保留了很大程度上的内在多元性。许多知识分子、公务员和工程师都似乎感觉到,组织机构的自我封闭性已经被打破,大动荡的时刻、既不受政党也不受社会地位观念束缚的新时期即将到来。在保持传统还是打破现状、选择专业的确定性原则还是抓住不断降临的飞黄腾达的机会之间,各类专业人士作出了种类各异的选择,从而成为了国家社会主义统治的差异巨大、种类各异的工具。他们不必因此牺牲他们的个人信仰。与共产主义相反,国家社会主义从未要求过绝对的服从,但它要求反精英主义的、非常吸引 20 世纪欧洲知识分子的“贴近人民”。

这导致了平民主义的舆论政策、聪明的干涉手段和蓄意谋杀的根

本性结合。对于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兴起的通常解释，如德国的官僚体系或普鲁士的臣民精神，都被证明是错误的。因为国家社会主义比共和体制更多地限制了垂直型的决策模式，更是迥然有别于领导人型国家的自我塑造方式，从而更加有利于横向型的现代决策模式的发展。它为原有的和新设的机构都注入了活力。它打破了常规的等级制度。以往以规定为借口相互推诿职责的地方，重新焕发出巨大的工作热情，想人所想、急人所急的工作态度不再鲜见。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35 年夏天，帝国财政部长什未林·冯·克罗西克在他的部属中进行了一次以对德国犹太人的税收掠夺为目的的方法竞赛。依照一个口头下达的一般指示，参赛者还要在报告中区分“有推荐价值的”、“可行，但无推荐价值的”和“根本没有推荐价值的”措施。但他们都在报告中共同建议，要不声不响地取消一系列有利于犹太人的优惠政策。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之下，他们代表了这样的观点，即在犹太人问题上“采取非常手段在今天已经可行了”。

23

1938 年 4 月，这位财政部长为向他的同僚内政部长继续输送收集到的建议，再次刮起反犹主义的头脑风暴。这鼓舞了两个来自税务处的公务员争论这样一个问题：应对全体犹太人还是只对纳税义务人的未成年子女取消财产税的免税金额。此外他们还在斟酌，对战争中致盲的犹太人的导盲犬，是否还应继续免收乡镇的养犬税。还有一个负责人起草了一份完备得近乎只要一签署就可生效的法律草案，这个草案对犹太人缴纳的所得税和财产税规定了一个特别附加额，其诡异之处在于：附加额的高低是浮动的，以方便在今后法律所规定的事由（如：个别犹太人损害人民利益的行为）具备时提高其额度。人们完全可以想见，这与尽人皆知的德国民族性中所要求的绝对服从完全是两回事。

围绕在希特勒身边的那些人是如何评价这些——毕竟是以现政权的名义在积极活动的——老一代精英们的代表的呢？戈培尔在其日记

中,并非偶然地以帝国财政部长什未林·冯·克罗西克为例写道:他虽然在每个新的尖锐矛盾之前“有些懦弱”,但之后都表现得稳妥可靠。凭这种特质他属于那些“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国家中很好地加以任用的公职人员”。1937 年,希特勒颁发给这位伯爵金质党徽,并授与他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荣誉党员的称号。从那以后,即便在艰难的情况下,什未林·冯·克罗西克也执意使用“亲爱的党的同志”这一称呼,而且自己也喜欢被别人这么称呼。1939 年,在得到了荣誉纳粹的称号之后,什未林·冯·克罗西克把与其地位相称的 450 000 帝国马克的部长官邸花销纳入了帝国财政预算。

最初无党派的高级公职人员卢茨·什未林·冯·克罗西克伯爵 24 (1887—1977)是来自普鲁士的乡绅,伯爵的头衔是因为收养而继承的。他出生在安哈尔特,1905 年至 1907 年在洛桑和牛津求学;在哈勒他通过了国家司法考试并结束了其政治学学业。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他已获得多次嘉奖,升为中校。1919 年他踏入了新组建的帝国财政部,十年后成为预算处的领导,1932 年被帝国总理冯·巴本任命为财政部长。帝国总理施莱歇和之后上台的希特勒都把他当做杰出的专业人士而继续留任。什未林·冯·克罗西克对纳粹领导集团直到最后一刻仍忠心耿耿。他还在 1945 年 5 月 2 日被希特勒的继任者邓尼茨任命为帝国政府领导的业务首脑。他在威廉大街诉讼案,即第十一号案件中被判了十年监禁,并一直坐牢到 1951 年。作为专业部门的部长,他的事业是杰出的。他随时能够在由其自由口述的数页长的信函中,帮他的争论对手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财政问题。

与什未林·冯·克罗西克不同的是他的国务秘书弗里茨·赖因哈特(1895—1980)。这个图林根州图书装订工的儿子出身可没那么显赫。他就读于伊尔梅瑙的公民和贸易学校,之后成为一名商人。1914 年,他在拉脱维亚的里加被列为敌对的外国人并被拘留在西伯利亚。

1924 年他在巴伐利亚阿默尔湖畔的赫尔兴建立了一所函授贸易学校。这是他的第二教育途径的新思想,可魏玛教育部门的官僚们对此却置之不理。但是他两年后参加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却不同。他是党的远程教育思想方面的演说家,从内容上看,他的理论集中在财政预算政策上,后来成为财政政策的发言人并于 1930 年当上了帝国议会议员。

作为国务秘书,赖因哈特从 1933 年一直工作到 1945 年。他勤奋而专业地在演讲、书籍和文章中宣传他的政治目标。他以他的社会政策改革热情实施了无数对中下层人民有利的税收优惠措施,这些措施在 1945 年之后仍然继续有效。他曾对一个由帝国劳工部部长在 1941 年至 1942 年间提出的书面建议极富感情地批注了一个"好",而这个建议是平衡当时差距还很大的工人和职员的养老金水平的。赖因哈特降低了不同工作的录用标准,同时对自己部内的全体公务员进行强制性的再培训。他为此建立了一所又一所事先并未列入计划的帝国财政学校。戈培尔对此评价道:"虽然赖因哈特是一个小教书匠,他处理问题有些胆小迂腐,但是最后总能彻底漂亮地解决它们。"

财政部的这对"黄金搭档"表现了具有国家社会主义特点的融合:受过精英教育、享有贵族地位的部长和出身卑微、政治上白手起家但努力上进的国务秘书。赖因哈特视自己为福利国家的奠基人。而与之相反,什未林・冯・克罗西克则代表了成千上万从内心深处接受了不确定的、自我矛盾的纳粹思想的公务员、军官、科学家和其他知识分子。

民族的统一

在对社会主义者、犹太人和极端主义者失去所有耐心的时候,德国

人并没有(像回顾历史时简单设想的那样)将希特勒视为无情的挑唆者,而是奉之为伟大的民族统一者。在凡尔赛和圣日耳曼签订的条约强行禁止奥地利和德国之间的民族统一,多数人看到了其中存在的严重不公平。但1938年与奥地利的联合——恰好也是在三月——实现了1848年以来民族统一的夙愿。当然,大德意志民族国家并不是一个共和国,但这已经足以让人民欢呼雀跃。如果今天把德国历史解读成充满歧途的西方化道路,那么在当时人民则(同样一致地)视其为一条奇迹般的、几乎不可看清的民族和国家的统一道路。 26

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1938年的柏林市施潘道区的犹太人大街被更名为卡尔·舒尔茨大街,另一条则被更名为戈特弗里德·金克尔大街,以此纪念1848年和1849年革命中的两位杰出的革命者。这两条大街的街名从那时起一直沿用至今。1938年5月15日,不仅想成为德意志帝国总理,而且一直想成为德国人民和全世界德意志人的元首的希特勒,在维也纳英雄广场上宣布:“作为德意志民族及帝国的元首和总理,我要告诉历史:我的故乡从现在起加入到德意志帝国中。”不久之后,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保罗教堂议会曾在此召开——他作为1848年革命思想的追随者和实践者宣称:“我们的先人九十年前为之斗争和流血的事业,现在终于可以宣告完成了。”

整个民族都在为此欢呼雀跃,特别是两年闪电战期间所取得的战果更是为之增色不少。假如哈布斯堡王朝和霍亨索伦王朝在1918年取胜,那么他们的政权或许还可以在数百万战争死难者遗骨上幸存下来——希特勒喜欢称之为“哈布斯堡王朝的国家僵尸”。但现在,是崭新的、年轻的和民族革命的大德意志帝国取得了胜利。在一个社会崛起的代表的带领下,1918年的灾难有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值得欢庆的结局。突然之间,无止境的人类牺牲、世界大战的煎熬和战后的艰苦岁月,显得不再是漫长徒劳的了。失败被重新定义为一次辉煌胜利的序

曲。当希特勒在1939年11月向纳粹德国国防军统帅部宣称要对法国发起闪电进攻时,他给出了这样的理由:"这一切意味着世界大战的结束,而不是一个单独的行动。"

1939年3月15日,德国军队挺进了布拉格。后来在民主德国享有很高声望的解剖学教授赫尔曼·福斯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曾经孕育了莱比锡大学的布拉格大学,作为最古老的德意志大学又回到了德国人手中!这实在无法想象。这对斯拉夫人是多么沉重的打击,而对我们又是怎样的恩赐。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伟大时代,应该为可以经历这一切而感到庆幸。什么才是重要的?是没有你所想要的那么多的黄油,还是没有咖啡?还是即便不适应还得忙忙碌碌?在所有时代的进步和发展面前,那一切显得多么可笑和无所谓。"

27

不断取得的胜利,伴随经济崛起的表象,持续弱化了德国实用主义者的声音。那些与现实的、不事张扬的妥协为伍的人,依然故我(没有被送往集中营),不论他们现在是叫沙赫特、贝克还是格德勒。但他们干扰了希特勒的大动荡政策,因为这项政策要求大众阶层明确地二选一,要么全有要么全无,不容妥协与混沌。另外需要补充的是,纳粹领导人在仔细观察了舆论变化之后很早就变得胆怯敏感,所以他们总是支持消费的需求——这常常又与他们的军备经济优先原则背道而驰。

后来的民主德国为了监视它的一千七百万人民,部署了十九万专业的和同样数量的非专业的国家安全特工。而1937年盖世太保包括女秘书和行政人员在内不足七千人,可见国家社会主义时期的安全部门人手明显少得多。但他们做到了同时监视六千万人。绝大多数人是不需要监视的,集中营的情况也证实了这一点。在最初的恐怖活动之后,直到1936年底,也就是集中营建立了近四年后,也只关押了4761名犯人,这当中还包括酗酒者和刑事犯。

希特勒轻易地、游戏般地就取得了他想要的成果，因此，虽然他只是不经意地促进了帝国崛起，但这在无形中拔高了他的个人威望。他很快就超越了狭隘的政党界限，动摇了德国内部反对派的基础。直到1938年，德国已确立了这样一种政治局面，它被墨索里尼一针见血地称为“民主极权主义”。在经历了内战、阶级仇恨和政党相互倾轧的时代后，德国人所需要的是一个民族共同体。 28

我的祖父在他的回忆录中详细描写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光。这个被其父禁止学习数学而获得了古典语文学博士学位的学者在西线担任过小分队队长。1917年，他在那里遇到了一个“战功卓著”的军士长，并写下：“他不会害怕。我想把他升为军官并要求他去报到。他却回答我说：‘我的父亲是个裁缝。我想继续做士官。我无法适应这个社会。’但就是这样一个士官，他最后得到了一等铁十字勋章。”这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开始孕育的社会动力。纳粹党卓有成效地将其照单全收。他们吸引了成千上万的高素质人才，而这些人则在地位斗争的泥潭里抛弃了因阶级出身而带来的自负。他们把倾向社会主义的工人、小手工业者和希望为他们的孩子获得更多社会承认和更好的生活机会的职员团结在了一起。另外还包括那些已经从魏玛共和国的教育改革中获益并继续在推动社会崛起的人。他们所有人并不愿看到新的阶级统治，而是希望开创这样一个（在今天几乎是理所当然的）政治环境，使一个人的生活道路、职业和社会声望尽可能少地由人们出生时的社会地位决定。

国家社会主义的种族理论，后来被理解成单纯地教导仇恨、谋杀和屠戮。但对于数百万德国人而言，其吸引力在于，它是关乎德国人民自身的平等的承诺。纳粹意识形态强调对外的差异和对内的平等。用希特勒的口号来说是：“在德国人民内部是最高的人民共同体和面向每个

人的受教育的机会，但对外是绝对的统治地位。"对于那些属于依人种统一定义的、人口占多数的民族（占德国人口95%）的人来说，他们内部关系中的差异在缩小。国家政策积极倡导，要在新一代年轻人中填平地位的鸿沟，并要在帝国劳动服务部门、纳粹党的大型机构并且逐渐在武装部队中得到体现。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制服，在今天已被人一厢情愿地视做军事化的标志。但如果人们愿意设想一下，在有些国家，学生至今仍在穿校服，或者想到童子军的制服以及体育协会的统一运动服，那么就不难理解，制服其实只不过是为了达到使人看不出贫富差距的目的。

29

这样的想法适用于从1939年至1942年间总是跳跃性规划的整个"东方移民总体计划"，它要为德国人提供更多的空间、原材料和个人发展的机会。该计划以它在1942年确定的最直接的方式要求，把五千万斯拉夫人驱逐到西伯利亚。德国的研究机构多年来一直在促进着经专家论证后决定的重大纳粹罪行，它以杀死数百万人为目的；国家在1945年和1946年的财政预算中还为此拨付了研究经费。从内因看，我们必须把这样一个东方移民总体计划理解为德国高涨的阶级运动发酵的产物。希姆莱称之为"热血的社会主义"。希特勒则热情洋溢地谈道："我们可以让我们贫穷的劳动人民家庭迁出比如图林根和埃尔茨山脉地区，以给他们更大的生存空间。"德国的劳工部门希望看到，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至少消灭七十万小型的和困难的农业生产作坊"。所有的关于所谓德国人民的移民意愿的科学调查都指向了穷人。不同的是，涉及到的这些人群，在三十或六十年前，受贫困驱使，他们最希望移居的是美国。

1942年的德国儿童都在玩一种"黑土地的拓荒军"游戏，因为士兵的未婚妻们都梦想在乌克兰拥有大片的骑士封地。甚至当年还是听话士兵的海因里希·伯尔，曾在1943年12月31日从野战医院给他的父

母写信："我非常想念莱茵河，想念德国，但是我更常想的是，在赢得战争后获得在这里、在东方的殖民生涯的机会。"儿童图书的作者特亚·豪普特和伊尔莎·毛写出了一部"针对所有低年龄层"的小学课本。它要把"东方殖民的思想灌输给年幼的儿童，并以此尝试着要求孩子们把美国西部拓荒的浪漫主义精神运用到东方垦荒中"。于是有了这样的文本："现在我们想要向小矮人借来七里靴，穿着它一起穿过陌生的土地；我们需要它，否则我们就不能很快到达目的地。……现在我们在黑色的肥沃的土地上。……在小麦和黑麦旁，玉米正沙沙作响。" 30

这一切不是为了容克贵族和垄断者们的利益，而是作为针对每个人的具体的乌托邦才计划出来的。

1918 年的心灵创伤

在德国人的政治情感深处，第一次世界大战留下了三个巨大的创伤：由于英国的海洋封锁而导致的饥荒、货币的贬值和内战。在战争中饿死了超过四十万人。此外有许多人因为物资匮乏而得了无法医治的结核病，或无法抵御其他传染病，最终因病早亡。物价飞涨更到了惊人的程度。早在战争期间，食品价格就已上涨了超过 100%，在个别地区甚至更高。国家几乎不加控制的价格上涨加重了普通百姓承受的物质痛苦，因为他们当时仅拥有很少一部分物质储备。1923 年爆发的恶性通货膨胀导致了对最具国家意识的中产阶级实质上的财产剥夺。

回顾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后的两年，许多德国人都把对那些困境中卑鄙的受益者的可憎画面和国家衰败的感觉联系了起来。根据广泛流传的观点，是他们把忠诚于祖国的人民推入了自我摧毁的不满中。在东方轻松地缔结了两个和平条约，即《布勒斯特—利托夫斯克条约》 31

(1918 年 3 月 3 日)和《布加勒斯特条约》(1918 年 5 月 7 日)后,德国才失去了在西方触手可及的胜利。德国是在内部团结被破坏后才在军事上走向失败的,并且明显是中了好斗成性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圈套。因此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党纲的第十二条是这样表述的:“考虑到每场战争所需要付出的巨大的人员和财富的牺牲,必须把个人通过战争获益视为对人民的犯罪。因此我们要求毫无保留地征收所有战争所得。”

对战争胜利者和革命者的双重恐惧,被人们轻易地反映在畸形的宣传中。“有钱的犹太人”狡猾地将其获利偷偷传送到了同样贪得无厌的“犹太化的布尔什维克”手中。当这类畸形宣传和所谓的“消灭中产阶级”、“无产的下层人民变成富裕的农场工人”等主张碰撞到一起时,人们把一切问题都归结到共产主义者身上了,如:对所有发展的破坏,礼节、风俗、宗教的终结,诚实合法取得的财产的丧失,“所有秩序的瓦解”。

在这样的宣传背景下,后来支持反犹的国家政策的活动家们总是声称,他们反对“犹太人”的措施是为了自卫。《我的奋斗》这本书的最后一章就叫做“自卫的权利”。这样的官方信息还出现在法律《职业公务员队伍的重建》的标题中,通过这部法律,帝国议会于 1933 年 4 月使犹太人的自由化为泡影。由帝国财政部的公务员于 1937 年夏天起草的对犹太人实施部分征收的法律草案,用了《德意志帝国受犹太人侵害之损害赔偿法》这样的标题。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它在德国的宣传机器中越是一致地被表述为“雅利安人抵抗”“世界犹太人集团”侵略的战争,这个集团正在以“三重身份”努力争取统治世界:“第一重是犹太人,第二重是与犹太人联姻的大财阀,第三重是犹太化的布尔什维克。”

32

在这个模式中还不自觉地夹杂进了强权者的理论。除了源于优越感的装腔作势,它还包括由科学家助长的对人类最高价值受到威胁的

恐惧,认为最高价值在必要时刻必须以暴力抵御低等价值的入侵。它独特地简化了从一个神圣的政治理论转变到另一个理论的过渡,尤其是国家社会主义作为更加开放的、实用化的意识形态广受欢迎并吸引了德国社会中差异巨大的各色人群。在内战和国内斗争把共和国摧毁之后,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因其第三条道路的梦想而充满了吸引力:纳粹的政治家承诺均衡的平等和要与任何形式的"分裂"作斗争,不论这种分裂现在是自由资本主义还是布尔什维主义性质的。

与1939年不同,1914年的德国人所能回想到的,是俾斯麦的三场完胜的战争、超过四十年的和平发展、经济繁荣的时代、国力上升和人民富足。私人经济的备货和库存非常充足,其价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约合近400亿帝国马克。可在1940年帝国的物资库存仅为50亿帝国马克,而且1940年时的1帝国马克货币的实际价值明显要低于1914年。为向中立国采购,帝国银行在一战前夕的黄金储备约合14亿帝国马克,另外流通中的金币的价值更达到25亿帝国马克。与此相比,在1939年9月1日可证实的加上秘密收藏的德国金币价值也仅为约5亿帝国马克。

33 德意志帝国总共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花费了1600亿帝国马克。尽管有更好的收入和储备状况,但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相比,帝国还是处于更差的财政支出状况中。在1939年9月至1944年9月间,高达50%的花费可以来自日常的财政收入——人们称之为黄金支付比例——而在1914年至1918年,这一比例仅为13.1%;当时有24.8%必须作为"短期债务",确切地说就是:通过印制纸币来支付;剩下的62.1%必须通过长期的、由德国人民埋单的举债来筹措。新的战争借款在1914年至1918年就达到982亿帝国马克。相比之下,英国为一次大战的支出

中来自日常税收的部分总能保持在28%上下。

在1914年至1918年，德国微薄的税收能力不能简单归咎于政治家的错误。它首先是由各个联邦国仍然保持的税收主权导致的。帝国缺乏一个自己的财政管理体系。在1913年高达400亿帝国马克的国民收入中，帝国可支配的正式收入仅为23亿，其中军费就占到75%。与今天相比，国家的份额实在是低得可笑。这和整个中央集权的威廉家族的权力大厦极不相称。

1914年帝国议会各党派制定的政治性的堡垒条约，妨碍了接下来的四年中每次关于改善税收基础的重大讨论。只有社会民主党人在徒劳地要求收缴战争的赢利。因此对于帝国来说只剩下长期负债的道路，即战争借款。直到共和国时期，通过由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领导的财政改革，国家才建立起一套直到今天仍值得信赖的中央国家税收体系。通过改革，从1919年起，政府持续地、以缓慢适应的速度提高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国家份额。希特勒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可以如此大范围征税，而这在1914年"号称是完全不能承受的"，那都还要归功于共和国时期打下的基础。

34 除了在财政预算中偿付的支出外，两场战争也消耗了绝大部分的经济物资：库存被耗尽，机器、楼房、工业设备、交通工具和整个基础设施被最大限度地加以利用和损毁，森林和农田在它勉强还可以承受的限度内被破坏。

1914年至1918年，德国人的生活水平平均下降了近65%，绝大多数居民仅能维持基本的生存。第三帝国在财政方面的分析家们认为，这是"非常令人担心的"。所以一位年轻的财政专家在1941年写道："事实究竟给人们怎样的教训，首先表现在困难已经超过了当时还可承受的限度。自身的崩溃表现在可以对外部事务起直接强化作用的物价上。"与之相比，在第三帝国，人们"不用担心生活水平会下降"。

阅读提示

问题的提出

接下来涉及的是已经提出，但一直没有解答的问题：事情是怎样发生的？从德国人的视角出发，他们是怎样允许这史无前例的集体罪行发生的——特别是对欧洲犹太人的屠杀？国家推动的针对所有“低等价值的”，针对“波兰人”、“布尔什维克”和“犹太人”的仇恨无疑是重要前提，但我们从中并不能得到答案。德国人在希特勒政府统治之前的几十年里不比其他欧洲人怀揣更多仇恨，他们的民族主义不比其他民族更加强调种族主义。并不存在所谓直通奥斯威辛的特殊的德国路径。所谓在德国很早就发展出了特有的、彻底的反犹主义和仇外意识的观点，缺乏任何常识性的基础。人们错误地接受了这样的观点：对于一个后果特别严重的错误发展一定存在特有的、长期形成的原因。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把握时势赢得和巩固了它的政权，因此最重要的原因应该在1914年之后寻找，而不是在此之前。

我们考察的重点放在德国人民和国家社会主义领导层之间的紧张关系上。希特勒的统治大厦从第一天开始结构就极不稳定，这一点已



得到了证明。问题是,它是如何得到巩固的——虽然还显不足,但对于十二年看似光辉的、充满毁灭的岁月已经足够了。因此我抓住开始提出的问题"事情是怎样发生的",更准确地说:在后来像国家社会主义这样如此公然欺骗、完全丧失理智的罪恶行径,怎样在内政方面达到了一个如此高的、今天仍无法解释的统一程度?

36

为了得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我将从纳粹表现为"受欢迎的独裁"这一角度来考察其统治。这样重要的问题最好是重新放在战争年代里来回答,因为国家社会主义的其他特性也能在战争中得到非常清晰的表现。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元首"希特勒以及相当一部分部长、国务秘书和顾问,扮演着传统的富有感染力的政治家的角色。他们几乎每时每刻都在问自己,如何才能确保和改善普遍的满意度。他们日复一日地收买了人们公开的赞誉,或至少是漠不关心。在给予和索取的基础上,他们建立了一个任何时候都能有多数人支持的专政。那些后来被证明符合德国人民福利的施政要点,实际上都建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他们对国家内部崩溃的原因进行总结和分析的基础之上。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总结和分析,纳粹领导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直在进行新的尝试。首先,应尽可能做到立足于公正,按普通百姓的名额进行食品分配。其次,他们采取一切措施来确保帝国马克至少外在的币值稳定,这样就能避免出现类似于 1914 年至 1918 年的战争通货膨胀,以及在 1923 年时德国货币几近崩溃的可疑迹象。第三,向军人家庭提供足够的金钱——这与一战时明显不同,这些军人家庭得到了应征士兵最后的总收入的 85%。相比之下,同样的英国和美国家庭得到的还不到一半。许多德国士兵的妻子和家人战时可支配的金钱比和平时期还要多,他们不仅欣喜于回乡度假的士兵意外带来的沉甸甸的礼物,也欣喜于来自被占领国的军队邮政包裹。

为了继续增强这种有保障的、或许还在改善的财产状况的幻觉，希特勒在很大程度上做到了既不向农民、工人，也不向中小职员和公务员增加战争税的负担。这同样与英国和美国的情况有根本的区别。但在德国大多数纳税人受到保护的同时，德国社会中收入较高和非常高的这部分人的税收负担有了显著的提高。反映第三帝国推动并展现出来的社会公平政策的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在1942年末，仅拥有房产的德国人缴纳的税款就高达80亿帝国马克。还有一个与之相对应的例子是，对于夜间、周日和节假日加班的加班工资是免税的。这一规定是在对法国的战争胜利后开始实施的，德国人把它作为一项社会性的成就一直保留至今。 37

本书的第一部分所要探讨的正是：从种族主义的立场出发，纳粹政权对被他们判定为劣等民族或者外来种族的犹太人表现得如此残酷，但为什么在内政方面，他们又如此具有阶级觉悟地对社会弱者施行救助。

当然，向富人们征税无法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提供必要的经费。当时，年收入超过6000帝国马克的纳税人，仅占全德国纳税人的4%。如果其中大多数人都只是象征性地承担如此少的税负，国家要如何负担这场世界历史上最昂贵的战争？答案很简单：希特勒是以牺牲其他人的生存基础为代价来照顾普通的雅利安人的。为了让自己的人民高兴，帝国政府强征不断提高的占领军税，并以此摧毁了欧洲的货币体系。为保证本国的生活水平，帝国在被占领国抢掠了数百万吨的食物供应给德国的士兵，之后又大量运回了德国。如果德国军队要从被占领国得到供给，而且是持续供给的话，那么它应该以所在的被占领国的货币支付它的经常性花费。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做到了。

几乎所有在国外执行任务的德国士兵，以及在国外为军事占领当局服务的人员，在国外为军事占领当局和德国购买原材料、工业产品和 38

食品，都不是用德国的货币支付的。所有负责人都明确地遵循这样的原则：如果在这场战争中谁要挨饿，那么一定是别人。如果战争中的通货膨胀已不可避免，那么它可以在任何地方发生，只要不在德国。为此而创造出来的各类技术可以参阅本书第二部分。从欧洲犹太人那里征收来的数十亿的款项也流入了德国的战争钱柜里，这方面内容可参阅本书第三部分。

接下来要介绍犹太人是如何被征收征缴的，首先是德国犹太人，然后是德国附属国的犹太人，还有被德国军事占领的国家的犹太人。我们将通过典型例子来说明这一切，而不是面面俱到、泛泛而谈。同样，我在这些章节中也将描述德国人在二战中为抢掠他人而使用的方法。我在这里还综合了当时特殊的或在这里和其他地方都具有代表性的典型例子。

在大规模的抢掠和种族战争的基础上，国家社会主义对平等和社会进步的关心达到了在德国至今也未有过的程度。这使它一方面广受欢迎，一方面又罪行累累。物质丰富的生活和这种间接的、个人不需负有责任但却乐得从这些重大的罪行中获益的好处，都决定了受到政权热心关照的大多数德国人的思想意识，他们不会站出来反对。相反，毁灭的政策还从中获得了支持的力量：它顺应了人民的福利的需要。一个值得重视的内部阻力的消失和之后犯罪意识的缺乏，同样得到了历史的证实。这方面可参阅本书第四部分。

对“事情是怎样发生的”这个问题作这样的回答，可以阻止国家宣传中对简单的反法西斯口号的减少。这些口号很难见到被粘贴在展示墙上，却几乎没有和民主德国、联邦德国和奥地利的全体德意志人二战后的历史分开过。但为了至少防止对个人和能准确描述的集体究竟承担什么罪责这类问题的不断发难，对作为国家社会主义的纳粹统治加

39

以考察似乎是必要的:作为丧失理智的、几乎是病态的、所谓有魅力的专政的主要责任人和他的追随者受到人们的指责;(按照来源于类似社会主义的前人的理论构建了这样一个短命的模式的)种族主义的理论家们,他们对于其他人的身份(有选择地或相结合地)是银行家、康采恩企业主、将军或嗜血的刽子手们。民主德国、奥地利和联邦德国的人们,对纳粹主义采取了极为不同的抵制政策,但是这些政策都导致了相同的结果:它们都为各自的大多数人民创造了一个平静的现代生活和良心上的安宁。

历史资料

就我这里提出的问题,现有的资料回答得非常有限。值得一提的是玛丽—路易丝·雷克的《国家社会主义在二战中的社会政策》(1985)一书所作的基础性工作。具有经验性和榜样性的社会历史调查,如比尔特·孔德鲁斯的《士兵妻子》(1995)和克里斯托弗·拉斯的《人物资料》(2003)也提供了很多帮助。关于针对苏联的饥饿战争,过去也有人作过一系列的调查。因此对于"享受'特供'的德国普通消费者"这一章节,尽管我找到一些新的资料来源,但作进一步实质性的研究工作是不太必要的。这方面可以参考由苏珊·海姆和我编写的《毁灭的前兆》(1991),在某些问题上还可以参考克里斯蒂安·格拉赫的《战争、供给、人民谋杀》(1998)和《有计划的谋杀》(2000)中的研究成果。对于许多单个的问题,由埃尔克·弗勒利希仔细整理后出版的多卷本戈培尔日记,是不可多得的来自国家社会主义权力中心的重要文件。 40

当对德国人民的福利负责的、毫无忧虑可言的食品管理部门在二

战中小有名气时,他们并没有告诉人们保持货币稳定和分割战争获利的方法。希特勒及他的顾问和工作人员有理由担心,1914 年至 1918 年的不幸记忆会再次重现。所以戈培尔在 1941 年 9 月写道:"我们是可以艰难地战胜一个新的通货膨胀的。"这句话背后也包括了对犹太人的征缴。

当我与克里斯蒂安·格拉赫共同研究了对匈牙利犹太人的大屠杀时,我就明确指出了反通货膨胀的政策、雅利安化和德国人民的福利之间的联系。作为在时间上稍晚的例子,我们可以从匈牙利的情况看出,在那里的犹太人的财产是如何被匈牙利化的。具体来说,一个被驱逐的犹太人家庭卧室里的用品都被他的匈牙利邻居买去了。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几十万次执行的征缴中获得的金钱收入(犹太人的银行存款、股票和积蓄)都进入了匈牙利的国库,再从那里用于支付军事占领、运回德国的供给和每个德国士兵的军饷等各项军费开支。这里就涉及巨额的国家洗钱行为,匈牙利负责了其中肮脏的部分。这一认识构成了我们接下来研究的出发点:我希望了解,是否这个在匈牙利的发现也发生在欧洲其他被占领国中。因此必须对德国、其他附庸国和被占领国的民用财政管理部门和国家银行进行调查。此外还要了解它们负责在军事占领当局中为战争财政收支所做的行为。最后是对如何把犹太人的财产变为现金,这些现金又如何同其他现金流混合以及它们最后的流向所进行的一个分析。

41 最早朝这个方向思考的是荷兰学者 A. J. 范德莱乌。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他就已经在他对德国法院系统的调查研究中对战争准备、战争以及犹太人财产的国有化之间的联系进行了分析。如何利用被驱逐、被流放的犹太人的房产,对在轰炸中牺牲的德国人进行"实打实的快速救援",在这方面近来出版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必须着重强调的是《"三号行动"——德国人抢掠了犹太人邻居》(1998)的作者沃尔

夫冈·德雷森所作的开拓性工作。

学者们对在塞尔维亚（施拉普，1986）、在意大利（克林克哈默，1996）或在挪威（博恩，2000）的德国占领当局已经开展过了全面的调查研究，但是还缺少对当地无论表面还是事实上的部门竞争关系的调查。因为军事或行政统治能力在以上的这些调查研究工作中主要是基于“摩擦损耗”、“部门竞争”、“无效率”和“一事无成”等观点分析总结的，所以读者在最后会感到困惑：为什么这个该死的纳粹政权还能维持这么长的时间？对此所作的专门研究，如格哈德·阿尔德斯对德国在荷兰的强盗行径或让一马克·德莱富斯关于法国犹太人如何被掠夺的专门研究，都回避了对传统的机构冲突作理论上自圆其说的探究。

作为中心议题，人们对德意志帝国1939年至1945年间的战时财政政策尚缺少足够的调查研究。我们可以把弗里茨·费德劳所作的值得肯定的早期工作放在一边。这个纳粹时代的作者知道他说了些什么和隐瞒了些什么。对单个工业企业、银行和保险公司所作的大规模的更新的研究，是最大程度上的高度专业化的研究，但其对历史研究的贡献不大。曼弗雷德·厄尔特对艾希霍尔茨的德国战时经济大历史的研究给出了几个重要的观点，同样重要的还有他在罗斯托克大学撰写的关于帝国银行的博士论文。但这两个主题很有趣的文章可能给人带来 42 的收获并不大。

相反，联邦国防军下属军事历史研究所中几十年来耗资数百万致力于撰写并始终未能完成的多卷本《德意志帝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研究小组，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把战争财政作为该书的一卷本或一个大章节的建议。作为研究小组发言人的罗尔夫一迪特尔·米勒在2002年秋天告诉我：“不行，财政问题对于我们这些普通的历史学者太复杂了，我们这里也有些关于德国信贷银行纸币的内容，但是我们无法进行调查。对此我们无能为力。”对于希特勒关于民族国家的理解十分

重要同时又异常神秘的德国信贷银行纸币的结局，可以参见本书第二部分的“个人支付”和“集体征收”两章。

关于军事历史研究所的同仁们的以上经验，我还有过一个小插曲，这是我不久之后在弗赖堡的联邦档案局军事档案部亲身经历的。我在那里预定了馆藏资料“RW7，OKW/国防军特勤军需部长”这部分（错误百出的）索引卡，后来负责的档案管理员在阅览室打电话给我并认为：“阿利先生，您似乎很专业，但是您好像还是搞错了，一般没有人预定这些档案。”军需部长是国防军的财政军官，大多数关于他们工作的文件都没能保存下来。少数保留下来的明显也没有得到专业的开发整理，并且他们不建议对此加以利用。在印刷好的馆藏目录中到处是可笑的引起歧义的文献来源。在联邦档案局在因特网上提供的馆藏目录中，没有任何方法可以找到国防军的特勤军需部长的财政和货币事务的文件，因为它们通常不会被收录到相关的文档中。

例如“1939 年至 1945 年德国驻波兰最高长官工作日志”这个文件集，它是由维尔纳·普莱克和沃尔夫冈·雅各布迈尔于 1975 年受慕尼黑时代历史研究所委托编辑的。在那里面，帝国银行经理和被占领国波兰的货币发行银行的负责人弗里茨·派尔施的大量文书，几乎都是归入“银行问题等”的文献摘要中。诞生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大型编撰工程《在纳粹十字标记下的欧洲》对财政和货币政策问题也存在同样的盲区。

43

对我们特别有帮助的是联邦档案局帝国银行的大量个人文献和其他丰富的关于个人的书面材料。这些资料直到 1990 年还保存在民主德国的国家安全部的档案馆中，并在此期间分类汇编成档案。同样属于这种编撰上的进步成果的，还有不久前由联邦档案局、国家档案馆和巴黎德国历史研究所共同完成的两卷本的关于《法国的军事指挥官》和《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的军事指挥官》两个文书资料集的检索工具书。

本书从《柏林州法院赔偿档案》(B Rep. 032)中受益不浅,该档案近年来在柏林州档案馆开放借阅。它包括来自许多欧洲国家档案馆的按国家分类、复印的一手资料,以及幸存者提供给法院的证词记录。帝国财政部的文书资料中虽然也保存下来了上万份文件,但是既没有纳入两德统一前联邦德国的档案中,也没有列入同样规模庞大的当年民主德国丰富的检索工具书中。直到2004年,差不多战争结束六十周年后,一个十卷本的帝国财政部现存文件索引才出版了第一卷。

尽管如此,这些文献还是构成了我研究的最重要的基石。在根据老的索引卡片确定的重要方向,和负责的档案管理员卡罗拉·瓦格纳的帮助下,我发现了许多至今从没在科学文献中被引用过的第一手资料。大部分关于德意志帝国战时特别财政预算的并且在上面极为细致 44 地记录了当时在被占领国的大多数征收活动的文书资料,都以明显的题头被要求销毁。这也包括可能记录有关征收敌人和犹太人财产的信息的文件,和有助于更详细地了解如何通过"普通行政征收"来平衡过度增长的财政支出的文件资料。尽管如此,我在本书第四部分中将尝试根据现存的文件碎片,重建德意志帝国战争征收体制的基本框架。这里我一方面重点研究的是,负担是如何在德国社会各个阶层间分配的,另一方面我探究的是,至1944年由被占领国和其他附庸国分担的不断增长的战争预算份额,是如何用劳动人民特别是被迫害的人群的财产来支付的。

帝国银行致力于通过各种手段搜刮被占领国和欧洲的犹太人。它不仅征收被杀者的黄金(包括金牙)、珠宝、一部分股票和外汇,而且它还在被占领国的国家银行里安插一个德国的特派员。他负责国防军的现金补给和占领军费,并(另外作为补偿性的任务)负责货币稳定的内部措施。为了这个目标,他也系统化地运用兑换成金钱的犹太人财产。本书第三部分将以希腊为例来对此加以说明。

我可以方便地使用法国中央银行的档案，但由于这些档案缺乏登记索引，一些相关工作难以完成。意大利中央银行档案的索引和工作条件都非常的出色。但我有两次希望揭开二战期间欧洲国家中央银行秘密的尝试都失败了：匈牙利中央银行明确地予以拒绝，希腊国家银行则对许多问题都没有给出回答。

45 在1945年还保留着的数千份看起来不那么重要的帝国银行文件，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被销毁了。这种情况既发生在两德统一前的联邦德国，也存在于民主德国。在国际的压力下，联邦档案局于1998年发布了一份对帝国银行文件留存情况的调查报告。这上面称："这对于无偏见的观察家来说显得无法理解，这些与纳粹罪行联系如此紧密的文件后来会不小心散落并且最终丢失。"在报告中提到，文件的销毁在今天是"不可理解的"。这表明，有人试图进一步掩饰事实的真相，而事实上也存在这么做的动机。不论在民主德国还是在老的联邦德国，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存在着一个一致的利益，要让所有这些可以让人作为证据轻松提起赔偿要求的文件消失。这不论在哪里都是有利于全体德国人的。

在东柏林，由德国专家和政治家共同组成的银行业委员会于1947年9月4日在编辑《关于接管帝国银行的会谈》的同时还编辑了一份《犹太事务索引》，其中包含对犹太人"减少的资产"的说明。这在后来也无声无息地消失了。但毕竟还有些保留了下来，就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多亏了民主德国使对于战时财政问题极为重要的档案资料《帝国信贷银行的主要管理活动》的核心部分保留了下来。它同时也包含德国私人银行的档案。对于本书提出的问题，帝国信贷股份公司国民经济部在当时出具的鉴定报告也具有参考价值。

曾作为帝国银行清算人的乌尔里希·本科特，几十年来一直住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他于1978年写道："长期以来我在未对内容加以

清查的情况下通过(联邦)银行销毁了数千份卷宗。”他期待某个踌躇的西柏林州中央银行的工作人员也做出同样的“举动”,考虑到那里还保存有帝国银行的文件。本科特的催促并不只是嘴上说说而已。在法兰克福,他通过德国联邦银行的文案焚烧设备,在 1976 年至 1978 年间 46 销毁了最后一批重要的帝国银行的工作文件。他这样做明显得到了联邦财政部的支持,当时的联邦总理是赫尔穆特·施密特,财政部长是汉斯·阿佩尔。

尽管有大量原始资料被故意地销毁,我还是能够通过欧洲其他国家的资料来还原这些强盗行径。在这里,出于单个章节和总主题“希特勒的民族帝国”间的平衡考虑只能一带而过的各种不同问题,还有大量的资料可以佐证。第三帝国的战时经济、财政和货币政策的重要文件,保存在至今我仍未使用过的莫斯科庞大的《帝国经济部》档案中,此外还有那里的《帝国财政部》和《四年计划的执行人》两大类馆藏档案。

更容易找到的是关于对被占领国系统化和肆意掠夺的书面资料、有关数百万从前线邮寄回家乡的邮件内容的资料,和小的以及稍大的投机商的资料。我无法对这些资料作进一步的利用。无论如何,对于德国海关部门的文书——特别是对地区事务负总责的高级财政总长签发的文书——作比在我的“令希特勒满意的强盗们”这一节里更加全面的回顾是非常值得的。这些海关文书构成了一个在历史学上从未被使用过的资料类别,但是依我的印象,它对于回答许多社会史上的问题是非常好的资源。上文已经粗略提到的在 1933 年至 1945 年间对德国因迟延付款而可能被扣押财产或因为交不起房租而可能失去住房的低收入者提供保护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法律,和其他一些在下文中要论述的主题一样,都经过了详细的调查。

引用了纽伦堡档案材料的文字资料依各自的编号(NG-,PS-,

NOKW-,NID-)被我列为一般原始资料而非专门的档案,因为它们可以通过不同的形式在许多地方查到。同样,对于艾希曼审判(ET)的材料和汉斯·弗兰克卷帙浩繁的政府日志的选集(弗兰克日记)也是如此处理。此外我还利用了华盛顿的国家档案馆、美国华盛顿大屠杀纪念馆和慕尼黑时代历史研究所的文书资料。

在引述中使用的正字法依据的是通用的规则。我没有对当时普遍的(纳粹)词语加上引号,否则可能会使理解上有些前后不统一。我将它们视做历史术语处理。我在处理元首、雅利安化、民族同胞、人民共同体或最后的胜利等概念时成功做到了这一点。同样非正规的词语如“犹太人赎罪金”也没有加引号,最后根据上下文人们可以知道,在这里指的是一种独裁恣意的行为。在遇到“最终解决”的概念时,词语本身给出的历史的冷静对我来说有些冷静过了头,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使用“去犹太化”这个词时,尽管1927年犹太人的词典里已经非常理所当然的有了相应的“去犹太化”这个动词。其他词的适用范围可能也是不同的。“犹太人财产”、“犹太人股份”和“犹太人黄金”这些名词原本是不存在的。所有这些都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只是在这个时代中夹杂进了一个集体仇恨的趋势。想要避免使用这些词就只有以极其繁琐的表达方式为代价(如:之前由犹太人占有的股票……)。因此我在这种情况下表达上会有些前后不统一。

如果我谈到“德国人”,那么它同样也要归入集体主义的普遍化的范畴中。但是我仍然经常使用这个词。在所有表达不完善之处,“德国人”一词所表现出的差异性要大于受严格限制的概念“纳粹”。希特勒总是一再成功地使他的支持基础远超出他直接领导的政党追随者的范围,并由此大大扩展了支持他的选民。当然,德国的男人们和妇女们也进行了抵抗,并为此遭受苦难,甚至牺牲;德国的犹太人也是德国人,并且不言而喻常常是很自豪地认同这一身份。尽管如此,当时的德国人

包括奥地利人(估计其中的95%)都从雅利安化中获益。如果谁把这 48
一切仅仅归咎在所谓的纳粹身上,那就是在回避历史问题。

在下面的几章中将列举多组数字,如:财政预算编号、征收单证、税率、每月向占领当局缴纳的占领军税和汇率等等。通过数字来详细说明是必要的,因为这属于问题的核心。对于外国货币,书中还给出了德国官方汇率的表格。关于如何换算成今天的货币,基本的原则是:1帝国马克相当于10欧元。为了更好厘清比较尺度的关系,读者有时应把它换算成现在的水平。1939年时一个月有200帝国马克的纯收入就是超出平均水平的了,一个退休人员每月40帝国马克也可以过上不错的生活。50千克土豆在1942年秋天的售价提高到了75帝国芬尼,这就已经导致了民族同胞"部分的不满"。

与一般的生活状况相比,战争支出高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但人们有时还是要回忆一下,在这数十亿的花费中还缺少了些什么。他们总是谈到购买武器、修建碉堡、交通运输和供应食品、德方的军饷和家庭生计的支出。他们没有留下一个帝国马克给反抗侵略者的正义战争、给战争伤残者和幸存者,他们也没有留下一个芬尼给华沙、鹿特丹或哈尔科夫以及数以千计的其他城市和乡村的重建。同样,他们对于被轰断或炸毁的桥梁、工业设施和铁路的重建,对于完全毁损的街道、农田、堤坝和森林的重建也没有任何花费。对于死难者的抚恤也没有出现在经济方面的战争收支表中。

受欢迎的独裁

在崛起的表象背后

由于存在600万的失业者，所以希特勒于1933年许诺“工作，工作，工作”。他可以在五年之内实现国内近期的政治目标。可是帝国劳动局报告，在1936年底仍有超过250万的失业者，一年之后为161万。工资和退休金仍停留在世界经济危机的低谷水平。1928年，在魏玛共和国最好的年景，所有的工作收入总计为426亿帝国马克，在1935年为318亿帝国马克。三年之后工作总额才增长到十年之前达到的水平。计时工资、薪金、社会保险金以及退休金仍处于明显较低的水平。比较农产品出售的数量，直到1945年农业的收益也显著地低于1928/29年的统计数字。

尽管如此，恢复经济的错觉和坚信独裁的情绪还是可以保证绝大多数人对国家社会主义祖国的忠诚。仅在纳粹上台几个月之后的1933年底，在大多数的民众中便流行起这样的观点：“人们越来越有信心和信念，在这个政府的领导下和德国一起向前发展。”莱比锡的解剖学家福斯这样写道。作为社会工人党的地下通讯员，维利·勃兰特在1936年的夏天这样描述柏林工人的情绪状态：“既不是过分热情，也不

是对政府特别友好”，当然“对政府也没什么敌意”。

经过自由的压倒性的全民公决，1935年1月，萨尔地区重新回到 50 了帝国联邦。之后，又实行了普遍义务兵役制，德国军队开进了莱茵兰非军事武装区。同时，德国开始用最先进的武器快速地装备部队。帝国政府因此违反了《凡尔赛和约》，德国脱离了国际联盟——这些措施使政府受到德国大众的普遍欢迎。在大多数人的眼中，德国背上了“战争罪人”和“辱没和平”的骂名，忍受了众多的刁难，国际地位也因此而降低。在最初的几年，对于这个惊慌失措、攻击性强以及自我攻击的民族，希特勒就意味着决斗。

当希特勒掌握政府权力的时候，经济上的衰退已经停止了。他的财政幕僚们适时地促进了刚刚开始的繁荣：他们增加了短期国债，以降低失业率、增加国内购买力。这样使国家减轻了非生产性的社会福利开支的负担，而且他们向国民许诺，国家的财政收入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加。

实际上，从1933年到1935年，国家的税收收入增加了25%，差不多20亿帝国马克。同时对失业补助的开支降低了18亿帝国马克。可以看到，在经过合理的短暂时间之后，国家贷款又筹集到了高达38亿帝国马克的资金。已经实行的政策似乎已经造就了一个美好的未来，并出现了“德国金融奇迹”这样的宣传用语，公认的经济学家京特·施默尔德斯在其发表的文章中还使用了“帝国金融经济的最高成就时期”或者“完全的价格政策”这样的表述。

因为政府在开支方面超过了附加收入的30%，在纳粹当政的最初两年，公共债务增长了103亿帝国马克。1933年至战争开始之初，用来满足不断迅速膨胀的赤字的唯一的重要税收，就是1920年由魏玛共和 51 国在整个帝国统一实行的企业法人税。在1936年8月到1939年7月之间，企业法人税分四个步骤实现了倍增。这项企业税从20%增加到

40%，特别针对那些从军备繁荣中获得利益的企业法人。同时，国家扩大了企业的纳税基数。1935 年从企业法人税而来的国家收入只有 6 亿帝国马克，1938 年已经达到 24 亿帝国马克。企业法人税在 1935 年占国家税收总收入的 7%，而在 1938 年达到了 14%。当局明确记载了这些平衡社会收入的措施的政治收益。帝国中央保安总局在 1938 年的年度报告中写道："特别是工人阶层对企业法人税的增加有非常好的印象。在他们看来，重新武装的费用是通过进行合理的负担分配所筹集的，国家对大公司的高赢利也相应地进行了征收。"

广泛适用的社会政策和税收政策减轻了家庭的负担，1934 年 10 月颁布的所得税法明显地提高了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低收入者从中得到了实惠。对这项改革是这样解释的：国家的总体收入不能缩减，因此其中的差额通过增加未婚者、未育的已婚者以及高收入的有一个或两个子女的已婚者的负担来予以弥补。此外，属于因人口政策原因而施行的家庭负担平衡措施，还有婚姻生活借贷、家具补助、教育补助和子女补贴费。到 1941 年，帝国为此而耗费了大约超过 30 亿帝国马克。

截至 1934 年一直向工薪阶层征收的用于失业救济金的税收，已经适度削减，以平衡所有纳税人已经提高的税率。由这种平等思想指导的改组同时引起了税负的增加：失业者不久就开始减少，然而用于劳动失业保险的捐税仍然很高。

52

从 1933 年到 1939 年年中，德国用于加强军备的开支达到大约 450 亿帝国马克。这在当时几乎是无法想象的数字，是德国在 1937 年财政年度帝国收入的三倍多。在 1939 年 8 月底，帝国债务也已经达到了 374 亿帝国马克。巨额的贷款为充分就业和军备提供了财政支持。就连被财政专家蔑称为"小市民"的戈培尔本人，在其日记中也称之为"飞快的赤字"。

1939 年 1 月，帝国银行董事会写信给希特勒："无止境的国家开支的膨胀已经摧毁了有序预算的企图，即使是税款负担的大幅增加也会将国家财政置于崩溃的边缘，并因此而摧毁中央银行的货币汇率。没有什么财政上的灵丹妙药或者什么机构和控制措施能够有效到在这种无边际的支出经济的灾难性作用下还能保持货币的稳定。没有哪个货币发行银行有能力在导致通货膨胀的国家支出政策下还能维持币值的稳定。"

这封信函的作者们长时间以来已经用各种诡计多端的财政手腕来支撑这种负债政策，但是这封抗议信还是导致了帝国银行行长亚尔马·沙赫特以及帝国银行董事会一部分人的下台。取而代之的是早已担任帝国经济部长的瓦尔特·丰克，他兼任了帝国银行行长职务。埃米尔·普尔，一位诚实正直、没有任何政治倾向的货币专家，被任命为主管央行业务的常务副行长，并得到数百名高素质的专家的辅佐。他们的任务很快就扩张到整个被占领的欧洲。普尔因为其偶尔对帝国政府能力的讥讽名言而为众人所知，不过他在这个职位上还是一直待到 53 了 1945 年。出于职业上的原因，他使用一切手段保证德国货币的稳定。他从所有能够想到的来源掠夺黄金运回德国。帝国银行第二副行长的职位由库尔特·朗格担任，他的升职全靠纳粹政党。

单就 1939 年而论，民用财政支出增加到了 163 亿帝国马克，而军用财政支出增加到了 205 亿帝国马克。在国家财政收入通常为 170 亿到 180 亿帝国马克的情况下，在债务还本付息方面已经要花费掉 33 亿帝国马克。后来成为德国抵抗运动核心人物的卡尔·弗里德里希·格德勒，很早就把这种开支行为称做"财政的疯狂"。他在 1940 年 7 月 1 日的备忘录中一针见血地写道："帝国的财政已经被破坏了。"那些日子里刚刚取得了军事上的大胜利：德国战胜了法国。在战争的持续过程中，到 1941 年底"已经有五分之三的帝国收入要用来清偿过去的债

务”。“也就是说，帝国的负债情况已经导致国家债务的还本付息已经无法通过现有的收入来进行清偿，而债务本身还在不断增长。”

希特勒用不断给数百万人造成负担的军事行动来掩盖他和他的领导班子都已知晓的困难的帝国财政状况。就如接下来发生的那样，没收财产、驱除出境和大屠杀成为了帝国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1942年，财政国务秘书赖因哈特甚至断然要求：“要不断地清偿帝国债务和支付帝国债务的利息，就只能通过不断加强对东部地区的获利式管理甚至压榨来予以满足。”纳粹政府需要通过不断的外围军事行动来维持内部稳定的表象。“巨大的军备计划和建设计划已经准备好了，”格德勒 1940 年写道，“德国民众已经得到会有完全的养老保险金的允诺。54 随着被占领区的不断扩大，人们都将投身于越来越庞大的建造计划和改造计划之中。”

以战争为目的的雅利安化[1]

1937 年底，帝国债务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从这时开始，帝国财政部的主管官员要不断地在贷款额度上做手脚。他们必须一直考虑，如何能为帝国债务再提供资金。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把目光转到了犹太人的财产上，他们断然把犹太人的财产划归为所谓的人民财产。在此，他们需要一个具有思想高度的、不仅在德国使用的时代概念，以便能在没收“人民的异类”和“人民的敌人”的财产时产生共鸣。

到 1937 年，作为公务员、商人、医生和雇员的犹太人都沦为特别法

---

① 雅利安化（Arisierung），系纳粹用语，即把犹太人的财产变为德国人的财产。——译注

的牺牲品。许多人丢掉了工作，事业中断，就连经营业绩良好的企业也被强制出售。此外，犹太人所从事的每一项经济活动都受到了不计其数的、地域各异的百般刁难。总而言之，就是要让所有的被逼迫者都认为有必要作出决定：离开这里！他们想要什么就给他们什么吧，只要能离开！财政机构和外汇管理处几乎是竭泽而渔地利用国家政策所造成的紧迫局势。借助于帝国移民税和一直以来对外汇、证券、邮票、首饰、黄金、宝石和白银、艺术品以及古玩实行的输出限制，纳粹国家不遗余力地进行横征暴敛。犹太人的私人财产、企业或者土地，有时候是半自愿的，有时候则是由于国家和社会的强制而被迫同意进行雅利安化的。犹太人还可以支配其人寿保险和证券，他们可以选择如何处置他们的财产。直到 1937 年底，所进行的并不是系统化的没收财产，而是一种越来越有组织的部分充公，而且有成千上万的非犹太德国人参与其中 55 并从中捞得好处。

真正对犹太人的财产实行国有化是从 1938 年才开始的，那时候就开始使用暴力了。奥地利也紧随其后，对犹太人的财产实行了国有化。1938 年 3 月 19 日，希特勒疑难经济问题的特别公使威廉·开普勒被任命为驻奥地利的帝国特派员。就在同一天，戈林交代给他三项任务。首先，他要注意考察奥地利的地下资源；其次，保证工资水平和物价水平的稳定；第三，对属于犹太人的所有奥地利企业实行雅利安化，在必要时，其规模可以超过在德国的雅利安化。“加快而且如实进行”对奥地利犹太人财产的雅利安化，对军备扩充计划的“顺利”实现非常重要。

人们只要看一下 1938 年初帝国的公共财政状况就会发现，加强军备的资金有相当大的部分是由高达 120 亿帝国马克的票据提供的，这种票据并不是国家的，而是一个虚构的、私法上被称为 Mefo（冶金研究

公司)的企业的。这种方法是由沙赫特在作为帝国经济部长和帝国银行行长时发明的。1939 年,这种票据第一次到期,因此必须准备用财政手段和长期贷款手段来清除短期的债务。同时,军队估计在接下来的财政年度需要 110 亿帝国马克来满足其目标。这已经超出了资本市场的能力。因此帝国财政部长紧急发行国库债券来满足当前的需要,这种国库债券将在半年内到期。

正是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1938 年 4 月 26 日出台了一项规定。该规定强制犹太人将其所有的财产详细地向财政局进行申报,只要其财产超过 5000 帝国马克。财产申报工作要求在六周之内,即于 6 月 30 日完成,后来由于提交表格缓慢的缘故而延长到 7 月 31 日。从这个时间点开始,如果财产发生变化或者重新组合,应重新申报。帝国经济部的负责官员以及法律评注者阿尔夫·克吕格尔将这种方法称为"德国经济上完全和最终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开路先锋"。克吕格尔将申报上来的犹太人财产按照不同的标准进行了区分:"不可侵犯的"是外国犹太人在德国的财产,"不可动用的"是德国的犹太人和无国籍的犹太人的非犹太配偶的财产,最后剩下"可以动用的"财产计 71.23 亿帝国马克。克吕格尔称,在 1938 年夏天,"据官方统计,德国和奥地利的犹太人拥有价值为 80 亿帝国马克的财产"。显然他是把"不可动用的"财产也计算在内,或者是将无需申报的在 5000 帝国马克以下的财产也计算在内了。但是人们不要以为,这样就可以推算出所有德国犹太人的财产了。例如在汉堡,只有 16% 的有纳税义务的犹太人申报了他们的财产。

56

如果考虑到并不富裕的犹太人,那么就应该注意到:其他的德国人要为他们在养老金、医疗保险金、死亡保险金和伤残保险金上缴纳多少。如果人们对德国和奥地利的这 70 万犹太人按每人 1500 帝国马克

计算的话，结合当时的平均寿命和养老金金额，便会超过5亿帝国马克。由于被迫流亡和强制出境，这批费用现在就落在了纯正的雅利安人的共同体手中。国家的开支相应地便可降低，或者支付水平便可相应地提高。

在财产规章的众多条款中，只有两条与登记手续无关。其中一条授权戈林为“四年计划”的负责人，“确保申报财产的使用与德国经济的利益相协调”；另外一条规定，如果犹太人企图藏匿其财产，将会受到 57 刑法的制裁。在这种情况下，财产将会被没收，而且本人会被处以十年以下徒刑。根据新的法律规定，犹太人从现在起必须“自愿”地向财政机关进行雅利安化的申报。同时帝国经济部于1938年5月颁布了下面的公告：“犹太人立法的发展促使很大范围的犹太人试图从德国逃离。”因此很有必要“及时地确保所有犹太人的财产秩序正常”。当政府官员根据线报得知有试图逃亡的企图时，就可以如范德莱乌之前确定的那样，“将犹太人的大部分财产运入国库”。

在财产申报义务公布三天以后，1938年4月29日，戈林主持召开了部长会议。会议讨论的内容是“将犹太人的财产转变为国家所有，将犹太人从经济生活中彻底清除出去”。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要明文表示将犹太人的所有财产通过强制手段全部兑换成国家债券。这种方式对外界也有所交代，即宣称犹太人最终会得到赔偿。因此在转换犹太人的财产时要“目的明确地当面发给国家债券”。

对于将犹太人的财产强制性地兑换为国家债券，从帝国财政管理部门的角度并无过多叙述。在1938年7月中旬，帝国必须大量收购其价值为4.65亿的长期贷款，以避免汇率的崩溃。这种行为不啻于借助印钞票来提供资金。帝国财政部试图达到两个目的：一方面通过各种方式来掩盖交易所的困难状况；另一方面按照财政部长的话说，通过回

58 购国家的长期贷款来减小未来帝国长期贷款证券发行的难度。1938年9月1日,什未林·冯·克罗西克在给希特勒的急件中写道:"9月份帝国的库存现金已近枯竭,新的长期国债在目前又不适合发行。"之后他又满怀着"信守不渝的忠诚"告诉元首:"我们在一个非常困难的财政危机中进行调节,给国外的印象就是我们的经济状况处于非常虚弱的状态,在国内会因惊恐而导致信任的锐减。"

人们看到这种状况就会明白,为什么德国对外侵略斯洛伐克,对内大肆迫害犹太人了。德国国库缺钱。德国政府不惜一切代价来避免国家破产的结果。只要出现静止状态就会将问题立刻暴露出来,所以唯一的出路就是不断的过激行为。

在11月计划后,戈林回忆当初的会议:"我们作出决议,使德国的经济雅利安化,将犹太人从经济生活中排除出去,将犹太人的财产计入(国家欠私人的)债务登记簿,并让他们退休。"他又补充解释道:"犹太人要被从经济中排除出去,要将他们的财产转让给国家。他们将会为此得到赔偿。赔偿额将在(国家欠私人的)债务登记簿中予以注明并将会按一定利率支付利息,以此维系其生活支出。"这只是意味着将德国犹太人的所有财产转换为国家长期贷款,也就是意味着战争资金拥有数十亿帝国马克的回旋余地。在1938年的外交政治上,犹太人问题作为重要的因素,德国驻外代表机构对于有关的语言规定了统一的说法:与法国革命中对待教会财产不同,对犹太人的财产不是没有赔偿的

59 征用,而是,"被没收财产的犹太人都获得了帝国国债的转让证书,他们因此而享有利息。"

1938年12月6日,在纳粹各州党部头目面前,戈林告诫般阐述了加强军备与犹太人的财产国有化之间的相互关系。所有犹太人的商店、库存商品、家具或者艺术品都要就地出售。例如,一名犹太人在斯

图加特拥有一幅油画，那么这幅油画就要拿出来卖给斯图加特博物馆。相应地，汽车也是如此处理，理所当然地要在当地市场上按照商品价目表出售。但是从出售商店、油画或者汽车所获得的利益，“不论是在慕尼黑、纽伦堡、斯图加特、卡尔斯鲁厄还是汉堡，”戈林补充道，“都不属于城市，不属于州，也不属于纳粹党的州分部，而是唯一地仅仅属于帝国。”

最后，戈林解释，他为什么要统领犹太人事务，虽然他从心里并不愿意这么做：“但是如果不这样做，那么我就不知道，我如何保证我的四年计划，也就是保证德国经济的正常秩序。”他再三地提醒对所有可能的犹太人的财产感兴趣的纳粹省党部头目：“从犹太人财产雅利安化中所得的利益只能唯一地属于帝国，也就是说，属于这里的管理者，这位帝国财政部长，此外不属于任何别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贯彻实施元首的扩充军备计划。”同样，内政部长弗里克拥有从个人和地方手中获取横财的职权。“目前在犹太人手中的财产被视为德意志民族的财产。任何减少这种财产的行为也就意味着减少德意志民族的财产。”1938年12月戈林为此公告说：“将犹太人从德国的经济生活中排除出去所获得的利益只属于帝国。”通过11月9日、10日的大洗劫，之前所表述的意图很快获得了实现。现在，由“四年计划局”的专家、帝国财政机关、帝国经济部和帝国银行设计的方案得到了施行，德国犹太人财产的相当大的部分通过强制公债转化成了国家财产。 60

这种方式后来成为整个欧洲雅利安化者的模版。不再仅仅是在斯图加特出卖犹太人财产的问题，不再仅仅是斯图加特人的购买兴趣，而是在巴黎、阿姆斯特丹，或是塞格德出卖犹太人的财产——是塞格德人、阿姆斯特丹人和巴黎人的购买兴趣。很多时候，在很多地方几乎都是当地机构为了当地的利益而出卖犹太人的财产，也就是把犹太人的财产卖给当地人。按照自1938年以来经过不断实践的原则，只要一切

正常运行，从这些财产出售中所获得的赢利都会归入帝国国库。瓦尔特·梅德尔在帝国财政部负责这项工作，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可以通过最一般的方式主管此事，即对各种不同的财产组成——无论它们原先属于谁——他都可以通过税收进行调节分配。瓦尔特·梅德尔是《帝国估价法评注》的作者。

纳粹的财政专家们精力充沛地热衷于将犹太人的财产转化为国家公债，其表现是，在大屠杀之后他们要求犹太人进行赎罪，并将犹太人为赎罪而缴纳的钱款称为"犹太人赎罪金"。这笔资金高达10亿帝国马克。为了筹集这笔资金，犹太人被强迫出卖房屋、证券，甚至是国家公债。但是帝国中央银行的代表卡尔·布莱辛在1938年11月12日的会议上对强迫犹太人出卖国家公债表达了反对意见。他担心"犹太人为了搞到钱，会在短短几天内卖出数以万计的国家公债"。因为"我们要发行新的国家公债，就需要现在的国家公债的汇率的支持"，那么现在突然这么多国家公债要卖出，就意味着帝国财政部长要被迫以国家的名义回收国家公债。所以，最后的结果是禁止犹太人转让国家公债。

在发行尽可能长期的国家贷款的同时，1938年，戈林需要大量的外汇用于进口支出。只有这样才能购买扩充军备所必需的原材料和生活必需品，也就是既要满足不断的需要，也要为战争作好所需的帝国粮食储备。因此他在7月25日，也就是犹太人财产出售期限届满之前的六天，要求在犹太人财产申报过程中要"以最快的速度"查阅有关财产中的外国有价证券的部分。拥有外国有价证券的犹太人被告知，他们要在"一周以内"将有关的有价证券"呈交帝国中央银行并按照要求出卖"。作为对价，被强制出卖外国有价证券的犹太人会获得帝国国库债券。几天之后，当时在奥地利主管经济问题的部长菲施伯克，要求一位

61

帝国银行的主管官员来负责由艾希曼成立的“犹太人移民处”的外汇部门。

帝国政府在1938年11月12日所施行的10亿帝国马克的“犹太人赎罪金”，一下子就将帝国收入提高了六个百分点。借助这笔资金就可以克服当前的国库赤字亏空。什未林·冯·克罗西克在1938年为了避免国家财政陷入完全失控的境地，主要通过减少财政支出、禁止新的公共建设以及缩减已批准的预算计划来进行调控。他用戈林的一句话来劝慰他的节省决定所涉及到的同僚：“现在迅速而充分地执行好保证国家在各种可能情况下得以存续的工作，才能在将来成功、安全地解决遗留的问题。”

帝国财政部在帝国银行管理部门的代表瓦尔特·拜尔霍费尔，在其所撰写的关于1938年的年度报告中，非常形象地将1938年11月中旬的国家财政状况描述为“灾难性的”。“国库赤字亏空已达到大约20亿帝国马克。帝国丧失支付能力的那一天即将来临。”这正是要实行“犹太人赎罪金”的时候了。因此帝国政府要求帝国银行“符合实际情况地”出卖犹太人拥有的股票，并断然要求发行克服困难状况的救急贷款。因此帝国经济部的犹太人事务负责人阿尔夫·克吕格尔，在其申 62 报上来的犹太人财产的总体核算中，特别注明可以变现的部分。这些不包括房地产或者企业财产的部分总计48亿帝国马克。这些财产可以毫不费力地被帝国攫取。1938年11月18日，一位外交部的代表记录下了戈林在内部谈话中的一段话：“帝国财政的形势异常严峻。补救办法首先是犹太人所负担的数十亿帝国马克，以及帝国通过将犹太人的企业雅利安化而获得的收益。”

1938年11月21日的实施条例将犹太人的赎罪金扩大为所有财产的20%。这项条例涉及所有已经进行财产申报的犹太人，也就是资产超过5000帝国马克的犹太人。他们必须分四个时期将到期的数额缴

纳给主管的财政机关，也就是在没有其他要求的情况下，分别于1938年12月15日、1939年2月15日、5月15日以及8月15日缴纳。通过这种方式，帝国国库索取了大约11亿帝国马克，这些在预算中被记载为“其他收入”。在1938/39年财政年度，帝国的正常收入总额大约为170亿帝国马克。这其中包括从帝国移民税中获得的收入，以及在1938/39年财政年度通过对犹太人歧视性对待而获得的其他收入，保守计算，至少为5亿帝国马克。这样，总体上估算，在战前几年的财政预算中，雅利安化获得的收益至少占到帝国收入的9%。这包括没有记载的将犹太人的外汇和证券强制兑换为国家公债（1933年到1935年，帝国移民税已带来将近10亿帝国马克的收入。1938/39年财政年度因为恐怖暴行而成为获利最高的时期，达到342 621 000.00帝国马克）。

只要稍微想象一下，德国或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任何一位财政部长、城市财政局长或是政党的财办主任，突然之间可支配的收入多了九个百分点，而且不给自己的人增加负担，那么显而易见，“犹太人赎罪金”是多么吸引人，而没收犹太人的财产对帝国的财政又是多么的重要。《德国税报》这样写道：“没收犹太人财产而产生的所有收益都归帝国所有，由帝国用于其基本需要以及用于所有德国民众的福祉。”帝国保安部用一种普遍夸大的方式记载道：与大屠杀不同，“赎罪金法规在民众中还是受到普遍欢迎的”。

63

什未林·冯·克罗西克在其回忆录中狡辩道：“我曾以我的名义阻止赎罪金的征收。因此，当时我确实已经尽力了。”而真实的情况却是，在战争开始后不久，关于犹太人支付赎罪金的第二次实施条例规定：“为了达到10亿马克的数额，犹太人缴纳财产的比率从20%提高到25%。”这份文件有什未林·冯·克罗西克的亲笔签名。

额外数额的缴纳要在四周之内完成,帝国财政从犹太人赎罪金中总计获得了1 126 612 495.00帝国马克的收入,通过其他途径获得的更多,达到了大约12亿帝国马克。

从第三帝国到联邦共和国,人事上和精神上存在着非常多的连续性,这些并无争议,也无需反复谈论。如果人们追踪本书中提到的帝国银行官员和各部官员后来的仕途轨迹,很容易就能发现,他们中有一半都拥有着"后法西斯时代"的轶事和令人不可置信的真实故事。下面这个事例可以为此提供佐证:联邦财政部的一位官员,某位西格特博士,于1951年夏天解释为何犹太人缴纳的财产从20%提高到25%时,在一封答复美国方面就此询问的官方信函中说:"原则上是这样规定的,犹太人缴纳财产总额一直达到10亿帝国马克为止。如果其中**个别**犹太人谎报财产或是根本不缴纳或是部分脱逃其缴纳义务,那么承担责任的不是德意志人民,而是由**犹太人相互承担责任**。" 64

1938年11月,德意志帝国在财政上究竟处于何种困境,可以从它需要借助大银行的帮助由"犹太人赎罪金"提供财政补助推导出来。1938年11月14日,在帝国经济部中负责信贷事务的部门(IV Kred)邀请柏林五大银行的董事在11月23日的上午开会。这五大银行是德意志银行、德累斯顿银行、商业银行、帝国信贷银行和柏林商业银行。根据会议记录,与会者讨论戈林"已经决定的计划,将犹太人的所有不动产和有价证券首先转变到帝国手中,之后也许转变到私人手中"。

如何判断变现的可能性,视情况而定,但预期还会有30亿至50亿帝国马克的收入,这也是在之后几年要增加的附加收入。德国的银行不再向犹太人提供贷款,因为犹太人在政治上受到歧视——用信贷术语来说,"他们具有很高的风险"。为了支付强制缴纳的费用,有缴纳

义务的犹太人必须转让其证券、首饰和不动产。但是这也让银行家们很紧张,因为“仓促地和没有经验地”出卖证券,会导致“有价证券市场的混乱”。银行家们希望在维护证券市场稳定的前提下慢慢地出卖证券,通过这种方式,银行就可以避免承担汇率的风险。作为技术上的手段就是要“避免没有必要的工作,基于对帝国财政部有利的原则而将富余的有价证券封存起来,然后根据资本市场的情况,从对帝国财政管理有利的角度出发,符合实际地和谨慎地出售这些证券”。

65

但是,帝国已经丧失支付能力了。在这种情况下,银行自告奋勇地提出,“对(犹太人的)已缴纳的证券预先提供适当的资金。关于达成协议的条件,沟通应该不会很困难”。于是他们便这样做了。与德国银行业的高层商谈的结果是,他们要为所有犹太人名下的有价证券承担保管义务。这样,市场维护和全面的监管得到了保证,而且还可以保证,帝国的债务证书不会流入到证券交易中。

德国大银行的高层在上述事务中不是扮演着强盗的角色,更确切地说是帮凶,是保证最有效率的没收程序的协同组织者。此外,他们还是窝赃者,他们将没收的财产变为现金。例如,德意志银行将五成的买卖佣金包括过户手续费的负担加在了犹太客户的头上。但在银行那边,听到的却是这样的声音:“在我们从事与特别税支付相关的业务时,我们只是向我们的委托人,也就是身为犹太人的存款人,从总额中抽取0.5%的佣金,也就是每一宗有价证券交易至少抽取1帝国马克。”此后,关于暂时国有化的证券的交易也会使证券交易活跃起来,而且使银行在介入交易时享有优惠条件。但是,这其中的收益主要都是流入帝国国库,从而降低了所有德国民众的负担。这同样降低了德国民众人寿保险的负担。

66

德国银行受国家的委托,为帝国的利益出售犹太人的证券,或者将这些证券转让给普鲁士国家银行。在其他情况下,这些证券要交到帝

国银行的证券部,从那里再销售出去。帝国银行证券部的高级行政专员布斯曼博士共同清算犹太人财产中的有价证券,并将收益汇划到帝国犹太人财产缴纳证券部分的预付账户上。这种操作一直持续到纳粹政权结束。因为在1941年秋天证券价格大幅上涨,所以帝国因此而得的收益也增长了200%。之后,帝国银行在一些占领国的证券市场也出卖这类证券,例如在巴黎。

从1939年9月1日到1945年,高级行政专员瓦尔特·布斯曼博士和他的上级瓦尔特·拜尔霍费尔一同负责管理战争财政。后者从1939年起在帝国财政部综合办公室负责所有的财政事务和信贷事务。1939年2月1日,他被任命为帝国财政部在帝国银行理事会的代表。在那里他负责所有的法律经济和国民经济事务,也负责现金的支付往来和公共财政经济。

对德国人民温和的税收政策

1937年底,戈林的一个同僚建议在战时,在现有税收的基础上增加下列附加税:所得税增加到50%,法人所得税增加到三分之二,对工资所得的额外收入征收8%的调节税,对其他的额外收入的税收增加到30%至100%,财产税增加到200%。一些自1936年就研究税收问题的人士适时指出:"对工资所得税增加50%,很可能形成庞大的工人阶层。""所有阶层的税负应当和他们的支付能力相适应。" 67

1939年春,在财政管理方面对战争的准备就已经进入了具体的阶段。5月30日就已经对相当多的建议进行了讨论,帝国财政部许诺会在接下来的十天之内修改其报告草案并装订成册。接下来,经济事务全权代表、国务秘书波瑟的建议引起了广泛的兴趣。其思想的关键在



于,“对于战争任务所需的财政负担要通过对战争结束后的帝国的收入进行提前的战争财政立法来支付”。在该建议的附件中解释了为什么在战争期间抵偿国债是没有必要的。帝国财政部建议,对所有自然人以及对资本公司的赢利征收25%的军费。那么将有50亿帝国马克由工资和所得税提供,另外有17亿帝国马克来自企业的税收。帝国银行赞同该项建议。但是帝国的政治领导者1939年5月底就确定了路线,并打算在今后持续贯彻这条路线:“军费开支应该从被保护地区(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以及从后来的占领地区中得到满足。”

1939年8月30日,帝国内阁防务委员会成立。在此背景下,《帝国法律公报》于9月4日公布了《战时经济条例》。序言和第一条规定,储蓄现金是损害民族的犯罪行为,但是直到1942年才确定对其进行刑事处罚。第二十二条规定了一个不太确定的,在最初收效甚微的企业利润缴纳政策,并对工资税和所得税征收50%的战争附加税。但是具体的措施确实仅适用于年收入超过2400帝国马克的德国人——这已是相当高的免税界限了。根据1943年的数据,所有的德国纳税者当中至少有70%豁免了直接的战争税负担,至于对于年收入在2400—6000帝国马克的纳税者来说,26%的人也是增加了很低的负担。所以《战时经济条例》只是让所有的所得税纳税义务人负担了所公开的50%的战争附加税的四个百分点。

68

1937年的社会统计数据给出了相同的结果。根据统计,德意志帝国年收入在2400帝国马克以下的雇员有370万,占全部雇员的53%。如果把大量从事邮政和铁路运输的小公务员也算上,那么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德国工人以及大部分的雇员和公务员直到1945年5月8日也没有支付一芬尼的直接战争税。

如果将《战时经济条例》与计划阶段的建议相比较,便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之前预定的所有的收入者首先负担50%的附加税,之后缴

纳所有工资、薪金和私人收入的25%的计划并没有实现。本来要广泛适用的税收政策被这样的方法所取代，即只是由顶尖收入者以及纳税人中收入最高的四分之一承担税收。这完全符合希特勒早在1935年便已表达的基本理念。“按照元首的命令，应该要么通过强制公债，要么通过先进的分阶段的赢利税收，对高收入进行战时限制。”

借助《战时经济条例》，纳粹德国试图达到“对战争负担的公平分配，并对购买力予以限制”。德国领导人试图造就和保证战争社会主义，以便保证小人物们的忠诚。就如同经济学家延斯·耶森所认为的那样，“必须避免少数人发财，而让其他人沦落为牺牲品”。希特勒也作了相同的表述：“当士兵们在前线浴血奋战时，不允许任何人在战争 69 中获利。当士兵们在前线牺牲阵亡时，也不允许任何人在后方逃脱其责任。”

因为《战时经济条例》取消了对加班、夜班、星期日工作以及假日工作的额外工资，所以在战争初期，工人工资实际上降低了。当然，企业从中也并未得到任何好处，它们必须把未付的薪金全部缴纳给国家。通过这种让德国工人负担的方式，国库总计至少收入了2.7亿帝国马克。1939年9月4日，国家宣布对烟草的销售价征收20%的附加税，对啤酒、烧酒和香槟酒的附加税也有相应的提高，这涉及了广泛的民众，不过，他们并未负担得太重。这种间接的战争税收——这是唯一提高的消费税——在1941年11月再次提高，增加到50%。纳粹当局的谨慎还体现在与民众相关的细节上。“在德国东南部的消费地区”，每100升啤酒“征收50帝国马克啤酒税，而在其他地区则征收70帝国马克啤酒税”，也就是说，在1940年，在汉堡或者德累斯顿，一升浓啤酒征收14帝国芬尼，在慕尼黑或者维也纳则只征收10帝国芬尼，也就是低了30%。当局之所以放弃酒税，是因为“酒税间接涉及到了广泛的葡

萄农阶层，而他们在全民中的经济地位并不是太高”。

然而，失去加班津贴也使德国工人阶层的情绪大受打击。所以，帝国国防委员会在1939年11月15日重新要求，对每天超过十个小时的加班以及所有的星期日加班、假日加班、晚班都要给予额外补贴。此外，废除了休假禁令。但对每天八小时工作时间之外的第九个小时和第十个小时的加班，依然禁止发放补贴。另外，这些工作的额外补贴不计入战争附加费的征收基数，而是——就像到那时为止在全德国都一样——计入正常的税收。

70 在同一次会议上，财政专家还建议，基于财政平衡和消费平衡的考虑，同时也是为了抑制民众的购买力，将战争附加税的起征点由年收入2400帝国马克降到1800帝国马克。这项建议“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而流产。货币政策的负责人坚信：“降低购买力的唯一有效手段就是对国民收入进行政治上的强制消费，也就是提高税收。”什未林·冯·克罗西克写道：“这样做虽然会受到指责，但是同样也能得到理解。”但戈培尔却对帝国财政部这些“无用的官僚主义者”抱怨不已，认为他们眼里只有“最后剩下的储备资金”，他们是一群“老朽的政客”，“真是悲哀！”

1940年6月，财政专家中有种意见占了上风：“目前根本不存在任何指望，有哪一种税收政策可以在帝国元帅（戈林）和元首那里获得通过。”相反，不同于任何战时经济理性，没有任何强制，而是出于纯粹平民主义的考虑，领导层在1940年8月取消了对于对第九个工作时和第十个工作时发放额外补贴的禁令。这还不够：基于军备部长弗里茨·托特的建议，从1940年12月起，只要是来自加班、星期日工作、假日工作以及夜班工作的额外收入均从税收和社会公共福利税中豁免。因此，民众的薪金收入显著提高了。为了民众庆祝节日的需要，当局还决定，从战争税中截流一部分作为圣诞节的开支。

与往常不同，财政部那些通常比较务实的高层此时也信口雌黄：他

们可以在对法战争胜利后为这些慷慨大方的税收减免政策埋单——“当然,前提是在1940年底结束战争”。国务秘书赖因哈特当时致函他的部长:“如果在这场宏伟的战争中,强有力的战争税收政策并未在我们中间实际推行,那么肯定会给德国公众和外国造成一个我们非常强大的印象。” 71

另外一个类似的可以理解的考虑是确保德国农民的安全感。按照帝国信贷银行国民经济部负责人伯恩哈德·本宁的观点,农业在经济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是“一块特殊的税收绿洲”,也是在整个战争期间唯一的一个“不仅在价格方面而且在税收方面都享受相当优惠政策”的经济部门。本宁认为,在国家投入了数十亿的价格补贴的同时,农业的总体税收在战争期间仍可以达到7亿至8亿帝国马克。实际上牛奶和土豆的生产价格在战时也增长了25%至35%。1943年,德国农民占有银行流动存款超过100亿帝国马克,此外还占有很高的现金资产。这是《战时经济条例》所期望的结果。1939年底,一位财政高官抱怨道,对于农业经济的优惠政策“在很多情况下显得太过分了,以至于其他的国民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成了实际上的牺牲品。这部分人没有掩饰自己的不快,只要不使用过激的表达方式,当局允许他们适当发泄他们的愤怒”。

基于相同的理由,为了减轻农业的税收负担,政府在1941年提高了社会保险金数额。这一方面补偿了在战时增加的生存成本,另一方面修正了在1930/32紧急命令时期对社会保险金的减少。最大的获益者是依靠小额保险金生活的人,因为正如一位激进的社会活动家所要求的那样,对养老金不是按照百分比进行提高,而是总体进行提高。每人每月可以多获得6帝国马克,寡妇的退休养老金增加5帝国马克,孤儿增加4帝国马克。平均起来,社会保险金增长了15%。同时,法律也

采取了比较宽松的资格认证制度，特别是对于在一战后的混乱时期为[72]经济的复苏作出了贡献的人们。保险金改革在德国的老年人当中至少一时掀起了“看得见的满意和欣喜”。政府首先补发了三个月的保险金。这项改革使这些受益者更加信任元首，而他们在此前经常会说的是，国家社会主义对老弱病残漠不关心并希望他们快速消失。

1941 年的保险金改革，使长期存在的每个社会保险者的供养问题得不到合理解决的弊端消除了。强制的医疗保险被广泛推行。每人每月须义务缴纳的保险费用为 1 帝国马克，寡妇和孤儿仍然无须缴纳。而在此之前，退休者要么依靠社会救济，要么只有在很例外的情况下进行私人投保。这些法律先后于 1941 年 8 月和 11 月生效。

1942 年，帝国劳动部建议再次提高社会保险金，而且应该显著超过 1941 年的水平，但是由于财政部长的反对而搁浅。同样，1944 年秋，戈培尔的一项建议遭到了财政部的反对，这项建议的内容是要提高行政部门的退休金总额。战争初期由德意志劳动阵线主张的对养老保险的激进改革，所谓的德国民族的养老事业也未获通过。该项目要求将养老金翻倍，以便与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平相适应。这直到 1957 年才在联邦德国得以实现。因为该项改革要求很高的税费，纳粹领导人担心会过于损害中等收入者的利益。劳动阵线想通过这种方式削减一部分战时购买力，并使更多的公众能够接受他们关于实现老有所养的许诺。但这也招致了帝国财政部长的敌对态度。他所支持的那些因参战而牺牲的人，和劳动阵线的“许诺”并没有什么关系。对这些“许诺”也没人[73]知道有多少会被实际履行。除非它们不是严肃的承诺，而是被作为面向人民的宣传工具。

显而易见的是，这种相互关系打上了第三帝国领导层的社会变革意志的烙印，他们同时积极地哗众取宠，是为了当其奏效时，大屠杀的

政策也能得以实施。所以在1944年秋天产生了关于养老金增长太快的激烈争论。金融经济已经变得相当的疯狂。赞同者希望通过借助受欢迎的“心理作用在德意志民族同胞中”宣传其思想。他们要求迅速达到“雇主和雇员的平等”,以便使人们预先尝到美好未来的滋味,并许诺“通过社会保险的改革使劳动群众的利益公平得以最大地实现”。然而帝国财政部部长、经济部部长、总理办公厅主任以及义务劳动者的全权代表都拒绝这样的改革。但是对于这项财政政策上的毫无根据的改革,博尔曼、施佩尔、希姆莱和巴克投了赞成票(戈培尔、戈林、希特勒和纳粹党各州头目当时没有机会参加这项改革的内部讨论)。

相反,1943年提出的第三次提高烟草税的动议,由于德意志劳动阵线的反对也陷入流产。德意志劳动阵线同时还欣喜地获悉,提高啤酒税、新的矿泉水税和煤炭税的动议也遭到了否决。1943年春,帝国财政部试图让因仰赖分配政策而获得较好生活的底层收入阶层负担全部薪金25%的附加税,还是终归失败。戈林完全拒绝了他们的企图。希特勒在其重视军事事务的思想指导下,对这方面的决策采取了回避的作法。

纳粹党办公厅主任马丁·博尔曼在1943年3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元首强调:第一,战争期间,如果能不增加税收,那是最好不过的了!战争结束后,一次性地将所有的战争赢利都收入囊中,才是最好的!第二,如果需要在战争期间征税,那么只能提高所得税的征收额度!而且从6000帝国马克才予起征。第三,削弱购买力。元首反复强调,高收入者对购买力的影响是很小的。因为仅仅是艺术品或类似的物品价格上升,这完全没有危险。大众的购买力才是最根本的!他们需要购买日常用品,他们要搞到食品和衣服等等。”希特勒下令两周后,3月18日,弗里茨·农嫩布鲁赫在《民族观察家报》的社论中表达了反对财政部长企图征收附加税的态度,即“从国家社会主义的立场出

74

发”,反对对那些额度在5000至6000帝国马克的小规模收入还提高附加税的征收额度。

经过如此调整的政策获得了所期望的效果。例如,1943年3月,法兰克福的州高等法院院长在其例行的舆论报告中描述了整个民族的田园生活:“全国的经济形势大好。人们偿付其债务,抵押物被返还。强制执行大大减少。地方法院的民事庭更多地只是在处理房屋出租者和承租者之间的诉讼以及赡养费的纠纷。法院执行官很大程度上是在作评估家用物品价值的工作。”该报告作者谈到被驱逐出境的犹太人的物品,它们已经被收归帝国所有,并卖给了在轰炸中被炸得一无所有而取得补偿金的德国人。相反,对于在空袭中物品遭受破坏的人们,对其损失必须作出粗略的估算。

在专业人士面前,伯恩哈德·本宁只好得出这样的结论:很显然,“考虑到”那些来自于低收入阶层的人们,他们是采取不了什么有力的措施的。帝国的财政专家试图纠正已在实施的税收政策,以减少巨大的购买力过剩也就是通货膨胀的危险,并且减少由于战争而激增的国家债务,至少也要使债务增加的速度放缓。什未林·冯·克罗西克自己也不无讽刺地将其追求的意图描述为必要的“税收布尔什维主义”。然而希特勒及其亲信总是对什未林·冯·克罗西克的意见予以反驳,认为提高税收“为时已晚”。如果“在战争一开始的时候,或者最晚在取得对法国胜利之后便采取这样的措施,那么一切都还好说。然而最好的时机已经最终错过”,再征税也就没什么意义了。

75

1943年5月,戈培尔满意地写道:“新的税收法律被推迟了。”尽管如此,不久之后他还是出于谨慎,对元首(与德意志劳动阵线的头目莱)作了关于税收计划的民众心理方面的报告。最后,“德国民众没想到又得面临新的负担(斯大林格勒—突尼斯—肉类供应的缩减—炸弹

袭击一撤退)”。在这种压力之下,国务秘书赖因哈特转而批评其部长并要求“必须停止关于增加税收的讨论,因为这会在民众中引起恐慌”。鉴于当前局势的不稳定,要避免任何增加混乱的可能性。

稍后,也就是在意大利“变节”之后,戈培尔要求德国防止发生类似的突变:“国家社会主义必须经历一场革新。我们要比过去更加社会主义地和我们的人民团结在一起。德国人民必须始终清醒地知道,我们是在公正而慷慨大方地管理着他们的事务。”事实上也正是如此。9月底,帝国总理府的办公厅主任拉默斯告诉财政部长,希特勒和戈林都认为,鉴于目前形势最好不要增加税收。1943年底,什未林·冯·克罗西克清醒地评论道:“无论何时都有很多理由表明,在任何时候增加税收都是不合时宜的:在年初或者在胜利之时,人们因为季节或者胜利 76 的喜悦所形成的繁荣景象是不可以因税收而葬送的;在秋季或者在遭受失败的时候,人们的经济状况也不能因为冬季的到来或者前线战报引起的形势压力而变得更糟。”本宁在1944年对财政专家们失望地说:“我还清醒地记得,年收入低于3000帝国马克者,从战争一开始就根本没有被列入征收附加税所考虑的范围。”

实际上,1944年年中,帝国财政部长至少已经让希特勒原则上同意了一年半以来所制订的提高间接税收的计划。仍然处于争论焦点的是,是否应对烟草制品和烧酒增加附加税,以及是否应对电影票和火车旅行进行征税。但是,日常生活所需用品仍然是明确予以免税的。拉默斯要求部长提交草案。税收总额大约会达到34亿帝国马克。但希特勒对征税的决定犹豫了好几周,考虑到军事形势,最终又禁止了这些法律。虽然帝国的财政形势在1944年的下半年急剧恶化,戈培尔却仍在1944年11月向帝国财政部争取显著地增加伤残补助金的数额。由什未林·冯·克罗西克提出的普遍增加共同税作为阵亡者抚恤金的建议却被宣传部长拒绝了。

1945 年 2 月,在几乎所有的国外收入都丧失之后,什未林·冯·克罗西克又作了最后一次努力。现在就连戈培尔自己都认为:“我们必须在钱的问题上得到可靠的保障。”但他仍然拒绝了财政部长的提议。1945 年 3 月底,苏联红军越过了奥德河,而美国军队则占领了维尔茨堡,纳粹头目已经丧失了对德国人民的领导能力,戈培尔在其日记中写道:“克罗西克此刻又在起草税法改革的草案。这个草案对我来说太不具有社会性了。该草案主要以消费税为基础,而对于所得税却没有考虑进去。但是,消费税几乎与所有的德国大众息息相关,因此在民众中肯定相当不受欢迎。这样的改革根本体现不了公平,因此我们目前根本不可能将其付诸实施。”

77

针对资产阶级的强硬税收政策

官方规定,从 1939 年 9 月开始,德国企业要把因为战争而获得的超额利润上缴国库,而且在《战时经济条例》中作了规定。但是相应的条款——因为各种避税的可能性——实际上直到 1941 年仍然没有产生实际效果。企业直到 1941 年仍然没有因扩大战时经济生产而进行信贷的需要,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来。

为了提高效率,对利润抽税的主管权于 1941 年 1 月 1 日由价格委员会转移到了帝国财政部。帝国财政部的负责人明显降低了超额利润的最低标准,其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对所谓的匿名资本也进行征税,从而使国家在战争中的收入保持增长。这使得企业对信贷的需求从 1942 年开始出现了增长的势头。

德意志银行的国民经济部也把这种现象归因于“对战争利润的广泛征收”。不过,军队很少付清购买军备的款项,并且总是拖延付款。

国家在1941/42年收取的营业税达到7.5亿帝国马克,1942/43年则超过13亿帝国马克,在接下来的财政年度降低了几个百分点。因为至少偶尔会出现超额抽税的情况,所以从1943年开始对单个企业的征税总量进行了限制:抽税总额不得超过企业营业收入的80%。

对于企业来说更为严重的是,1941年年中第一次在对企业的法人税中增加了战争附加税。这适用于所有年收入超过50000帝国马克的企业法人,现在总计达到了企业利润的50%——在战争之前企业法人税已经高达40%。从1942年1月开始,规定年收入超过50000帝国马克的合资公司的企业法人税为55%。而且有些还溯及既往地适用,从而导致了企业收入的急剧减少。实际上,国家通过征收企业税在1941/42至1943/44的三个财政年度内增加了四十多亿帝国马克的收入。 78

J. F. 雷曼斯出版社是一家专门从事医学、殖民政治和种族政治出版的专业出版社,该出版社的所有人,一个中产阶级,在1942年抱怨道:"高销售额也是具有两面性的,但最终只意味着财产的减少,因为不管利润率是多少,即便是按照和平时期的利润率来抽税,也会被榨干,而库存也会渐渐完全地售完。"柏林的旅店和葡萄酒销售商洛伦茨·阿德龙,1942年缴纳的税款不是其利润的40%,而是其年销售额570万帝国马克的40%。

1939年9月至1942年3月间,帝国国库从各种形式的战争税中增加了120亿帝国马克的收入。考虑到社会各个阶层的负担分配,对烟草、烧酒和啤酒征收的附加税占了这笔收入的大头,仅从1939年9月到1942年初,这笔税收就达到25亿帝国马克。暂时取消的附加税共计2.5亿帝国马克,剩下的90亿帝国马克税收,也就是75%的德国国内的战争负担,落到了企业和高收入者的头上。对此,戈林的财政顾问奥托·多纳表示:"所得税以及企业法人税的递增解决了国家所需要的

79 大部分收入。"同时,德国禁止任何房租和其他的价格上涨。

在1942/43财政年度,这种趋势更加明显。在该财政年度,德国国内税收的超比例增长,首先体现在对所谓的房租税于1942年年底又重新予以征收。这个税种是1926年开始设立的,因为不动产的所有者当时并没有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所以对其征税以缩小不同阶层在经济上的差距。这一税种所带来的收入,仅在三年后即达到平均每年8.5亿帝国马克,是魏玛共和国进行新的公共住房建设所需资金的"最基本的来源"。因此,当时对已经存有的不动产征收这种新的税收,与其公共福利的目标相适应,这种税也称之为建筑免除债务税。这种税收收益直接归地方所有。

在1931年12月8日颁布的紧急条例中,已经要求房屋所有者预先缴纳这个有争论的税收,以巩固国家财政。魏玛共和国因此而承诺在不久的将来取消这种特殊税收,然而纳粹政府通过1936年12月1日的一部法律又保留了这一税种。1942年该税种的重新起征,意味着要预先支付未来十年的税收。因为严格禁止房租上涨,所以这仅仅涉及房屋所有者。此外,帝国国库将原属于联邦州的这一税种收归国有,帝国国库一下子就多了81亿帝国马克的可观收入,折合成今天的欧元就是800亿。《银行经济》杂志为这个令人满意的结果感到高兴,"不仅因为这一税种调节了购买力,还因为它对国家财政造成了影响"。

因为这笔税收中的45亿帝国马克是以现金的形式筹集到的,所以战争所需的货币流通总额的增加在短期内得到了满足。业主们之所以积极筹集现金,是因为德国业主联合会的代表认为,缴清这笔税款就意

80 味着这项税收的结束。当然,他们也担心,他们会受困于国家制定的固定的房租价格、强制储备金或者高额的土地税。事实上,帝国经济部部长丰克在几个月后就发出通知:这些核心税种在战后对于国家来说是

特别重要的税收来源。1944年初，在那些在政治上极富鼓动性的财税专家们中间展开了一场讨论，他们赞同国家通过对不动产所有者征税来满足国家偿还债务的需要。在新闻界，反对房东的舆论运动也相当普遍。党卫军报纸《黑色军团》上甚至出现了“愤怒的民众”这样的标题(1942年11月12日)，以此表达社会舆论对房东的不满。在这种形势下，卡塞尔的州高等法院院长要求：“要从法律上保护正直的和值得保护的承租者，以对抗来自房东的故意刁难行为以及专横的解约行为。”

在缴纳房产税之前，纳粹省党部头目就展开过激烈的争论，如何对付不合理的房租收入，因为在战争中房屋所有者怠于整修房屋，因此原本在房租中包含的这部分费用房东并没有支出。所以很多纳粹省党部头目建议普遍降低房租价格，他们甚至把这种思想传播到了新闻界。但是财政部长拒绝了这种措施，他的理由是，这会增加因购买力危机引发的通货膨胀的可能。最后，还是决定对房屋所有者征收上述的特种税。

纳粹国家的社会性质究竟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比较有意思的是关于对房屋所有者应该征收多高的特种税的讨论。起初，在1941年12月，帝国财政部的官员主张一次性缴纳五倍年税的税款金额，这大约相当于40亿帝国马克。但是在主管部门的工作会议上，帝国内政部的代表主张更高的数额，普鲁士的财政部长建议税款总额为“八倍的年税”，帝国价格专员认为财政部长建议的数额对“房屋所有者来说是意外的厚礼”。帝国劳动部和军队的代表警告不要施加过重的负担。1942年1月，帝国财政部的主管官员将一次性的纳税总额增加到七倍的年税，而德意志劳动阵线的代表保罗·弗莱施曼认为九倍的年税更为合理。在之后的会议上，纳粹党部办公厅的代表警告道，

81

“不要给房产所有者送大礼”。3 月底,普鲁士的财政部长波皮茨建议征收十二倍的税款。最后,财政部的克洛普弗处长告知纳粹党部办公厅,博尔曼同意十倍年税的建议。什末林·冯·克罗西克也决定“采纳这个建议”。通过这个方式,房产所有者在 1942/43 财政年度支付了战争税种约 18% 的国内数额。

上述房产税的决策过程,对于汉斯·莫姆森所说的纳粹德国与日俱增的极端化倾向是一个很好的佐证。政治高层首先考虑的是,什么是他们所不想要的,为此他们急功近利并要求结果的最大化。因此,只剩下极少数的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政府官员们可以就少数问题任凭其官僚主义想象力的发挥,但既不是出于自身的需要,也不是因为接受了上级的命令。所描述的情况就是这样:在纳粹统治时期,没有什么时候是在讨论哪怕只是可能会增加工人负担的法律问题,对于房租税的讨论说明了一个原则,物质条件更好的人也要承担更高份额的战争负担。这符合戈林在 1938 年 11 月就已提出的有计划性的建议,即武装军备需要借助“富裕的德国人一次性的缴纳财产”来提供资金。

82 另一个类似的例子就是在对待证券交易收益的处理上。1941 年 1 月 1 日,对从股票交易中获得的收益又开始征收投机收益税,之后,每年分到的红利(以及各种类型的收入)被限制在六个百分点,这主要是基于“宣传上的考虑,因为宣传也需要以实际措施来配合”。因为在战争开始的头两年,股票交易以平均每年 50% 的速度递增,那么持有很多的股票就意味着还会得到更多。纳粹党的负责人,包括党的元首都一致反对这种“不劳而获”的收入。1941 年 12 月 4 日,帝国经济部被授权,要求所有的股票持有者履行普遍的申报义务,并颁布法规以规范对证券交易所获收益的转让和再投资。如同以前对待犹太人一样,现在要求雅利安人的证券持有者也要将手中的证券尽可能地转化为不可

再交易的国家公债。最后,这种做法没有推行下去,因为这会导致证券交易所对国家领导和党的元首信任度的下降。

1942年1月2日,纳粹政府就已经开始推行实施条例。从1939年9月1日以来购买的股票、矿业股票和殖民股票,到4月30日止要向当地主管的帝国银行分行进行申报(矿业股票是按百分比计算的采掘地下资源或欲申购开采权的企业的股票凭证)。同样,在此之前的六个月,也就是在实施条例起草和讨论的期间,这些证券如果交托给亲戚、未婚夫(妻)和亲家,以及交托给康采恩企业或者是雇员,也要作出说明。这种申报义务针对的是"大额款项",在10万帝国马克以下的数额就没有这种申报义务。这样做是为了"帮大买家进行消毒"。此外,帝国的证监会就信贷规定了德国金融机构金库中以股票证券作为质押的最高上限——银行之间各有不同。

申报义务按照1942年6月9日第二次颁布的实施条例进行。根据该项条例,禁止已经申报的证券继续交易,持有者并有义务将其出售到帝国经济部指定的机构。这是指由德意志帝国银行和普鲁士国家银行组成的财团。在短短几周之内,这个财团就吸收了价值1.5亿的证券。证券持有者已经申报的证券大约价值为10亿帝国马克。国家只是在具体情况下才予以干涉,即便如此,也只是要使证券持有者遵守规定,而不是要没收其证券。这方面的负责人想保留这样的可能性,即"通过新的索取来抑制新的超出预期的证券行情的上涨"(出于尽可能全面冻结资本市场的政策,所有证券的75%要转换为帝国公债或者是帝国国库债券)。 83

在1943年的一年当中,又有价值1.4亿的证券转归国家所有。因为银行财团将证券价格按照1941年12月31日的证券价格来计算,多数证券都被估值较高,所以大量买进就是不合理的了。很快,帝国银行和财政部、经济部的专家又作出决定,这些证券可以以购置时的价格予

以回收。到1943年底,已有大量证券被回收。就如同最初对待犹太人一样,现在补偿给非犹太人的证券持有者的也是冻结的,也就是不能买卖交易的帝国国库债券。

原本这些法律上的措施是有时间限制的,可是设定的期限一再被延长。1943年初,帝国经济部将——但不是溯及既往地——自1939年以来购进的证券的免税金额减半为50 000帝国马克。这种方式使大股东和出于谨慎尽量不将帝国债券装进钱夹的证券投机商非常气馁。帝国经济部部长丰克认为,这种证券上的收益在心理上是非常危险的。84 他的目的在于,控制证券价格,“把在证券交易所流动的资金排挤出去,然后引向国家债券”。也就是:给战争提供资金支持。因此,要阻断资金不断流入证券交易所。强制的方式是向帝国银行缴纳证券作为干预基金来稳定行市,这些基金将用来抑制证券价格的上涨。属于这个基金的还有尚未重新私有化的犹太人的证券。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这部分基金为了调节证券价格的目的而被吸收到德国证券交易所并转到普鲁士国家银行。

当然,各公司都尽力地想获得例外,将强制分配的国家债券卖出——但大都没有成功。总体上来说,国家的这种干预可以短期地遏止证券价格的上涨,但是不能持续性地进行调节。因为德国的战争财政的性质产生了购买力的滞剩,滞剩的购买力当然也就涌向了证券交易所。帝国银行很清楚他们可以美化修饰这种状况,但是他们无法消除出现这种状况的诱因。

毫无疑问,战争初期对德国胜利的预期为证券价格加了一把火。但是,这最迟在1941年秋天发生了改变。尽管表面上没有什么变化,人们对证券的购买兴趣仍然有增无减,但购买动机发生了变化:现在人们购买证券,只是为了避免他们的钱被强制购买国家债券。出于对政治领导者的怀疑,可用于交易的证券种类也在不断减少——那时的人

称之为“证券市场的物资匮乏”——而同时证券的需求又在不断增长。原因在于，虽然证券价格不断上涨，但是没有人想出卖证券实现其利润。最后，工业股票——尽管这在战争中有很大风险——相对于帝国债券成为较安全的投资项目。

相同的情况发生在不动产交易中。在“不动产市场上令人不快的交易”的标题下，帝国保安部记录了大量流向不动产的资金。1942 年，对于已经建造和尚未建造的不动产的需求不断增长，而同时又没有相应的供给。为了尽可能地阻断不动产的购买，而将闲置的资金引向国家债券，赖因哈特在 1942 年 4 月禁止从犹太人手里买卖已经国有化了的不动产。 85

1943 年初，作为对不断重复的警告的短暂的回应，证券价格出现了普遍的涨停。证券交易所依然开放，但是，其功能已经丧失。交易所投机商“因为没有其他的选择只能主要购买帝国的有价证券”。

因为上面已经提到的希特勒的预先规定，帝国财政部在 1943 年考虑对 4% 的纳税义务人，也就是高收入者，继续提高税收。帝国经济部部长在对这项法律草案的评论中表达了反对意见，称这项法律草案侮辱了富裕者，“导致了这个阶层的民众与其他民众的关系严重恶化”。国民经济学家京特·施默尔德斯强调说，国家这样做是为了追求税收的公平。但是，他又表示，大幅度地限制利润也存在着危险，因为“企业家的懒惰通过税收得到了奖励，而合理化、成本节省和卓有成效的行为却通过税收受到了惩罚”。

1943 年，根据工业界粗略的估计，企业利润的 80% 到 90% 都被国库征收去了。这种说法很明显有些言过其实，不过，倒是符合实际情况地揭示了纳粹德国在税收政策上的趋势。在缴纳一定的利润企业法人税，再加上国家恶意的支付拖延后，企业的利润已经明显地减少了，然

而，国库还要对这已被掏空的利润征收65%的税负。拿一家公司作为86例子，这家公司在1941/42财政年度根据当时的法律要把自1939以来获得的证券转让给帝国银行，并用其兑换不能交易的帝国债券。这样，公司按票面价值的利润为12万帝国马克。然后需要支付的是："55%的企业法人税，将30%的利润上缴，再加上约13%的营业税"，总计为利润总额的98%。政府在1945年规定了更加高额的财产税，而且该税种还溯及既往地要征收1943年和1944年的额度。

令军方满意的巨额军费支出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时的帝国政府严重地忽视了士兵家庭的福利问题。成千上万的劳动妇女和儿童那时候相当贫困，依靠自己的力量维持生活，家里的主要劳动力应征入伍后，他们陷入了物质上的困乏。威廉时代德国的政府官员将他们作为被施舍者对待。男人们在前线为祖国流血牺牲，但是他们对于家乡来说又是那么不可或缺。国家给予他们的太少，而要求他们牺牲的又太多。与此相关的法律是1888年制定的《现役士兵家庭资助法》，这项法律虽然经过多次修改，但远远不能适应"现代民族战争"的需要。

当时统治者的愚昧和无知在于，没有在经济方面为无产者阶层提供财富帮助。帝国的执政者们缺少的不是金钱，而是根本不具备社会政策方面机智果断的能力。所有的现代大规模战争所必须的分配正义和社会心理的必要性，对于他们来说都是陌生的。一个老化的统治阶级最后垮在自己的手里。虽然没有居心不良，但却在脱离民众和漫不经心的统治中将自己硕果仅存的合法性挥霍殆尽。1918年9月，当一切都为时已晚的时候，首席新闻官告知帝国宰相："住房危机、衣服危机

以及主要是饥饿正嘲笑着所有的说教。”

87 鉴于1914—1918年的经验,21年后还有相当部分的当时的德国人存活着,帝国于1939年8月28日颁布了《德国国防军费用使用法》。其中第九条规定:在计算家庭财政时要考虑现在的生活状况以及在和平时期应征入伍者所能获得的收入。该规定是为了“维持家庭的财产状况”,以便使士兵安心服役。最后,不仅对已有的报纸预订和生活保险提供补助,而且对之前的分期购买行为以及建筑互助基金信贷和抵押的利息及清偿提供补助。所有这一切补助都由公共财政提供,以“维护军队士兵的意志,使他们满意和有安全感”。

绝大多数德国人都能感觉到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明显不同。祖国没有降低入伍者的地位,国家关心他们,国家给他们以物质上的温情。政治领导者很明确地督促政府官员,“他们对于整个民族特别重要的职责就是要以极大的理解善待在前线奋战的将士的家属的苦难”。尽可能迅速和没有阻碍地贯彻实施对这些家庭生活方面的帮助,是每个政府机构的职责和荣耀。所有的执行令发布后,在战争的第一周还有很多请求连续不断地被提了出来。1939年10月,报纸上称,在戈林的施压下,入伍士兵的家庭赡养费又要通过法律予以增加:“国家社会主义的领导者要让前线的德国将士免除其家庭生活的后顾之忧。”从现在开始,所有的租金费用都要予以返还,所有额外的东西都可以提供。所有这些举措的目的,就是通过“持续的照顾”赢得“将士的心”。

88 在取得初步的经验后,同时也受到对法战争胜利的影响,帝国政府颁布了所谓的《现役军人家庭赡养费支付法》(EFUG)。这项法规将以前的优惠措施全部囊括进去;最引人注目的是,与当时其他人不同,军人家属的加班、夜班、休息日及假日加班的补贴免予征税。根据《现役军人家庭赡养费支付法》,现役军人家庭赡养费明确注明不是社会福利

的补助,而是作为"由国家履行的民族共同体的神圣职责"。现役军人家庭赡养费不是社会法意义上的补助,后者是可能被收回的,而现役军人家庭赡养费以及之前存在的其他收入不可以被索回;与一般的薪金收入的重要不同之处在于,现役军人家庭赡养费的支付不可以被扣押。这项规定不仅只约束国家,而且也对私人的债权人有效。《现役军人家庭赡养费支付法》第一条第二款简洁明了地规定:"现役军人家庭赡养费不是社会救济的支付。它无需偿还,而且它不能被扣押。"

对房租、社会保险、煤炭储备和土豆储备的附加支出以及其他支出,都没有受到官僚主义的干扰而得以顺畅进行。政府机构还为子女较多的军人家庭提供家政服务。对于其他特别的费用,不管是军人的家属因为牙痛还是因为孩子教育而需支出的昂贵费用,政府机构都会提供积极的资助。在日常实践中,相关的负责人会基于平衡各种社会关系的需要,以及根据情况的特殊性对现实问题进行个性化的处理。理所当然的,现役军人家庭赡养费的受益人无需纳税,在医疗保险中,他们也不用支付医疗卡的费用。因为这些费用可以及时得到支付,劳动妇女也就不需要再去工厂上班了。

不久,对现役军人家庭的赡养费必须设定上限的规定出台。根据规定,现役军人家庭赡养费不能超过军人在服役前所能取得的净收入。军人作为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只能拿到最后净工资的15%。也就是说,军人的妻子们可以支配不少于正常收入的85%,她们第一次在其89 生活中可以超然于其丈夫的任性和专横来操持家务。即使这种赡养费的平均值有些低,但在普遍的价格稳定、完全的房租停涨和禁止扣押的情况下,她们还是可以生活得很好。如果人们将军饷和赡养费等等算在一起,那么,很多家庭在战争时期的可支配收入要高于和平时期。

同时代的一项研究报告表明,这项措施首先是为了维护广大群众的民族情绪。但是,定时定量并且令人舒适的供养制度也产生了自身

的矛盾和冲突，在这些获得国家福利的女邻居的身上，聚集了社会上嫉妒的眼光、对获取那些额外好处的渴望、对如何欺骗性获得这种好处的兴趣以及对商品日益匮乏的深深失望。不过，这项措施总体上还是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军人的家人，首先是妻子们，在政治上至少以没有风险的形式保持了中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帝国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总计为现役军人的家庭赡养费筹措了275亿帝国马克的惊人数额。以最后的和平时期收入为标准，德国的军人家属在现役军人赡养费上平均获得了和平时期收入的72.8%，这几乎是美国士兵家庭（36.7%）和英国士兵家庭（38.1%）的两倍。

与此同时，在1939年至1941年之间预算项目也出现了增长，军人家庭从中获得的补助从2.5亿帝国马克增长到5亿帝国马克。在帝国出现危机的1942年，现役军人家庭的优惠骤然翻倍，直到战争结束，每年达到10亿帝国马克。当人们观察儿童补助金和家庭补助金的增长曲线（以1938年为100%起算）时，就会发现，它们在1939年增长了25%，1940年增长了28%，1941年增长了56%，而在1942年却增长了96%。不断地运用社会政策进行贿赂构成了希特勒民族国家内部政治统一的基础。

为了充实战争资金，帝国经济部部长丰克在1943年4月建议："对现役军人家庭赡养费和其他类似的社会补偿性付款的免税政策应该取消。"不过，由于希特勒、戈林和戈培尔强力推行的社会舆论政策，这项建议没有获得支持。希特勒、戈林和戈培尔以及纳粹党的省党部头目，把自己看做让德国内部社会舆论满意的最高守护者。"我们在战争中对内过于奢华了，"丰克干巴巴地说明道，"要想摆脱已有的政策轨道已几无可能。"

90

第二部分

征服和压榨



目标明确的劫掠

向德国人交纳特别税[①]

要描述德国的战争政策并非难事。由于军工投入和全民就业，工资水平和企业利润在战前就已呈急剧增长之势。帝国的税收和居民的可支配购买力均创造了新纪录。战争初始，尽管工资和物价水平停止增长，但是企业利润和一般购买力仍然呈上升之势：因为人们超时工作，因为就业人数增加，因为各种名目的加班。此外，帝国对士兵发放薪饷，对其家庭发放死亡抚恤金和入伍赡养费也毫不吝啬。

与此同时，由于军工生产不断扩大，民用物资的供应不再能够满足需求，甚至还急剧下降。这迅速导致了购买力和供给能力间的剪刀差，并埋下了物资短缺、黑市盛行、价值缩水和通货膨胀的祸根。1939 年秋天出现了局部短缺经济的典型症状，先是经营织物和床上用品的商店营业额较上一年下降了 45%，经营家具的商店下降了至少 30%，经营器皿和玻璃制品的商店下降了 35%。当耐用消费品很快被抢购一空后，剩余的购买力再也无法在国内得到满足，也就是说既不能转化为

① 原文为 Kontribution，意为占领军向居民征收的特别税、军税。——译注



商品消费，也无法转化为劳务消费。

出于政治考虑，广泛征税势必不可行，因此1939年至1941年间的 94 个人收入增长了21%——其原因首先是由于大大延长了工作时间。结果，过剩的群体购买力增长了一倍多，由140亿帝国马克攀升至310亿帝国马克。要缓解国内货币过剩并提高帝国收入，只能到被占领的欧洲国家去寻找出路。“既然不可避免要通货膨胀，那只要不在德国发生，任何地方都可以。”不仅政治家，而且帝国财政部乃至帝国银行都如此认为。

在这股邪恶的动机下，这些人做了能做的一切。被占领区的德军统帅——这些人还有些顾虑或者还有一丁点儿正义感——反复得到指示：“你们清楚我们的基本观点，那就是被占领区的军队开支应完全由当地来负担。”在塞尔维亚，一个深受戈林信任的人特别感谢帝国银行为他们配备了这些内行专家。这些先生们来到塞尔维亚的第一周就建立了塞尔维亚国家银行，随即发行了新货币——塞尔维亚第纳尔。由于禁止现金兑换，人们不得不把积蓄的现金存入银行并折合为新货币。这样，现金流动首先被遏制，进而减少了战争通胀的风险。

同所有的被占领区一样，在波兰，所谓的“防务捐赠”也逐年增加，这种进贡美其名曰“总督辖区为换得军事保护而对帝国防务的捐献”。由于1941年征收的费用不能令帝国财政部满意，1942年春季，捐税由1941年的1.5亿兹罗提（波兰货币）提高到5亿兹罗提，后来确定1942年将征收13亿兹罗提。到了1943年，帝国财政部索要30亿兹罗提。国务秘书赖因哈特用那句著名的格言鼓动那些反对在总督辖区实施 95 “拖延战略”的官员：“我们决不松懈！”此外，占领费征收的高低，理论上取决于德国在有关国家维持一支占领军所需要的费用；1942年，（“被邀请到”波兰或“行军经过”波兰的）德国军队预计约40万兵力，

每月需花费约1亿兹罗提的占领军费，而实际上波兰境内只驻扎了8万人。使用了超过驻军五倍的经费，满足了军队对食品及其他物资的需求，而被占领区的居民不得不忍受谷物、土豆、肉类和其他食品的严重短缺。如此这些林林总总的负担，帝国将其部分推给了所谓的总督辖区，到1942年底至少达到35亿帝国马克。但是这还不包括吸纳的实际存款，帝国银行对此曾经表示，“与总督辖区财政的最终剥离势必要延迟到战争结束后方可进行”。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空前地将诸如占领费、捐税、强制信贷和所谓的防务捐赠等转嫁到了欧洲。战争负担很快超过了被占领区战前最近一年的财政预算，在战争前半段毫无例外地超支100%以上，而在战争的后半段则通常超支200%以上。所以，1943年1月，帝国财政部要求“总督辖区应将三分之二的财政收入上缴给帝国”。果不其然，波兰辖区的德军统领们抱怨道，那些捐赠“在规定的时间内根本无法筹措到”。然而，帝国财政部坚持认为，所要求的防务开支“暂时来看是合适的”。1944年春，由于德国本土的工厂不断遭到空袭轰炸，越来越多的军工产业随之被转移到波兰，为此，波兰不得不集中全部的建筑和生产开支，因为帝国财政部始终不准备放弃一直坚持的原则，即“所有总督辖区的开支均自行负担”。财政部人士表示，这“刺激了经济发展并推动了新的税收策略”，使占领区内“金融收益不断增长”。 96

同样，德国的军工制造和食品进口迅速耗尽了法国被占领区经常性防务开支的四分之一。据1943年6月巴黎驻军的军需部长估计，用于士兵个人配置的开支也占据了四分之一。此外，各种各样的榨取手法也占据了不小的分量：根据占领军军需部长的指示，甚至占领军的亲属所需的假牙，包括金银的牙套，都毫无例外地从占领费中支出。德国人操纵当地的货币，最大限度地以法国法郎来负担其对英国的空袭，用

法郎在大西洋岸建造潜艇港和巨大的舰船。诸如此类都是和法国被占领区的军事管制毫无关联的事项。占领开支的约75%本应是军费,却用在了与占领军无关的用途上。1941年底,法国的首席谈判代表就曾指责(虽然是徒劳无用地):"以占领费为名征收的捐税,往往大部分却用于负担与占领军生计无关的支出。"

1944年上半年,丹麦的每月占领军军费开支达到8600万帝国马克——超过了其1941年收入的三倍以上。其中约四分之一用于官兵个人,其余用于"中间开支",特别是"当地的建筑计划和食品筹措"。丹麦被视做驻挪威的德国占领军的粮仓,不时还会支援德国本土。1942年,丹麦向挪威占领军的总司令部输送了22 000头牛、17 500头猪、2870吨黄油、近500吨果酱、800 000只鸡蛋、3000吨水果和蔬菜,这被誉为当年最重要的任务。不仅如此,"除了要照管被占领区的德国军队外,还要将大量的活牲畜(牛、猪)、黄油、奶酪、鸡蛋和海鱼运回德国"。

97

养育那些德国士兵和丹麦妇女所生的孩子,也要从占领费中支出。出于履行《苏德经济条约》的考虑,1940年至1941年间,德国人有计划地将苏联的订单转移到荷兰,其总额达6000万帝国马克,相当于从苏联向德国输送了35万吨粮食。由于这些订单可从荷兰被占领区的财政中结算,德国财政部将这些乌克兰来的粮食出售,从而将6000万帝国马克作为一般性行政收入转入了战争预算,又可以去购置新的坦克、枪支和飞机。

波兰的发行银行将所有能找得到的黄金如数上缴给了柏林的帝国银行。其对价仅是总督辖区政府的信贷账户上增加了相应的数额。所有被占领区的货币皆如此。为了满足帝国的经常性开支,波兰克拉科夫被占领区提高了土地税,并引入了一种新的人口税,大大提高了所得

税，还动用了从犹太人和被划归为“国家敌人”的波兰人处掠夺的财产。不过这些都没有加重在波兰的德国人的负担。提高税收只针对波兰人；德国人年收入低于8400兹罗提者无需缴纳所得税。这些德国人——即使从税收上看——也比在德国境内过得好多了。

1907年的《海牙陆战条约》允许占领国征收军事占领费和各种捐税。然而德国人所要求的数额明显违背了条约第五十二条规定的限度，这条讨人嫌的规则很快因“狭隘和陈旧”而形同具文。取而代之的是要求保护结盟，美其名曰战争进贡，由例如保加利亚人、斯洛伐克人或罗马尼亚人来负担。德国的财政官员毫不迟疑地将此列在“上缴金”项下。1943年，帝国的战争收入绝大部分是从国外攫取而来的，在国内强迫外国人劳动，或者侵占犹太人或“国家敌人”的财产。这些途径从根本上改善了德国的战时财政状况。直到1944年夏天，50%的经常性收入得到了保障，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87%的战争支出都依靠信贷。德国的财政专员们通过转嫁负担的方式大大改善了对需求的满足。 98

领导帝国信贷银行国民经济部的伯恩哈德·本宁，对占领费给予了高度重视，1944年他将其誉为德军战争财政的“根本动力”：这些所谓的“其他收入”作为稳定增加的款项被并入税收中。本宁陶醉于此。对于这项收入的数额，虽无日常报告记载，但可以根据统计数项的差额来估算。最耸人听闻的，当属国务秘书赖因哈特最后通报的数额——竟然高达每年260亿帝国马克！

本宁进一步解释，“其他收入”一项中包括：（1）所谓的行政收入，此项收入据赖因哈特1942年的统计为50亿帝国马克。它包含了一系列子项目：帝国铁路、邮政、银行上缴的款项，贷款的清偿，帝国有关劳动投入的债券的收益（早期的失业保险）。（2）乡镇的战争进贡，最初

确定为15亿帝国马克，后来两次增加，约合25亿至30亿帝国马克。99 剩下的分量很重的那部分收入（即180亿帝国马克）主要来自于境外：波兰总督辖区的防务捐赠，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的上缴金，特别是被占领区的占领费。这些收支的细目并未列出，但无论如何总有不可小觑的数额是与法国相联系的。1943年德国从法国获得了约1900亿法郎，折合95亿帝国马克（由此可见，通过占领和负担转嫁，德国成功地使法国的国民经济最大限度地隶属于德国经济之下）。尽管战争开支在1943年大幅增长，但《银行经济》杂志在1944年初仍满意地评述道：多亏了“其他收入”急剧增加，信贷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才没有提高，仍然保持在50%。

针对外汇兑换率，帝国采取了强有力的步骤。占领法国后，法郎的汇率由之前的100法郎兑6.6帝国马克被强制确定为100法郎兑5帝国马克，几乎贬值25%。德国军人的军饷和工资自然增长了。因为其数额以帝国马克为基础，却以法郎支付。（在德国占领军的压力下，法郎必然更加脆弱，即便如此，1942年底苏黎世公告的汇率仍然高出强制汇率的16%。）德军占领波希米亚与摩拉维亚并使之成为保护国后又如法炮制。捷克克朗仍为法定的支付手段，但也贬值了三分之一。1939年的波兰被占领区和1943年的意大利皆如此。德国人将里拉的汇率由100里拉兑13.10帝国马克降为100里拉兑10帝国马克。不过更有甚者，1941年卢布贬值了470%。不言而喻，那些应承担责任的人心知肚明，帝国马克相对于欧洲货币是被严重高估了。

100 汇率操纵的后果有利于被占领区的买方——包括整个德国的国民经济和在被占领区的每个德国士兵。同时，德国输出到这些因战争而在各方面均处依附地位的被占领区的产品价格上涨了——另一方面，输入到德国的产品也更加便宜了。随着战争的进行，越来越多的加工

业被转移到国外，而越来越多的原材料和制成品进口到德国国内。其间产生了一个贸易差的问题，不过仅仅是理论上的。由被占领区输入德国的产品，大部分以明显违反公法的方式划入占领军的开支中；另一部分则记入了柏林的清算户头①：仅是挂账，从未实际支付。

历史上的清算制是对进出口产品的中央结算。② 根据清算制，甲乙两国签订清算协定，甲国的进口商向本国中央银行用本国货币支付从外国购货的账款，乙国的出口商可以从本国中央银行获得相应的本国通货；进出口商间的交易付款均交给甲乙两国中央银行的清算账目，并在议定时间段内轧平。③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政府正是运用这套娴熟的手法，从各债权国家强制获得了十亿计的无息信贷。专家们如实地称之为单方面有益于德国的强制公债。

根据帝国信贷银行1944年7月10日的公告，截至1944年6月30日，帝国对被占领区、保护国、附庸国、中立国的债务已近290亿帝国马克。仅对法国、比利时和丹麦的债务就增长到140亿帝国马克。荷兰、波兰总督辖区、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乃至表面中立的保加利亚，对德国的战争贷款当时也达到了近130亿帝国马克。公告上写道：如帝国银行副行长普尔在1944年7月10日的会议上所说，根据“国防 101

① 即原1934年的“德意志银行清算部”。——译注

② 清算协定并非纳粹的新发明，而是1931年至1932年世界经济混乱的产物。第一个物物清算协定是瑞士与匈牙利互订的，魏玛德国继而开始与东南欧各国谈判清算协定，以帮助德国出口商收回已经冻结的商业账款。——译注

③ 简单地说，每一签约国的进口商将货款交给本国中央银行，而该中央银行即用这笔款项支付本国出口商。如果两签约国的进口与出口不相等，则其中一国在对方国保留一笔“应收账目”，该账目可用黄金或外汇来清账，但当黄金或外汇被禁止转移时，清账的方法是要么由债权国减少对债务国的出口，或由债权国决定增加来自债务国的进口。清算协定的另一特色是两国间的贸易平衡，即签约国一方向对方购进的物品在总值上必须与它售给对方的商品相等，以求双方贸易平衡，彼此无需付账。——译注

经济研究小组"的估算,被占领区的所有商品和劳务供给在二战的最初四年约700亿至800亿帝国马克,五年总共约900亿至1000亿帝国马克。超出清算交易而取得的占三分之一。由此可知,战争的最后阶段尽可能顺利维持被占领区的进贡之心是多么重要(见第四部分"1939年至1945年的战争收入"一章)!

此时已不可能再认真思考对苏联的掠夺计划,以清偿德国的战争债务。1941年制定的计划(见第四部分"虚拟的战争债务"一章)早就落空了。倒是帝国银行董事会1944年考虑:如何使用一些诡计将对外债务转嫁给债权国:以军事占领费为名,通过预支方式募集到大量的债权,并且通过缔结和约在条约中向被占领国主张这些债权。帝国财政部设想的德国外债就应当这么解决。德国国内已获支的战争费用如"国内薪金,(现役军人的)家庭赡养费,物资费用包括火车、汽车、制服、武器等等"将在战后与欧洲各国清算。为了稳住债权国的情绪,帝国银行行长丰克将那些过度的外债公开称为"价值稳定的投资"。

只要稍动脑筋,每个德国士兵的军饷都能用其所驻被占领国的货币付清。为减轻德国的通胀压力,这些士兵有义务在境外花费其军饷。同理可知,这些士兵应当让家中寄钱或通过战地军邮汇款给自己,从而在被占领区购买能买到的一切并寄回家中。具体的可行性随各被占领区的差异而有所不同。

102

然而有些部队,特别是那些开赴苏联前线的官兵,却有节制地花费其军饷。他们把余下的薪饷寄回德国。帝国银行的主管官员们看到了一个不妙的前景,因为官兵们在东方未兑现的购买力转移回德国后就成了多余的购买力。

这些负责战时财政的人士很快拟订了一种针对性的措施。他们有规律地将东线的士兵迁至西欧,特别是法国,以充实军队。在那里人们

有机会生活得更加丰富以补偿过分的辛劳。所以,军队财务部门很关心士兵将其多余的卢布兑换成西欧的货币。驻法国的一位主管军医1942年秋季报告:来自东线的部队在与营妓交易时肆意放纵。另一位军医1943年1月也从法国报告:从东线来的士兵因拥有充沛的供给和节余的金钱,经常引诱周边的女孩来到驻地寻欢。这样,东线多余的购买力就消耗在了法国,而没有转到德国。如后文所述,德国战时财政大臣们控制卢布转换成法郎,以致在法国战场的最后阶段不得不为东线士兵寻找营妓,而卢布就消失在德国的战争财政中。

个人支付 103

通常,进驻的德国士兵先使用德国信贷银行纸币(RKK)作为支付手段,再使用被占领区当地的货币。德国信贷银行纸币为纸币式样,面额0.5至50帝国马克不等,实际上只是取代了数目相等的帝国马克。借助于这种军事辅币,德军在占领每个新城市时,无须没收财产并履行《海牙陆战条约》中列明财产清单的繁琐程序。军队可以更灵活地搜刮财产,还能"避免其间军纪的混乱"。尽管德国信贷银行纸币在德国发行并由帝国印刷厂印刷,却不在德国境内流通。归根结底,它只是个典型的征收收据;帝国银行的副行长普尔称其为"披着货币外衣的征收收据"。不过从整个国民经济的视角出发,它对持有者来说却并非征收收据,而这一点蕴藏着巨大的利益。

以法国为例,由于银行和储蓄所被强令将德国信贷银行纸币与法郎兑换,商人和平民手中很快就握有了这种纸币。这些金融机构在法国中央银行将要上缴的占领军费兑换成法郎。法国央行继而将德国信贷银行纸币转交到巴黎的德国信贷银行——德军在占领法国后立刻建

立起来的德国金融中心,但法国央行从中却并未获得对价。毋宁说,法国中央银行不得不放任货币发行,或者说,它联合本国财政管理部门共同完成了这一切,以填补其垫付信贷银行纸币的对价。到了这一刻,打劫欧洲被占领国家货币的行为已经具体化,德国蓄意输出的战争通胀开始显现。

105 德国信贷银行纸币从法国中央银行又流入了军队财务部门,并得以再次转换为德军需要的商品物资。也就是说,德国信贷银行纸币反复流通和转换,显示出与征收收据的明显区别——它似乎不具备没收财产的实质要件。毋宁说,正是在钱币、商品、银行汇兑、货币发行的循环转换掩护下,实际的掠夺在悄然进行着。

采用德国信贷银行纸币的好处在于,德军要夺走法国人的牲畜、食品或燃料,或者要求法国人为德军提供劳务时,简单易行,都可直接或间接用德国信贷银行纸币支付。这些法国人个人并没有遭受损失,毋宁说,战时对个人财产的征收已经与一般性货币流通相重合。由此,那些德国银行的金融战略家们,就成功地将德国信贷银行纸币引入被占领区作为货币流通后给该国经济所带来的巨额负担转嫁给了大众。用武力强迫将德国信贷银行纸币混入被占领区当地的货币中,首先对整个法国的国民经济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相对的,德国经济却因此获利。

通常,德国进入被占领区并实施统治后就会终止德国信贷银行纸币的流通,从此将当地货币作为唯一合法的支付手段。比如在丹麦。但是在法国,尽管法国中央银行期许"一定程度上相当于占领区第二发行银行的德国信贷银行在不久的将来也会在法国放弃这种纸币",但是贪婪的德国人却一直在使用德国信贷银行纸币,直到将其在法国能得到的一切都掠夺一空。

106 实际上,所有那些负责补给食品、武器、原材料和其他重要物资的

机构，德国都想方设法从法国当地攫取而不欲从占领军费中支出。他们只需拥有并使用信贷银行纸币。1943 年 7 月，军需部长在驻法司令部提出，应禁止无限制使用信贷银行纸币，因为信贷银行纸币破坏了对占领军费的有序管理和使用。军需部长意识到，大部分驻法德军想方设法将信贷银行纸币输入法国使用。最后，在法国和德国金融专家的压力下，德国信贷银行纸币于 1943 年 12 月初退出流通，以勉强稳定法郎。

德国信贷银行纸币的这一基本特征很快被实践证明，金融学家格奥尔格·霍尔茨豪尔于 1939 年 5 月“针对他研究的这一不甚著名的领域”如是描述：“现金支付是最好的支付手段，它不仅有利于更好地掌握和攫取现存的物资并发挥金融作用，而且有利于平衡和分摊占领军的开支。”德军可以从每个人手中获得任何其想要的东西，因此军方强令，今后必须使用现金并“尽可能避免各种形式的实物支付”。各地必须坚持，“任何人任何时候都必须以钞票交换战争经济之重要给付”。霍尔茨豪尔最后意识到，恰当运用支付手段，可以控制被占领区的收益并提高利润。

实际上，战争期间在被占领区使用德国信贷银行纸币往往会带来一种“满足感”。“获得了对价的意识，使战败国的人们忘却了买方其实是他们的敌人”。在 1941 年著名国民经济学家，后来的抵抗运动战士延斯·耶森的指导下完成的博士论文中，赫尔穆特·卡斯滕谈到使用信贷银行纸币的另一个好处：“与之相对，征收总是让人有抢劫之感，因为征收没有对价，于是经济上承受的不利进一步增强了国家间的仇恨，并引发或明或暗的反抗。那些被征收侵害和刺激的民众就会有各种反应，从毁灭储备物资乃至破坏性的复仇活动，到地下的或公开的暴动。” 107

为避免这一切,经济利益和收益远景应协调一致。卡斯滕在其论著中进一步指出:"自 1940 年夏以来在法国的经验表明,以现金支付首先刺激了这些被征用的物资或其替代物不断被生产。这一效果也可以通过从遥远地区引进和直接掠夺部分实现。这种掠夺包括了那些基于长远利益而圈定的潜在目标。"

集体征收

在被占领区以现金购买军事物资或劳务的手法,美国内战时的联邦主义者就曾经使用过,1870/71 年的德国在普法战争中、1877/78 年的俄国在争夺巴尔干的俄土战争中也使用过。一战时,德军统帅部也曾从中受益。而且,这与《海牙陆战条约》第五十二条的原则并不矛盾。第五十二条规定:"对于现货的供应,应尽可能地以现金进行支付,否则就应该出具收据,以证明其征收,而且应尽快地履行对此应当支付的金额。"不过这一做法在一战中使用未果,毋宁说它导致了通货混乱,因为缺乏"一个统一的计划和一个强有力的银行部门来领导"。比利时是个例外,在那里,德国的货币政策和特别税政策较为强硬,在整个二战期间,都是由德方进行总体规划和进行系统化运作。一战时的做法则相对怀柔。

108

不过,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1914 年至 1918 年间,帝国陆军首先使用德国货币和帝国银行收购的外汇;而 1939 年至 1945 年间的德国信贷银行纸币虽然等价于帝国马克,但其兑换率由占领国基于自身利益确定。理论上说,一旦占领当地并成功地在被占领区开征占领费和捐税,就可以放弃使用德国信贷银行纸币。不过军需部长将其视做随时可以启用的第二货币,以作为财政高压手段备用。被占领区的人们习

惯将德国信贷银行径直称做军事银行。

尽管战争伊始德国信贷银行纸币就已经储备在帝国银行的保险箱里,但却是另有他用的。本来它们应当用于国内,以在战时尽可能快地收集交易的银币、铜币和镍币,并将这些金属用于战时生产。然而德军对波兰战争期间,信贷银行纸币即自动发挥了占领费的效用。于是,帝国银行将德国信贷银行纸币由最初的临时性措施发展成一个擅长赢利并能全面应付贸易战的工具。

德国信贷银行这一概念并无深刻含义,它的大名只是被印在这一纸币上而已。所以发行德国信贷银行纸币的金融机构“必要时都可以被称为德国信贷银行”。1939 年 9 月,德国信贷银行在波兰被占领区成立。管理委员会中有帝国银行、经济与财政部和军方的代表。他们 109 通过法律规定被占领区的支付及信贷交易,并实际担负了发行银行的职权和义务。帝国银行经理克雷奇曼大放厥词,称德国信贷银行纸币“在被占领区作为德国辅币来使用,恢复了当地的正常民生”。

1940 年夏至 1941 年 6 月,德国信贷银行的总部设在布鲁塞尔,由帝国银行经理恩斯特·朔尔茨主管。此后迁至柏林,因为它最重要的使命转移到了东线。德国信贷银行管理委员会的负责人是埃米尔·普尔。除他之外,帝国银行经理马克斯·克雷奇曼在帝国银行一个高级专家组成的参谋部的支持下,主持德国信贷银行的事务直到 1945 年。同时,帝国银行还考虑派遣有经验的工作人员赴被占领国家,以控制当地央行或发行银行,这些人员能和德国信贷银行的同事“完美合作”。所以,帝国银行以双重手段控制了欧洲占领区的货币政策。

由此,对被占领区发行银行全面有效的监督得以保证。其间,德国信贷银行能够放心地与被占领区的发行银行合作,以利用发行银行的本土优势并可防范经济财政政策难以避免的缺陷。出于同样的考虑,

德国信贷银行还控制当地其他银行的经营。可想而知，使用被占领区本地的货币总是优于使用德国信贷银行纸币，毕竟不会有拒绝承兑的顾虑，正如霍尔茨豪尔所言，因为本地货币为当地人所承认，自然也就不存在疑虑了。

110 被占领区通货的使用由此被改变，进而从根本上改变了通货的性质。至此，以前尚能够通过发行银行和国家经济部门的政策有针对性地保护其汇率的被占领区的货币，就退化为仅在本国内有效使用的支付手段而已。本地区国民经济之外，尤其涉及与他国经济联合的任何事务，都由德国信贷银行包办。德国银行专员建立的外汇秩序明确禁止被占领区的国家银行在德国或其他国家（被占领国或保护国）使用本国货币。

对法国、荷兰、卢森堡和比利时的战争开始后，德国信贷银行动用权力接管贵重物品和有价证券。战争一停，驻法国的外汇保护指挥部（DSK）就致函所有银行，规定银行对外汇、黄金、宝石、外国人和本国人拥有的外国证券都必须申报登记，且“暂时不可动用”。同时，占领军封存所有客户的银行保险箱，只有在外汇保护指挥部工作人员在场的情况下才可以打开。外汇保护指挥部通常由德国海关及德国财政管理部门的人员组成。

外汇保护指挥部自动没收了“国家敌人”的保险箱。驻巴黎的德国信贷银行公布，到1940年8月底，外汇保护指挥部抢夺了黄金、外汇、有价证券和其他公开债权总共价值5亿帝国马克，其中有上吨的黄金、38.9万瑞士法郎、85万美元和80万份有价证券。人们列出驻波尔多的外汇保护指挥部1940年6月30日的掠夺清单，其中主要是来自

111 犹太人的财产。这些财产被运到了驻巴黎的德国信贷银行。根据法国外汇保护指挥部截至1941年4月30日的一览表，战利品可谓“琳琅满

目”。当时“取得并没收了”2.4吨黄金、大量铸币和钻石，总价值28.5亿帝国马克。其中包括外国人的大量财富。在外汇保护指挥部的帮助下，仅在比利时、法国和荷兰掠夺的财富总计53.6吨黄金，并通过各地的德国信贷银行运送到柏林。

各地德国信贷银行还根据情况管理所征收的犹太人财产。如在1942年，东部帝国行政专署(RKO)颁布了一条“运送非工商业、无固定住所犹太人和国家敌人的贵重物品及无主财产”的指令。于是这些财物被集中到拉脱维亚里加市的德国信贷银行并由东部帝国行政专署进行财政保管。帝国银行的账簿上记录的分别来自布鲁塞尔、安特卫普、斯坦尼斯劳的财产有着相似的背景。约纳坦·施泰因贝格却误认为，德国信贷银行运送的是纳粹追随者的黄金和供奉，而未置可否。

而从德国将犹太人运至灭绝地(集中营)时，德国信贷银行会交给运送者少量帝国马克，以给这些被驱逐的犹太人途中购买食物及供警卫队购买返程票。在确认将杜塞尔多夫及周边地区的941名犹太人运至波兰东部的电传中，有这么一段话：“运送者携带(价值)4703帝国马克的德国信贷银行纸币。”可见，连这样的支出，德国也转嫁给了被占领区。

直到1941年8月，德国共发行了总价值54亿帝国马克的德国信贷银行纸币。至于战争结束时还有多少没印出来，谁也不知道。由于这套体系运行良好，1941年10月，克雷奇曼还向日本盟友详细介绍了德国在被占领区的财政手腕。很快，日本军队也充实了军饷——一种模仿德国信贷银行纸币的军方货币。在东京建立了针对南部殖民地的银行，负责中国被占领区、朝鲜和印度支那、菲律宾的货币事务，并由此主导当地的经济拓展。几周后，一群印度人来咨询日本人，因为日本人“承诺货币乃是为印度的解放和实现大印度的独立作准备”。 112

1941年春天，帝国银行副行长普尔夸赞德国信贷银行是“德国银行的速战队”，一年后他欢欣鼓舞地向经历了过去一年的人们下令：“发行德国信贷银行纸币使德军每入驻一新地区即刻就能获得所需金钱，且德国信贷银行还可辅助承担德国与被占领国家间的清算交易。通过这样的方式，各国发行银行在货币政策上被步步紧逼，直到他们顺从并用本国货币负担德国军队的货币需要及预支清算账户。如果他们拒绝或不再发挥作用，就要建立一个新的发行银行来替代。”哪里的发行银行工作人员逃离岗位、向国外输出黄金储备、毁坏货币铅版并拒绝合作——如在波兰和比利时——德军就会在那里当即成立一个新的发行银行。

后来普尔如此总结：“德国信贷银行在将德军所需都转嫁到被占领113区的同时，避免了以帝国马克支付，又利用了德国货币体制。这一悄然进行的银行途径和手法，侵入了各被占领国并为我们开启了战争经济，在实践中亦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战争结束后，普尔始终表现成一个非政治化的专业人士，一个遏止了最糟糕情况发生的核心反对派。

总之，德国信贷银行纸币充当了以战养战的经济手段。帝国银行的领导称赞道：“从来没有哪种货币工具，在战争中能够像德国信贷银行纸币一样展现出如此强劲的效用和广泛的灵活性。”利用它，帝国银行指挥部发展了个人支付的技巧，使得潜滋暗长的财产征收成为可能。通过瓦解欧洲被占领区的通货，帝国银行确保了帝国马克的稳定性。

而在法国方面，专家们很快意识到，德国人的行为将导致什么样的结果，那就是“我们的经济财力被耗尽并最终导致通货崩溃”。卡尔·弗里德里希·格德勒在1940年7月分析了德国信贷银行的作用机制并得出结论：“这个机制借助于畅通的财政管理肆无忌惮地剥削，势不可挡，制造的却是贫困和饥饿，这一切首先显现在德国的欧洲近邻，最后报应到德国人自身。”他向自己的德国同胞宣告，他们“总有一天会

为自己的轻信而后悔并付出代价”。一年多后，这位学者又控诉这一对欧洲被占领国家和附庸国横行无忌的经济压榨——当时欧洲占领区所有的国民经济（“或许丹麦是个例外”）已经完全崩溃了。格德勒用以下文字阐明其主旨：“企图壮大自身实力并以战争胜利的预期蒙蔽大众，如此的贪婪明显违背情理。问题是，任何一种由道德责任感主导并受道义原则约束的刹车系统迄今都没能建立。”

民族战争的胜利

令希特勒满意的强盗们

1939年9月3日，来自科隆的日耳曼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同时也是一名士兵的海因里希·伯尔几乎不能想象，他到底该怎么使用他的"令人难以置信的25帝国马克工资"。在鹿特丹，他很快用50芬尼为家中的亲人弄到了半磅咖啡。很遗憾，当时德国的士兵每个包裹只能寄500克，并且每周只能寄一次。"母亲对咖啡的渴望在我看来是不好满足的，"一段时间后，在法国的运河岸边，他写道，"请把你们还有的钱寄给我，不然我很难购买更多的咖啡。即使是德国货币也不要紧，我可以在食堂进行兑换。"

当时，官方规定每个德国士兵在每封官方军邮中可以接受额外汇款50帝国马克，但这一数字很快上升到100帝国马克。而在圣诞节可以接受200帝国马克，这样"至少给了士兵一个购买圣诞礼物的机会"。"然而必须提到的是，"负责匈牙利地区的德国国防军官员说，"通过这一措施，我们极大地促进了国家的季节性消费。"对在荷兰的德国士兵来说，每个月还有一笔1000帝国马克的额外金额（相当于现在的10000欧元），而这样做的目的是，士兵可以把它作为购买东西的钱转

寄出去。德国的银行特派员抱怨道，通过德国国防军的工作人员，“毫无疑问很大一部分”德国资金流入了荷兰，这必然导致“有害的货币政策的反作用”。在比利时负责财政的德国官员感到很气愤，在第一年就 115 有3400万帝国马克从德国汇入了驻防部队（其中第15军和第16军士兵的汇款因无法计算而没有记入）。银行的人抱怨这一“不可能的结局”，因为当纯粹私人目的的战地军邮汇款必须从驻军部队成本中扣除时，这是令人震惊的。但是帝国财政部对这一现象始终保持沉默。

以上是就官方规定而言。非官方的，每个士兵在入境时，或者休假结束归队时，他可以想带多少货币就带多少货币。1940年的秋天，帝国银行管理部门报告了一个中转站，即小城赫尔措根拉特（在亚琛的西边）火车站的状况：银行“被来来往往的德国国防军官兵挤得爆满”，而工作人员又接到“命令，在边境上必须兑换所有要求的金额”。从1941年开始，海关边境工作站正式取消了“对德国国防军士兵的外汇检查”。而在这之前，他们有时会拖延入境并“激怒”士兵。

在比利时，每个士兵入境时可以合法兑换的金额在1941年上升到了300帝国马克。这一数目远远超过了德国工人的平均月工资。但很快就有并不想保持部队良好气氛，而想保证财政数目的军官令人绝望地要求，把每人可以兑换的数量削减到50帝国马克。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保护货币，避免货币数量扩大带来的通货膨胀。但最高参谋部军需官提出了异议，他指出，考虑到东部部队特殊的救济需求，这是为他们进驻比利时鼓足士气。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基于一般性的理由拒绝了救济军队的要求。战地军邮负责人在他的报告中经常提到在他的“区域有非常多的战地军邮包裹寄回德国”。

德国士兵简直把欧洲各国的东西都买空了。他们从前线向家乡寄回了成千上万的战地军邮包裹。收信人主要都是女士。当人们同现已 117 年迈的女士谈论到这些包裹时，她们的眼中还会流露出激动的光芒：北

非的鞋子,法国的天鹅绒和丝绸,希腊的利口酒、咖啡和雪茄,俄罗斯的蜂蜜和熏肉,大批来自挪威的鲱鱼,更不必说来自罗马尼亚、匈牙利及意大利的礼物了。

每个人分摊到的幸福自然也很不相同。"我现在还可以回忆起很多很棒的东西,"一位女士在2003年给本书作者的信中写道,"亲戚和朋友们都以国外寄回来的包裹为荣,……寄件人的威望也得到了明显的提高,并且经常会被人们用来和没寄任何东西的人进行比较。收到珍贵物品的人也经常对只收到战地军邮信件的人吹嘘自己的礼物。"(按先后顺序,在以下的信中,写信的这位女士按照笔者在《时代》报上对老年读者的要求,回忆前线寄往家乡的战地军邮包裹。而当女士们详细生动地述说的时候,先生们无一例外地都在争辩,他们当时只寄回过一个包裹。)

自从1940年10月1日帝国与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之间的关税范围被取消后,保护国开始抱怨德国人"毫无顾忌"的购买欲。"通往帝国的快速列车上的行李架经常被很重的箱子、形状不规则的包裹及鼓鼓囊囊的袋子所填满,"一位德国公务员说道。人们甚至在军官及高级公务员的行李中发现令人惊奇的贸易商品——毛皮、手表、药物、鞋子,其数量无法想象。

沃尔夫·格特当时是布拉格德国剧院的一位年轻演员,之后曾在东德取得巨大成功。他曾在当年的信中写道:"亲爱的,请写信告诉我,我还应该带些什么回去。我将尽最大可能去弄到这些东西。""昨天我们搞到了一个很棒的写字台。最近一个同事维斯纳不断地到访,他已经成了一名真正的古董贸易商。昨天他买了一幅帝国时期的杰出版画,今天买了一个西班牙哥特式的圣母像。把钱投资在这种真正具有价值的物品上至少不会错。"格特还在赠给一个友人的诗作中写道:

118

"我将此视为圣诞的欢愉/献给你一个新的书袋/希望借此表达美好的祝愿/这就是与你的友谊对我的意义。"然后他又给家人写道:"我已经预先记下各种不同的愿望。昨天我给你们买了四公斤的可可(每公斤7帝国马克)。"罗莉会有"一些香水和科隆水",而他的多娜会"得到一双浅色的皮手套"。在寄出相应的钱后,格特给一个姓米勒的年轻人置办了"单层电炉、配套的锅、平底锅、电锅",之后他又向家里寄了订单和"催促"信:"要买多少张壁纸?每张0.5帝国马克的那种可以吗?我寄的种子包裹收到了吗?今天我把之前通知过你们的五个书籍包裹寄了出来。其余的必须下次再寄了。"

在法国,二级士官弗里茨·博阿斯在给《沃尔姆斯日报》的一篇没有通过官方审查的文章中写道:"首先人们冲向百货公司……每个人都想为家乡的亲人买点东西。恰好母亲在今天刚收到的来信中写道:'我们还需要买一些布料、套裙的料子(最好是带细条纹的棕色)、一件漂亮的睡衣和两三双长筒袜、一块擦窗户的皮抹布,如果可以的话还有一些洗手肥皂和一点咖啡豆。我亲爱的,你可以今天先把这些东西买了,下一次我会再写信告诉你我还想要些什么。我差点忘了,你们那儿还有杏仁和白色松紧带吗?'"

"我想要尽快地把黄油打包,还有四大块肥皂,这样它们在周三就可以被寄出去,"目前为止还很传统的士兵伯尔写道。之后很快就是经常出现的请求,因为他们想得到官方禁止的被偷偷藏起来带入的汇款来买新的东西("最好是放在一个包装好的蛋糕盒里")。几天之后就是最新的结算:"我昨天又寄出一磅黄油,现在一共有四个黄油包裹在路途中,还有一个包裹里有一块很大的肥皂,有400克那么重,是送给妈妈的圣名纪念日礼物。虽然现在我已经欠了40帝国马克的债务,但我在期待着那令人惊喜的包裹。"没多久他们就等到了:"那本夹了钱 119

的书《芭芭拉·纳德勒》我已经收到了，现在一共是60帝国马克(10帝国马克是你的，50帝国马克是父母的)。……如果你们一直按照现在的方法调整补给，我就不会错过这‘黑市’的美好了……当我可以给亲人寄东西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很幸福。”

有时伯尔会寄出一幅巴黎的版画，有时是化妆用品，有时是给妈妈的三磅洋葱，有时是一双女士鞋、一个指甲剪，或者他会预先通知大家几天之后的“紧张的黄油之旅”，并且让大家有所期望，他还有一些“给安娜玛莉的东西，更别提给我们的了……”几周以后，“吃完饭后我感到很舒适，然后就开始忙碌地打包，累得满脸都是汗水，十一个包裹啊，真的是十一个包裹：其中有两个是一位战友的，一个是一位中士的，我自己有八个，对了，有两个给你，一个是黄油包裹，另一个里面装了很多书写纸；有两个给阿洛伊斯一家，还有四个给我们家；这个星期我还打包了一包裹鸡蛋，因为我的鸡蛋不够打两包了，你在家很快就会收到的。”这件事几乎还没有全部解决，我们的士兵又找到了另一条通往幸福的捷径：“我在巴黎还可以买一些漂亮精致的东西，肯定要给你买双鞋，还有一些布料。”

法国的民间习语把成千上万像海因里希·伯尔一样驻扎在国外的德国士兵形容成“马铃薯瓢虫”。历史学家亨利·米歇尔写道：“带着沉重的包裹，德国士兵们开始了回乡之旅，这些行李中装满了女士衣物、各式各样的巴黎特产和奢侈品。虽然都是少量购买，但却对法国经济造成了重大伤害。因此才出现了黑市和通货膨胀，因此才使得法国居民越来越难买到生活必需品。”

120 莉泽洛特·S.的父亲曾被派往法国当卫生员，她在2003年回忆道：“据我所知，我母亲每个月都要给我父亲寄钱。而我父亲就用这些钱来买我们所缺少的东西，比如说像咖啡、可可、奶酪、各种规格的巧克力，还给我母亲、我及我们的学徒买鞋子，带夹层和不带夹层的皮手套，

有一次甚至带了一双摩托车皮手套。……几乎每天邮局都会往家里送来包裹。当父亲战友们的妻子筹不到法定的最高数额汇给她们的丈夫时，我的母亲甚至还给这些战友们寄钱。而父亲就把这些钱花在购物上。回家度假时他总是带着满满的行李，他一个人甚至都拿不动这些行李。有一次父亲带给母亲和我每人一件皮大衣，而我当时 12 岁，肯定还会长大。他就考虑数量限制，然后把东西按照国防军规定的单位寄出来。当时父亲是一名少校军医的司机，所以他可以利用这个机会。邮局每次都把十个包裹包扎在一起送过来。在我和我母亲的两人家庭生活中用不到的东西，我们就拿去交换。修理房屋和花园的工匠得到了不少的益处。”

与在法国的情况类似，驻扎在其他国家的德国士兵也做类似的事，即使是在一些很难买到所需物品的地方。在此我们以一些信件为例，这些信件是战争前期一位士兵从波兰寄给妻子和孩子的，而德国海关缉私部门对其进行了监察：“前天我已经把给父亲和弗丽达的包裹寄给了你，包裹到时请到邮局查收。……鞋子已经寄出了……我还给奥托搞了一些做裤子的布料。”在回乡之前必需的通知中：“你不用担心伊尔莎的复活节礼物，我已经买好了，会在复活节时带回去。这是非常漂亮精致的东西，你们在德国肯定买不到。我已经考虑了方方面面，也买好了所有东西，你就不用回信感谢我了。你可以答应我吗？我这次一起寄过去的咖啡你们可以尽情享用，复活节时我会再带一些回去。家里还剩的可可你可以送给伊达一些，因为我又给你们准备了足够多的。”

121

在波罗的海国家，帝国特派员洛泽通过观察发现了大量的资金流入并被兑换。这些钱被用来购买所有可以买得到的东西，然后“被买下的东西就会被寄出这个区域”。而这一情况发生的前提条件是，对德国

占领者非常有利的且带有强取目的的卢布的固定汇率，这一汇率使得帝国马克的购买力提高了400%。在苏联的被占领区，每人允许不经登记而携带入境、兑换和消费的现金额比在西欧各国要高：包括德国信贷银行纸币、卢布纸币和帝国马克的总价值达到了1100帝国马克，另外，还有600兹罗提（等于300帝国马克）用做穿过波兰总督辖区的旅费。当帝国经济部讨论这一规定时，所有人都同意，只有东部经济指挥部的最高行政专员霍夫曼"反对这项规定，因为这将导致东部国家的商品都销售一空"。直到最后，德国现金的流入才在占领当局的紧急要求下得到了限制。

奥托·布罗伊蒂加姆以前是东部被占领区的委员会领导，他在其1954年发表的报告中称："对德国军人和德国普通居民来说"，"波罗的海诸国由于其让人难以置信的低物价水平"已成为"一个真正的天堂"。那里的商品经常被卖空。布罗伊蒂加姆这样说是有原因的。"我去了国防军百货公司购物"，他在1941年8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那也是他到达里加后的第一天，"很多东西都没有了，但我的司机买了25公斤的黄油，我后来跟他分了一点"。

一名士兵1934年出生的女儿说道："我父亲时不时从东部寄来的包裹总是令人很开心，当连队在里加中途停留时，父亲寄来了装着黄油的金属罐头和可口的红茶。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一双既粗糙又很大的鞋子和系带子的靴子，这两双鞋一直到战后都还可以穿，并且一点也不汗脚。还有一个我引以为豪的用上好的俄罗斯皮革做的公文包被我拿来当做书包。我父亲也会带一些各种不同的小的皮制品——这就是我对这些东西的印象。一床很厚的绿色的羊毛毯陪伴我度过了童年的寄宿时光，同样的，还有一件深咖啡色的羊毛衫，它的领子是白色和棕色相间的。"

1943年的10月，海因里希·伯尔离开法国，被派往克里米亚半

122

岛,他再一次向家中寄出“作为最后一次贡品的法国黄油”。在战争最艰苦的时候,也就是12月初,他的头部受了轻伤,也许这个伤口救了他的命。他在敖德萨的军事医院驻留(“在那里的市场你可以买到任何你想要的东西……”),随即又作为康复期的病人被送到加利西亚东部的斯坦尼斯劳去。他立即就向家乡寄回了一包巧克力和一包肥皂。之后,在回乡休假之前:“我一直在想,从这里我还能给你们带什么好东西回去。我梦想中的半高筒男靴真的很好看很暖和,但是对我来说它可望而不可及,因为实在是太贵了……”

即使是在经济很不景气的年月,也就是1943年的1月、2月和3月,根据战地军邮机构的统计,第18军的士兵们从战争最前线列宁格勒往家乡寄了超过三百万个战地军邮包裹。这些包裹中都是战利品、烧酒和吃不完的食品。与所有的预期相反,也因为寄往前线的包裹数量一直受到限制,由德国寄往寒冬的前线的包裹明显少很多。这种极度夸张的自给自足到底到了什么程度,也许应该尽量保密。根据军队战地军邮指挥官卡尔·齐格勒的报告,在他的工作场所“持续性的战地军邮总的全部统计资料最后必须被烧掉”。

虽然挪威经常性地依赖食品进口,德国士兵在这里却也尽力买光了所有东西。虽然战地军邮包裹的数量在这里是受到限制的,但是德国驻军机构的工作人员很快被依法允许每个月寄2.5公斤的东西。包裹寄去的主要是鱼,同时很快产生了繁荣的银狐皮贸易。1942年圣诞节,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再一次扩大了官方规定的邮寄限制,并为邮寄鱼类设立了“转寄鲱鱼搁物架”,这样做是为了方便用铅封的快运货车取货并寄送“休假士兵私人购买的鲱鱼”到居斯特罗,再转运到其他地方。 123

由于战争失败带来的威胁和挪威百姓的异常不满,帝国特派员约

瑟夫·特博文在 1944 年尝试,正式将每个士兵在挪威每年可以私人购买的鲱鱼数量限制在 7 至 8 公斤。令人感到讽刺的是,军需部长在 1944 年 4 月的报告中说,他一直在努力地协调,想把额度上调到 10 至 12 公斤。遗憾的是他"没有成功"。

如果人们想想,当时一个德国普通居民一周肉类、鱼类的配额是 350 克,一名士兵未婚妻就可以把自己的配额提高 50%。这一结果还只是根据官方规定的数量,没有算上额外的休假时附带的数量——也就是按规定非法的,而又被官方默许了的。在 1944 年的夏天,责任开始明确起来,一些德国士兵因"非法出口鲱鱼"而被严格追究责任。而在 1943 年 12 月,军需部长冷酷地记录了帝国特派员的无理要求,即停止向德国秘密出口鲱鱼的要求"被拒绝了"。同时,德国驻地军团的负责人在 1942 年夏天证实,挪威人"在很大程度上营养不良"。

124 在军事胜利已经毫无指望的地方,当地负责军需的军官也偏袒着德国士兵这种习惯性的快速敛聚商品的欲望。首先发生的可能就是像德国邮票目录反映出来的那样。被封锁的库班河部队在 1943 年 4 月消耗了一百万张邮寄包裹的许可凭证,这些凭证上都印着"一个包裹/前线—家乡"。一个相类似的集邮方面的珍品,在 1944 年 1 月在已经完全被封锁的克里米亚被印上"一个包裹,方向家乡"。1944/45 年的冬天,在已经被英国优势军力包围的罗得岛上的军官,把 25000 枚邮寄包裹的许可凭证分配给了他的 6000 名士兵,用来往家乡寄包裹。在 1944 年 10 月,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还允许驻扎在意大利北部被占领地区的每一个德国人,合法地把 100 帝国马克兑换成德国信贷银行纸币并在意大利消费。因为这会导致货币状况和供应状况的不稳定,帝国财政部提出了强烈抗议,并且成功地在六个星期后使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取消了这一规定。

1943 年 8 月,在法国的被占领区,仅私人购买就花费了 1.25 亿帝国马克。计算法郎价值损失的人指出,这相当于今天的 5 亿欧元。这加速了通货膨胀,摧毁了军事政治秩序,削弱了国民经济的稳定。而这些对被占领国家的管理和持续的经济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因此这些地方负责被占领国家国民经济的驻地机关工作人员一直尝试限制战地军邮包裹的寄送,并对德国士兵进行海关监察和外汇控制。在边境的工作站,这种监察被看做"是非常困难的"。它导致了"令人不愉快的冲突"、"反抗和侮辱性的行为",而对物品破例的查收充公引起了"部队中普遍的愤怒"。

因此,戈林在 1940 年 10 月完全取消了已经放松了的购买限制。他认为,"各方面对被占领区商品销售一空的顾虑是杞人忧天的"。同时他严厉谴责"与控制购买和限制邮寄相关的措施"是"心理上无法接受的"。他要求要使德国士兵被允许按和本地人一样的限制数量来购买东西,只要他们买得起。现有的"毛皮、首饰、地毯、丝绸及奢侈品的购买限制"在戈林看来应该被"立刻"取消。同样,从战争前线寄往家乡的战地军邮包裹的数量限制也应取消(相反方向的包裹邮寄则依然有着严格限制)。 125

利用这个机会,戈林进一步创造了很快就非常著名的一个概念"携带豁免":"对休假士兵携带的所购商品的限制应当放宽。士兵所能携带的东西以及他个人和其家庭成员的必需品允许被携带。"另外戈林实施了一个方案,取消对本来就免费的最重 1000 克的战地军邮包裹(200 克以上的才被接收)的数量限制。1942 年 7 月 14 日,海关自行取消了对重量超过可允许的上浮范围的包裹的监察。

与他的士兵相一致,希特勒称赞德国国防军是"最天然的中继站,当每个士兵想给他的妻子或孩子寄点什么的时候,它总是有求必应"。

1942年夏天,他再三提醒海军元帅雷德:"士兵从东部前线往家乡带的东西",那是"对家乡非常有利的津贴啊"。当个别官员和海关公务员反对这种肆无忌惮的劫掠的时候,希特勒大发脾气,因为他要让士兵保持健康的情绪:"我现在要像强盗一样地前进。我还能从东部带点什么呢?艺术宝藏?根本就没有这种东西!只剩下那么一点吃的了!这种情况下不可能有比让士兵们的家人得到它们更好的事情了。"在同一时 126 期的夜间巡视中,希特勒也表示:人们必须"把回乡休假的士兵看做最完美、最简单的运输工具,允许他们给自己的家庭成员带尽可能多的食品"。

另外,凯特尔又立刻发布了一项命令。根据这项命令,"即刻起德国国防军的官兵,对他们有能力、有力气从被占领区携带至德国的食品、酒类和烟草,不受任何监察查封的限制"。在有关国民营养状况的大型会议上,戈林在1942年8月初又回到了这个议题上。据资料记载,他在会堂里直接说道:

"另外帝国财政部是被拥护的吗?——(呼喊声:是!赖因哈特!)——赖因哈特先生,取消你的关税吧。我对这一点都不感兴趣。……我宁愿看到这里有极大数量的走私品,也不愿看到征收关税但没有任何东西的情况。"

在同一次会议上,戈林以德国国民的名义作了更加强硬的表述。他对占领区的一些政客很是愤怒,因为这些政客想要保证法国货币的基本稳定,认为这样才能较长时间地榨取法国。他根据自我富足的原理反驳他们:"之前就有人说过,看在上帝的分上,人们不允许士兵们花他们自己的军饷,不然法国就会有通货膨胀。我不期望别的,只希望这一天的到来,即法郎不再是为了一定目的所需要的一些纸。之后法国才会发生我们想让法国发生的情况。"

一名当时在汉堡工作的女图书管理员,在其自传中写到这样的结

局："我们还没有碰到供给困难。……我们的食品、衣服、鞋子的配给证都能一一得到兑现。而且，休假的士兵还会从被占领区带回很多肉类、红酒、纺织品和烟草。"当这位女士 1943 年夏天忙于为父母在科隆被炸毁的房子做善后工作时，她在火车站看到来自东部前线的士兵，他们由于家乡的房子被炸毁而获得休假："他们日夜兼程才赶到这里，身上背满了包裹和行囊。"该作者的弟弟在 1944 年圣诞节时获得了休假，他"从箱子里取出一只全鹅、半只仔猪、一大块肥猪肉"。另外好像还有德国国防军部队发的东西，"咖啡、茶、烧酒和香烟"。 127

在凯特尔的命令发布后，基尔海关缉私部门的工作人员，极其透彻地写到关于希特勒规定的放弃所有德国和丹麦边境监察措施的作用："毫无疑问的是，在士兵行李掩饰下通过德国国防军进口到德国经济区的商品，首先以极高的价格在黑市上被买卖。无可争辩的还有，德国国防军的官兵，特别是海军和空军的官兵，在很大范围内自己从事这样的黑市买卖。"为了禁止这种情况，赖因哈特针对在东普鲁士边境上发生的一次法律争执宣布："从被占领的东部区域把尽可能多的食品运送到家乡，并且在海关方面被宽大处理，是元首的意愿。"

希特勒和戈林就是这样鼓励贯穿欧洲的、有组织的、轻松愉快的、最受欢迎的私人掳掠，并推翻德国国防军军需部长的限制的。战争开始时他们所作出的规定——德国紧缺的产品"净重在 5 公斤之内"进口时可免交关税——还是相对保守的。但根据所有相关部门的报告，人们一直非法逾越这种限制，虽然限制还是存在的。基于政治压力，1940 年夏天，陆军总司令部把合法的重量提高了一倍。

相反，戈林的"携带豁免"使有政治目的的几乎无限制的运输变得合法化。让我们再来看一下 1940 年 9 月的运送量，从法国运往德国的战地军邮包裹激增了四倍，平均每月接近 310 万件。同时，军饷在 1940 128

年 11 月 1 日也提高了:在波兰总督辖区、挪威和荷兰提高了 50%,在法国和丹麦提高了 20%,在比利时提高了 25%。通过这种方法"德国国防军官兵的购买需求在更大范围内得到了满足"。军需总长瓦格纳、陆军总司令布劳希奇和中将赖内克也赞同关于"携带豁免"的意见。

新扩大的购买可能性引致的腐败效应,从伯尔的信中就可以看出。在"携带豁免"生效之前,他还半是自我批评地记录:"商店现在已经被士兵买空了……但是我还是很难决定,我是不是也该囤积点东西;虽然每一件都要付钱,但在我看来还是跟偷盗一样;我唯一注意到的东西是咖啡。"事实上他之后也用 2 帝国马克买了一件开领短袖紧身衫,用 80 芬尼买了一条毛巾。但他还是克制住了自己,并注意到战友们的疯狂购物欲,他们的"囤积逐渐导致了商品的紧缺"。在其他场合,他们抱怨自己无法克制的购买欲:"魔鬼,真的是个魔鬼,他无处不在!"魔鬼很快也降临到伯尔头上。"啊呀,"他在回科隆之前预报说,"我还有半只乳猪送给你们。"之后他又悲伤地回忆起欢乐的时光:"啊,我非常想再带一只乳猪或之类的东西。"

在伯尔 1958 年写的《致一个年轻的天主教徒的信》中,浮现了一些他在法国的经历。比如正直的校长夫人,她站在走廊上按门铃,想给少尉先生看看她用法国丝绸做成了什么样式的漂亮女式衬衫。伯尔还用令人作呕的方式描述,他的士兵如何从空房子里掳掠床上用品、被子、129 玩具等,把它们分装在小包裹里,再寄回家乡。他自己则检查天主教堂的经文,对天主教教义进行辩论,在巴黎买下仇视德国人的书,发表长篇大论来驳斥他住在科隆防空洞的家人每夜对死亡恐惧。

戈林的"携带豁免"使关于"士兵可以带什么东西"的争论得以缓解。根据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的解释,"士兵可以携带行李的最大重

量是,士兵们不用皮吊带和负重装备而用双手可以承担的重量”。这挑战了帝国财政部负责管理海关关税的公务员的正义感。根据他们对海关日常实践工作的介绍,“允许携带的物品数量不应该按照入境人员的力气来确定”,而应该采用一个“大致的、普遍有效的、与单个入境人员力气无关的标准”。而当“每个人自己可以携带多少东西”这个问题出现在帝国海关的入口处时,政治领导者的耐心又一次消失殆尽。

1942 年 8 月,戈林大声叱喝这些“胡说八道”,因为处在领导地位的部队用这些“胡说八道”限制了“携带豁免”,士兵们只被允许携带满足他们随时归队义务的东西。他“反复”表达了意愿:“士兵可以买所有他们想要的、能拿的东西。”戈林的助手弗里茨·克拉雷曾在德国食品供应四年计划处工作,他固执地认为:必须使每个德国国防军士兵“像以前一样可以从被占领区携带所有他们买得起拿得动的食品和生活用品。对于可能发生的通货膨胀,我们就不需要为被占领区考虑了”。顺带地,“阻碍性的”德国海关规定应该被取消。1942 年 8 月的 130 这次大会之后不久,当柏林的海关对一名空军上校进行大搜查,并找到了很多没报关的名酒和食品时,戈林抱怨道:“买些红酒、白兰地或类似的东西,还有必须有配给证才能买到的东西,在有限范围内不仅仅应该被允许,照我看来,还应该被促进——当然这也是不应收取关税的。”

这方面的争论一直持续了两个月,以致惹恼了希特勒。为平息争论,财政国务秘书弗里茨·赖因哈特给帝国海关下了一个明确的反对现有规定的命令:“德国国防军士兵允许使用皮吊带和负重设备。穿过国境时不需要表明其军事立场。”士兵和士兵的行李要“尽可能优先地”办理,特别是“取消对士兵随身携带的所有食品包裹的查封”。“最高财政长官”赖因哈特威胁性地强调,“其任意一个部下在自己管辖范围内违反这项禁令,将来都会有危险,元首会让他们对此负责”。赖因哈特援引 1934 年的《税收调整法》的第一条,该条规定:判断税收构成

的财税公务员,要"考虑税率的变化和国民的看法",而且他们还有义务,对法律条文的每一段"根据国家社会主义世界观进行解释"。

因为1943年底法国急迫的通货膨胀危险,德军停止向法国境内引进非法的,但也长期以来早就需要的价值几亿帝国马克的信贷银行纸币。戈林因此要求:"我再一次请求大家对这个问题的关注,通过相关措施,实际上可以不用减少驻扎在西方的部队,特别是来自东部前线的士兵现有的合法购买的可能性。"直到面对失败的威胁,戈林才感到,自己不能再包庇私人的敛财了。1944年5月15日,在财政部和粮食与农业部的压力下,他下令禁止"私自从被占领区带回面粉、脂肪和肉类"。这一命令并没有产生效果,反而引起了民众的恐慌。10月,帝国财政部注意到,由于军事状况已经改变,"禁令并没有得到有效执行"。

把伯尔的战地军邮信件作为历史资料引用的人,能感到他的字里行间透出了驻防部队政治方面的微弱理智和一直被希特勒及戈林鼓励的掳掠行为之间的冲突。显然,伯尔也滥用了德国信贷银行纸币,并要求他的家人:"如果你们可以在信中偷运一些信贷银行纸币,那也很好,这样我就可以付清欠债了。"还有一次他建议他的妻子:"跟那些还在家里的人说,尽可能多攒些信贷银行纸币,因为战友们和我有很多钱要兑换……"虽然不是经常性地,但有时他不能成功地偷运货币和食物("用银行纸币真的很不幸;我本来还可以给你们寄一些巧克力和肥皂")。总的看来,在希特勒和戈林善意的保护下,士兵伯尔热情地、有目的地买了一些东西,并把所有的东西寄回科隆。在回乡休假之前他再一次要求家人:"如果可以的话,在信件里再给我寄点钱,那么我就能再买些这个国家的好东西了;这样我们还可以庆祝一个小的节日,啊,每天,每天,都是节日……"

整个军队里充斥着对食物和家庭供给永不满足的欲望,这种狂热

中和了战争所带来的困难。他们用一种有意义的方式促进了前线和家乡的联系。这种伤害其他民族而带来的特殊利益,导致了一种得到了更多关怀的感觉,一种在大的战争中寻找小小快乐的感觉。"啊,"伯尔在给他妻子的信中写道,"你相信吗?我很幸运,能再给你寄点东西。"或者:"能给你们买些黄油真的让我感到难以言喻的快乐。"在战争中就这样产生了千百个伯尔这样消极的忠诚者。独裁者为了保证其政治主导权,有了这些也就够了。信仰天主教的、非纳粹的伯尔一家,看起来似乎也过得很满意。他们有目的地花钱,在法国购物;即使在物价上涨时,也过得自在舒心。 132

帝国的旧货市场

除了来自国外的那些独特的战利品,有组织的掠夺形式和貌似友好但首先是以利益为导向的掠夺形式也在不断出现。1940 年至 1941 年间,铁路邮政工作人员定期从纽伦堡把他们的铁路邮政车转交给他们在边境火车站梅斯工作的德国同事,这些人负责把它们再运到巴黎,顺便塞给他们价值几万帝国马克的德国信贷银行纸币,让他们"从巴黎带些紧俏商品像咖啡、茶、可可、巧克力、白兰地、香槟、红酒、利口酒、衣服、长筒袜等"。这些东西也装载在同一列火车上运回梅斯。在那里,铁路邮政工作人员再"取走货物,把它们放在铁路邮政车上带到纽伦堡,它们大部分再被卖给邮政工作人员"。

如果是量小的包裹,士兵们就"滥用战地军邮",从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或希腊向家里寄出,每个包裹可装 600 到 800 支香烟;如果是量大的包裹,士兵们就把货物放在开回德国的国防军火车上。通过这种方式,德国士兵把比如说一辆装有 13 070 公斤甜橙的货车运送到罗森海

姆，再从那里让运输公司把它们作为“捐赠物”送给他们的家属。一名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工作的牙医搜集到很多金牙，并利用他们保守机密的义务拒绝透露这些财宝的来源。

133 科隆的最高财政官认为，腐败的风气是战争的必然后果，不可能被真正有效地解决：“生理和心理都饱受摧残的人，对奢侈品显然有很大的需求，除了众所周知的烟草外，这一需求远远未被满足。……特别是普通民众，人们愿意为自己所追求的东西付出任何代价。”在法兰克福海关缉查部门的管辖区域，一名空军士兵在黑森州卡塞尔市的小酒馆里变卖法国的美酒；另一名从乌克兰给他的妻子寄了170公斤食物，此外还有地毯和油画，代价是在包裹寄出后被关了三个月禁闭。在巴登—巴登，人们“大批量地”以高价变卖法国香水。那些为了私人目的而进行的大宗购物，被各公司视做“对战争非常重要的库存”，而士兵则称其是“为德国国防军运输的货物”。这里的一名空军检察员，为了去法国购物，从一名士兵身上诈取了价值16 000帝国马克的德国信贷银行纸币，因为这名被检查到的士兵倒卖了价值155 800帝国马克的法国首饰。

越来越多的被利益驱动的强盗行径，使得在比利时的军队管理部门要求建立抵制日益盛行的腐败活动的特种法庭。但是这一建议并没被采纳，因为该建议的提出者恰巧将其建议提交给了戈林。在比利时驻军的报告中提到：“军队管理部门反复申请的”要求在特别法庭上判决在黑市上被逮捕的士兵，在撤军比利时之前都“不会被正面地考虑”。人们之所以需要一个这样的军事法庭，“是因为每一个国防军分支机构的法庭一直偏向于，对其所属官兵的违法行为包庇甚至默许。在空军中这种情况尤其突出”。戈林是空军的最高指挥官。

134 我们在下文中将详细引用一个文本，因为其特别的表达能力。这

个文本来源于德国邮件检查机关，更确切地说，是设在乌克兰的信件检查站。那里的办公人员分析了成千上万德国人写的往返于家乡和部队驻地之间的信件。他们的分析为德国各行各业各阶层人士的活动范围提供了精确的全貌。它有一个巴洛克式的题目："基于乌克兰的'德国邮政服务公司'的检查所得出的关于乌克兰状况的报告 A，即：经帝国专署派递的德国公司的邮件，及其员工从乌克兰发往帝国境内的个人邮件"。这个邮政服务公司负责运送乌克兰帝国专署德国国民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在乌克兰寄出或收到的邮件，同时也负责致力于"乌克兰经济领域开发"的私人公司员工的邮件。下面这份档案文件是当时的记录，但是未注明日期的副本。从内容来推断正文之后没被印刷的部分，它应当是在斯大林战役之后写的，可能在 1943 年夏天，因为某些地方提到了"年初的危机"与"多疑和拒绝"。黑体的文字表示对原文的强调。

"信件检查站在过去半年中检查了上千封驻扎在乌克兰的德国人的信件。这些信件从一方面显示了，大部分在乌克兰的德国人愿意共同参与到建设中，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东欧热火朝天的建设工作。然而必须非常严肃和正确地评价令人忧虑的**腐化现象**。这些批评和质疑的声音在信件中尤为引人注目，而且乌克兰的损失可能也显得被扩大了。信件内容毫无疑问地反映了损失的存在，这同时也威胁了帝国的利益，损害了建设工作。

135

"在乌克兰的腐化现象下首先存在的就是**交换贸易和黑市交易**。大部分来自乌克兰的信件涉及买卖。交换生意是大部分写信者对乌克兰仅有的兴趣。他们为了得到乌克兰的产品（鸡蛋、油、肥肉、火腿和其他物品）可以进行所有可能的和不可能的交换。在信件中谈到了用来交换的商品：盐、火柴、打火机火石、酵母、旧衣服、家具、女士内衣、手袋、粉碎机、黄瓜刨皮刀、吊袜带、糖精、护肤霜、小苏打、指甲油、发酵

粉、唇膏、牙刷。我们有印象,有多少个写信者说到过,乌克兰已经成为德意志帝国的'旧货市场',而德国人团结一致买空了乌克兰的东西。这里所有的东西都被'卖掉'了,一封信件中提到,最便宜的合金首饰、小雕饰、不值钱的项链被卖给乌克兰农妇。旧的过时的艳丽衣服卖得也很好。有时人们会用'非常便宜的玻璃首饰'换一整箱大约 2000 只鸡蛋。这让人想起和黑人用玻璃珠换象牙的交易,一个在乌克兰的观察者写道。

"所有从乌克兰寄回家乡的信件的主要动机是:把他们能弄到的东西拼凑在一起。'买下所有的东西',信件中会出现类似这样的字句,'钱是没有用的','别老看着钱,要买些需要的东西'。家中的妻子被要求清除家里的所有废品。士兵甚至要求妻子,不许往纺织品收藏室送任何东西。'在这里我需要所有东西。'收信人被要求'拜访所有亲戚朋友','并把旧衣服、旧家具收集起来'。人们借钱购买所有的必需136 品。采购联盟联合起来,统一行动,以方便组织运往乌克兰进行交换的物品的运输。不再穿的衣服 1942 年被周围的熟人和亲戚囤积起来。'我很能理解,亲戚们不愿免费给你这些衣服,你根本就不需要它们。''采购的钱'很大程度上被用来买交易品。人们追求链状交易。祖父应该(在一封信中露骨地描述道)把他的新靴子寄到乌克兰。这样他可以换 8 升油,用 8 升油他又可以换一件新的大衣。'我们可能又可以卖掉这件大衣。'另一个写信者首先在友好的鞋匠那里用油换了一双过时的女式皮鞋,再用这双鞋'做一大笔'交换生意。这种交易就这样在乌克兰和德国进行。

"**各种规模各种形式**的交换都有。有人把盐按磅地寄出,每两周向家里寄 5 到 10 只鸡蛋以补充营养。也有人一次性地或连续地向家乡寄 10 个、20 个、30 个、40 个包裹。甚至还有人向乌克兰运了 500 公斤盐!(在乌克兰,50 公斤盐的交换价值相当于 1000 帝国马克;1 磅盐相

当于一只母鸡;10 磅盐相当于一只羊。)往家里邮寄两三千个鸡蛋的事并不少见。一名写信的士兵充满自豪地说道,他在圣诞节时往家里给他的妻子寄了 75 公斤的东西。在另一件案例中,东贸易公司的雇员由于受贿分到的黄油比他在德国全年的黄油配额还多。从乌克兰寄出的信件中还向家人提前通知以下包裹:'一箱酒和卡尔库拉绵羊皮,2300 只鸡蛋'(一个包裹)。'一箱酒,两桶蜂蜜'(一个包裹)。'1 号包裹:两只母鸡和蜂蜜;3、4 号:母鸡;5 号:鸡蛋;6 号:面条;7 号:粗面粉;8 号:豌豆;9 号:麦片;10 号:肥肉;11、12 号:菜豆;15、16 号:肉类和肥肉;17—19 号:鸡蛋、肥肉、面粉;20—22 号:鸡蛋、糖、黄油;23 号:香肠和蛋糕。'(这 23 个包裹是在两天内分别寄出去的!)

137

"交易并非仅有这种简单方式。大批量交易的实施只有通过**行贿、腐败、严重的徇私舞弊**才有可能。'大量的邮寄品'在官方运输的掩饰下偷运。运输公司和被收买的铁路工作人员帮助他们把整节车厢运到德国。运输护送员也全部被'买通'了(许多信件中经常很坦率地谈论这些事情)。很多东西也在空军的帮助下被空运回德国。黑市商人的小团体还组织了自己的邮政业务。大量的信件和包裹被回乡休假的人携带回去。曾有人提到,一个'金雉鸡',也就是穿棕色制服的人,在回乡休假时带了'一整袋信件'。因此很有可能,庞大机关的很多严重贪污事件人们并不知情。'用来交易的物品'和寄回德国的东西很多都是贪污来的东西。在一个'负责处理物品配给证'的熟人的'帮助'下,一个肉铺老板很天真地说,'如果想把肉类带到乌克兰',他的销售额还太少了。从德意志帝国运出的供给品(专修材料、红酒等)是给驻扎在乌克兰的德国管理机构的,但是它们会再次流回德国。这是对乌克兰经济状况的再一次侵犯。有人说到,珍贵的卡尔库拉绵羊被宰杀,它们的皮被运到德国。

"这种交易并不仅仅是为了个人的家庭需要。它是由'**生意**'并最

终由商业基础促进发展起来的。人们可以投机赚钱。信件中保证，乌克兰满大街都是钱，人们用最短的时间就可以发财。'你可以在一夜之间成为富婆'，俭朴的人们可能向家里写信说，他们赚了很多钱。还有138 一些人想把他们在乌克兰'赚'的钱拿回德国买车买地。暴发户的风格就是给妻子买珠宝和昂贵的毛皮。写信的人都描述他们在乌克兰的赚钱经历。卖廉价的冒牌首饰可以赚1000%的利润。火柴，据称可以到'6米'，相当于6帝国马克，而旧西装可以卖到600帝国马克。在这些信件中人们还会注意到恶心的黑市粗话。人们保证，他们可以'组织得很好'。也有人描述了在做这些道德败坏的生意时，人们怎样绞尽脑汁'扭曲事实'。从一封信中我们就可以得到对所有这些事情的大致印象：

"'对他们来说主要的任务就是，他们怎样自己创造舒适的生活，他们怎样尽可能多地囤积食物寄回家乡。无论如何这个区域的情况都是超过一般限度的。交易和黑市贸易发展迅速，犹太人以前做过的事情，今天"雅利安人"又以非常完美的方式重演。'

"**腐败行径也从乌克兰传到了德国**。从乌克兰运到德国的供应物品，成为了德意志帝国黑市贸易的基础。像在很多信件中说到的那样，人们用对自己家庭完全没用的鸡蛋去交换其他更需要的和短缺的物品。他们为了囤积产自乌克兰的油而在国内到处奔走。人们也利用非法渠道为自己搞到乌克兰的名贵西服面料。珍稀的物品也被用来行贿。在一个装有500只鸡蛋的包裹中说道，收件人应将其中100只鸡蛋送给劳动局工作人员。

"不管怎样，总的说来，就像很多信件中引人注目的言语：乌克兰是黑市天堂。人们称在乌克兰经济机构和国民管理机关工作的德国人为'东部鬣狗'。"

报告的细节直接反映了所有德国人的元首（希特勒）的殖民主义 139
观点。希特勒在他的谈话中不止一次地描述应该怎样对待东部的"当地人"："我们给乌克兰人提供头巾、玻璃珠作为首饰，这让其他的殖民地国家很羡慕。"他对克罗地亚的公使（当时是与德国结盟的国家）描述在苏联被占领区销售工业次品的可能性：那里的人拥有"很多简易的烹饪用具、简易家用器具"。1942 年夏天，希特勒又描述了未来的景象，他的人民（即使大多数出于私人利益）已经有活力运用的东西："收获季节，生活在稍大乡镇的人们，会来到我们卖次品的市场。在同一个市场上我们也卖粮食和水果。人们卖出一些东西后马上就可以购买其他东西。……这里有最便宜、最好看的薄印花平布。"在希特勒的一次讲话后，乌克兰帝国行政专署的头目科赫对德国的贸易政策进行解释："……对这个民族来说，他们所习惯的拙劣的艺术品就已经足够了。"在这些意见中，希特勒用强盗头子的方式概括了放纵的士兵们及驻军机构潜藏在内心的愿望。

实打实的快速救援

在东部的人们还梦想交易和购物天堂时，德意志帝国西北部城市的德国平民日益清楚地感受到了英国空军的优势。国内政治方面，对被炸毁的内陆区域的快速援救，几周之后得到了显著重视。回顾过去，汉堡的省党部头目卡尔·考夫曼自夸道，他在 1941 年 9 月"在一场艰苦的空袭后向希特勒提出请求，疏散犹太人，以使得至少一部分房屋被炸毁的人能重新分配到住房"。

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希特勒于 1941 年秋天决定，在战争期间驱 140
逐德国的犹太人，而不是——像当时计划的那样——在战后才驱逐。

用考夫曼的话说："元首立即同意了我的建议，并很快下达了驱逐犹太人的命令。"在1942年1月20日的万湖会议上，考虑到特别紧迫的驱逐工作，赖因哈德·海德里希明确提出"住房问题和其他社会政治方面的必要性"。

1941年11月4日，科隆的最高财政官着重指出，在他的管辖区域内"犹太人已经于10月21日开始迁出"，这是"为了给科隆和特里尔房屋被炸毁的无家可归的人空出房间"。该行动"正一步一步地实施"。事实上，居住地是始于1941年10月的德国犹太人大规模驱逐行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首先被驱逐的是居住在空战中被严重炸毁的德国北部和西部城市的犹太人。10月，8000名来自柏林、科隆、美茵河畔法兰克福、汉堡、杜塞尔多夫的犹太人被赶到罗兹（里兹曼施塔特）的犹太人聚集区。十天后，第二波又开始了，这次主要是被炸毁城市及有被炸毁危险的城市的犹太人——一共是13 000名来自不来梅、汉堡、柏林、比勒费尔德、明斯特、汉诺威、杜塞尔多夫、科隆、卡塞尔和美茵河畔法兰克福的犹太人。他们被送往里加、考纳斯和明斯克。

科隆的第一次驱逐活动后，最高财政官直接下达命令，不仅仅是居住空间，还有"被驱逐的犹太人的家用器具……首先应该用来救济房屋被炸毁的人"。威斯特法伦的最高财政官坐阵被严重炸毁的明斯特时，也要求其工作人员注意，"所有物品，特别是纺织品和家用设备，应用来救济被炸伤的人、刚结婚的人和烈士家属等"。像自己在就职誓言里说的那样，兼职做柏林党部头目的约瑟夫·戈培尔把被驱逐者的财产储藏在帝国首都的地方办公大楼里，这是"为了救济被炸伤的民族同胞，同时也是作为应对将来可能发生的损失的储备"。

141

1941年11月初，在帝国财政部长下令立即尽可能卖出"犹太人的财产"后，只简略带过空战的问题，并寄希望于利用快速占领其他地方来投机，但情况在1942年夏天得到了改变。从这时起普遍来说，"在分

配‘被驱逐的犹太人’的家用设备方面,被炸伤的人会被优先考虑”。一些市长被要求为不测事件贮藏被剥夺的家用器具。首先他们必须向帝国国库汇报其评估价值。各种各样的机构除了照料被炸伤的人,还要照料战利品部分:科隆的市孤儿院从犹太幼儿园花费 1860.50 帝国马克买了家具,修道院、圣玛丽亚医院、音乐学院或国家图书馆也一起买了一部分。个人则是按阶层购物,有的买了里尔克的诗,有的买了莫扎特安魂曲的乐谱,或者就是一双鞋、书包或床上用品。

1941 年 12 月,纳粹党理论家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建议,将巴黎以及“在所有被占领区域已经逃走的或正要启程的犹太人的”家居用品全部充公。他指的是在法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的犹太人的家居用品。因为“可怕的房屋状况”,新占领的东部区域的德国工作人员应该享用非常舒适的家具。罗森贝格利用了其家具偷盗计划的双重功能。一方面,当时希特勒任命他为东部占领区的帝国部长;另一方面,他已经领导帝国参谋部很久了。他的下属偷窃被占领地区的艺术品,“为了保证犹太艺术财产的安全”,还习惯性地检查被逮捕或逃走的犹太人的房屋。

几周后,希特勒同意了这一建议。他还指出,和帝国财政部长磋商 142 之后,很可能“被查封的物品会成为国家所有”。但是他首先改变了大量新剥夺财产的用途:因为紧急的军队运输在目前是不可能的,使用苏联的家具也是“为了帝国所需”。这里主要考虑对炸死的德国人进行实打实的快速救援。最终被驱逐的德国犹太人留下的东西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这应该是英国空军日益明显的优势造成的。

1942 年 1 月 14 日,罗森贝格命令他的参谋部,尽可能多地搜刮“西部占领区已经逃走或正要启程的犹太人的所有家居用品”,他还任命以前负责抢劫艺术品的德国红十字会会长库尔特·冯·贝尔为西部

工作机关的领导人。冯·贝尔后来自夸道,他是“家具行动”真正的发明者,但是被罗森贝格拿到希特勒面前,并被批准了。这个问题的另一方面就是,谁突然产生这个念头,使逃亡的和被驱逐的犹太人的家具变得如此实用,更确切地说,是谁创造了这个抢劫命令的基石。这既不是希特勒也不是罗森贝格,而是国防军统帅部。就像负责帝国财政部的报告人证实的那样,希特勒“赞成了措施”,国防军统帅部“起草了这一措施”。

冯·贝尔很快为德国贸易提供了紧缺物品,像床上用品、桌布、内衣裤、瓷器、烹饪器具、餐具和家用器具等。第一步就考虑到以下城市的家庭用具补给:奥伯豪森、博特罗普、雷克林豪森、明斯特、杜塞尔多夫、科隆、奥斯纳布吕克、汉堡、吕贝克和卡尔斯鲁厄。救济行动进行得很成功,因此冯·贝尔很快接到了另一项任务,作为罗森贝格补给参谋部的顶级强盗,更确切地说,不再做“卢浮宫工作组的领导”。他以前是红十字会的人,现在他希望完全献身于“为遭到空袭伤害的人收集犹太人的家居用品”。

146

巴黎的德国大使馆建议,先不要通知法国政府抢劫家具的事,毕竟“该行动在程序上和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不得已时人们应该强调“该措施历史上的合法性”。普遍来说,该措施被看做德国为抵抗布尔什维主义而发起的欧洲战争。也许至少一些参与者能理解将家具运输到苏联被占领区的所谓的目的,它从一开始就是借口,用来掩饰有悖于人权精神的剥夺别人财产的行为。然而戈林并不为这种想法伤脑筋。对他来说确定的是,“被占领区的房屋设备必须提供给德意志帝国遭到空袭伤害的人使用”。维希政府多次要求,对所谓“运往俄罗斯的设备”进行“补偿”,因为它认为犹太人被没收的家具是“法国的国家财产”。它并不是要求归还原物,而是在法国的占领军费账户中存入等价金额。

1943 年 11 月 17 日,罗森贝格向希特勒报告“家具行动”的情况。

就人们出于实际的原因怎么缩短家具抢劫的时间，当时他报告道："经过元首的允许，目前为止在法国已查封充公了25万套犹太人住房（指的是家居设备），其中已经有47 000件被运回帝国，由省党部领导补给在空袭中受到伤害的人。通向帝国的运输还在继续。同时在法国我们还在继续进行查封行动。"两个月之后，冯·贝尔的自愿和非自愿的帮手们——更确切地说，是法国的运输商和被强迫工作的犹太人——再次向德国运送了10 000件家居设备。被强迫工作的人事实上只得到"每天每人五法郎的低工资"。至1943年底，抢劫行动一共涉及了近一百万立方米的家具，由两万四千多节货运车厢运回德国。（通过内河航运寄送的家具吨数只能说肯定也很巨大。） 147

对作战部队的补给进行得有多好，可以从科隆的最高财政官和其下属的特里尔财政局领导的争吵中看出。最高财政官要求，把犹太人的家具从很少被空袭的地方运送到一直被空袭的科隆。特里尔的负责人开始为了地方利益这样那样地考虑。四周后最高财政官作出了让步，也就是说，"因为现在大量的家用设备从国外运进来"，为他省去了运输成本。1942年5月31日，负责科隆的省党部头目作出关于约一千次空袭的结果的终期报告。约瑟夫·格洛厄含糊地说："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的国防军统帅部成功地向科隆运送了大量无需配给证的纺织品。为了给人们弄到家具、家用设备和每天所需的消费品，我们还会采取相应的措施。"

在比利时抢劫家具的第一年，西部工作机关腾空了3868套犹太人的住房。战利品确切的百分比直接上报给军队工作机关，大部分分配给了在杜塞尔多夫、美因茨、霍尔茨明登、奥伯豪森、科隆、明斯特、瓦内—艾克尔、柯尼斯武斯特尔豪森、柏林、雷克林豪森、盖尔森基兴、格拉德贝克、博特罗普、亚琛、不来梅、汉堡、佐尔陶、于尔岑、乌因森、策勒等城市的空袭中受到伤害的人。1943年夏天，西部工作机关用三周时

间向亚琛寄送了28节货运车厢的东西。“以前属于外国犹太人的家用设备和衣物”被分配给遭遇空袭的家庭,并收到了“充满感激的祝福”。另外受到偏爱的是有很多子女的人和因为战争致残的人,很久以来人们都知道他们的愿望,但是无法满足。

根据一份1944年夏天的清单可以知道,当时——只提到了接收大宗物件的收件人——481节装满西欧犹太人被没收家具的车皮开到了卡尔斯鲁厄,运往曼海姆的是508节,柏林528节,杜塞尔多夫488节,埃森518节,杜伊斯堡693节,奥伯豪森605节,汉堡2699节,科隆1269节,罗斯托克703节,奥尔登堡884节,奥斯纳布吕克1269节,威廉港441节,德尔门霍斯特3260节,明斯特523节,波鸿555节,克累弗310节。同时,8189节装满物品的车皮在中心仓库被发出,必要时从该仓库可以尽可能快地把家具运给在空袭中受损的人。1576节车皮家具被运送到铁路沿线城市的还住在危房里的家庭。党卫军也需要500节车皮。

148

很多个人也被——特别是精心挑选出来装备的货运车厢——照顾到了,以恢复与其身份相当的配备。有些收件人是“党卫军中尉蒂克森”(橡叶骑士十字勋章获得者),“尼纳曼上尉”,“阿达米上尉”,“党卫军上校布雷默”(骑士十字勋章获得者),“帝国邮政(邮局支票科),领导,柏林,纪尧姆”;同样地,冯·英格拉姆也受到了关照,“就像在家具行动中的其他骑士十字勋章获得者一样”。在这里也包括,用“以前属于犹太人的”私人住宅和公司来照料“一些特别有功勋的值得尊敬的参战人员和党员同志”,以“支持他们建立富裕的生活条件”。

搜集家具的人与一些负责为驱逐犹太人作准备的工作机关取得了密切联系,此外国家秘密警察必须偶尔约束那些缺乏耐心的家具抢劫者,以免引起即将被驱逐的犹太人的不安。1943年底,西部工作机关的负责人抱怨道,帝国保安部在比利时的列日几乎不再拘捕犹太人了,

并认为:"因为上次在帝国境内的空袭造成的巨大损失,各方面对我部门的要求都有了本质的提高,我请你们考虑一下,在列日的犹太人行动尽可能地继续,这样才能持续搜集犹太人的家具并把它们运回帝国。"半年之后,也就是1944年6月13日,一直没有发生任何事情,负责士兵保障的人再次求助于国家秘密警察。"为了在空袭中受到伤害的德国人的利益",他要求,尽快逮捕当时还住在列日的60户犹太家庭。 149

家具行动还包括查封没收犹太人流亡国外时装有搬家物品的大货运箱,也就是所谓的集装箱,它们因为港口城市安特卫普、鹿特丹、马赛的战争开始而一直被闲置着等待发送。在1942年夏天科隆的一次惨重的空袭之后,帝国财政部把安特卫普的1000个货运箱当做国家财产转让给科隆的城市管理机构。同时还有来自鹿特丹的货运箱进入科隆港,从那里再被运往明斯特、曼海姆和吕贝克;在这些地方它们不会被立刻发送掉,而由帝国财政部采取行动设立了一个"救灾储备"。首先向柏林成功地运送了货运箱,它们经意大利的的里雅斯特和热那亚辗转到了德国人手中。在汉堡自由港贮藏的货运箱,在1941年上半年已经被部分拍卖,很大一部分被社会管理机构买去了。分散在城市各个区域不同贮藏点的储存品是作为"灾难发生时的储备"。与此相类似,在全德国到处都是曾储藏在运输公司的流亡物品。

所有这些救济物品的合法收件人是负责此项工作的最高财政官。他们的责任是,把国家抢劫来的东西再私有化。这件事一直以同样的方式进行:乡镇管理机构给人们钱和购买家用器具、衣服等的配给证,以赔偿被炸毁的东西,这也算成是财政支出。此外申请人会得到一个关于空袭受损的特殊证明,这保证了申请人优先购买东西的可能性。这样他们就可以购买或在拍卖中竞标替补家具。这种机会带来的收益

150 再存回帝国银行。从财务技术的角度看，财政管理机构对剥夺来的货物进行的是将负担转嫁给原物主——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被杀害了——的零和博弈。这一情况可以根据 1943 年 7 月 24 日刊登在《奥尔登堡国家报》官方专栏里的一则广告得到反映：

“1943 年 7 月 25 日，星期天，在哈特乌斯汀的施特郎曼小酒馆，销售瓷器、搪瓷器具、床和衣服，只收现金；下午四点对空袭中受伤但未受到关照的人开放，下午四点半对多子女家庭和新婚人士，五点开始对所有人开放。市长：施尼特克。”1942 年至 1944 年间，奥尔登堡城仅从类似这种销售的交易中就获利 466 617.39 帝国马克。市财政局长把收入立即再汇入帝国银行——作为一般的管理收入入账。

西北部的大多数物品源于荷兰犹太人被清空的房屋，因此奥尔登堡人会谈论到“荷兰家具”。直到 1944 年夏天，德国灾难救助队与阿姆斯特丹的 A. 普尔斯运输公司合作，把 29 000 幢房屋里的财产运输到德国。在荷兰的家具行动以帝国保安部为驱逐犹太人而建立的中央机构所颁发的一个严格规定拉开了序幕。这一规定于 1942 年 3 月 20 日刊登在《约德周报》上：“每一个居住在自有的、租赁的或其他房屋内的犹太人，根据最高特派员命令的第三条，出于安全上的原因，必须于 1941 年 9 月 15 日在阿姆斯特丹犹太委员会，申请关于清除属于该房子设备的家具、物品、家用器具或其他财物的书面批文。”没有书面批文的人会受到严厉处罚。

1943 年夏天，来自布拉格的家具被运抵鲁尔区，科隆的“二手衣物”也来自同样的地方。在一篇有很多插图的报告中，布拉格托管局的领导自夸道，在他们的监管下，上千名被驱逐者房屋里的物品被仔细地

151 分类、修复并储藏。发言人创造出一句格言：“犹太人的财产是国家财产。”1943 年 2 月底，在布拉格堆积了很多家具，按不同种类分布着一些地方雅利安化后的剩余财产，包括：从 4817 间卧室和 3907 间厨房劫

掠来的所有用品、18 267 个橱柜、25 640 张沙发、1 321 741 个家用和烹饪用具、778 195 本书、34 568 双鞋、1 264 999 件衣服,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这些东西在托管局工作人员看来,恰恰是战争中"独一无二的储备"。

每个德国犹太人被驱逐时可以携带 50 公斤的东西。他们当然会选择质量好的和保暖的东西。很多时候行李箱被留在原地,它们只是假装被装上了车。1942 年 6 月 24 日,把柯尼斯堡的犹太人送到明斯克附近被毁的灭绝营马里一特罗斯蒂内兹的火车货运车厢被撂在了站台上,无人过问。相似的事情还于 1942 年 4 月 22 日发生在杜塞尔多夫,在那里分好类的行李——热水袋、羊毛衣服、长筒袜、大衣、西服、鞋子——五天后被移交给纳粹党的国民福利列车。一些从被驱逐者行李中抢到的东西——药用纱布、绷带、肥皂粉、固体和液体肥皂、剃须刀片和剃须膏、洗发水、润发水、压缩低聚乙醛、火柴、科隆水、软膏、鞋油、缝纫用品、牙刷、烟草、香烟、雪茄、茶、咖啡、可可、糖果、香肠、甜橙、柠檬,还有其他食品,主要被寄给以下收件人:德国红十字会相关部门、一座兵营、一所储备野战医院和在杜塞尔多夫总火车站负责照料部队的相关机构。

一个特别的例子是多次遭受惨重损失的汉堡。1941 年 2 月,盖世太保接到省党部头目的命令,在自由港查封了 3000 至 4000 箱货物,而且在汉萨同盟的拍卖所的帮助下,立刻把这些东西拍卖了。当时虽然参照的是类似奥尔登堡和亚琛的需求标准,但是送往汉堡的补给品还是特别多。除了已提到的 2699 辆装满原属于西欧犹太人的家具的货 154 车,还有 45 艘船运送了 27 227 吨"犹太物品"进城,它们来自荷兰和比利时。在拍卖中,一共有十万名来自汉堡和周边地区的人在拍卖中竞价,更确切地说,主要是女性竞价者,因为男人们都在打仗。大约十万个汉堡的家庭在家具、衣物及日常生活实用品的销售中受益。它们以

前属于大约三万个犹太家庭。

像在拍卖一样——特别是在无产者居住区。图书管理员格特鲁德·赛德尔曼在战后回忆说:“菲德尔俭朴的家庭妇女突然穿上了皮大衣,她们交易咖啡和首饰,从港口弄到家具和地毯,它们来自荷兰、法国。……我的一些读者也敦促我,在港口储备些地毯、家具、首饰和皮草。那是从荷兰犹太人那儿打劫来的东西,他们——我在战后得知——已经被送到集中营的毒气室。我不想这样做。在我拒绝时必须要小心这些贪婪想要发横财的人,特别是女人。我不能流露出我的真实想法。只有对那些不这么兴奋的妇女,我知道她们的丈夫是正派的社会民主党人,我才可以向她们解释,这些装满高级家用设备的船是从哪里来的,从而谨慎地影响她们,并告诉她们一句老俗语:‘多行不义必自毙。’她们也争相传颂这句话。”

家具行动的第一年,仅在法国就有(保守估计)价值1亿帝国马克的东西被盗走,那相当于现在的10亿欧元。荷兰的家具战利品也有近似的总价值。然而这些东西在德国的定价是很低的,因为国库的利益在家具行动中只是次要目标。组织者在报告中自夸:“由西部工作机关155 领导的家具行动完全是为在空袭中受到严重伤害的人服务的。通过这一事件,德国的家具贸易的压力显著减轻。极其快速地为人民弄到家用设备这件事,对他们的纯心理影响不能低估。例如,在一次大规模的空袭中,一些家庭损失惨重,但几个小时后,他们就被安顿在设备齐全的房屋里,这就可以被看做我们战争道德的决定因素。”

“各劳动阶层”收到家具的人写信表示感谢,这证实了社会心理方面的影响,“及时的雪中送炭总是令人印象深刻”。如果人们相信特殊救援,那么“西部工作机关在各个社会圈子里”受到了“极大的欢迎”。很快,他们的工作不仅“对战争是重要的”,而且也是“承受困难的民族同志们取得胜利的重要性工作”。虽然交通问题越来越多,但当涉及运

输空间和快速运输时，塞满抢来的家用设备的火车和轮船始终“被安排在第一位”。

除了家具行动之外，政治领导人还尝试用特殊补助来安抚被烧毁的城市中的居民。罗森贝格、戈林与戈培尔及乌克兰的帝国特派员埃里希·科赫一起，组织“向德意志帝国区域补给食品的火车或货车，这一输送出于特殊原因和目的”。物品由乌克兰送出，那里的城市居民因此而蒙受损失。救济行动被官方称为“来自东部的粮食捐赠”。

中校汉克与戈林在私下也是朋友，他建立了与之相对的西部分支机构（A. W）。他手下的工作人员购买成品衣服和一些面料，并把订单分给荷兰、比利时、法国的服装厂。在这种情况下，1942 年秋天，国防军统帅部每月要汇 800 万帝国马克，用来在法国黑市上购买纺织品。付款从军费开支里出；这些货物应该让“德国人民中特别有需要的人，156 特别是在空袭中受到伤害的人”受益。剪裁好的、一起订购的以及从犹太家庭拿来的纺织品，“绝大部分是通过西部分支机构的救助车厢（火车车皮）直接运到相应城市”。根据负责人的意愿，车队已经装备好了待用，“从而在有空袭时，可以立刻被派上用场”。除了衣服，它们还装载了“滋补剂，像红酒、白兰地等”。

同时，戈林策划了“圣诞行动”，即从 1942 年夏天就已经开始的在被占领的西欧进行的商品（尤其是玩具等）囤购，以便将它们放在德国的圣诞树下作为礼物分发。直到 12 月 20 日，戈林一直都命令在法国购买化妆品、玩具以及普通的礼品。囤购的物品被隐藏在 2306 辆货车及若干艘内河航船里。这些装满礼品的袋子首先被运到被炸弹炸毁的地区，其次被运到那些战争的呼声已经降低的城市和区域，如维也纳、布雷斯劳、柯尼斯堡以及西里西亚的工业区。同样在戈林的指挥下，德

国人在荷兰境内采购了1.76亿帝国马克的礼品。

虽然一直努力将这种与军备无关的开支尽可能降低,国防军最高统帅部还是于1942年6月命令,为帝国国内的收购商人准备2亿帝国马克的法郎。8月变成1亿帝国马克,9月又变成2亿帝国马克,10月仍然要求2亿帝国马克。为了不使这种黑市交易停顿下来,正如戈林所要求的:"11月20日,国防军最高统帅部指示将这部分开支以法郎的形式保持在244 500 000帝国马克。"1942年下半年,德国国家囤积者为"圣诞行动"花费了185亿法郎,这部分开销是由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划款的。帝国财政部的官员称之为"黑市商品行动",他们支持这次行动,并且向德国审计署表明了他们的心安理得。据帝国银行报告,1942年在法国为了将"稀缺物品输入德国",花费了将近30亿法郎的军备开支。

157

在此期间,戈林于1942年8月6日预先宣布了圣诞行动。在国家航空委员会的赫尔曼—戈林大厅,戈林要求各个承担责任的委员以及到场的被占领地区的负责人,从所有欧洲被占领的地区"最大限度地掠夺,以使德国居民能够正常生活"。在戈林抱怨这种抢劫已经不再不言而喻地属于战争之后,他向到场的代表们解释道:"我想,这尽管是抢劫,并且是相当广泛的,但在形式上,我在荷兰、比利时以及法国开展了一系列向收购商人授予全权的大规模囤购行动,在圣诞到来之前,那儿的人们还有或多或少的时间进行采购只有在最高级的商场和仓库才能买到的货物。而在德国,我想使圣诞节前的橱窗都挂满这些商品,使我们的民众可以轻松购买。"按照戈林的设想,他所囤购的物品,如蜡烛、鞋子等等,全都应有尽有。

1942年11月初,粮食局就已经发行了圣诞节的特殊购物券。这些馈赠很快兑现了戈林的诺言。"尤其令人兴奋的是为那些工作时间长、劳动繁重的工人们配给的烈酒和葡萄酒。……总而言之,这个圣诞

节的特殊馈赠使许多民众都忘记了整日困扰他们的忧愁。”

购买礼物花费的钱跟其他经费一样从占领军费中开支。受益的德国人还会再支付一次，无所谓这是特殊的实物津贴，还是对特殊人群的报酬，还是购买被整体打劫的商店的廉价促销品。人们感到很开心，他们把很多钱花在了礼物、红酒、烧酒、咖啡、黄油、糖上面。这回笼了——货币政策想要的——国内的购买力，而且给帝国国库带来新的公共管理收入。 158

在1942年圣诞节假期的第一天，戈培尔谈到了“食品优先”这一指导方针决定性的后果：“食品的特殊分配继续合理奏效。另外我给老年人和多子女家庭的礼物创造了一个奇迹。”然而同一天，希特勒则期望另一个奇迹不要发生，即在1月30日为其夺取政权十周年而举行的庆典活动，恰好与不能再被隐瞒的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失败同时发生。他的亲信伯尔曼说道：“希特勒反复强调，如果在这天我们能够告诉德国民众，他们的食品配额和其他配给物会被再次提高，将是极富吸引力的。”如果他还想用言语来激励民众，肯定每个人都会很沮丧，很遗憾现在这——距浮夸的圣诞行动才这么短——“已经不可能了”。然而，他要求通过加强对被占领区的“掳掠”来“保留”他们“到目前为止的配额”。

早在1943年夏天，当年的圣诞行动就已经准备好了。犹太人财产被查封，被占领国家的货币面临崩溃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戈林决定利用敌人的财产，为了“特殊目的”，例如“在法国和比利时的黑市上大量购买自由外币和咖啡”，从而能够拥有足够的物资。当时，这一步骤被拒绝了，主要是为了避免国外的德国财产被报复性地相应采取查封措施。但1943年夏天，对在国外有财产的民众的照顾被取消了，因为对大多数人的物资照料应被优先考虑。

作为主要支柱的西欧

在比利时的巧取豪夺

1941 年秋天，海因里希·伯尔被从法国暂时调往科隆附近。他在那里看守苏联战俘。他觉得战俘营里的景象会让他意志消沉。对于这些看守人员来说，这些囚犯的命运折射出他们的愚蠢。首先，他们要能挨得过繁重的劳役，然后再由纳粹国防军决定他们的生死。伯尔现在就想去比利时，1940 年的时候他曾到过那里。“我现在最大的担忧就是，我能否去得了安特卫普。咖啡、雪茄、衣服，所有美好的我想要和必需的东西。要是这一切都能达成就好了！”这是可能的。而他的新娘安妮玛丽·切赫得到了一件“无袖的短绒线衣”。

为了让士兵和他们的妻子、女朋友保持这样的状况，1943 年春，赫尔曼·戈林要求“在比利时的所有零售商店和娱乐场所都必须展现出一派和平的景象”。与此相应，在西欧的德国占领区内，“当德国的士兵想要放松放松，恢复精力的时候”，那些“餐馆、酒吧以及其他的娱乐场所”都应该保持营业，以便等待他们的光临。同样，即使是那些“不卖生活必需品的商店”也应该这样，一直营业。这样，“德国的士兵们就可以买到所有他们想要的东西，直到所有的库存全部售空为止。而

且商品的价钱还必须比较合适”。在荷兰,那些“与战争无关的”“商店及其相关的场所”如果违背了戈林的意愿关闭了,也会“悄悄地再次营业”。士兵们在那里用着荷兰人和比利时人的钱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 160

德国人会按照什么标准来确定比利时应该付的特别税呢?纳粹国防军的一位负责此事的军需官在1940年说道:“出于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原因考虑,比利时的金融和财政经济,至少要保证大体上正常运行。这样德国就能够向他们要一大笔以分期付款的形式支付的占领费。”此外,法国和比利时都必须接受这样一项条件,除特别税外,向驻留德军再支付一笔钱。这笔每月都必须交纳的款项远远超过了比利时的常规的税收收入的一倍多。刚开始的时候,这笔费用为每个月8000万帝国马克,到了1941年的第一个季度就已经涨到了每个月1.2亿帝国马克。由于要保证货币的稳定性,德国人把他们的要求又降到了每个月8000万帝国马克,而实际上国防军总是会另外多要2000万到3000万帝国马克。到了1941年9月,这笔费用已经又涨到了平均每月1.2亿帝国马克。

这笔钱必须由这个拥有830万人口的国家负担。1938年,比利时的捐税收入已经达到110亿比利时法郎。此外,这个因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而萧条的国家每年还要增加30亿比利时法郎的贷款。而现在,占领国还又向它要求额外的180亿比利时法郎,不久后还明显地要求更多。1941年1月,一张匿名的比利时传单上这样写道:“当赋税和关税就像德国要求的那样,不得不从110亿(比利时法郎)提高到160亿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在1941年借入255亿比利时法郎——但是找谁借呢?就为了满足德国的暴政。除了前面提到的这些惊人的数据外,德国人还把我们的原料和食物储备抢劫一空(我们储存了差不多两年的 161

食物啊!)。由此可以想象得到,第三帝国对我们国家实施的强盗政策有多么的残酷。是的,德国为了满足其帝国主义的狼子野心,不惜完全牺牲我们的国家。我们就像是被奴役的民族,我们的存在就是为了满足他们难填的欲壑。”1941 年夏天,很多德国部队收到向东线进军的命令。然而,这并没有使得他们对占领费的要求减少。因为与此同时,国防军统帅部下令加快修建沿大西洋的机场和大型的军事防御工程,因为“所有在这个国家对英国作战的需求,都要从这个国家取得”。

1941 年 10 月底,德国银行专员汉斯·冯·贝克尔指出,比利时的货币系统已经开始不稳定了。总军需部长也同样要求“占领费应该调整,要和这个国家的能力相适应”,“这个国家已背负了非常沉重的战争负担”,而且“其各个方面的货币储备也被不加考虑地洗劫一空”。在戈林和装备部长阿尔贝特·施佩尔授意下的囤积商人从这个国家大批量地购买物资之前,德国信贷银行就已经于 1941 年 8 月向布鲁塞尔发出了警报,大约三分之一的占领费被用于“向比利时周边提供的”私人的和战争经济的货物。

根据一份 1941 年统帅部的摘要,德国人仅仅在这一年就——用比利时人的钱——在比利时“购买了”18 500 辆汽车。同一时间,帝国铁路部门在那里就有 1086 个火车头和 22 120 节货运车厢。此外还有异乎寻常多的煤、水泥、冷制钢材、金属废料、铜、铅、纺织品以及各种工业制品。这些从占领初期到 1942 年 2 月 28 日由比利时供应给第三帝国的物资,总价值为 26 亿帝国马克。军事政府的首脑提起这些,满是强盗般的骄傲,他们是多么高效率地把比利时的“库存全部吸干,最后连一滴血都榨不出来”。显然,他们比他们在法国和荷兰的同伙的工作有效率得多。

162

然而,这仅仅是个开始。1942 年,当德国本土也面临战争的威胁时,他们的剥削甚至已经到了刮地皮的地步了。在 1942 年的上半年,

每个月就要支付800万帝国马克用于驻扎当地的士兵,1.2亿帝国马克占领费和7200万帝国马克用于向德国出口的"预付"银行结算。这就意味着每年大约24亿帝国马克。1943年,银行之间的结算支付甚至超过了占领费。

不仅是私人的买家,受德国公司和官方委托的买家也利用了比利时的市场。根据军队管理部门的估算,仅仅是1942年,黑市交易就已经占了德国用比利时的钱所购买的货物总价值的30%。这些货物的交易一部分是非法的、私下的买卖,一部分是在合法的形式下进行的。这都说明,这些所谓军方的监视部门的官员事先是得到了一定的好处,才默许一部分的黑市交易的。比方说,一个旨在大肆购买各种货物的"施密特集团"。同时,军备部、党卫军、陆军机动车处以及陆军军医处也都利用了这点。

即使这样,他们还是抢劫了比利时的黄金。1941年,与其合作的法国把41吨黄金运往马赛,然后在那里把这笔黄金交给了帝国银行的代表。这笔黄金原来是比利时政府营救下来,运往西北非的达喀尔的。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样把这笔黄金转换成德国的财产。在一次与戈林的国务秘书诺伊曼商谈后,1941年2月,另一个由比利时支付的"额外占领费"就被编造出来了。而对此的解释是,"公开地拿走比遮遮掩掩地拿走要好得多"。德国信贷银行的理事会在1941年7月3日作出决定:"比利时把其在柏林的那部分黄金储备用来分期支付额外占领费。这个要求是最近才向比利时人提出的。"这41吨黄金约折合5亿多帝国马克。然而对于德国的战时经济来说,其使用价值更高。因为只有通过黄金才能在西班牙、葡萄牙买到钨,在瑞典买到钢铁、轴承,在瑞士买到武器和卡车,或者在土耳其买到铬等紧俏货。 165

一年后,当比利时的黄金公开地转化成德国的财产时,出于货币政

策的考虑，帝国银行的领导层对此提出了异议。他们想维持现状，因为当时比利时法郎还是黄金储备金。而外交部却赞成这种窃取。基本上每个被德国占领的国家都支付过这种额外的占领费。比方说在德国的武器生产以及士兵家属战后生活的生活费等等，都属于这种额外的占领费。在这种情况下，比利时原本是反对用黄金和向德国借债这样的形式来"结算"占领费的。但是比利时的想法没能实现。取而代之的是，柏林的最高财政官把这笔有利于第三帝国的、在法国帮助下取得的黄金于 1942 年 10 月 9 日迅速转走。自 1939 年 9 月 1 日起生效的帝国法律成为了所谓的法律根据。这个法律计划强制所有的黄金和外汇转化成帝国马克。按照这个法律，德意志帝国银行给比利时中央银行赔偿了 5 亿帝国马克——而这笔钱当然是存在德国的银行的，是不可能对比利时方面有利的。外交部的贸易政策部门向国务秘书魏茨泽克和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报告说："通过外交部和大使黑门的努力，最终有价值 5.5 亿帝国马克的黄金归帝国所有。"

166 与此同时，法国则很好地保护了它的财产。为了避免德国人的抢劫，法兰西银行将其在国内的黄金储备多次分批地向瑞士转移。对此，戈林负责柏林的下属非常镇定："在必要的情况下为了帝国，可以将瑞士的财产很容易地取回来。"

根据德国的估算，在德国占领比利时的时候，比利时为满足民众的需求，总共付出了 833 亿比利时法郎。而同时给侵略者所支付的所谓的贸易结算的预付款，就高达 1336 亿比利时法郎。此外，德国抢劫了黄金、犹太人的财产以及其他的东西和数不清的战利品。最后，德国留下了一个经济完全被摧毁了的国家。

无边界的荷兰

荷兰有880万人口，略多于比利时。1940—1942年的占领费为每月1亿荷兰盾，这项占领费是付给纳粹国防军统帅部的。此外还有300万荷兰盾要付给一个由第三帝国委派的专员，这个专员负责一个指挥部，专门监管统治荷兰。荷兰盾和帝国马克的汇率被固定为1比1.33。实际上，纳粹国防军把公开了的占领费的最低限额部分提高了至少20%。1939年，荷兰政府的国家支出已经上升到了14亿荷兰盾；1941年底，国债达到了44.6亿荷兰盾，一年以后达80亿荷兰盾。

自从1940年5月纳粹德国入侵以后，征服者们就开始想要建立一个对他们有利的经济联盟。纳粹德国宣称，他们要"把荷兰和德国的经济融合在一起"。1941年4月1日，这一计划已经深入进行，且消除了德国和荷兰之间在经济上的国界。尽管在占领的头半年，德国已经从荷兰大规模地购买了各种物资，相关负责人员还是决定要尽快开放荷兰的市场，以使德国能无障碍地购买到更多。为了"减轻债务"，荷兰的货币发行银行已经发行了"5亿荷兰盾国债"，相当于6.65亿帝国马克。他们不得不这样做，因为德国的这些大宗购买只用帝国马克支付，而占领军强迫他们收下这些帝国马克。 167

负责经济方面的官员曾试图不要让荷兰承担所有的私下买进的货物并简单地将其当做荷兰要承担的占领费，但是失败了。德国驻海牙的财政官写道："我们德国人用德国信贷银行发行的纸币大量买进荷兰早先还很富足的库存。这些货物在随便一个穿制服的人的保护下就越过了国界。"他们弄走了荷兰如此多的库存，不但没有给这个顺从的国家任何弥补，负责战争经济的官员还做了与之相反的事情。1941年

初,他们用编造出来的额外的占领费抵除荷兰的清算结余。对此,荷兰财政部就必须取消德国4亿帝国马克的债务,而且还要给他们价值1亿帝国马克的黄金。为了推迟荷兰盾的崩溃,到1944年才又重新设立了汇率边界。

1944年3月,帝国经济部大致统计了一下,荷兰总共支付了83亿帝国马克的占领费。直到上一年3月,德国的私人、官方和企业为其所购买的所有的物品总共才支付了45亿帝国马克。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荷兰支付的占领费的约五分之三直接地用于德国人的发财致富。这条价值几十亿的妙计,其细节就不在这里详细叙述了。

以上的例子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大概的支付轮廓。而且我们可以想 168 象得出,这些伯尔一样的士兵们、空军上校们、戈林的特派员们以及那些平民公差旅行者,在富饶的荷兰上演了一出怎样的戏剧(如果想知道得更详细,可以在西北德国的海关缉私部的文件里找到成千上万被运走的毛毯、古董及各种值钱的物品的线索。虽然这里的海关早就废除了,但是因为海关人员都很厌恶这种战争中徇私舞弊的行为,所以这些事情他们都一一记在心里)。

这些占领者、统治者制定了企业税、公司资本税和财产税,而且让其与德国的那套系统越来越协调。最初他们就把战争赢利税提高到10%,然后到25%,三个月以后就已经是35%了。一家荷兰的报纸按照这些模式计算了一下,结论是"就算在很不顺利的情况下,也有83.33%的赢利落入帝国国库的口袋"。和德国不一样的是,1942年7月1日,这里的工资所得税普遍提高了10%。被占领区统治政府计划提高营业税,想要间接地筹资并用来支付一项特殊的(有待商榷的、由荷兰支付的)"反布尔什维主义的战争费用"。出于调节社会平衡的考虑,1942年初,他们又想出了一个"敏感的财产费,特别针对那些拥有

大笔财产的人(工厂主、大财阀等)”。这种事情在由荷兰纳粹发起的“马瑟特运动”中“无疑变得非常流行”。新的税法生效以后,荷兰的报纸《新鹿特丹法院报》为一些公司算了一下,用于充公的赋税达到了112%。

1942年2月9日,负责压榨荷兰的汉斯·菲施伯克向帝国财政部提交了一份计划,“除了现在得到的这些,还可以向荷兰再要求一份额外的‘占领费’,这笔费用要从1941年7月1日算起,每月大约5000万帝国马克,其中1000万以黄金支付”。M. M. 罗斯特·范托宁根对纳粹十分忠诚,并被占领军推举为荷兰国家银行的行长,这件事情菲施伯克之前早就和他谈过了。相应地,荷兰应该拿出这笔德国要求的所谓的资助,来支付针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共同战争”的费用。帝国财政部对此没有任何异议。1942年5月2日,帝国专员赛斯·因克瓦特要求范托宁根把这笔钱转到帝国中央账户,并把黄金运到帝国银行在柏林的金库。戈林表示了对他们“减轻了帝国的黄金负担以及解决了外汇短缺问题”的“特别感谢”。 169

法国的沉重负担

经过了1940年6月的挫败,德国占领军把法国分成了五个区。阿尔萨斯—洛林实际上已经被第三帝国吞并了,但不是完全的武力吞并;北边的两块区域归比利时和法国北方的军事指挥部管辖;意大利人则得到了一小块位于两国边界附近的管辖地;法国的主要部分被分成被占领区和非占领区,就算是非占领区也于1942年11月沦陷了。在非占领区,维希组成了亲法西斯的临时政府。而在被占领区,德国人在巴黎成立了军事指挥部的管理处。这个部门由管理处和经济处组成。直

到 1942 年年终,这个部门一直由维尔纳·贝斯特负责。

来自帝国经济部的卓有成就的埃尔马·米歇尔博士,从占领初期到占领结束一直统管经济部所有的财政问题。他于 1940 年秋天接管了这个部门。这个部门负责整个法国地区的进出口贸易和德国外汇储备委员会。在米歇尔的部门内,首先要提到的是帝国银行经理利奥波德·舍夫勒,他负责"货币、贷款和保险"方面。他致力于控制法国财政部以及监管银行业和保险业。卡尔·舍费尔控制着法兰西银行。他曾在但泽银行担任执行主席直至 1939 年,然后在波兰被占领区参与德国信贷银行的建立。

170

由大使汉斯·理夏德·黑门领导的位于威斯巴登的停战委员会,是除了军事管理机构以外的第二个权力中心。这个委员会一直在和维希政府就整个法国的问题进行谈判,直到占领结束。由帝国银行经理海因里希·哈特利布统管的帝国银行也设立在威斯巴登。此外还有设立在巴黎的德国大使馆,它象征法国还具有一定的主权,同时还具有早期预警系统的作用。在里面工作的官员就是对希特勒有用的中间人和调停人。然而在被占领区的权力结构划分中,他们的分量却最小。

挟着停战协议,胜利者强令战败者每天缴纳 2000 万帝国马克的贡税。这在当时是很大的一笔费用,而帝国财政部却认为这还太少了,又把它提高了一些。这些政府精英用他们独有的、高雅的论调对此解释道:这样就避免了你们以后签订和平条约的时候还要承担"不必要的财政和兑换方面的费用"。到 1943 年 1 月和 2 月,国防军要求的这笔每天都要支付的费用已经追加到了 2900 万帝国马克。此外,戈林和施佩尔的代理人也开始在法国各地大肆买进各种物资。就如德国信贷银行理事会指出的那样,所有这些累积起来,"每天需要大约价值 3500 万帝国马克或者每个月与 10 亿帝国马克等值的法郎"。

占领者无休止的贪欲把这笔钱的数目很快推到了一个顶峰。在

1941 年到 1943 年期间,法国民用的国家支出每年约是 1300 亿法郎。在占领费也达到和这个一样的高度以后,也就是法国的国家财政预算增加了一倍以后,其财政支出就迅速增长了。法国财政支出的强劲增长是 1943 年德国在东线作战失败以及武器生产增加的直接后果。这个增长和德国占领的其他国家是同步的。就算这样,1943 年 4 月 24 日,戈林在德国的贝希特斯加登市的一次会议中仍抱怨道:“你们在法国取得的这点经济成就是远远不够的。”这里缺少一个“强有力的直接收取税费的税务机构”。他的这番话即时奏效,事情很快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71

除了每天的占领费外,很快,法国不得不同意向德国贷一大笔款,用于向德国的货物运输(提前结清)。从 1941 年到 1943 年,这笔贷款从 200 亿法郎提升到了共计 450 亿法郎。按照 1944 年的预算草案,这笔贷款估算将近会有 900 亿法郎。除此以外,法国还要给驻扎在东南部的意大利占领军支付营地费用和日常开销。这还不够,纳粹国防军还对一个个单个的城市施加惩罚,借此来获得金钱。因此在头九个月,南特就已经支付了 1000 万法郎,瑟堡 600 万法郎,波尔多 200 万法郎。国防军在闪击战役中获得的战利品也位列其中。

迫于德国的压力,法国的税收收入虽然在 1941 年到 1943 年期间从 682 亿法郎相当可观地提升到了 1010 亿法郎,然而财政赤字也在迅速上升,每年计为 1600 亿法郎到 2200 亿法郎,而在 1944 年的预算草案中预计达到 3170 亿法郎。由于德国人的贪得无厌,法国的支出已经超过了常规的国家税收收入的三倍还要多。

根据帝国银行 1944 年春季的一份官方报告,截至那个时候,占领费总共已经达到了 6800 亿法郎。此外还有对德国的商品和劳务输出,价值约为 1200 亿法郎。其中约有一半是建立在贷款的基础上的。由于德国人在占领的这四个月内一切都很顺利,此间至少又产生了 10%

的额外收费。法国解放后,法国新的财政部长艾梅·勒佩尔克说,德国172 从法国总共攫取了9000亿法郎。在占领期间,法国的债务增长了10 500亿法郎。1994年,经国际清算银行核算,强加于法国的占领费为352.5亿帝国马克,相当于7050亿法郎再加上银行结算债务。这里面还不包括被吞并了的阿尔萨斯—洛林,以及意大利军队强加于法国东南部其他被占领区内的占领费。

这些内容相当一致的报告使我们可以确信,德国从法国直接就拿走了超过8000亿法郎,即400亿帝国马克。根据帝国银行经理哈特利布的分析,德国对法国的劫掠"减轻了德国预算的负担,这样也使得其向中央银行的贷款大大减少。而与之相反,法国的财政和货币负担却大大增加了"。1959年,皮埃尔·阿尔努向外界公开了德国是如何对法国进行赤裸裸的抢劫的。所有的和每一件事情都要不断地付钱——当然是用顺从于他们的国家的钱:"(德国人)没有用武力抢走任何东西,他们很正当地买走了一切;但他们却没有为此支付给我们通常使用的货币。"

法国的财政部长不断地往德国信贷银行在巴黎的账户上打入占领费。除了已经描述过的对私人的抢劫,还有全面的、手段完善的对国家的抢劫(牵扯到戈林的圣诞大采购)。比方说,1942年1月到10月期间,军事管理部就向法国索要了65亿帝国马克,也就是每天2130万帝国马克。在不稳定时期,德国官方用这笔钱中的7.2亿帝国马克为其"东线的军队,即驻扎在苏联的军队,购置了马匹、食品及酒类"。另外有8.4亿帝国马克流进了"(官方的)黑市,用于购买有价证券和艺术品"。

173 入侵巴黎的第一个星期,他们对这些伎俩的使用就已经驾轻就熟了。法国支付占领费的B账户中的钱用于纳粹国防军及其士兵,这个

账户不断地在支出，而且数额非常巨大。与此同时，法国支付占领费的A账户开始用于德国的“自助购物”。在第一个半年，下述金额就被从A账户抽出来，就像这个字的字面意思，真的是抽出来，5.36亿帝国马克被用于安置“在德国工作的法国工人”的家庭（参见下文第155—162页）。帝国经济部“抽取”了2.5亿帝国马克用于“购买与原材料相关的东西以及购买股份”。帝国后勤部得到900万帝国马克用于“购买牲畜”，帝国交通部则用500万帝国马克购买了大量的布鲁塞尔国际卧车公司存放在法国的股份。帝国财政部的基础部把从法国弄到的收入转移到了账户A上“以供帝国财政部支配”。

此外，由于汇率和德国大购买商的利益息息相关，他们就想办法让汇率变得尽可能对他们有利。这样就使得各种各样的劫掠变得更加容易。1帝国马克兑20法郎，这意味着法郎贬值了25%。而对那些德国还未收回的旧账，当然是要用相对划算的战前汇率。就像在波兰所做的那样，帝国财政部压榨每一个被从阿尔萨斯或洛林驱逐出去的法国人，将得到的好处收归国库，他们在那里收入了500万帝国马克。当A账户上的钱不够了的时候，B账户上的钱很快就会往A账户上转。比方说，在帝国经济部的操纵下，1941年4月3日、10月9日，分别向A账户转入了6亿法郎和9亿法郎。

罗各斯公司，一家专门购买原材料的公司，仅仅在1942年5月16日到10月14日之间，在法国购买物资就花了7亿法郎。当然这笔钱不是从A账户中提取，而是从号称仅仅负责专门的、仅仅支出日常占领费的B账户中提取的。此外，私人和官方的买家总共支付了价值25 174 亿帝国马克的德国信贷银行纸币，其中1943年支出13亿帝国马克，但是这些钱并不是打到A账户上去的。但是对于买家来说，这些德国信贷银行纸币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们要先用帝国马克买这笔德国信贷银行纸币，于是帝国的国库就又产生了收入。

1943 年 9 月,军备部长阿尔贝特·施佩尔利用新成立的公司布里美泰克斯在法国为德国的工厂购买了大量的机床。这笔从占领费预算中出来的 3 亿法郎的交易是私下里进行的。与此同时,上文提到过的罗各斯公司也出现了。它是 1940 年由戈林一手创建的,百分百的帝国的财产。帝国财政部的部长级指挥官本德尔在理事会里任主席一职。这种类型公司的商业目的是:"登记并利用所有被占领地的战利品,以及收购、存储、转卖战略物资。"

如果查阅保存在巴黎国家档案馆的 1940 年到 1943 年关于账户 A 的文件,很快就能发现,上面记录着一些交易,非常引人注目:那些在法国大肆采购的德国官方机构、公司以及私人付账的时候,总是会先把等值的帝国马克打到帝国中央账户上。

这些当然都是暗箱操作的。此间又冒出来了一个所谓的柏林一般货物贸易公司。它只是专门为帝国财政部洗钱的伪装的公司(类似于下文将要介绍到的德国清算银行储蓄所,或者乌克兰中央经济银行柏林办事处)。单个的德国公司的汇款从那里被转到帝国中央账户,而且"根据第十七号计划(Einzelplan XⅦ),特殊预算的第十五部分也将作为预算收入转入"。因侵吞犹太人财产而闻名的第十七号计划属于第三帝国的特殊战争预算。

175

那些大量购买法国原材料、制成品或者和法国签订了配件供货合同的德国商人想的是要赢利。按规定,他们对所得货物是用帝国马克支付的。这同样对在法国的公司股票的赢利有效。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德国投资者、企业和银行购买的法国股票也要按照当日汇率换成帝国马克来支付。每次,当法国出售者得到他们的钱,这笔来自占领费预算的资金的时候,这笔钱就又到了帝国的国库。

位于柏林奥伯舍内魏德的德国通用电器公司(AEG)在 1940 年 11 月 9 日和 13 日拿出了价值 430 万帝国马克的法郎在法国进行大肆采

购。11 月,德国银行搞到了价值 2025 万帝国马克的法郎。1940 年 10 月 23 日,柏林的考奇欧信托公司申请到了价值 300 万帝国马克的法郎,11 月 20 日再一次申请到了价值 100 万帝国马克的法郎,12 月 5 日是 150 万,12 月 27 日是 200 万。12 月 11 日,德累斯顿银行携 200 万帝国马克进入法国商业界,1941 年 1 月 23 日注入了其下一步资金,300 万帝国马克。1941 年 1 月 20 日,柏林贸易公司以 130 万帝国马克紧随其后,2 月 11 日又增加了 100 万帝国马克。

为了满足持续不断的需求,大公司和单个的贸易公司在法国大肆购买物资,或者买入大量的股票,银行和信托公司为匿名的委托人购进有价证券。他们强制管理威斯敏斯特巴黎银行、巴黎荷兰银行、里昂信贷银行及英国劳合银行。上述提到的银行,首当其冲的是威斯敏斯特银行。普鲁士国家银行花费了一大笔资金,用来购买法国硼矿的股份,将其纳为德国财产。这份提案是通过法兰西银行的德国专员向威斯敏斯特银行的德国专员提出的。法国外汇保护部和军事管理部门的经济处都同意这些买卖,并且还指示,应该从“法国人以及一部分犹太人手里”也弄点股票过来。 176

给法国公司的供货付账,也是通过这样的方法“支付”到帝国的账户上的。比方说,1940 年 11 月,多特蒙德得到了 72 万帝国马克,他们用这笔钱通过转账的方法购买到了法国废铁,这些废铁将被拿来在鲁尔河边的高炉中熔化。不管耶拿卡尔·蔡司公司、安联公司、弗里德里希·克虏伯公司、柏林库尔特赫尔曼艺术品金匠作坊,还是“生活艺术装饰坊”(专门提供特别的生活艺术品的公司),想要在法国购买货物、原材料或者公司股份,都是一样的:接收者付钱,帝国收款,而法国人还会由政府付第二次款。

陆军最高统帅部于 1940 年 12 月 5 日从 A 账户上拿出了价值为

2000 万帝国马克的法郎，用于购买国防军日常所需。1940 年圣诞节前夕，宣传部的高级官员拿着价值 75 万帝国马克的法郎上路了。位于柏林菩提树下的德国艺术品金匠作坊买入了价值 50 万帝国马克的物品。1940 年 12 月 17 日，杜塞尔多夫、埃森、乌珀塔尔的市长也有意大量购买。1941 年 1 月 20 日，法兰克福市的市长，1 月 21 日，莱茵省的省长也紧随其后。1941 年 2 月 12 日，柏林市的市长给他在法国的采购商寄去了 701 000 帝国马克。美食批发商“和英士与黑尔德公司”、柏林艾米尔·科斯特股份公司为高级官员们的战时日常生活购买美味佳肴。1940 年 10 月 17 日，专为希特勒购买艺术品的商人卡尔·哈伯施托克从 A 账户中拿出了 150 万法郎。事前，帝国经济部已经把相当于 75 000帝国马克的钱款打到了(化名为柏林一般货物贸易公司的)帝国中央账户中。

177　在军事历史研究所仅存的公开的战争历史中这样写道：“这种种交易是通过来源于占领费的贷款来支付的。”但事情并非如此。尽管贷款是用来筹资的而非付账的，委托人还是把他们的债务平衡得很好，只不过帝国财政部阻止了继续转钱。这项“清算调整”只在停战协议期内有效，但是对于那些被占领的国家，这个却是无期限的。

主管法国财政的负责人考虑到这一强迫合约带来的一系列经济后果，于是对停战委员会说明：“比方说货物从法国运到德国，然后因此产生的费用打到德国清算银行，以便这笔费用再回转到帝国银行，如果货物被撤回，法国财政部就要被迫从国家贷款中(即国债中)拿出一笔相应的法郎付给法国的债权人。这笔钱应该和前述款项等同。这样就会产生对帝国马克价值有利的反作用，与此相反，对于法郎的价值就不利。”

德国清算银行和帝国银行共同享有地址、电话号码和表格。这两者就是同一个部门。他们于 1941 年把这些信息印成小册子，发到帝国

银行的职员手中。

在意大利：买了东西不付钱

1943年9月，德国军队进驻"叛变了的"意大利以后，外交部发表了一份书面声明，上面清晰地说明了占领费和结算的关系。外交官公开声明这个计划是反国际法的，因此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将原文呈出来"。其中写道："现在的军事情况紧迫，不得不把意大利境内的制成品和原材料大批量地输出或者转移到德国，这样的话，通过银行结算就 178 不是很实际了。意大利政府一直都有一笔战争负担摊派费。我们基本上打算用这笔款项来填补这笔空缺，这样的话，我们重新开始结算（就像在轴心国时期那样），既可以平衡收支，又可以瞒天过海。而且还可以反击一下那些对内对外发表有代表性的反动言论的宣传，特别是那些以我们'抢光'了意大利为借口的。"

为了让那些重要的公司愿意继续提供费用，德国就必须首先把德意同盟时期留下来的那笔旧的债务偿还清。这样意大利人就能得到"一大笔结余"。按照外交部的想法，必须每个月"固定"从意大利人支付的占领费中"抽取1亿里拉"来弥补这项差额，在"个别特殊"的情况下，可能还要抽出更多的钱。这样的话，就相当于前几年德国的订货商在一些供货商那里遗留下的债务，由意大利人自己支付。（只要是和德国的私人公司有关的债务，一律都是用帝国马克支付的。）一些曾被强迫做过劳工的意大利人和那些强制劳动过的意大利战俘给他们的家人转过一笔钱。这笔钱原本是意大利的战争负担摊派费里面的，他们每个月可以拿到200至250里拉。而这些被引用的文件的作者也想使用同种方法，以便搞到这笔储蓄。

德国人从意大利总共弄到了价值为100亿帝国马克的财富。每个月起码能得到70亿里拉。虽然接下来的十八个月战争期间，盟军解放了意大利越来越多的地方，但是几乎直到战争结束，富饶的北部一直都处于德国的控制之下。不过因为意大利总体上看起来即将成为盟军的地盘，而且在一次特别行动中被解救出来的墨索里尼在加尔达湖的索179 多玛建立了意大利社会共和国，这样意大利就不用付占领费，而是（委婉的说法）战争支出费。

就像在别的国家一样，德国决定哪个国家要付的占领费的多少不是按照纳粹国防军的实际花费决定的，而是根据这个国家上一年度国家财政的数据决定的。1942—1943年，意大利的预算约为810亿里拉。这一笔预算实际上是包括了一项巨大的收入的，它包括法西斯意大利自1943年8月在其占领区搜刮来的钱财和被盟军一步步占领了的意大利的那些地方的收入。然而德国将意大利1942—1943年的这笔预算作为计算其战争支出费的出发点。

1944年3月负责财政方面的政府官员向全权负责意大利的将军仔细分析了意大利国民经济状况。意大利的年度国民收入为1300亿里拉，与此相应，就要付给德国840亿里拉战争支出费。这样就还有460亿用于私人和公共的消费。计算得多么精确啊！但是现实的情况更是不容乐观："要注意到，除了战争支出费，意大利还要支付当地驻扎部队的花费，满足其征用征调的要求，承担国防军的费用和战争带来的损失，而且他们还须在清算系统中先支付一部分定额。除了这些以外，意大利还要考虑到其本身的战争负担（战争带来的损失、养老金等）。"

而且，1943年10月23日的不平等条约签订后，更没有什么能阻挡所有这些费用的不断增长了。这段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话是这样说的：意大利要给大德意志帝国支付"与帝国经济要求相符的战争负担摊派费"。1940年在法国，为了把非占领相关的费用单独入账，还分别设置

了账户 A 和账户 B，而现在帝国财政部这样说：德国方面怎么样处理钱，那“仅仅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只要在意大利周边地区购买物资的时候需要里拉”，就会产生“一笔由意大利支付与升值了的帝国马克等值的额外的占领费”。现在已经不容等待了，帝国后勤部、戈林、罗各斯公司以及施佩尔的军备部的总代理准备好了很大一笔里拉，用来在北意大利大批购买物资。特别税的三分之一用在了军事装备上，其他的用于支付士兵和国防军官兵的工资以及其他的物资购买。还有一大笔防御工事的建造费用。 180

这样的一项政策引起了通货膨胀、货物减少，而且还带来了贫困。这些还引起游击队的进入以及民间抗议的增多。盟军的胜利也加强了这一趋势。当七万工人在米兰、五万工人在都灵举行罢工的时候，帝国财政部的特使胡贝特·施密特博士在 1944 年 7 月考虑：“对于这个问题只有一个解决办法，那就是把这些罢工者大量地送往德国集中营。”就是这个给出了轻率的解决方法的财政官员，对于他自己的事情、他自己的任务，却想不出任何的解决方法。“意大利的债务在不断地增长，”他于 1944 年总结道，“1943—1944 预算年度意大利的财政预算中的收入与上一年度相比下降了 30%，只能填补支出的约 14%。”

作为帝国财政来源补充的东欧

帝国的奴役劳动

从1940年起，帝国财政部一直在绞尽脑汁，利用金融系统压榨在德外国劳工的工资收入。帝国公司汇往25万个比利时工人家庭的工资都落入了帝国政府的一个集体户头上。以帝国马克支付的工资数额从那里流向帝国财政，而比利时工人的工资最终是从占领费预算中以比利时法郎的方式扣除的。也就是说，德国企业先负担工人全部协定工资，紧接着，帝国财政将工人被扣除税款后汇回家的生活费截取，最后由比利时国家以本国货币返还给工人家庭。

这种对外国劳工的工资欺骗在荷兰、法国、克罗地亚、塞尔维亚、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或斯洛伐克都得到了实际应用，后来还用在了意大利。每个劳工是否自愿在德国工作，根本不重要。对帝国而言，征用外国劳工以及类似的银行交易都是帝国收入的强有力补充。资金流入很快会记入臭名昭著的“公共管理收入”项下。对此，拉斐尔·莱姆金1944年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被占领的国家不仅向德国输出他们的财政，而且还向德国输出他们的人力资本。”在法国，德国人也娴熟地操作着这套掠夺手法。在第一个半年中就有在德法国劳工汇回法国

的超过5亿帝国马克的工资被提取，工人家庭最终获得的是法国法郎。但之后不久，法国的强制劳工的数量显著下降。在比利时这样被间接经济管制的国家，工人们欲寄回家中的工资尽管都记入了清算账户，但实际上并无差别。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强制德国人清偿这些清算账户上的欠款。

之前与德国结盟的意大利最终于1943年9月被德国占领，随后德国人抓走了超过50万战俘去充做强制劳工。而他们的工钱却在德国悬而未决。既然帝国的这套工资欺骗手法已经如此熟练，故从一开始就为意大利工人家属所能收到的工资规定了一个数额，这个数额将由意大利承担的战争负担摊派费筹措。雇佣意大利工人的企业，将工人工资汇入德意志银行的账户。同其他外国工人的情况一样，这些工资从银行落入了德意志清算银行一个总的“工资储备金账户”。这些到账的钱款不可能再寄往意大利，帝国经济部长责成：“这些钱就留在柏林，以供意大利政府使用。对这些到账款项的使用未来将作出决议。”结合前后事实，这意味着这笔结余款项将不时转化为国库债券。德军胜利时，这些钱款将用来与占领费冲抵。意大利劳动银行根据企业汇款至德意志银行总户头的书面凭证，向工人家庭支付工资。为此，意大利的财政部长向银行“出具了相应的信用担保”。

这套措施在针对波兰和苏联的强制劳工时，明显更加冷酷。根据 183 1942年的相应规定，每从乌克兰强征一名工人或一名年轻女人到德国，“其留下的全部财产及现金”就必须交给村中的长者保管，后者将其转让以实现其价值。“所有活物（马、奶牛、猪、羊、母鸡、鹅等等）、草料、秸秆、农作物”必须“即刻”“提供给占领军的经济主管部门出售”。村中的长者必须将买卖所得收益和现金存入德国信贷银行所谓的“限

制使用账户”。德军佯称,这些钱待这些工人返回故乡后将呈给本人,以便他们能用之重购牲畜和财产。德军占领苏联地区后,对于苏联的强制劳工,无论如何都是先将其所有财产变现,然后直接纳入战争财政。

到了德国,这些强制劳工被分至各个部门。这些从东欧强征来的劳动力根据最低级别的非技术工人的工资标准发放工资。1940 年 8 月 5 日帝国国防部发布命令,在德国务工的波兰人必须缴纳“社会福利税作为所得税附加”。(这一构想可追溯至 1936 年帝国财政部要对德国的犹太人的经常性劳动收入征收特别税,美其名曰“劳务补偿税”。) 1940 年从波兰工人身上榨取的这些收益首先流入了帝国手中。同时帝国财政部授权,适用于波兰工人的这一规定延伸至其他强制劳工群体,特别是那些受到歧视的群体。不久,犹太人和吉普赛人也得缴纳这种附加税。

184

根据第一个执行令,在帝国的所有波兰人,不管是自愿在德国充当劳工,还是在被德国吞并的国家劳动,原则上都要缴纳特别税。唯一例外的只有务农的波兰劳工(包括强制劳工),因为对他们颁布了一个较德国人正常工资极为不利的工资标准。每个月,他们的开支、住宿及零用钱在 8.50 帝国马克至 26.50 帝国马克之间。这意味着帝国放弃了巨大的税收,并间接支援了农民、大农场和食品价格。

社会福利税占工人毛收入的 15%,这也导致波兰工人既不能参加青年义务劳动军或参与防务工事,也不能享受德意志劳动阵线或寒冬赈济组织的捐助。

此外,德国人规定强制劳工(包括自由劳动的波兰人)都无一例外地要作为较为不利的第一或第二个税收级别缴纳工资所得税。根据家庭出身确立的第三和第四级别从一开始就没想到将波兰人纳入。人们早自 1939 年 2 月 17 日起就在工资所得税上对犹太人实行歧视。他们

被归入最糟糕的第一级税收群，而在前一年德国财政部长就已经剥夺了犹太人的儿童免税金额。针对苏联劳工，当局后来多次将征税体制具体化，但都没有从财政上作出对用工单位或强制劳工有意义的修改。

一个有妻有子的犹太人，1942 年作为强制劳工在戴姆勒—奔驰公司工作，每月工资 234 帝国马克，其中 108 帝国马克用于缴纳税款和社会保险费用。他的雅利安同事在同样的情形下拿到同样的工资，却只需要缴纳 9.62 帝国马克所得税和 20.59 帝国马克社会保险金。犹太人、吉普赛人、东欧的强制劳工所支付的税款和社会保险金是德国人的三倍以上。所以，也正是在德国劳动的强制劳工和在被德国吞并地区的波兰工人使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半段的所得税收入翻了一番。除去这些外，属于波兰工人自己的工资，大部分都寄回给总督辖区的亲人作为家用。对此，企业将相应的数额统一汇入帝国的一个集体户头，名义上只是记为“计划外财政收入”。而在波兰，总督辖区政府将对工人家庭负担这笔款项。 185

这种掠夺从根本上要追溯至帝国财政部。而总督辖区由于要照管波兰工人们一定范围内的亲属，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于 1940 年秋对帝国财政部也提出了抗议。总督汉斯·弗兰克就猛烈抨击道：帝国财政部以社会福利税为名减少了在帝国劳动的波兰工人的工资。结果，总督辖区却不得不用国家的资金负担这些工人家庭的社会救济。

希特勒本人似乎对此进展也感到惊讶，他曾表示：“如果帝国财政管理部门将波兰工人在帝国挣到的工资，不是转移至总督辖区政府，而是以其他名义自行使用，那么这几乎是不可行的。”企业以及纳粹东普鲁士党部等也抗议对波兰工人待遇过低，可能导致工人不再卖力工作。1943 年，帝国中央保安总局要求，“当前应避免将波兰人置于不利处境”，因为“波兰境内的抵抗运动愈发强硬”。 186

扣除了所有税款后，来自波兰和苏联的工人还要从工资中扣除每

天1.5帝国马克的住宿费用。按同时代标准估算,扣除后的结果是:一周收入40帝国马克的苏联劳工或波兰劳工,扣去不断上涨的所得税、特别税和社会保险金及生活成本后,还剩下约10帝国马克。这还要以德国的消费品供应尚未完全耗尽为前提。

接着,帝国经济部门又推出了"东部工人节余"项目,全力推行节余程序。每个企业的工资登记簿都包含了所谓的"东部工人节余卡"①,并粘贴突起的阿拉伯数字作为特制的标记。工厂将等量的工人工资直接打进帝国中央账户,每个工人在返乡时将得到所谓的节余并附加2%的利息。《帝国法律公报》上含糊不清地规定,关于结余金额具体如何交给工人及其家属,由东部占领区的负责部门或其总指挥部进一步制定细则。

为苏联强制劳工统一签发节余卡的是乌克兰中央经济银行。工资由企业统一打到这个银行虚拟的柏林办事处,并不计入每个个人账户,而是承诺有朝一日兑换成各母国货币。在德国,这些钱也不许被取走,规定最早也得等到工人返家时方可。

187 由此一目了然;所谓的乌克兰中央经济银行的柏林办事处实际上是什么东西:不过是帝国银行的众多假名之一。人们只要想想,在战争胜利后德国人会如何对待这些外国公民,自然就会明了,这些被强征的劳工最好无儿无女,在奴隶条件下辛苦劳作至死。德国官方如此地大张旗鼓包括引入"东部工人节余项目",不过是掠夺产权的又一伎俩。结果,在德国的波兰和苏联劳工所有缴纳的税、费和"节余",都是对德国战争财政的"特殊贡献"。当西欧和意大利工人向家乡汇款时,德国人也动用了同样的手法。

---

① 一种限制性取款账户。——译注

使用强制劳工对帝国的财政和经济有什么好处，从前文的阐述中已经一目了然。它完全免去了帝国财政的工资负担，巩固了战时经济，照顾了德国纳税人，减轻了不堪重负的消费品市场面临的抢购压力——这是其极受欢迎的附带效应。如果人们不用强制劳工而用更多的妇女劳动力并延长德国人的劳动时间，那么需要多投入数十亿帝国马克，用这些钱妇女们却几乎什么也买不到，更满足不了任何消费欲望。这可能严重影响帝国马克的稳定和公众心态。

如果我们研究 1941 年到 1945 年间德国国内的工资所得税收入，就会发现其主要都来自外国。戴姆勒—奔驰或克虏伯都不缺强制劳工，工厂总是减少波兰工人和苏联工人的工资，约低于德国人 15 至 40 个百分点。相反，德国民众，以其国家为代表，从每个东欧强制劳工创造的利润中明显获利更多：德国将工厂所支付之名义工资的 60% 至 188 70% 据为已有。

粗略估算，德国的工资所得税收入至少达 65 亿帝国马克。在农业中，帝国承担的工资负担较重，农民和食品制造业也间接得到了补贴，至少达 35 亿帝国马克。如果人们算上帝国所侵吞的劳工们往家庭平均每年 5 亿帝国马克的汇款，那又要增添 25 亿帝国马克，而这些钱被帝国记做了一般性行政收入。人们认为，所谓的东部工人节余可能超过 5 亿帝国马克，而德国从强制劳工身上获得的财政利润至少达到 130 亿帝国马克——相当于今天的 1300 亿欧元。这些都被帝国和国有企业所攫取。这上百亿的收入大大减轻了每个德国人的负担，而这只是普通德国民众从这场广泛的掠夺战争中获得的部分收益。

在德国联邦档案馆中，只有少量文件记载了帝国对强制劳工工资和福利的掠夺以及德国社会从中默默获得好处。耐人寻味的是帝国对

战争中过度消耗的社会保险金的补偿额，其透露出以下信息——此表格的编制借助于（维也纳）阿尔贝特·米勒的帮助：

189

	补贴（百万帝国马克）	指数	变化（百分比）
1938	640.4	100	
1939	748.6	116	16
1940	940.4	146	26
1941	1395.3	217	48
1942	963.1	150	-31
1943	1119.2	174	16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1942 年会计年度里社会保险金补贴增长戛然而止。那一年强制劳工经济政策正式确立，帝国对社会保险金的补贴额随之明显降低。人们看到，从 1938 年起的连续三个会计年度，补贴增长一倍多（指数达 217）。继续统计其线性变化，又三个年头后本应达到年补贴 21.4 亿帝国马克（1944 年）。到 1945 年 4 月底应升至23.5 亿帝国马克。

这一线性成长模型最初年增约 37.5 个指标点（那么，1942 年本应达到 250，1943 年应达到 287.5，1944 年应达到 325，1945 年应达到 362.5）。即使人们从 1942 年的指标点 150 按同样增长率起算，1943 年也要达到 187.5，1944 年要达到 225，1945 年要达到 262.5。人们对比这两组假定的线性模型并“翻译”其中金钱的差异，就会看到从 1942 年到 1945 年 5 月约有 22 亿帝国马克被“节余”，它们都来自强制劳工和屠杀犹太人。

不出所料,在德国的工资所得税收入中也清楚反映出自 1942 年以来对强制劳工的大量使用。

190

	工资所得税(百万帝国马克)	指数	增长(百分比)
1938	2090.8	100	
1939	2645.7	126	26
1940	2979.3	142	11
1941	4223.4	209	42
1942	4539.2	217	7
1943	5001.2	239	10

这些数据首先表明,自 1938 年至 1943 年间的工资所得税收入增长了一倍半。这一增长率包含了两次重要的飞跃,一次是 1938 年到 1939 年的 26 个百分点,一次是 1940 年到 1941 年的 42 个百分点。第一次飞跃是由于吞并了奥地利及苏台德地区,特别是战争开始后延长了工人的工作时间;第二次飞跃则是由于在工业生产中大规模使用了强制劳工。假定没有 1940 年到 1941 年的飞跃,那么年均增长率不会超过 5 个百分点。1940 年到 1945 年第一季度税收总收入约 173 亿帝国马克。在这个数据基础上,我们假设 1944 年到 1945 年仍然增长了 10 个百分点,因为强制劳工的使用在一步步强化。按照这个发展趋势,1940 年到 1945 年第一季度的税收收入应达到 238 亿帝国马克。由此推测,至少有 65 亿帝国马克——超过工资所得税收入的四分之一——攫取自工厂的强制劳工。

191

莫斯科的发行银行

不论战争最后阶段德国人的撤退如何混乱，占领军还是在北欧、西欧和南欧“支付”了德国信贷银行纸币或本地货币。因而，帝国进行的掠夺约莫就是其所支出这些货币的数额。而在苏联占领区却不是这样。德国人在那儿仅部分使用了现金，掠夺的更主要方式是隐蔽的“收据”或完全的肆意妄为。根据驻军命令，所有价值1000帝国马克以下的非军事物资和私人所有物品以现金支付。更高价值的物资则使用事先印好的收据，这也包括膳食和饲料，它们从来没有用现金支付过。而在苏联的集体农庄和国有企业中又有多少是私人的呢？因此，不同于其他占领区，在苏联地区的抢劫程度不能用所转化的货币量来衡量。下面将作进一步分析。

1941年6月9日，帝国银行经理马克斯·克雷奇曼通知德国信贷银行管理委员会即将面临的任务。帝国银行工作人员为满足部队的直接需求，已经筹划了六个机动化的德国信贷银行。1941年6月12日，为配合“东线作战计划”，帝国银行授权德国信贷银行纸币的印刷量提高10亿至15亿帝国马克，并要求“以最快的速度”。十天后，“巴巴罗萨”计划实施。7月底德军行进放慢，帝国印刷厂印制了价值100亿的伪卢布，但是并没有投入使用。作战部队每经过一地区，士兵就以德国信贷银行纸币吸纳戈比硬币（苏联辅币）。

192 在6月9日的会议上，管理委员会就提出，一个新的发行银行（一个莫斯科的发行银行）如何接管苏联的银行机构。因为，在预定的地区没有卢布钞票可用，甚至连卢布的铅版也没有，人们计划要迅速制造新的卢布。首先要启动印刷程序。在入侵苏联前，克雷奇曼又想到要引

入各种不同的货币:“如果苏联被占领区被划割成不同性质分而治之，那么未来要建立更多的发钞银行。”

一天后,即1941年6月10日,帝国财政部也举行了一次机密会议,内容涉及即将展开的东线作战。与会者讨论授信给一些德国企业，这些企业要能控制重要的生产设备和农场,并即刻再行运转,自然急需用钱。入侵苏联的十二天前,在一次虚拟讨论中,与会者假定,生产资料在落入德国人手中时已经被完全摧毁。这就导致了一个问题,即一旦设备已被摧毁,而“原油、矿产和农产品等存货依照命令应即刻运回德国”而不能作为抵押,如何能够保证信贷业务“通常必需”的担保。因此未来德国信贷银行的负责人应当提供间接的、无需担保的帝国信贷。最终也只有这种方式可行。于是,东线地区银行共发放了价值数千万帝国马克的信贷。

1941年晚秋,德国信贷银行管理委员会表示要以2克朗兑换1帝国马克的比率在东部地区引入一种新的克朗。为建立新的中央银行，人们甚至已经选中了帝国银行经理马克西米利安·伯恩胡贝尔。但是这个方案未能得到执行。首先是德国驻波罗的海诸国的民政管理部门 193 负责人表示反对,因为他们不希望激怒民众。后来,前线部队的不断开进逐步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此事也被搁置。

相反,与此同时,乌克兰地区发行了新货币——卡波瓦内兹(Karbowanez)。建立乌克兰中央银行(ZNU)的法律于1942年6月1日生效。在法律结构上,它进一步依赖总督辖区政府的发行银行。而发行银行的两位负责人均由帝国银行指派,占领军对货币的影响力由此保证。如同其他地区货币改革的情况一样,帝国财政部要求乌克兰发行银行将在乌克兰用新货币兑换成的卢布向德国信贷银行主管部门上缴。使用类似的方式,德国财政部也曾在阿尔萨斯—洛林地区抢夺法郎。而且1941年吞并东加利西亚后,所有的卢布都必须兑换成兹罗提

(波兰货币),以致波兰发行银行向帝国银行移交了约3.4亿兑现了的卢布。根据帝国银行经理克雷奇曼的报告,1940年除波兰合并区外的德国占领地区有6600万兹罗提被兑换成帝国马克,对此德国的银行家们都是秉承一贯的信条,这些金钱完全通过波兰的德国信贷银行和克拉科夫的发行银行变现。帝国银行的这位代表自豪地补充道:"帝国收获了超过3亿帝国马克,这些收入先是用于兑现东方各辖区的波兰货币,继而还贡献了波兰之外的作战军费。"1940年4月,波兰被占领区的德国信贷银行将其业务移交给新成立的发行银行时,带走了3.06亿兹罗提(折合1.53亿帝国马克,约15亿欧元),这笔钱信贷银行未予开支。什未林·冯·克罗西克如此评论随后几年的典型事件:"银行账目上的兹罗提最终由波兰的国民经济负担,只是这种变现以民众无法察觉的捐税形式实现,而专家们心知肚明。"

194

在那些仍然流通法郎、兹罗提或卢布的地区,德意志帝国的代言人们用这些钱购买物资,而无需记入占领费账户。

乌克兰地区的新货币增加了德军在苏联被占领区的支付手段,而无需制造伪钞。同时它使乌克兰储备的卢布大幅度贬值。这就要求名义上保持物价关系的正常有序。当地不是受假钞之害,而是饱受占领者的贪婪之祸。占领军使用这种货币更加方便地掠夺,而且愈演愈烈。乌克兰人用高额的卢布兑换卡波瓦内兹,中央发行银行的分支机构却不用向其支付现金。银行只需将相应的款项记入一个个人账户,而这个账户不过是有名无实,一直处于冻结状态。

这一做法所声称的主要目的是,"消耗当地多余的购买力"。而实际上,这些收入通过德国信贷银行和占领军军需部都落入了德国士兵和苏联被占领的卢布流通地区黑市商人的口袋中。同时,德国人购买的大量食品在1942年至1943年间几乎没有运回国内,而是被运至乌

克兰作战区之外。东方占领区指挥部要求帝国财政部为运回的物资付钱,但这一点逐渐不再被提起。

195 所以只能不断印制货币。新货币才发行七个月,帝国驻乌克兰专署的财政部门就表示这种状况应受到严厉批评,因为纸币流通量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增长了80%。发行量增加,货币就会贬值,特别是军士们手中很快一文不值的货币将会流入国内百姓手中。1942年“占领费的90%必须通过发行国库债券的方式筹集,当然还要借助印钞机方能兑现这些债券”。

享受“特供”的德国普通消费者

无论是在一战还是二战中,德国人都没有从本国农业中获得足够的支持。即使纳粹头目们成功地向外转嫁物力消耗,有83%的食品还得由国内生产。但无论如何,进口——特别是植物油和饲料的进口——仍然是必需的,以保证对本国国民足够的供应。大多西欧和中欧国家的粮食结算记录都体现了这一基本情况。于是,英国舰队一再利用物资封锁来暗中施压,尤其是企图使德国的供应力退回到战前水平,而使其自给的粮食数量减少。装备军队必然导致人造肥料的缺乏,人造肥料所需要的氮也是制造火药所必需的;而且很快会缺少劳动力、马、拖拉机、新的机器和燃料;要及时弄到种子,也不能耽误庄稼的及时收割。鉴于此,纳粹头目们在战争伊始就迅速决定使用波兰工人,特别是在农业中。

撇开这些,帝国粮食与农业部提出了未来可能出现的其他问题。196 自从1936年以来,相关负责人就专注于帝国的粮食储备,并借助于补

贴和税收刺激来修建储备粮食的仓库和场馆。戈林认为这些建筑物间接属于军备。为了加快建设速度，他于1938年夏任命强硬的粮食与农业部国务秘书赫伯特·巴克专门负责仓库的建设。粮食库存于1939年6月30日达到550万吨，一年后也基本保持这个量。到1941年6月30日降至200万吨，而到1942年6月30日更是少到67万吨。1942年8月，戈林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自那时起要比从前更加不顾一切地从被占领区攫取食品。此后，巴克将帝国粮食储备于1943年夏又提高至120万吨，到1944年6月30日进一步达到170万吨。

不同于1914年间，粮食与农业部在准备阶段即1939年8月已经实施了严格区别的配给制度，并在入侵波兰前若干天分发好了配给票。受到萨特的情境分析的影响，西蒙娜·德·波伏娃在1939年8月28日这样描述德国的战争准备："只要有了面包定量卡，人们就不会争夺了。"于是，1939年9月1日，一项挖空心思想出的、长期筹备的配给政策投入实施，并一直实施到战争结束。

巴克的同事和顾问们将1939年肉和蛋制品的配给有效降到了民众心理和生理的最低需要水平。既然生产1千克肉所需要的饲料约相当于5千克粮食，那么农业基础可以更好地被利用。此外，稳定物价、严惩黑市商人和黑市屠夫，完善了起先很慷慨的食品管制。配给制度 197 被认为是公正的，特别是它一直体现了差别待遇：重体力劳动者、待产和哺乳的母亲、儿童、病人，然后是普通消费者。当然，也要考虑各地区的供给方式。

尽管食品有了适当的配给，人们的进食习惯也逐步适应了战争，但仍然还存在疏漏之处。有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此次将物资匮乏转嫁给了被占领区人民，特别是被迫害的少数人群和苏联俘虏。波兰

或希腊，尤其是苏联地区都蔓延着饥饿，精神病院、犹太人隔离区、集中营、战俘营里很多人饿死。就这个政策戈林曾不止一次地表示：“倘若有人要挨饿，那么绝对不能是德国人，让其他人挨饿去吧。”

基于这样的基本考虑，一个统治苏联的命令出台：“决不喂养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而是抛弃他们，要以俄国为基地支持欧洲地区的配给经济。可想而知，这片地区的工业荒废和大量人口死亡是不可避免的。”这份文件的另一处写道：“在俄国的土地上，有数千万人是多余的，他们必须死亡或者迁至西伯利亚地区。”他指的是徒步迁徙。

军需总长爱德华·瓦格纳 1941 年 11 月 13 日说道：“战俘营中不工作的俘虏应被饿死。”这一政策在 12 月份又有了改动。从那时起，“让尽可能多的战俘从事义务劳动并养活他们”。是德国人在莫斯科的境遇导致了这一转变。德国人对这场变得持久和完全不可预知的战争改变了战略和经济政策，暂时应尽可能将所有战俘充做强制劳工使用。不过这一决定对那些已完全瘦弱不堪的战俘而言为时已晚。要想奏效也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198 饥饿政策，特别是针对城市居民的饥饿政策，最终未能使城市屈服。瓦格纳严禁“部队的给养流入被占领区民众”。300 万军队应“为了故乡的亲人”依靠脚下的土地来供养自己。后勤军官应当无所顾忌地征收。这一实践随着德军停止从苏联南部农业区向北部地区和城市地带供应食品而推进。军队沿行军路线，所经之处，军人和农场主把所有能吃的都一抢而空。1942 年 12 月，德军驻苏联南部地区的农业负责人说到要吞噬一片 800—1000 公里纵深的地区，这片区域应具备帝国所需要的一切。

“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德军统帅很早就认定，“占领大城市并不那么吸引人。实施包围则更加有利”。1941 年 9 月 10 日，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给养部门的专家威廉·齐格尔迈尔教授在日记中写道：“我们不能

背上未来迫使列宁格勒投降的负担，必须借助经济手段消灭之。”11 月 27 日，汉堡市长卡尔·文森特·克罗格曼受命前往列宁格勒前线时记下了这段历史：“人们认为，列宁格勒中的大部分人口，约 550 万人，将会饿死。”东方占领区司令部认为，此时“无动于衷是非常必要的”。同时，戈林预测，这会是自三十年战争以来最大规模的死亡。

爱德华·瓦格纳宣告：“必须让列宁格勒饱受饥饿之苦。”两个月前他写信给自己的妻子：“首先必须长期围困彼得堡，最后才能使得我 199 们不再要供养几百万人。此时决不能有恻隐之心。”在列宁格勒一役，整个城市在两年半的包围中至少饿死了 100 万人。

哈尔科夫地区的军事指挥官下令：“德军对哈尔科夫城市居民的生计没有兴趣。”该城市由国防军第六军占领，最高指挥官、陆军元帅冯·赖歇瑙对东线部队的行动下令：“给养居民……及赠送烟和面包是妇人之仁。”从被占领的刻赤至克里米亚的报告说：“迫于危急的给养状况，清除犹太人的行动要加速执行。”

对国内食品供应的担忧在最高统帅部颁布的命令中得以反映。1942 年 5 月，东方前线的士兵——除了正常的战地军邮外——每个人还可邮寄一个 20 公斤重的包裹回家。官方宣称这旨在“帮助负重过多的军队”。不过，最高指挥部对这些包裹免于海关检查，而直到寄回国后才被打开。若是查看这种“装脏衣服的包袱”的话，就会发现里面全部包裹着熏肉。1942 年 12 月，国防军与戈林一致决定，为所有在非洲、潜水艇上和东线作战的士兵组织“前线度假军士包裹行动”。帝国驻乌克兰专署为这一特别目的购买了价值 3700 万帝国马克的食品。

1942 年 8 月 6 日的会议上，戈林赤裸裸地要求所有帝国专署和军事指挥部从被占领区向帝国输入更多的收入：“我不在乎有什么地方势将发生饥荒，只要这个地方不是在德国。”在狭小的塞尔维亚夺取了肥

沃的土地后，有10万吨小麦和玉米被补充供应回德国。同样的情形发 200 生在法国和比利时，“因为德国是为了进行对布尔什维克的战争而为欧洲在流血”。于是1942年到1943年底，法国向德国输入的食品数量增长了50%。1942年8月，负责乌克兰地区的帝国专员埃里希·科赫在与希特勒谈话后阐释了给养政策的基本方针。根据总结性的议定书，他说道：“乌克兰要提供德国所欠缺的物资。这一任务要不惜一切代价完成。……提高面包定量是政治需要，以将战争推向胜利。缺乏的粮食必须从乌克兰筹集到。在此目标面前，对平民的给养完全不重要。”

正如克里斯蒂安·格拉赫所指出的，提高德国人给养水平之困难加速了对欧洲犹太人的屠杀。当捉襟见肘的总督辖区政府仅存少许来自德国的食品时，1942年夏天，巴克决定征收更高数额的粮食和鱼类。当地给养部门的负责人卡尔·瑙曼坚决反对，他指出波兰给养已经非常匮乏。而巴克意味深长地反驳：“波兰地区还有350万犹太人，应在今年全部清除掉。”这一数字被严重夸张或错误估计了，才导致了一系列后果。1942年8月24日，还是瑙曼在总督辖区政府的行政会议上面对所有管理精英们决定：“供养包括150万犹太人在内的人口已经不可取。只保留30万犹太人，他们作为手工业者或其他工作者对帝国还有利用价值。……其他120万犹太人不再被供养。”事实上，到1942年12月31日，有超过100万波兰犹太人被送进了毒气室而被杀害。 201

克里斯蒂安·格拉赫还指出，面对同样的形势，德国领导层在三个季度前，即1941年9月，针对苏联战俘的饥饿策略已然强化。当时纳粹高层已清楚，不可能在冬天到来前战胜苏联。9月4日，巴克拒绝了向国防军提供210万吨粮食和65.2万吨鱼的要求，并要求军队依靠苏联领土养活自身。在明确援引1918年德国国内因饥饿而爆发叛乱的情况并表示不可能降低对德国国内的配给后，戈林于1941年9月16

日发布命令:"原则上被占领区只供养那些为我们工作的人。"基于食品补给之需要,戈林下令:"不计一切代价要节约供给。"不久,戈培尔在与巴克就红军战俘营之情势交谈后表示:"对正在发生的饥荒无须任何解释。"在里加的赌场内,国防军军官谈论"他们的任务,就是让俄国战俘饿死或冻死"。

直到1942年2月1日,共有330万红军战士被俘,其中200万被投入德军战俘营并在运输途中死亡,死亡率达到60%。如果人们扣除战争的最初三周,这三周里刚被俘的人还能靠身体储备勉强维持生命,那么200万人的死亡相当于平均每天死亡1万人。在一战中,德国饱受饥饿之苦,当时140万俄国的战俘有5.4%死亡。人们只要想想,部分人负伤或者在关押时已经奄奄一息,那么死亡数字就会证明,当时要帝国上层遵守《海牙陆战条约》是多么滑稽可笑的事情。

202 对苏联战俘、犹太人和苏联城市居民实施无情的饥饿政策后,1942年10月4日,一个周日,戈林在柏林体育馆就"收获感恩"讲话。首先他谈到非德国农民的收成,他宣告:"我们成功地用被占领区供养所有的军队。"戈培尔认为,这是"一个小失误"。戈林的讲话主要是预示,食品配给在几个月后将提高,特别在遭受空袭的地区。他承诺圣诞节人们将得到"特别配给"。在谈到被征服的东方地区时,他用了这样的措词:"从今天起,形势将越来越好,因为我们已经占领了最肥沃的土地。鸡蛋、黄油、面粉,那里将会应有尽有,并超乎我们的想象。"几天前,希特勒就谈到建立战争—寒冬赈济计划。戈林面对百万听众表达了这一愿望,他宣称"东方战场的开辟"很快又会带来"和平的形势"。是的,"战争将不会受到大的阻碍,直到胜利结束"。

于是,由元首策划、戈林具体操作的这一动员没几天后就进一步加强了人们的信心。帝国保安部如此报告民众的反馈:"戈林说到了人们的心坎上",或者"戈林详尽描绘了帝国给养状况将不断改善",这"减

少了民众对给养困难的忧虑”；而且工人们看到了“即将实现的前景”。进而，人们“对于军事状况，例如战争进程和斯大林格勒的持久战，不会有过多的想法”。在1942年10月12日帝国保安部的报告中写道：“女人们的心情得到根本好转，承诺要稳定地改善给养和后勤条件自然而然地对她们发挥了最大作用。”戈培尔注意到“德国民众的情绪完全缓和了”。

根据帝国统计局的报告，1941/42和1942/43两个战争给养年间，占领军从苏联被占领地区攫取了以下主要农产品（一个给养年就是从一次收成到下次收成之间的时间；在下表中，饲料、谷类都算做粮食；油料果实、黄油、食用油都列在植物油和动物油项下）。 203

苏联食品	占领军（吨）	德国（吨）	总数（吨）
粮食	3 385 021	988 318	4 373 339
鱼类	435 058	60 585	495 643
植物油和动物油	90 732	632 618	723 450
土豆	1 880 240	15 535	1 895 775

根据这些数字，综合同时代的统计表，还可以算出军队直接获得的或夺取的成果。它尽管比较少，但仍然是相当可观的，仅粮食就超过了10万吨。最后不要忘了东方战场的帝国人员的后勤供应（公务员和东部公司的员工）。此外，两年内数百万德国军人也要进行私人采购，这些都没有被官方统计表考虑在内。但我们还是能得出一个结论，尽管没有被计算在内的食品收获肯定少于已经计算在内的，但也已经是相当大的数额。因此，下面要将军队的消耗随之提升15个百分点，这是

还原真实数据所要加上的最小数值。

如果人们将所有结果与德国的粮食生产相联系,那么抢劫苏联地区给德国增加了10%的收成,植物油增加了超过60%的量,鱼类则增加了12%。

人们只要将所有的收益与这些年一国居民维持生存的最低消耗——当时的规定是2.5个粮食单位(GE)——联系在一起,就能清楚看到,为什么在苏联被占领区饿死现象是那么普遍。不同食物的换算要借助1940年代确立的GE方案,这是帝国给养部门使用的。一个GE相当于2公担(1公担=100公斤)粮食。其他的农业产量,据巴克的学者顾问们,即著名农学家埃米尔·韦尔曼和格奥尔格·布洛姆,根据营养成分和能量的转化换算成GE。这就构成了战争期间食品配给制的自然科学基础,今天这些基础数据对有效解决饥荒仍然是有帮助的。据此,土豆应换算成0.2个能量因子,荚果相当于1个能量因子,一头母牛为5.7,一头猪为4.2,鸡蛋为4.2,脂肪为3.4(鱼类平均为5,介于猪肉和牛肉之间)。

204

要审判掠夺所导致的灾难性后果,需要进一步换算:德国人两年间从苏联抢劫的,再根据上面的关系除以共同的基数。我们选择最主要的给养物资,根据帝国统计局那段时间的统计数据,得到下列结果:

	军队	**德国**
	GE	GE
粮食	33 850 210	9 883 180
鱼类	21 752 900	3 029 250
植物油和动物油	3 084 890	21 509 010
土豆	3 760 480	31 070

总数	62 448 480	34 452 510
加上军队消费的15%量	9 367 272	
	71 815 752	
总数		106 268 262

前面已经谈到，一个人每年平均需要2.5GE才能勉强维持生存。205 因此，将德军在前线消耗的以及为供应平民所掠夺的食品折算成GE后的最低收益分成5份，可以看出人们实际得到的基本物资。所谓的最低限度其实源自德国“欧洲生存空间”报告。据此，苏联的自给量在和平时期达到了101%。即使有战争——如果仅仅因为破坏和混乱——而没有德军的抢劫，最低也只降至100%。而德军的食品掠夺导致了数千万人饿死或——纯粹从计算上讲——完全抽空了2120万人的生存基础。

不待人们想象并冷漠地解释这一真实的场景，1941年5月21日的国务秘书会议已经决定：“战争现在只能继续推进，所有军队在第三年里必须依靠俄国提供给养。当我们必须从这个国家掠夺时，毫无疑问数百万人将会饿死。”

1942年夏天，一个在乌克兰基洛夫格勒工作的德国雇员在信中谈到了食品掠夺的实践，这个人为帝国在苏联被占领区的垄断企业工作，并且负责“接收和保管所有的生产，无论是农业还是工业，并且将一切可能的食品和酒类首先供应南方—东方前线。”这封信中写道：“犹太人，纯属浪费！”他说工作的主要目标是“尽可能减轻祖国的给养负担。但是可能还有些剩余”，所以要运回德国，“大量的小麦、向日葵籽、葵 206

花籽油和鸡蛋都运回帝国。正如我给妻子的信中所说，你们正要分到这些食品，我可以自豪地说，我也是这次行动的主要参与者”。

被占领国家的食品首先有利于德国士兵。他们还可以把不少物资寄回家。1942 年，更多数量的食物被运回德国——分给德国的重体力劳动者、孕妇、雅利安老人和婴儿，赢得了普通消费者的长期满意。这指的是持有普通食品配给卡的一般消费者，他们并无权利享受特殊补贴。

食物配给的量及对德国人有利的内部分配制度坚定了德国民众对帝国的信任。1945 年，柏林的母亲们生活困难，她们第一次“不能按时拿到全脂牛奶”。德国妇女甚至在 1945 年后的十年间不时回忆起当年，不满地暗示：“即使在战争期间我们也没挨饿，因为一切运转正常！而战争结束后一切变得糟糕。”

这里又要联想到当年被围困的列宁格勒。1942 年 1 月，那里每天都要死亡 3500 到 4000 人：“几乎没办法弄到棺材。数百具尸体就简单用布包着，或者堆在公墓里，或者堆在墓地周围。政府将被丢弃的尸体埋在公共坟坑里，这是民兵用炸药包炸出来的。人们已经没有力气在结冰的土地上去挖一个普通的墓穴。”

第三部分

抢劫犹太人



国家强盗原则

通货膨胀和雅利安化运动

通常人们会把雅利安化运动的获利者和企业大财团(康采恩)的经理和银行家们联系在一起。20 世纪 90 年代晚期,在许多欧洲国家和大企业内部的由历史专家组成的“纳粹调查委员会”加深了这种错误的印象。在不同的专业著作中,那些职位或高或低的纳粹机关工作人员,都被认为是对雅利安化运动推波助澜的人。多年来,德国的一些邻国如波兰、捷克和匈牙利的二战受益者——那些在占领军掠夺犹太人的行动中,从与占领军的肮脏交易中获利的人——又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然而,每一种认为这种肮脏的交易只是中饱了私囊的观点,都是错误的。因为它掩盖了问题的实质,即当初被洗劫一空和赶尽杀绝的欧洲犹太人,他们的财产现在在何处?

要搞清这点,首先得明白,德国发动二战的资金来源。几乎在欧洲的所有雅利安化之处,那里的国家机器和占领军都会没收犹太人的财产。当然,在任何所有制关系发生革命性的社会变革时,毫无疑问,腐败、贪污和私人侵吞等所有想象得到的人间丑剧也都会轮番上演。在柏林被雅利安化的普鲁士财产,都作为罗马化的犹太人财产流入了布

加勒斯特。然而,在哪里都一样,在任何情况下,对于从犹太人处掠夺
210 来的股票、房产或者家具和衣物,私人要想得到都必须花钱购买,而且是按照因为战争而几无市场流通可言的交换价值。正如德国财政官员所说,这些财产在私有化以前就已经被国有化,"流向"国家了。

尽管有些商品被贱卖,大量的销售收入还是流向了欧洲的国家银行。没收和变卖处理犹太人财产不仅作为1938年德国财政预算时的紧急措施,而且还被官方树为典型,推广到欧洲其他被占领国和地区。唯有如此,雅利安化运动才能有序进行。值得一提的是:一场席卷整个欧洲的大规模洗钱运动在每一个国家都会催生一些副产品,但归根结底都是对德国有利的。没收程序的某些环节很有进一步揭露的必要,它们从根本上保证了被没收的犹太人财产都能流向同样的目的地,即德国的战争银行。这使某些紧急的战争需求得到缓解。这方面的详细数据已经很难查证,因为德国人把国有化的各地犹太人财产和针对其他人和团体的没收行动完全搅和在了一起。

所有的没收政策都可以从德国人将其称为"总督辖区"的波兰讲起,那里曾居住过约两百万犹太人。德国人占领波兰国土后,便立即封锁了所有犹太人名下的账户、银行保险箱和仓库等。他们按照所谓的条例强迫犹太人将所有银行存折和保险箱集中存放到一家银行。超过2000兹罗提的现金须存入银行账户,每周只可以提取250兹罗提用于生活开销。由于有了托管人,他们不得不依程序行事。1939年11月,总督辖区政府正式成立了托管局,它确认了之前的国家财产,没收战争
211 后无人认领的财产,没收国家公敌和犹太人的财产。据设在克拉科夫的财政部透露,这些财产都流入了总督辖区政府的总账户中。

在总督辖区内,托管局接收了约3600家企业,其中大多数都是犹太人的资产。这其中有1000家是有名可查的。华沙的房地产总共有

50 000 处,当时至少约合 20 亿兹罗提。“无论如何,只要可能”,不动产都应该快速出手。为了大量出售流动资产,托管局负责人普洛德克成立了“信托—再利用有限责任公司”,出售来自犹太人居住区中的犹太人的,以及逃亡的或者被认为是国家公敌的波兰基督徒的家具和衣物。1942 年,普洛德克宣布关闭这家依私法组建起来的公司时,其资产已达到 5000 万兹罗提。

尽管有原则就有例外,当地的所有贪婪行为还是被明令禁止的。总的来说,那些来源于所谓被托管的土地、资本和企业的剩余资金都流向了总督辖区政府的账户。从这些财产中被严格划拨出来的部分首先用来支付给原来的所有权人。托管局声称:“所有权本身应首先不受侵犯!”直到犹太人被驱逐和杀戮时,那些事实上早已被剥夺的财产才作为所谓“无主的财产”从法律上变成了“总督辖区政府的财产”。

据帝国财政部 1941 年 10 月公布的数据,占领军费开支在比利时占到了国家正常财政收入的 125%,荷兰为 131%,塞尔维亚为 100%。而帝国银行在其他时间、用其他方法调查得出的数据显示:第一年的占领军费开支,在法国已达到国家正常财政收入的 211%,比利时为 200%,在荷兰(包括外部占领开支)为 180%。在挪威,那时总计达到 212 242%;1942 年底,军队支出约占 2.4 亿挪威克朗,占总税收的 339% 和国民收入的 95%。

占领军和傀儡政府虽能容忍一定限度的通货膨胀,但却不能坐视其无限制地迅猛增长。德国人竭力避免此类现象的发生,因为正如在被占领的希腊,通货膨胀率节节攀升,结果会给盘剥和联合统治带来麻烦。必须保证当地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功能。因此,在高度机密的情况下,欧洲犹太人的财产开始在战争期间的财政政策中发挥作用。

对这些财产的清算有一系列的措施,其目的是为了遏制欧洲被占

领国和附庸国的战争通货膨胀。换句话说，德国人从变卖犹太人财产中获利，并将其利润转入了国库。随后，这些财产又从国库转入占领开支账户中。根据政治形势的不同，各被占领国将犹太人财产转为国有的做法也各有不同，这点在以下章节中将一一阐述。

要想拨开笼罩在这段历史上的迷雾，主要困难在于其非同一般的保密程度。这可以从比利时的犹太人身上得到印证，由于他们拒绝同德国人合作，其地方管理权被德国军方剥夺。有关决议是由占领军的高级军官们在1941年5月16日会同戈林的国务秘书瑙曼和帝国财政部的高级官员在布鲁塞尔作出的。按照当时的会议日程，只有占领军费开支这一问题需要讨论。出于对货币稳定因素的考虑，必须压缩这 213 些开支。所以，十四天以后，军队发布命令，犹太人必须申报所有财产。5月16日的见面会上，也许是一位由财政部派往布鲁塞尔的官员要求建立一个特别的专责没收财产的机构。当时的会议记录留下了这样的记载："我们请求获得特别的授权。（国务秘书纽曼打断道：'对此没有商讨的余地。'）"意大利方面在被占领的意大利北部变得愈发困难的时候，德国政府特派员曾于1944年11月在意大利银行写道：在威尼托和弗留利这两个地方，从即日起，从每个犹太人的银行账户上所没收的资金可直接从其账户汇入主管银行。德方的银行特派员、安全警察与帝国保安部的指挥官马克西米利安·伯恩胡贝尔负责对犹太人的没收行动。

这个为了战争筹款并属于别国国籍的没收机构，无论如何都不能留下任何档案资料，且只能在最小范围里被提及。很显然，德国的官员们要极力遮掩其在各国所进行的违背国际法的掠夺行径。这些掠夺行径作为在被占领国内推行的内部事务，比当地从国家层面所推动施行的措施执行得更好。格哈德·阿尔德斯认为，德国对荷兰也采取了同样的方法。占领军把掠夺来的财产转了账，汇入帝国的总户头，"企图

将他们的掠夺行径掩盖得天衣无缝”。

对塞尔维亚的财政援助

从卷帙浩繁的历史档案中,我希望能重新整理出对塞尔维亚军事统治区的决策过程,并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德国人在那里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屠杀了犹太人。入侵塞尔维亚一年后,即1942年4月中旬,塞尔维亚军事统治区的头目总结道:“几个月前,我已把附近大片土地上能抓到的犹太人都杀光了;把所有犹太妇女和儿童都送入了集中营,同时借助帝国保安部的力量搞到一辆‘除虱子’的汽车,二至四周后即将对集中营进行彻底清理。”(该头目所谓的“除虱子”的汽车,就是把犹太人妇女、儿童和老人集中在一起熏死的“煤气车”。)几周后,约22 000名塞尔维亚犹太人中的绝大部分遇难。5月23日,外交部的一位犹太问题负责人断言:“犹太人问题已不再是塞尔维亚的焦点,当务之急是如何对财产法问题进行规制。” 214

全权主管塞尔维亚经济的第十七处(后来是第十二处)负责对当地犹太人财产的没收行动。帝国银行官员汉斯·古尔斯基统管整个项目;他曾经在布加勒斯特同赫尔曼·诺伊巴赫一起共事过(在以后章节会着重提到)。1942年初国防军与党卫军屠杀了塞尔维亚的犹太人后不久,占领区当局和四年计划局的专家已开始讨论遗留财产的最终用途。1942年5月23日,外交部发布命令:“只要是为德意志帝国和德意志人民服务,所有没收的财产都应由帝国统一的基金会管理。”在对犹太人占有的房屋和土地所施行的临时管理中,也已经预先考虑到了这些财产日后会被帝国统统收入囊中的可能性。大多数官员将潜在的雅利安化收益视做日后塞尔维亚对入侵者德国提出“战争赔偿”的预

支款。

帝国财政部强烈反对四年计划局于 1942 年 3 月 21 日提出的"有利于帝国价值"的言论。其代表克里斯蒂安·布赖汉在 1942 年 5 月提出:帝国所得的一半收益必须按规定流经塞尔维亚的账户;然后,军队负责人须确定每笔款项的用途,并详细通报塞尔维亚相关管理层。一215 个月后,就同样问题又进行了一次会晤。外交部代表报道说:"关于清算塞尔维亚犹太人财产的处置问题,已于 6 月 19 日在四年计划局的办公室,根据先前的几次谈话,作出如下决定:塞尔维亚犹太人的财产只能归塞尔维亚所有,归德意志帝国所有是违反《海牙陆战条约》的。"不过,战争所得收益可以间接地被帝国使用。《海牙陆战条约》第 46 条明确规定:"私人财产不可侵犯。"但是,该规定只适用于占领国的军队,不适用于被占领国的日常管理。

柏林会晤的几天后,戈林综合了专业财务人员的意见,当即宣布:从此塞尔维亚犹太人的财产应即刻归塞尔维亚所有,其理由是:"为了对因占领塞尔维亚的军费开支而大幅度提高了的塞尔维亚国家预算提供财政支援。"如今,财政总特派员加速进行多瑙河以南犹太人财产的交接,以便塞尔维亚可以对之再利用(多瑙河以北,驻扎在巴奇卡的德国人则采取了极其粗暴的手段);另外规定:塞尔维亚政府须对 1941 年 4 月 15 日成为南斯拉夫国民的犹太人在塞尔维亚的财产加以处置,制定出有利于塞尔维亚的国家法令。塞尔维亚内阁于 1942 年 8 月 26 日颁布了这项法令。除了上述决定的主要动机——巩固第纳尔(塞尔维亚货币),仿佛遵循了《海牙陆战条约》的规定——以外,占领方还希望通过交还犹太人财产来稳定塞尔维亚政府的表面局势和维护其声望。

事实上,1941 年下半年的战争负债几乎是塞尔维亚正常国库开支216 的两倍,紧接着,从德国方面来看,立即引发了一场严重的货币危机。那时,每月军费开支近 50 万第纳尔。1944 年 12 月统计出的塞尔维亚

犹太人总资产约30—40亿第纳尔。柏林决议作出时，这足够用来支付半年多军费开支；甚至从长远看，能减少塞尔维亚货币的通货膨胀压力。此后，外交部的代表于1942年9月提出了以往月度报告中经常遇到的问题："限制占领军费用开支"，"目前无须对此作出解释"。

这些言辞，正如塞尔维亚记载的：指明了纳粹高度机密的惯用掠夺伎俩，德国人正是用这种手段在整个欧洲强占了犹太人的财产。只是他们以后通过傀儡政府的金融合作机构和国家银行"洗钱"，将这些证据彻底消灭了。德国占领者为同谋犯们设立了一些国家机构，以自己颁布的国家法规为准，让钱流入国家财政的各项捐款名目之中，便于从此隐藏这些资金的真正来源，并占为己有。

向匈牙利提出的索赔要求

尽管匈牙利的帝国摄政霍尔蒂·米克洛什和希特勒之间的关系剑拔弩张，两国还是缔结了同盟，尤其是1938年到1941年之间，两国关系日益密切。德国对匈牙利的兴趣是垂涎其在东南欧的战略地位；匈牙利需要德国，是因为要调整《特里亚农条约》所造成的领土上的后果：1938年在首次维也纳仲裁裁决中匈牙利收回了部分斯洛伐克，几个月后收回了喀尔巴阡—乌克兰；1940年第二次维也纳仲裁裁决中收回北特兰西瓦尼亚；1941年收回巴奇卡、巴兰尼亚和紧邻施蒂利亚的普雷克姆尔杰。1941年夏天，匈牙利和德国的附庸国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一起加入了针对苏联的战争。 217

自1943年起，匈牙利政府试图将被德军包围的地区从战争中解脱出来，实现同西方盟国的和平。因此，1944年3月19日，纳粹国防军进入匈牙利，建立了帝国全权代表机构和一个合作的匈牙利政府，它拥有

一定自主权;同时,苏联红军已挺进到东部边界上了;当时可预见到:喀尔巴阡山地区将会成为战场。尽管德国已占领了匈牙利,但保守派的领导层一致认为:要将苏联人阻挡在国门之外。考虑到落入苏联统治的可能性,他们认为纳粹德国是一种比较小的灾难。

从1938年起,匈牙利政府颁布了歧视犹太人和分割其财产的法律,其中于1942年颁布了一项对匈牙利战争财政特别重要的法令,它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有犹太人的贷款一笔勾销,借此,匈牙利可以留有更多时间和余地来偿还对苏旷日持久的战争所产生的新债务。虽然表面上声称没收财产是"为了给犹太人迁徙提供资助",事实上是其进行战争融资的一种手段,就像他们以同样的借口,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斯洛伐克以及德国所做的那样。

反过来,德意志帝国于1943/44年间支付了小部分从匈牙利清算资金腾出的有价证券,价值逾1亿帝国马克,主要来源于被没收的犹太

218 人财产。举例来说,1941年9月,布尔诺的犹太人尤利乌斯·茨维克尔的有价证券被收缴给国家,其中包括利率为7%的匈牙利抵押债券和价值96 000美元的贷款。德意志帝国国库于1944年2月共向"布拉格迁徙基金"支付了182 898.75帝国马克,号称用于犹太人的外迁,该款项用于支付帝国长期战争债务。由于业主已被处死或流亡国外,因此帝国国库得出结论,该款项将永远不用被偿还。事实上,这只不过是德国同一战争账户里的转换,德意志帝国已通过茨维克尔的抵押债券抵消了对匈牙利的债务,用其价值换来了石油和食品(匈牙利当时是继罗马尼亚之后,在德国势力范围内的第二大原油生产国)。

1944年3月20日,德国进军匈牙利的第二天,国防军统帅部在柏林南部的驻防地于特博格同匈牙利军方代表签署了一份友好协议,德国愿意承担在匈牙利的军费开支。德国人这样做的目的显而易见:由于日趋紧张的军事局势,他们试图在新占领的土地上尽可能少地耗费

人力物力等资源,而尽可能多地与当地军事力量及民族主义右翼保持融洽。几天后德国就允许匈牙利恢复部分主权,并决定与新的匈牙利政府和军队再次结为联盟。

然而,什未林·冯·克罗西克反对于特博格协议。因为"对于帝国债务的不必要增长以及帝国无法偿还的债务",他是要承担最终责任的。此外,对于欧洲大战场上的战争债务和人员损失,他认为也应重新考虑责任的分担。再次,这位部长还进一步解释道,由匈牙利承担开支 219 的举措可以提供如下保障:即匈牙利人通过自己另外一系列的财政措施,平衡由军队入侵而产生的支出;因而在战争期间,为了维护匈牙利人自身的同时也是帝国的利益,匈牙利会强烈抵制由战争支出带来的通货膨胀危机。举措之一是对犹太人财产进行清算。被派往匈牙利的帝国财政部特使废弃了原先的财政约定,把急剧上升的日常军费开支强加于匈牙利身上。

1944 年 4 月与 5 月,新的匈牙利政府没收了犹太人的财产。阿道夫·艾希曼通过匈牙利宪兵队对犹太人进行了驱逐。德国官员于 3 月 19 日之后快速进入布达佩斯,其中有一位是来自德意志帝国银行的利奥波德·舍夫勒。他曾在巴黎主管对财务管理的审计,然后在被占领的波兰完成实习后,参与成立了"乌克兰中央货币银行"。如今,他在布达佩斯正式走马上任,上任伊始,便率先于 4 月 23 日解雇了匈牙利国家银行的代理行长,取而代之的是与德国人有着强烈合作意愿的伊什特万·贝拉蒂尼(他称其"与我们一贯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继任者于 4 月 26 日宣布:所有银行的保险柜中属于犹太人的财产,都必须过渡到帝国的掌管中。4 月 28 日,舍夫勒已要求调查所有黄金、外汇储备以及所有文书档案和专家鉴定书,尤其是国民经济部分的内容。(关于这一点,一位匈牙利国家档案馆的负责人员于 2004 年 1 月说道:"当时我的工作才刚刚开始,就被禁止审查匈牙利国库的财政

状况。”)

从其他渠道至少可以大致勾勒出这段历史的发展脉络。1944年5月23日,帝国财政部的官员在一次匈牙利会议中心满意足地承认:“目220 前我们已经顺利完成针对匈牙利犹太人制定的法规。匈牙利政府考虑到:在整个共同发动的战争期间产生的巨大经济负担,将进一步随着犹太人财产的没收问题而成为争议焦点。这些财产至少占整个国家财产的三分之一。人们打算对大多数犹太人的财产进行彻底清算。”负责该匈牙利会议的报告执笔人及会议记录员在6月份写道:“犹太人问题将进一步得到彻底地解决;犹太人在离开匈牙利国土时就丧失了匈牙利公民权,他们的财产自然归匈牙利国家所有。”因此,向匈牙利政府索回被其没收的犹太人财产的呼声日渐高涨,且该索赔金额在提高。这些可以避免纸币流通的加剧和暂时规避通货膨胀的产生。然而,大量和全面装备德国国防军对整体局势造成了严重的威胁。

当时在匈牙利对犹太人财产进行剥夺的是这样一群高官,他们同时掌管着国家烈酒专卖权的垄断项目;该项目机构成立于1941年,它不断提高烈酒税收,为匈牙利军队募集资金,以便联合德国共同向苏联宣战。该垄断机构的负责人于1944年开始执行其双重功能,使因战争融资而被匈牙利化的犹太人财产同时服务于个人政治目的。

实际上,对犹太人财产的没收行动在战争结束前已经变得越来越艰难。10月初,戈林的财政顾问奥托·多纳对布达佩斯的局势进行了大致的评估。他从中长期的角度预测了犹太人财产可以用于匈牙利政府战争基金的极大可能性。但从短期的资金账户平衡来看,只能使用一小部分资金,而可供急需使用的资金更少。然而,德国占领结束后,所涉及到的资金肯定已有几亿帕戈(当时匈牙利的货币单位)。那些221 被利用的犹太人财产实际上是从一个匈牙利人的手上转到了另一个匈

牙利人的手上。但当它从匈牙利的国库中流出时，却是以抽象的货币形式直接流向了德国的占领军费开支账户，从那里再继续流到每一个德国士兵的手中。此外，这些财产还用于支付大量向德国出口的各项食品、原油和铝土矿等。

埃米尔和亨尼·乌尔曼

1938 年至 1939 年间，纳粹德国凭借所谓的“犹太人赎罪金”的名义，对在德国和奥地利境内尚可支配的四分之一犹太人财产进行了肆意剥夺。其余部分从外表来看，一开始并未被侵占。由于这部分财产由信托资金监管，因此——仅从形式上来说——不能被变卖，也不能正式转为帝国国库债券，为物主所有。犹太人财产转为德意志帝国债券明显减轻了战争带来的经济负担。关于强制公债的确切数字，没有发现任何文件记载，而帝国的新闻发言人于 1941 年 8 月 28 日明确指出：“将犹太人持有的股票转化成利率为 3.5% 的帝国债券，此类事件不应再被提及。”这些情况同样发生于其他的被占领国，如荷兰和法国。其所使用的手段是，由具体托管人将犹太人的土地、股票、金银及其他资产转为流动资金，由国家付现，随后则以战争借贷项目计入贷方账目，这些行为意味着无须正式的法令，便可以对犹太人财产进行彻底的剥夺。被没收的款项要么以后补偿，要么以国家破产的名义自动销账。所以此时，对靠战争融资的官员来说，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进行财产没收或投资，其实质是完全一样的。

1941 年 11 月 25 日，在德国以第十一号行政令的形式最后通过了所谓的帝国民法。在 1941 年 3 月 15 日由专家制定的一项草案中声明其中立性，称财产的汇入是为犹太人的迁出而服务的。然而在附件中 222

人们意外地发现:文件的起草可以追溯于外交部的干涉,因此必须避免一种错误的印象,即财产的汇入是作为一种为战争融资的手段。如今,从德国犹太人那里没收来的全部或部分转化为国家名义的财产已经划入了帝国债务管理系统,而且在帝国债务登记账册中,作为已付款项已经销账了。这样,相关负责的官员就尽可能少地留下任何证据。因此,他们将那些不具名的、以证券名义支付的犹太人的款项全部勾销了。

德国对于预算支出的处理,通过运用战时相当有利的手段,把50%以上的战争所需资金用贷款的方式解决了。而那些已经销账、无须赔偿的旧债又为战争提供了新的贷款空间。人们粗略估计:这种形式的掠夺的结果,单单在德国,所涉及的金额就至少有20亿帝国马克。

在特殊形势下,德意志帝国并没有侵吞被跟踪和被谋害的犹太人的流动资金,而是占有以其原有物质形态存在的不动产并将其社会化。因此根据1941年5月希特勒颁布的一项法令,便产生这样一个问题:财产和财产的组成部分是否应该按其性质为区域性自治而服务。正如执行命令中是这样规定的:土地(地皮)的概念应如此定义,只要它们适用于道路、广场、绿化地带、运动场所的拓展以及类似的公用事业。同时要开发一些适合的房屋用做公共服务机构、学校、孤儿院和养老院、红十字急救中心等,以后还逐渐利用一些未开发的土地设置一些空战援助机构(如防空洞)。例如在波希米亚,女犹太人金茨基的所有财产被转赠给一家战争受害者的疗养院。利用这些流动资金,人们建立了一些基本设施和购买耐用消费品,为政府机构、设施、养老院和医院等提供服务。

223

1942年9月16日,瓦尔特·拜尔霍费尔命令:各州的财政部门将所有有价证券资金或者其销售利润立即汇入柏林的帝国中央账户。地

产的处置也以同样形式进行。1942 年 5 月，帝国财政部确认，根据第十一号行政令的第三条款，犹太人的很多地产都落入了帝国手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流入总财政预算的为战争特别收入与支出的第十七项计划。通过德国犹太人财产变现所得资金流向按第七章第一项的规定全部被记载下来，这适用于犹太人拥有的有价证券，如果有价证券是“出于特殊动机为帝国服务”的，就要适用同章节的第二项条款内容。第三条款是以普通形式由行政管理和财产变现的收入决定的。1944 年 1 月初，什未林·冯·克罗西克宣布一项命令：“在帝国中央账户中的现有的没收物资应当得到使用，以维持帝国账户的收支平衡。”

1942 年，帝国银行行长丰克和希姆莱达成了一项协议，将欧洲被屠杀犹太人的黄金、珠宝和现金存入帝国银行中。帝国银行按黄金、金币和外汇的价格折现，并由财政部的官员将钱以一个杜撰的人马克斯·海里格的名义，神不知鬼不觉地汇入帝国中央账户的特别户头中。其他的犹太人财产也以这种方式被国有化了，包括在灭绝集中营如贝乌热茨、索比波、特雷布林卡、迈丹尼克和奥斯威辛中被害的犹太人财产。被存入帝国银行的甚至还有从被害人嘴中拔除的金牙。1942 年 9 月 22 日的一篇《关于犹太人定居和迁徙的财产变现》的通告中写道：所有的现金款项必须全部存入帝国银行在柏林舍内贝格分行的党卫军管理处。外汇、贵金属、首饰、宝石、珍珠、金牙和碎金等须全部上缴和汇总。柏林的集中营管理处负责将其立即汇入帝国银行。手表、小刀、钢笔、钱包等按固定价格由随军小贩出售给前线士兵。这一系列命令的最后有一条指示：“全部的收益将归帝国所有。”德意志裔的迁居者可以购买上等的衣物和鞋子，在此也遵守同样的原则，即各种情况下的收益都归帝国所有。 224

关于黄金、珠宝、金牙和证券的上缴，帝国银行官员阿尔贝特·汤姆斯于 1946 年报告说，他在 1942 年夏天听取过帝国银行负责营运的

常务副行长普尔关于党卫军对上缴物品运输情况的汇报。这些上缴物品将于1944年底由党卫军头目布鲁诺·梅尔默一箱箱运送到帝国银行,并由汤姆斯签收。随后他将这些上缴物资交由帝国银行的相关部门处理。所有的股份、证券和借贷收入都划入证券部门的账户,硬币和黄金则存放于宝石部门。大部分珠宝首饰由于受到尽可能变现的请求都转移到"柏林城市典当行"中。所有这些业务的帝国马克的收益全部流入了名为马克斯·海里格的伪造账户中,总的账款不时地记入刚才提到的"第十七项计划"里的战争户头中去。

从东部信托总局运来的物资也按照同样的方法进行了处理。它们要么是从德国与波兰接壤处的犹太人手中夺来的,要么是从被视为国家公敌或被强行外迁的成百上千的波兰人手中抢来的。这种方法总的说来非常有效。希姆莱于1943年10月4日在波兹南宣称:"犹太人财产理所当然应毫无保留地交给帝国管理。"

225

一些例外也同样证明了这条规则:他们不仅将这些掠夺来的财产当做个人致富的手段,而且无限制地大量为制造杀人武器提供财力援助。比如说在华沙的犹太人聚集区被破坏后的一段时间内,帝国财政部想知道,在那边找到的财富现在如何了。党卫军声称:一切都按常规计划汇入到帝国中央账户中,但那里的有价物品一律不准注明其来源地华沙。在对辛菲罗波尔的犹太人进行屠杀时情况却并非如此。1942年2月,安全警察头目向有关负责的军队统帅汇报:"在对犹太人采取的行动中没收的钟表将按指示全部存入柏林的国家账户中。"

以上文所描述的手段将犹太人的各种财产变现的做法,应该追溯到1939年1月针对犹太人财产的有关规定。当时戈林向德国的犹太人强加了一项义务:应提供黄金、宝石、白金、珍珠等让国家全面收购。

因此,帝国财政部成立了一个中心,专门负责珠宝等有价物资的收购与变现。柏林市将"城市典当行"的雇员放入管理机构,它实际上由经济部监控,为帝国服务。所有没收来的珠宝首饰都被变现后压价,扣除办公成本之后,有10%以帝国马克的形式汇入柏林市的户头。建立托管中心的目的在于:占有从犹太人手中掠夺的黄金、白金和白银等;通过变现,将资金用于国家政治、战争支出所必需的外汇和黄金储备。

金表主要在国内出售,价值稍低的贵金属首饰被熔化后重新打造, 226 而那些价值连城的首饰、珠宝和珍珠被大量销往国外,以谋取用于战争的外汇。因为那些宝石为了卖个好价钱,必须依其形状拆开再重新打磨,这一切都交由柏林钻石切割有限公司和依达尔一奥伯施坦公司打理。1941年帝国财政部用以下附加的言论解释了其行为:"这种处理方法之所以非常重要和必要,是因为宝石抛光可以为技术工人确定一个加工所需要的非常精确的加工度。"宝石抛光后,钻石切割有限公司将宝石按其尺寸和价值分类,分批运输、出售,兑换成相应的外汇。

这些宝石首先会被运到瑞士。但由于潜在买主明显缺乏去购买来源不明的宝石的兴趣,因此只有一小部分运送到交易中心的钻石和珠宝能变现成外汇。1939年至1941年底,那些被掠夺的犹太人可以获得国内价格10%的补偿,但同时得从中扣除10%的管理费用。这些支付条款的重要性,在戈林于1943年夏天颁布的一项法令中便可看出。他指出要没收所谓的"敌人"和犹太人的邮票藏品,以便通过变卖可以获得最大限额的外汇。其主要原因是:"如今的外汇局势促使我们必须竭尽全力挣得外汇收入,即便在个别情况下最终产生的利益不怎么明显,也在所不惜。"1941年3月,什末林·冯·克罗西克在与戈林结束谈话后,接手了两箱从巴黎罗特席尔德家族劫掠而来的黄金和珠宝。这位部长当时很不情愿这样做,他不断寻找种种托词,其中之一是他为了一个"特殊基金项目"想出售这些珍贵的首饰。戈林当时回答道:"帝国

227 财政部门拥有了关于变卖犹太人珠宝的相当有价值的经验。”

因为当时除了主要负责的柏林城市典当行以外，一些地区性抵押行也处理犹太人首饰的变卖。多特蒙德城市抵押银行的一位负责人曾在 1941 年 8 月的一份报告中这样写道：“犹太人不可对变卖价格的高低有任何异议。他们须对从我们这儿得到的任何东西感到满意。”那位官员对他在德国历史中的未来地位谦逊地说：“如果在以后的岁月中，有研究人员只是通过道听途说了解犹太人的话，那么在城市档案馆反复翻阅了文献之后，他会获得这样一个概念：即便是德国城市抵押银行也在很小方面帮忙解决了犹太人问题。”多特蒙德抵押银行被定位为威斯特法伦犹太人首饰的购买中心。

对于当时的明斯特如何将犹太人的财产进行国有化，吉泽拉·默伦霍夫和丽塔·施劳特曼—奥弗迈尔印象尤为深刻。这两位女历史学家以当时经济状况良好的一对犹太夫妇埃米尔和亨尼·乌尔曼夫妇为例，揭示了帝国给犹太人强加逃亡税、没收其财产的真相，并对这对夫妇的财产状况及其被国家银行利用的情况加以完全公开：“这对夫妇当时股票和银行存款的价值有 12 500 帝国马克，地产价值折合 34 700 帝国马克，两项之和为 47 200 帝国马克，扣除帝国流亡税收和‘赎罪金’后，还盈余 21 350 帝国马克。其中他们逃往卢森堡时只可随身携带 10 帝国马克。由于在明斯特一位由国家任命的财产管理者征收了他们不动产的租金，他们一直仰仗于一名兄弟的支持。从土地登记簿中可以看到，他们的房产于 1941 年 2 月 18 日已过户到德意志帝国的名下。
228 国家要么以外迁移民的理由取消其国籍，并将剩余财产收归国库，要么依据 1941 年 11 月 25 日制定并由第十一号行政令颁布的《帝国民法典》的规定，以驱逐留守亲属的形式将这些财产全部没收。”

通过上述方式,德国全体国民仅在税收上就节省了 47 180 帝国马克。当时以这样的金额避免了由于财政金融原因引起的危机:取消了 800 名有两个孩子的工人年税额的 50% 。同时人们可以在战争期间满足部分剩余的购买力,以固定价格购买大部分从乌尔曼家族中得到的个人物品。

1940 年 4 月,乌尔曼夫妇到卢森堡避难,数周后被德国士兵逮捕。1941 年 10 月 16 日,他们从被占领的已经日耳曼化的卢森堡被押到罗兹集中营。埃米尔·乌尔曼由于体力衰竭卒于 1942 年 11 月 7 日,而亨尼·乌尔曼于 1942 年 9 月 17 日被送往库姆霍夫集中处决犹太人的刑场,同日在那里的煤气车中遇害。

为纳粹国防军洗钱

这边是吉斯林，那边是宪法

尽管在挪威仅生活着两千多名犹太人，但在那里他们还是失去了所有的财产。这些财产成了纳粹国防军的囊中之物。挪威内阁颁布雅利安化条例之后几天，1942 年 10 月，总理维德昆 · 吉斯林的命令就被作为国家机密宣布："第一，在根据 1942 年 10 月 26 日的法律而没收的犹太人财产中，已经查封的怀表和手表，因战争目的交由德国国防军并且由德国安全警察直接支配。第二，查封的金、银以及首饰必须作为战争支出的抵押，德国政府通过德国安全警察对其直接支配。"从这封信中产生了清算机关关于相关犹太人财产的第二号指令。吉斯林政府总共将 2173 名犹太人的财产变现成总价值为 230 万的挪威克朗，并将有价证券和相关的其他财产纳入了挪威国库。

整个事件的结果似乎显得无足轻重，这些财产就这样进了挪威的国家财政，然后入了占领军费账户并从那里直接进了德国军人的腰包，进了采购官员们的小金库，或者进了建立防御工事的挪威工人的工资袋。所有的金额，即便是极小的部分，也是用没收的财产来支付的。

1943 年 11 月，帝国审计局对奥斯陆的德国民政"金、银物品保管

库”进行审查。这个保管库从本质上来说是由清算机关上缴的物品组成的。早在1942年圣诞节,其中的337只金表和其他手表就被无偿地交给了驻扎在挪威的国防军指挥官(温迪施—格雷茨、迪特尔和舍纳尔)手里了。这些手表在12月24日被放在亮灯的圣诞树下,让那些有特殊功勋的军官们来亲手拾取。根据后来颁发的一个命令,“各式各样的消遣用品”以及大三角钢琴和普通钢琴也要运送给德军供其消遣。他们甚至为德国本土购买了针织品并(用挪威克朗)支付给清算机关。

比利时的情况却完全不同。那里的反犹太政策最终掌握在德国军队的手里。是德国军方——而不是比利时的行政机关——颁布了所有的歧视性条款。整个国家被占领的几个月后,即1940年10月28日,军队指挥官实行了针对犹太人的“那些从安全警察的视角来看完全必要的措施”。其中包括对犹太人的登记和将受犹太人影响的企业列入名单;除此之外,在对犹太人的公司和地产进行支配方面国防军负有审批义务并“将犹太人驱逐出现有的职位”。

三个星期后,军队作出了采取下一步行动的决定。陆军总司令、陆军元帅冯·布劳希奇于1940年11月16日宣布:“在比利时加速将犹太人完全从经济界中驱逐出去,是具有重要价值的;犹太人商店的现有库存应该变现并由军队或者国家支配。”然而这种尝试“像法国一样通过本国法律规定来实现经济上的去犹太化”落空了。比利时各个部的秘书长在被操控的政府中建立了一个行政内阁,他们“考虑到宪法困境而拒绝进行合作”。他们的这种态度与欧洲其他几乎所有国家的合作态度大相径庭。 231

与比利时相比,军队在挪威一定程度上被隐藏的“去犹太化”利益变得特别明显。这也说明,德国掠夺政策取得的成效在减弱,当地官员和银行职员反犹太人的意愿在消失。在奥斯陆,当一切都像抹了润滑

油并如同期望的一样进行着的时候,德国的将军们在布鲁塞尔对最大的阻力"比利时司法圈"提出了警告。检查官拒绝了国家公证处对将犹太人的不动产卖出的合同进行的公证。占领势力——一直是国防军军官,而不是党卫军——强迫人们让步。"他们的规定一直有效",因为在比利时司法界没有人愿意宣布其无效。

1943 年 12 月 21 日,军队指挥官无奈地发现必须要颁布一个条例,宣布比利时合同在德国公证处进行公证同样具有法律效力。然而 1944 年公证处就已经乏人问津了,也许是因为被迫害者的团结或者是看见了德国战争上的失利。国家登记法院以同样的方式实施了阻挠。他们顽强地拒绝直到最终将 6057 家被德国清算的犹太企业从商业登记中除名。接着比利时的司法部必须因为官方原因对其进行清除。这个也失败了。

1941 年 3 月 31 日,军事指挥部颁布了《针对犹太人的经济措施条例》。根据这个条例,政府负有对由犹太人占有的地产、有价证券和现金入账进行登记的义务。总共有 28 100 份犹太人财产进行了登记,其中含 7700 家企业、3000 块商业用地和 17 400 份私人总资产。1941 年 2 月,军队指挥官就"犹太人财产"指出:"这些财产都已被掌握。"但实际上,很多比利时的犹太人还是可以避免其流动资金、银行保险箱、账户和股份的曝光,因为比利时银行的领导们和职员们并不关心对其犹太储户进行识别。甚至第一眼就能看出来户主是犹太人的账户也被放过了。总体上只有那些根据相应的德国军事命令"主动"申报的财产占有人才被登记了。

1942 年 4 月 2 日,军事指挥部颁布了《关于犹太人财产由德意志帝国接管的条例》。此条例使布鲁塞尔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简称B. T.)从 1940 年 10 月成立以来所经营的事业合法化了。这个公司管理并清算犹太人的财产并没收"帝国敌人"的财产。军政府的两个成员将 B.

T. 进行了商业登记,这两位也是军政府(简称 MV)头目的财产受托管理人。两个合伙人中的一人同时担任企业负责人。通过这样紧密的联系保证了 MV 的工作分配适用于 B. T. 。后来成立的 B. T. 监事会主要是由 MV 中处于经济部门领导之下的成员作为主席组成。

B. T. 也对"现金、钻石、首饰等等"进行管理,这些物品都是由德国安全警察将特定的犹太人驱逐时在梅赫伦集中营中夺走的。处于百分之百军队势力控制下的 B. T. 长期派遣一名职员驻扎在集中营里。无论是犹太人的股票还是储蓄,但凡雅利安化运动所取得的收益,都被及时地运送到了法兰西银行与保险库协会,并由 B. T. 进行强制化的管理。

当德国的军官们发现战败近在眼前,因而放弃比利时之后,于 1944/45 年冬天,他们写下了关于货币和金融的最终报告。毫无疑问,这样的报告一定是长篇大论。但有一点对于我们这里所涉及的内容却很重要。报告中这样说,除了官方汇入的占领费用,"其他作为行政收入的比利时法郎也归占领军"。"特别是战争赔款、……、罚款、出卖没收的走私品和黑市买卖物品所得的收益。"然而相关材料只涵盖了 1943 年 10 月 1 日至 1944 年 3 月 31 日这个时期,这篇报告这样叙述道。这段时间只涉及到几百万的帝国马克,然而这说明了:"从结果上来说它们减少了对纯粹占领费用的使用和消耗。" 233

在军政府的最终报告中,对很大部分的行政收入是避而不谈的,这部分都是没收比利时的犹太人财产得来的。这里所涉及的金额并没有在报告中提及。无论如何这不会太多,比利时犹太人总共的财产本来就相对比较少。根据各地寄送过来的明细表所做的统计,前后查没的犹太人财产价值在 300 万到 1200 万或者 1000 万帝国马克这个范围。1944 年秋天,一位帝国财政部的官员在工作便条上对"比利时帝国委员会剩余的任务"附注到:"信托公司(因为犹太人的财产)","敌人和

犹太人的财产(已经签出的有价证券)","帝国要求东部政府部门清除犹太人动产","由投资指挥官罗森贝格继续投资艺术品"。这名官员被卷入这个事件,是因为它涉及到为了战争财政而进行登记甚至进行征用的资金。事实上剩下的任务并没有进行。

234

没有没收法令的没收行动

在荷兰,德国人设立了一个小型的民事监督管理机构。与比利时或者挪威不同的是,在荷兰从来没有出现过一部关于没收犹太人财产的本国的或者德国的法律——但这丝毫不影响那里对犹太人盘剥程度的严重性。1940 年 10 月 22 日,帝国委员会首先命令特定的企业进行登记,并在 1941 年 3 月 12 日的《企业登记义务条例》中对此行为作了具体的规定。这份法律文件的名称听起来颇具中立性,但是其最后一条却赫然写道:"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生效,并可以作为'经济上去犹太化的条例'进行援引。"

1941 年 1 月 10 日,为了德军的行动,几乎各地都对犹太人施加了各具特色的"处罚"。3 月 26 日开始对外汇和黄金流通进行控制,3 月 27 日犹太人对其农业用地须进行说明; 8 月 8 日对资本财产,3 天后对所有的犹太人的不动产都须进行说明。

然而 8 月 8 日的条例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该条例的特点并不在于没收财产或者犹太人缴纳财产,并由德国的或者荷兰的国家账户来掌管,而是在于总体上"对犹太人财产的处理"。帝国保安部的备忘录显示,这些财产是用来支付之后的犹太人移民费用的。如同在德国、在斯洛伐克、在匈牙利或者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这些战争款项在空洞的口号"建立移民基金"背后消失了。

结果所有的现金和票据都被存进了一个为了雅利安化而改制的银行里面，它的名字叫利普曼·罗森塔尔有限责任公司。有价证券也被存放到那里或者由保管银行去那里登记。“各种形式的收藏品、艺术品，黄金、白金或者白银制品以及加工过的或未加工过的宝石、半宝石和珍珠”也都被“运送”到那里。1942 年 5 月 21 日，犹太人被迫对所有的私人需求进行申报。在拥有犹太名字的银行背后，隐藏的是那些清算犹太人财产的德国黑手。 235

在荷兰管理下的阿姆斯特丹交易所的帮助下，大约 80% 的犹太股份被卖出。其他的财产也以相似的方式被卖出。财产交易是否必须满足《海牙陆战条约》中的禁止没收财产的内容，这个争议已经变得不再重要。乍看之下一切似乎都是正确的，因为这种行为在形式上并不是没收财产，而是对财产进行重组。来自清算财产出卖的收益，首先是供应国家和工业债券以及抵押契据，但是很短时间之后就仅仅供给了荷兰的国库券。荷兰的特别之处在于，从犹太人财产获得的金钱中，一部分直接转变成了德意志帝国的债权契据。由于荷兰的国库券是为了占领军的金钱需要而发行的，所以它保存了下来。荷兰的国库和德意志帝国向利普曼·罗森塔尔有限责任公司支付定期的利息，这些利息很快也用来供应国库券，即向国家财政或者占领费用财政回流。对集中账户的经营有序进行。这就导致了单个的财产至多只能以没收价值总额的千分比来计算。

这里应用的体系不需要形式上的没收财产法令，这可以在五年、十年或者二十年后弥补。与此相应，帝国委员会在荷兰将由犹太人财产转变而来的国家票据变成了特别财产，并把这些财产移交给了在海牙的财产和养老金管理组织。一切都可以因这种方式受到限制，并且事实上也确实有了这样的限制。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会发现国家 236

公债的到期和越来越高的利息，债务也不未被消灭——然而债权却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如果仔细观察德国人的政策，尤其是他们针对犹太人的没收财产政策，就会发现仅仅将出卖的"有价证券"的数额作为评价雅利安化规模的标准是错误的。人们首先一方面要对强迫的和之前已经通过自愿获得的国家公债作区分，另一方面要对国家公债和私人企业的股票作区分。为了使国家的金融政策有效而出卖股份，此时却不需要任何进一步的法令，因为国家已经对这些金钱进行支配了。同样，转变为国家公债的财产是以强制管理人的名义还是匿名基金的名义，对于货币政策的结果也没有任何意义。）

比方说，对敌对的外国人或者流亡的荷兰人在荷兰的财产——按照国际法并非无可指摘的程序——即可进行强制性的管理。而反过来说，这在英国和美国也相当普遍。只要财产是属于犹太人的，1942/43年的德国敌方财产管理机关就会完全地出卖它们，并且将金钱存入以此目的开设的坐落在阿姆斯特丹的审计和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这些钱款，以敌国逃匿犹太人的名义成了荷兰的国家公债——并百分之百地为德国战争财政服务。

直到财产全部被转移之后，党卫军和警察的首领才在海牙发表声明："[1942年]10月15日，荷兰的犹太人被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就是说一个庞大的警察行动开始了，不仅德国和荷兰的警察机构，而且还包括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工作范围、党的组织机构、荷兰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国防军等各方面都要参与进来。……我同时宣布，凡是把犹太人隐藏起来，将他们送出边境或者帮助其伪造身份证明的雅利安人，都要被没收财产并送进集中营，这一切大规模的行动都是为了制止犹太人逃跑。"

237

根据谨慎的、公开的评估，这些从犹太人身上抢夺来的流动财产达

到了1.5亿荷兰盾。从雅利安化的企业中获得“超过2亿”，从犹太人的房子和地产中获得大约1.5亿。根据同时代的荷兰人的观点，这些价值总计为“大概超过5亿荷兰盾”，是占领军公开宣传“应该能够对荷兰的经济生活产生激励”的一个“数额”。1943年底，德国强盗机关的官员们就花光了总价值在6亿至7亿荷兰盾的金钱。在荷兰的德国犹太人总括性赔偿数额的10%汇给了帝国财政部。

这是当时的评估。根据荷兰战后的说明，德军一共从荷兰的犹太人手中夺走了价值为11亿至15亿荷兰盾的财产。此外可以想象的是，德国官方没有将因直接贿赂而减少的犹太人财产计算在内，并且有部分财产是作为敌人的而不是完全作为犹太人的财产转变成了荷兰的国库券。经保守估计，占领军与荷兰国家银行合作至少将价值15亿帝国马克的犹太人财产转变成了荷兰的国库券。战争期间，德国人从800万荷兰人手中夺走了大概价值为145亿帝国马克的物品和服务，根据犹太人所占的比例，分摊到140 000名犹太人上，抢占的犹太人的财产至少占了10%。

在法国的统一掠夺 238

在法国的雅利安化体系中，被出卖的部分犹太人财产变成了法国的国库券，并最终转变成为支付德军占领费的现金。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潜藏体系的运作，我们建议大家先了解一下他们是如何处理更少保密性的敌方财产的。《海牙陆战条约》第四十六条，对如何处理敌方的财产，包括房产、企业和股票等，以总括性的方式作了规定。但除了所谓的敌国成员的财产，德国人把法国人逃离后遗留的财产，以及在敌国生活的中立国国民的财产也算入其中（人们称之为“逗留性敌人”，

比如说一个在法国拥有工厂、在英国居住的瑞士公民)。

根据主流观点,德国通过战争得到的股票和收益"以信托的方式为债权人保管"。从表象上看,这个法律基本原则令德国主管的委员会感到相当的不悦,实际上他们把大量的财产转移到了战争财政基金当中。我们可以在对单个的财产受托管理人"保障和维护特定管理措施的施行"等概括性授权中找到线索。

在法国一共涉及25亿帝国马克的财产。"管理措施"在帝国政府对存疑财产暂不收缴的保留原则与"弄到"所有财产的压力之间摇摆。除此之外,敌人的财产受制于所有外汇法律规定。黄金、外汇和外国有

239 价证券都被运走。它们必须由巴黎的德国信贷银行买入。这个银行买入后将其——使用占领费账户中的法郎——汇给信托机构。汽车的强制性出卖也适用相似的规定。对于所有这些价值,敌方财产管理人员都会给予一种有名无实的补偿,即法国的国库券。由此德国人以双倍的方式在交易中获得了收益:他们在中立国使用黄金、外汇和股票购买物资,然后立即封锁敌人财产管理者作为替代拿出来的国库券。这为法郎的稳定作出了贡献。敌方企业的流动资金也经历了相同的变动。这些资金"缴纳给信托公司"并且在那里"转化"成为国库券,如果敌人所有的公司例外地被财产受托管理人出卖了,那么股息和其他资本的收益或利润也必须被上缴。

由于占领军引发了通货膨胀,德国占领委员会从一开始就在法兰西银行采取了控制金钱流通的措施,这种措施在其他被占领的国家也是十分典型的。这些措施中包括了1940年11月由德国信贷银行和法兰西银行达成共识的无现金支付体系。从此以后为了占领军的利益,法国的企业一般情况下都是通过汇款得到供货和服务的钱款。这些行为都是在德国信贷银行巴黎分行委托下由法兰西银行实施的。德国同

样强制推动票据流通,减少大额面值货币的流通,宣布商业汇票的周期为九个月,或者规定国家补助由国库券替代,而国库券四年之后才能进行支付。通过这些手段,由大规模的占领费用产生的膨胀被抑制住了。同时占领军规定,为了减轻每个国家账户的负担,法国采用德国 1939 240 年已经采取的最低利率政策。属于这类货币政策措施的——如同许多的欧洲国家一样——也包括对犹太人财产的剥夺。

1941 年 11 月,法兰西外汇保护总部声明,法国先前发布的、快要到期的国库券,只有在有权支配人希望的情况下才被偿还。强制性管理的国家证券,其中包括全部由犹太财产转化而来的国家证券,如同是敌人财产一样,这些资金被冻结了。这些措施直接地减轻了货币压力。

所有的德国占领委员会都可以在被占领国的货币银行至少对这种为战争提供资助的程序进行尝试。在德国、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早些年犹太人购买或者后来必须购买的国家债券,在 1941/42 年被官方宣布无效了。这表明:被无偿没收了。然而这个法令只具有极小的意义。不管是否进行了没收,在任何情况下封锁到期欠款都扩大了战争发动势力的债务回旋余地。

国防军转向了突尼斯,这是另外一个迅速获得金钱的方法。当 1942 年 11 月初盟军登陆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时,德国和意大利作出回应,入侵了维希法国和法国殖民地突尼斯。几个星期后,德国要求每月支付 30 亿法郎来“保护突尼斯”。当时,法国国家账户还是能够支付这笔费用的。

德军刚刚侵入,就逮捕了几个犹太绅士,其中包括突尼斯的犹太教会主席莫伊兹·博尔热。在他们不久后把被捕者又释放之后,犹太教会就改制成了犹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提供强制劳动力建造空军据点。为了这个据点的生存,教会必须立刻上缴超过 3100 万的法郎。根 241

据迈克尔·拉斯基尔的表述,之后在突尼斯迅速发生了以下并非不典型的情况:“为了满足德国各种各样的需求,犹太领袖不得不抵押他们的庄园并用大量犹太人的财富作为银行借款的担保。因此,对犹太人进行的恐怖行动很明显地具有经济上的原因。”

拉斯基尔所描述的实际情况是,逼迫犹太人抵押他们的房产,让财产受托管理人进行登记或者把其他的财产作为给战争贷款的保证,这些明显地属于德军军需部门的掠夺手段。我们不可能更详细地调查事实是否如此,但是无论如何,在被占领国比利时的德军军需官,在对帝国财政部的犹太事务负责人发表的讲话中也提到了相似的观念。在比利时出卖犹太人地产因受到政府的抵抗失败后,本国人也表现出了“厌恶感”,“还不如由军事指挥官获得犹太人的财产”。国防军军官建议:为了得到钱,我们必须尝试用地产“获得尽可能高的抵押额,将负担转移到其犹太人所有人头上”。最终存在足够的投资者并且“投入的钱很快就能被回收。帝国使用这种方式就可以在不低于地产本身价值的价格将其卖出的情况下,很快使部分地产的价值变现”。即使在德国也产生了对以“为战争集资”的目的进行犹太不动产借贷的争论。

如同几乎所有被占领的欧洲国家一样,在法国也施行了一系列的没收犹太人财产的措施。这些措施的目的是为了准确计算财产的价值,限制所有权人对财产的处分权利,并且任用那些能尽快将财产转手卖出的临时性管理者。1940 年 10 月 16 日,当时的国防军最高司令官冯·布劳希奇、军队管理部经济处领导米歇尔、行政处领导维尔纳·贝斯特和先前的奥地利部长吉多·施密特举行了会谈。会谈在巴黎的里兹酒店举行;根据会议记录可得知,与会者对下列事项达成了协议:“由部委领导米歇尔对我方根据已经拟定的条例草案在法国被占领地区处理犹太人商业的情况作报告。”冯·布劳希奇首先表扬了这些建议,但

242

是他要求“加快这些措施的施行,因为没有人知道,我们德国人在几个月之后是否仍能在法国施行或贯彻那些我们认为正确的针对犹太人的措施”。他还要求“现在必须能够为那些过了时效仍没有重新开张的犹太人商店确定和设立财产管理人”。对于会谈中间的一个插问,“他回答说,他已经明确同意,任用法国人作为财产管理人”。

对于国防军高级军官们诸多的诺言和军事政府经济专家的引导,负责规划的党卫军官员维尔纳·贝斯特认为,发表关于犹太人问题的声明是明显多余的。会议记录显示,他对法国汽车交通作了几项指示。然而贝斯特此前在巴黎与德国大使进行的对话中已经给了相关的“建议”,即对每个人“进行审查,是否占领地的犹太人财产都能被没收”。

在里兹酒店会晤十一天后,即1940年10月27日,军事指挥官对犹太人名下企业的登记和标识义务作了规定。这个在会谈中由冯·布劳希奇公布的、由米歇尔起草的条例对所有犹太人商店、银行、贸易和工业企业的登记作了规定,也包括可能的拥有犹太股份的企业。相关企业应该尽快接受临时管理者的领导。德国军方希望“清除犹太人在法国的影响”,并且“使商店中的存货供祖国、国防军和法国人民”使用。米歇尔使用“祖国”这个词,指的是将抢夺的财产运回德国。 243

这个时期对外仅仅谈论“登记义务”,然而负责人对此的理解是“清点财产”并从同时委任的管理者身上看到了“迅速进行雅利安化”的具有足够伸缩性的基础。但是,最终根据德国的计划对犹太人财产进行没收还是以法国的法律和执行机构为前提的。这首先显示出很多问题。法国政府逐渐地,但也并非毫无压力地,“被鼓励颁布自己国家的法律”。德国军官和隶属于国防军的战争管理委员会为了获得自己尽可能多的资金利益,对法国犹太人采取报复行动。为了使对每个企业的干涉变得容易,军事指挥官有时会请求安全警察逮捕犹太人。还有:特奥多尔·丹内克从1942年7月起成为设在巴黎的艾希曼合作机

构的常驻负责人。丹内克 1942 年 8 月离开巴黎后，由军事政府官员勒特克作为其继任者。军事指挥官还任命他为安全警察和党卫军的指挥官。

1940 年 10 月米歇尔写道："在占领地区将犹太人从法国经济界中隔离出去已经产生作用。……剩余的犹太企业将被清算，他们的库存将由其他企业进行支配。具有重大经济意义的企业由委员会管理者进行雅利安化。"人们认为对这些措施"法国人本身也是十分感兴趣的"，并且人们因此估计法国政府在没有被占领的地区很快地也施行了相应 244 的措施。只有当必须确保对这些企业产生影响时才会例外地任命德国管理者来任职。即使戈林也下令，"把法国获益者的经济参与放在重要的地位加以考虑"。

法国人的参与属于政治范畴。根据德国大使在巴黎的讲话，必须"使法国从犹太人的世界中分离出去"；这指的是与自由主义和西方民主的联系。从一开始对犹太企业进行雅利安化的收益"就应该流入法国国库"，这一点使得德国占领官员也感到"诧异"。除此之外，只要没收行为是由法国人施行的，也至少是在表面上遵守了《海牙陆战条约》。1940 年 8 月，军事指挥部下属的法律部门经深思熟虑后指示，计划中的雅利安化必须"从外部看来是遵循私法上财产转移的程序的"。

德国和法国的利益在"去犹太化"方面是如何勾连的，我们可以通过两个例子来说明。1941 年 3 月 6 日，一位曾经在瑟堡担任汉堡—美国航运公司的代表、现在失业的 A. 拉贝拜访在巴黎德国使馆的格斯特纳先生。他感谢格斯特纳"为将他任命为暂时管理者或者委以相似的职位"所作的努力。与他有关的是，使馆如何向驻法司令部提出建议，使其"接受对犹太人的或敌人的财产进行信托式的管理"。几番催促之后事情终于成功了：1941 年 11 月，拉贝在格斯特纳的帮助下成为了

在布洛涅—比扬古的阿永·米雷耶饭店的临时管理人。

1941 年 8 月 9 日,同样是这位卡尔—海因茨·格斯特纳博士向德军司令部询问,具有良好的经济知识、语言技能和对德国友好的法国人吕西安·莱昂塔尔"能否作为委员分配到一家犹太公司去"。很快这 245 个叛国贼就得到了批示:"由德国使馆推荐"。

另外一个表明部分法国人对抢夺犹太人财产是多么感兴趣的例子,是巴黎对犹太人赎罪金的变形。1941 年 12 月 14 日,德军司令部强迫巴黎的犹太人缴纳 10 亿法郎的集体处罚。负有征收义务的法国国家组织动用了很大一部分已经逃往美国的富豪德甘斯堡和雅瓦尔家族的股票财产。帝国财政部关于"当拒绝支付时派遣专业人员执行之条例"的想法是完全多余的。

为了改善德国与法国之间的关系,德军司令部想把强制支付金额的 25% 转给"国家援助"等法国的慈善机构。但是帝国财政部坚持要求所有的款项都要以帝国收入的形式入账。最后双方对其中的百分比达成了妥协,同意支付 10% 的金额。于是,从犹太人处强制征收的 1000 万法郎罚款转到了那些在巴黎受到英国空袭的法国人手中。

在法国殖民地突尼斯进行的非洲战争的短暂时间内,德国占领政府也采取了相似的措施。1942 年 12 月,外交部特使鲁道夫·拉恩描述了突尼斯城的混乱状况。城市和港口遭到了英国猛烈的轰炸。拉恩对建立本国的警察机构和公民委员会,缓解现在所处的困境和安排紧急救援的事项作了报告。然后他在电报中进一步阐明:"因为国际犹太势力必须对英美对北非的袭击负责,所以占领军司令部安全警察和帝国保安部将要从犹太人的财产中取出 2000 万并将这些钱交给阿拉伯—意大利—法国联合委员会用来紧急援助那些遭受轰炸的人们。如果敌人对平民的轰炸继续进行,那么还要收缴更多的数额。"足足三个 246 月之后,拉恩发了个电报说,基于他的领导设立的帮助委员会"迄今为

止已经从突尼斯的犹太人处没收了5000万法国法郎,并向那些遭受轰炸的家庭——主要是穆斯林——进行分配”。上个月在意大利和匈牙利,德国人也是用犹太人财产对轰炸受害者进行紧急救援的。在乌克兰的克里沃罗格,东部司令部根据社会福利政策对被杀害的犹太人的房产进行分配。根据司令部的报告,城市管理者“没收了犹太人遗留下来的房子并将其卖给需要房子的居民”。

虽然在1942年的法国,德军司令部仍禁止犹太人夜晚外出并要求他们佩戴黄色的星形标志,但是早在1941年6月,他们已经达到了对犹太人政策的最重要的目标:维希政府接手了颁布一系列反犹太人法律的任务。他们颁布了《犹太人规章》,建立了主管政策施行的犹太委员会。效仿1938/39年的德国模式,1941年11月29日法国出台了关于建立所有犹太人必须参加的以色列人联盟的法律,同时解散了法国所有的其他犹太人协会。

这样一来,就使德国可以用较少的人手对抢夺进行监督。主管的军事管理部经济处包括五个军事管理委员、一个高级观察员、一个秘书和三个参谋助理。其中有三个委员、一个高级观察员、一个参谋助理和三个由财产托管机构留下来的书记员为专门设立的“受司令部委托的处理犹太问题的[法国]总委员会”下属机构工作。这几个人和为数不多的负责雅利安化的检查员掌控着法国的“去犹太化”运动。

247 去犹太化由总委员会执行,它负责支持第九部门——“经济雅利安化总部”——的掠夺行动。法国财政部在1941年设立的贮存和转移有价证券的中央账户的帮助下,对没收的股票进行管理。在那里股票按价值出售,然后转化成法国的国库券和借款。这个账户就是为德国的战争和掠夺机器提供现金化服务的工具。

对于大部分被迫害的犹太人来说，法国人和法国的专门机构必须为日常的雅利安化负责。然而来自德国和奥地利的犹太移民的财产却是特例，从1942年秋天开始也包括那些已经移民但未获得居民身份的来自波兰、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犹太人，以及那些曾拥有敌国国籍或在敌国居住的犹太人——33 0000法国犹太人中的至少50 000名。为了解决这些犹太人问题，军事管理部经济处在报告中任命费迪南德·尼德迈尔为临时总管。他清算或出卖企业并且负责"确保以有利于帝国的方式"处理收益。尼德迈尔1941年8月上任，"他一方面作为总委员长，另一方面作为党的特别委托人使德国人接手现存的犹太企业"。

这个办事机构使用"驻法司令部，德国犹太人金融工作处"的信头。帝国财政部还要求"必须将收益转入帝国中央账户"。直至法国解放之后，尼德迈尔还把没收的价值高达6000万帝国马克的有价证券、首饰和邮票存入了帝国总账户。

对于敌人财产，其中也包括大量的犹太人财产的使用，德国军方在1940年12月就已经设立了"法国军事管理部辖区内的财产管理和检查机构"。一个姓卡德尔巴赫的少尉被委派去设立这些快速成长的机构。1941年2月，他建议把所有的敌人和犹太人财产交由位于柏林的财务审计公司"德国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经营。卡德尔巴赫属于该公司董事会成员，这个公司与德意志银行有着密切的关系。像这样将主权任务委任给这样一个公司，在非常时期被纳粹国家称为私人经济的外包服务。 248

这家公司及其原班人马还拥有一个没有准确定义且从未正式成立过的信托机构。参与者认为它是"一个国库机构"，是"时间上被限制的"和"没有固定法律形式的"聚拢金钱的机构。事实上它与一个为洗钱而设立的空壳公司别无二致。"犹太事务"属于这个以私人经济方

式管理的、由国家授权的信托机构的工作范围。根据1942年5月米歇尔的指示，它们执行了下列任务：

“一、建立卡片索引，里面包括犹太企业和他们的临时管理者以及其他的细节并要进行动态的补充。

“二、由在犹太问题总委会中负责经济上去犹太化的受委托人执行没收任务，随时对委托人报告收入情况以及对应没收额持续进行调整的情况。

“三、从委托机构处获得简短的鉴定意见，以这种方式对雅利安化进程中的审批程序施加影响。”

249 对于军事政府来说，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对战争十分重要”，因为他们“管理着价值高达几十亿法郎的敌人和犹太人财产”。尽管法国人控制着处理犹太问题的总委员会，但是国防军还是保留了受司令部委托进行经济上去犹太化的机构。这些机构暗地里被称为“监管机构的”受委托人。即使那些受军事指挥官委托的人也是由信托体系加以调整的。按照米歇尔的命令，对法国经济进行雅利安化的信托体系列出了一个卡片索引。这张卡片索引存放在巴黎玛杰斯蒂饭店649和649a房间并长期“由一位先生和两到三位小姐看管着”。根据信托体系的报告，在那里有超过10 000张关于企业的索引卡片并时时更新。其中还包括超过1500个管理人的索引卡片（总军需部长估计“法国被占领地区的犹太公司总共有大约22 000家”）。

司令部经济处、信托体系和总委员会三者之间的分工严格遵守下列规则：法国方面向由信托体系任命的负责去犹太化的德方受托人提出进行雅利安化的方案；受托人将方案转告给信托体系的运营审查人并同意——必要时根据命令——出卖财产。司令部注意“法国机关在被赋予权利的范围内是否独立并负责地执行了德国法律”。因而德国监督员使用公章“供其处分”而不是“同意”来表示对雅利安化行动的

认可。

1941 年 6 月 21 日，军事政府宣布犹太人仅在“监管服务”即德国占领军的同意下才可以打开他们的银行保险箱。在军事政府中负责监管法国金融和借贷的帝国银行经理舍夫勒威胁说：“只要出现任何对这个条例的违抗，我就向所有出现问题的银行领导问责。”与他们的比利时同事不同，法国银行的经理们都认为：“绝大多数人对德国的条例感到害怕。” 250

一个月后，即 1941 年 7 月 22 日，维希政府公布了第 3086 号法令，并于 8 月 26 日生效，其核心内容是德国 1938 年至 1941 年间对犹太财产的侵吞。也就是说：犹太人所有的财产将转交给托管人出卖变现或者转变成国库券。在法国并没有出现形式上对犹太财产的没收。因为官方根据的是该法令第一条第一款“清除犹太人在本国经济界的每一分影响”。这种做法奏效了，几乎全部的法国犹太人财产进了德国的战争账户。即使是在法国北非殖民地的犹太人财产也都给了所谓的国家，这些钱——因为是由雅利安化支持的统一的货币——最后也进了德国人的口袋。

在该法令的第一条中，就将所有的法国国家公债、法国城市的债券或者国有企业从信托资产中排除出去了。这是完全可以想见的，因为这部法律按照德国之前的惯例，其目的是将尽可能高比例的犹太财产转变成国家公债。为了这个在法律中没有被提及的所谓的目的，被任用的那些托管人根据第十二条，首先利用其广泛的权力把委托给他们的财产卖出。买卖与其原价值相符，而由享有抵押权的第三人来承担质权。第十八条表明了对财产进行清算的主要目的：如果托管人不急于将财产出卖，主管的贸易法庭领导就可以任用自己的清算员，使财产如法律所希望的那样被卖出。 251

不具妥协性的明确法律意图很明显与第七条的内容相左。第七条规定,财产管理人必须像一个好的家长一样对委托的财产进行管理。家长式的悉心照管当然不是为了犹太人的幸福,而仅仅是为了法国财政部的利益。

如何处理大量经财产清算而来的收益是十分重要的。这一点在第二十四条中重新作了规定。根据第二十四条,全部买卖收益都必须以所谓的财产管理公司中犹太人的名字存入国家储蓄账户。在那里这些款项立刻变成了法国的国库券,其中一部分成了德国的战争资金。

如果人们弄清楚了财政经济上的关联性,就能找到为什么犹太委员会坐落在小佩雷斯广场 1 号的最可能的原因。那里离法兰西银行的主要入口才五十米远。因为根据第十七条买受人必须尽可能用现金支付,这一点与德国和之后的匈牙利的雅利安化实践相吻合,他们能很快把现金送到法兰西银行并在那里——从所有权法律制度上看是无可挑剔的——使现金变为国库券。

1942 年法国的犹太人财产清算达到了高潮,1943 年下降到了一半以下。德国信托体系拿走了支付其检验工作的一笔可观的费用,除此之外他们还侵吞了由托管人继续经营的企业的收益、确定了出卖收益的数目等等。他们将这些钱也转变成了法国国库券。德国敌方财产管理机构事后进行了这样的表述:“他们根据军事政府的指示,把钱存在由德国人掌控的敌方大型银行的分支机构里面,如果出现更多的钱款的话,就会适时卖出法国国库券。”在敌方的债权人要求下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把他们的钱也变为国库券。以这种方式运营毫无疑问是受到在法兰西银行的德国委员会的强迫的。这些德国委员会以此对银行领导表示信任。

252

只要将犹太人财产变现的收入转到信托体系的账户,法国就万事

大吉了。德国负责此项事务的人选择了这样一种减少法国通胀压力并使占领费用的支付变得简单的形式(比较少的那部分款项,即信托收入中的2250万帝国马克在1943年直接被汇入了柏林的帝国中央账户)。

附庸国的援助款

斯洛伐克的正义

斯洛伐克拥有265万居民。希特勒德国使它在1938/39年从捷克斯洛伐克中分离出来。占主导地位的斯洛伐克人民党对反犹太主义运动的宣传可以参阅亚历山大·马赫的演讲。他后来当上了内务部长，并与共产主义者保持着联系。他在这个新的国家成立之时说:“人们把各地的占有黄金、珠宝和帝国财产的犹太人都清除了,我们也要这么做。斯洛伐克最强大的力量是工作,谁不工作,谁就没有吃的。谁若把帝国财富偷走了,我们就要把它们给夺回来！这是处理犹太问题的最实际的办法。”1940年7月,《斯洛伐克政治报》也有相似的评论:“首先是犹太问题。不用这种极端的方式,我们的社会关系是不会得到根本性的改善的。”

1939年4月18日的政府条例规定,如果有人被认为是犹太人,那么他们——与德国不同——准许获得很多的特例。总体上条例否决了犹太人在公共部门工作的权利,并对他们进入特定学术职业进行了部分或全部的限制。因为斯洛伐克政府必须对本国无产阶级的贫穷境地进行改善,所以1939年他们就对犹太人的农业、林业经济财产进行登

记。几个星期之后政府颁布了法律，规定了如何对这些地产按照社会 254 "公平"的方式进行划分和分配。事实上相关的财产没收行动几乎仅仅涉及到犹太人占有的 101 423 公顷土地（这个面积也许看上去比较小，但在计算上，它的大小必须能为那些无土地的家庭建造 20 000 个 5 公顷大小的院子。算上孩子总共大概有 120 000 人，大约占斯洛伐克人口总数的 5%）。1940 年 4 月 25 日颁布了关于犹太公司斯洛伐克化的法律。这部法律的目的是创造"一个强大的斯洛伐克中产阶级"。

根据没收犹太人的地产、贸易与工商业企业的法律，1940 年夏天诞生了将斯洛伐克犹太人也驱逐到马达加斯加的计划。布拉迪斯拉发政府把这个项目作为与德国联盟的唯一连接点。然而这肯定是 1940 年 8 月被艾希曼作为犹太问题专家而派往布拉迪斯拉发的迪特尔·维斯利策尼的影响。他主要负责将犹太人从斯洛伐克经济界中排除出去，因而维斯利策尼偶尔也被称为雅利安化问题顾问。他一直努力使财产没收法律像德国模式一样发挥作用。所以以维也纳和布拉格建立的抢夺机构为样板，他在布拉迪斯拉发也建立了专门的斯洛伐克机构——中央经济部——并建立一个与其相连的基金，用这个基金来促进所谓的犹太人迁移工程。所谓基金，不过是用官僚们喜欢的委婉表示法，实际上是一个存储大量犹太人财产收益的账户。基金的名称可以随心所欲，至于基金的内容只能由斯洛伐克财政部进行支配。财政部在 1940 年 9 月 2 日以明确"法定"的条款规定，所有犹太人必须对其财产进行报告登记。

至 1942 年初为止，斯洛伐克政府清算了总共将近 12 000 家登记的犹太公司中的 9987 家，对其中的 1910 家进行了雅利安化。显然，直接的财产转移不仅对斯洛伐克的中产阶级有利，竞争对手的消失以及相 255 关的种族主义集中化进程对个别的斯洛伐克国有公司也是很有利的。

处理抢夺来的资产的除了统计局，还有"犹太中心"，这是对斯洛

伐克犹太人强制联合会的称呼。根据斯洛伐克反犹太主义者、主管内务部犹太问题研究组的安东·瓦谢克的说法,犹太财产总价值为45亿克朗。根据统计局和犹太中心的报告,这个最少的资产净值明显小了很多:总共在25亿至30亿克朗之间。然而即使更谨慎的估算值也对布拉迪斯拉发的财政部长有吸引力。1941年,斯洛伐克国家财政预算达到将近30亿克朗(大约2.5亿帝国马克)。其中军费支出大概占了5亿。这个问题是值得深思的。

当1941年6月底斯洛伐克加入战争,与德国为友、与俄罗斯为敌时,财政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他们是如何解决问题的,我们可以从拉迪斯拉夫·利普舍的谈话中发现些许原因:"根据8月25日最高政府代表人在场时政府主席的建议,我们必须认真地对未来的财政状况进行思考。我们的财政状况自从加入对苏战争之后迅速恶化。财政部长指出,到1941年底我们的财政赤字将达到6亿克朗。为了避免产生通货膨胀,我们决定,缺少的那部分财政资金的大部分——5亿克朗——通过对犹太财产征收15%的税费来解决。"

几天之后,即1941年9月9日,政府颁布了相应的法律。他们将强制税费的比例提高到20%,并且如同1938/39年的德国一样,将所有256本国的犹太人集中管理。官方的理由是:如果由那些非犹太人来承担这5亿克朗,那么将是"巨大的不公正",因为他们对这场战争是没有任何过错的(15%的犹太财产是5亿斯洛伐克克朗的假想说明财政部着眼的是33亿的财产)。利普舍认为,对财产征税实际上失败了,因为犹太人已经不再拥有足够的财产。事实上他们仅仅将已经被封锁了但还未进入国库的储蓄存款、股票和库存送进了国库作为税费。

1942年,斯洛伐克国家银行的管理者在其年度报告中模糊地,但又是足够清楚地发现:货币流通在德国的要求下不恰当地发生了大幅度的增长。然而如果"斯洛伐克国家银行没有采取中立措施的话",增

长还会更加厉害。其中首当其冲的是没收犹太人财产,把不值钱的家当变卖,并将钱存入账户。这些措施起码在一段时期内不会使货币流通发生更大幅度的膨胀。

因为房屋太少,1941/42 年冬天布拉迪斯拉法的 11 518 名犹太人只能被迫迁移。直到 1942 年 3 月,6720 个人必须离开该市到预先指定的地方安顿。这之后即 3 月 26 日,开始了向奥斯威辛和卢布林迈丹尼克集中营驱逐的行动。13 个星期内,斯洛伐克政府一共将 89 000 名犹太人中的 53 000 人驱逐。在这期间即 1942 年 3 月 25 日政府颁布了一部法律,对犹太人转移和其财产国有化作了规定。在天主教会的干涉下,斯洛伐克政府被迫停止了驱逐行动。

对每一个被驱逐的犹太人,斯洛伐克都要向德国缴纳 500 帝国马克,总计 2610 万。然而德国—斯洛伐克的清除费用计算错了,因而德国的利益相关者买受信贷的回旋余地也被扩大了。帝国财政部将这些 257 帝国马克"供党卫军使用"。

出于被迫,斯洛伐克估计在二战期间一共给予德国总计至少价值 70 亿克朗的实物和服务,其中将近 40% 来自雅利安化的收益。为了制止因为针对苏联的战争和因德国的要求而引起的通货膨胀,斯洛伐克国家银行首先以对其有利的方式清算犹太财产而稳定克朗。但是这样仍不能抑制通货膨胀。早在 1942 年德国就给了斯洛伐克国家银行总计 100 万帝国马克的(抢夺)黄金和(抢夺)外汇,1944 年又给了 1000 万的帝国马克。最后帝国政府将"珠宝和钻石以附加税的形式供布拉迪斯拉发的盟友使用"。这些珠宝和钻石至少一部分是来自荷兰的犹太人财产。

1941 年建立的独立国家克罗地亚的政府也采取了相似的行动。

1941 年 4 月 10 日,德国国防军占领了萨格勒布并在同一天宣布,基于德军大规模扶持的乌斯塔沙成为一个新的国家,包括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地区。四天后克罗地亚政府冻结了由大概 30 000 名犹太人支配着的所有账户。十六天之后,一部特殊的法律要求该国内的犹太少数民族对其财产进行申报并提交财产标志。随后,克罗地亚的犹太人就被迫"为了国家的需要而缴纳犹太税"。

大部分的犹太人被关在克罗地亚的集中营内并被折磨致死,小部分转入地下活动或者在 1942 年夏天被驱逐到了奥斯威辛。一直到 1942 年 10 月 30 日乌斯塔沙才最终将全部犹太财产收入国库。1943 年国家财政发出了高达 12.5 亿古纳的空头支出。根据《法兰克福报》的报道,其中一大部分的钱款是"通过有固定利益的有价证券以及通过对约 12.5 亿的犹太财产进行国有化的收入来填补的"。然而他们还是将一个——与斯洛伐克相比——较小的数额存入了德国人的账户。他们要求为每一个在 1942 年被驱逐到奥斯威辛的犹太人支付 30 帝国马克的贷方凭证,总计 4927 人。

258

保加利亚的战争财政

在巴尔干战争前,德国专家就引起了保加利亚政府的紧张。1941 年 1 月 23 日至 2 月 1 日,为了对将要进行的希腊战争作财政上的准备,在索非亚相当秘密地组成了一个专家委员会。希特勒的特使诺伊巴赫领导着由民间和军方的经济与财政专家组成的代表团。在会晤的最后一天,德国和保加利亚达成协议,为了德国国防军的利益,保加利亚提供 5 亿列弗(保加利亚货币名)的现金贷款,同时保加利亚要扩充军备。

帝国银行在3月3日已经预言:“借贷额似乎必须要增加到9亿列弗。”3月25日一语成谶。4月,在对南斯拉夫和希腊战争期间,索非亚的德国信贷银行再次向保加利亚压榨了5亿列弗,总计约14亿。两个月后又增加了50万列弗,就这样一直持续到1944年8月。德国国防军在1941年4月和5月入侵南斯拉夫和希腊之后,吞并了与轴心国结成联盟的保加利亚的色雷斯和马其顿地区。保加利亚还必须负担所有德军在保加利亚领土内已经产生和将要产生的军事开支。

1940年,保加利亚的国家财政预算为84亿列弗,比前一年增长了10%,增加部分主要来自于一般税费的增加、一次性的保险费,特别是“通过对高收入以及巨额资本和销售征收的更高的税费”。1941年已经达到101亿列弗,超过前一年的20%。在议会对财政计划发出争议时,财政部长博伊洛夫解释说,巨额的财政支出是由于欧洲的战争,并许诺,那些不断增长的国家收入不应该涉及国民中“拥有少数资本的部分”。

259

事实上,1941年国家支出的增长是由于合并南斯拉夫和希腊地区以及德军索要的170亿。它比1940年翻了一番,但是经济增长却远远小于支出的增长。因此1942年保加利亚的国家财政支出必须明显地减少。为了满足德国多方面的需求,保加利亚政府不得不制定的这项财政计划失败了,其中包括德军在被新吞并的(所谓“被解放的”)地区进行清算的费用、为军队进出希腊并从希腊连到北非前线的公路铁路的建筑费用以及无偿地向军事管理地区塞尔维亚提供出口产品等等。德军使用了在其他被占领地区取得重大成效的体系并与保加利亚政府达成协议,索非亚的国家银行必须将由军队带入流通的“在索非亚的德国信贷银行纸币无偿地”上缴。柏林负责人记录道:“这个程序运行良好并由实践证明了其可行性。”

此外,大量的食品和烟草被出口到德国。与在其他国家不同的是,

德国为其中一部分商品“付了钱”，然而这种付款方式与其在别国的敲诈勒索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只不过形式不同罢了。从 1941 年开始，国内的债务清除就开始与德国的战争借款进行互换（1945 年没有任何价值交换）。260 索非亚人民银行协会的主席用精辟的语言将这种高级的盗窃行为刻画为“将帝国马克纳入保加利亚货币的保证金基础”。此外他还骄傲地说：“保加利亚是第一个为创建统一的欧洲货币体系而作出重要贡献的欧洲国家。”实际上索非亚的国家银行直至 1944 年夏天一共接收了总价值为 7.1 亿帝国马克的战争借款，这相当于 224 亿列弗。德国仅仅使用这种方式就使微小的、在经济上占绝对弱势的联盟者交出了这么多钱。

财政部长多布里·博伊洛夫的官运说明了保加利亚的政策是多么迎合帝国的愿望。他从 1942 年 9 月开始成为总理，一直任职到 1944 年 5 月。1943 年秋天，在对狼穴进行的一次访问中，他告诉希特勒，保加利亚还能继续以借款的方式向德国提供支持。他“为了共同的命运之战的利益”，竟然对“整个经济平衡”不加考虑。相反，希特勒如同对待芬兰、罗马尼亚和匈牙利一样，向他许诺以胜利。他希望“朋友们要什么，就给他们什么”。但是事实上，德国一直到战争结束始终是从他国攫取财物。

德国—保加利亚的协议禁止路过保加利亚的国防军官兵随身携带武器。实际上这是没有意义的。德军直到军事上陷入了困境，才于 1944 年 1 月 6 日签订协议，允许保加利亚海关对旅行行李、军队邮政包裹等进行检查。之前保加利亚的官员总是对德军“大量的购买行为”抱怨，因为它致使相关地区“武器匮乏，价格暴涨，使保加利亚居民对德国士兵的愤怒情绪激增”。

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 1942 年的财政预算案中第一次包含了对犹太财产征收特别税的内容。犹太人必须缴纳 15 亿列弗，而其他直接税

种的增长总计仅6.28亿。早在1941年1月21日就已经颁布了反犹太主义的“为了保卫国家的法律”。从该法律中可以看出，犹太人从此被 261 认为是外族人，他们不能再从事特定的职业，并且根据第二十六条，必须在保加利亚国家银行对其所有财产进行登记。但犹太人并没有执行命令，因此1941年7月14日保加利亚政府命令每一个“具有犹太血统的人”必须向保加利亚国家账户缴纳一次性的财产税。超过200 000列弗（合计约600帝国马克）的财产要缴纳20%，超过300万的财产要缴纳25%。从公开的数据中我们可以算出“至少价值18亿列弗的犹太财产”。

此外，保加利亚还对犹太人采取了其他极具任意性的措施。1941年夏天，保加利亚政府宣布列弗为被吞并的马其顿和色雷斯地区唯一合法的支付手段。其中犹太居民可以以低于“其他储户”30%—50%的汇率将希腊德拉赫马和南斯拉夫第纳尔兑换成列弗。与反犹太主义立法同时进行，保加利亚颁布了对被占的马其顿和色雷斯地区的希腊人财产进行没收的法律。

事实上，1942年保加利亚犹太人缴纳的特别税所形成的国家收入低于预想值的一半，即7.09亿列弗。1943年应以这种方式获得4亿列弗并“通过出卖动产和其他有价值的物品”获得多于15亿列弗。德国专员在经常性的财政审查中发现：“这里允许出卖被没收的犹太人占有的动产和有价证券。”而比较棘手的那部分价值来自马其顿和色雷斯的犹太人，他们在1943年初被驱逐了。鉴于保加利亚犹太人已迁移或被驱逐，1942年3月2日，索非亚政府规定，将所有迁移了的犹太人的财产收归国有。和德国非常相似，这些来自国家抢夺的收益被称为“其他收入”。

1942年8月29日颁布了名为“犹太问题及相关事项的政策规范” 262 的法律。这部法律用59个法条囊括了以前颁布的所有条例，并为犹太

委员会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其在财政经济方面的独特性在于,犹太委员会由财政部的一名代表和国家银行的一名代表管理。第四十三条规定以有利于保加利亚本国的方式"没收股票和其他有价证券"。第四十五条要求所有犹太人将他们的动产和其他债券存到国家银行,其中包括保险、遗嘱、债权公证书、有价证券等等。第四十七条规定对犹太财产以"公开拍卖的方式"进行买卖。形式上保加利亚官员将每个被没收财产的犹太人所得的出卖收益描述得非常可观——但实际上却只能以自己登记的价值为限。基于战争引起的快速通货膨胀,出卖的价格都很高,然而最终"剩余利润都进了国库"。

1943 年初,保加利亚犹太委员会委员亚历山大·贝莱夫将驱逐"所有经济上获得好处的犹太人"的愿望转告给德军。尽管保加利亚政府基于外交政策的考虑停止了此任务的继续推进,并使保加利亚的犹太人免于被送到德国毒气室,但这些并不代表着没收行动进入尾声。1943 年 6 月,德国军事经济长官在索非亚作报告,称"绝大部分在索非亚的犹太人都要转移到外省去"。保加利亚犹太委员会一共清算了总计 45 亿列弗的犹太人财产。这些财产很大部分都成了保加利亚不断被迫上缴给德军的援助款。

1943 年 2 月 22 日,贝莱夫和艾希曼的特派员特奥多尔·丹内克最终缔结了已经经过保加利亚政府确认的协议。该协议要求将犹太人 263 "从新成立的马其顿和色雷斯省向德国东部地区"驱逐。实际上的目的地是特雷布林卡,在那里,11 343 名流放者很快被处决了,无一幸免。保加利亚公民搬进了犹太人空置的房屋,从而使整个国家保加利亚化。几乎同时,许多被逐出这个地区的希腊人逃往马其顿的希腊属区,那里正好有被驱逐出塞萨洛尼基及其周边地区的犹太人的房子。所以,长期存在争议的今天的希腊北部地区被希腊化了——马其顿和色雷斯的

部分地区被保加利亚化了。

罗马尼亚的黄金政策

应所谓的布加勒斯特的要求，赫尔曼·诺伊巴赫于1940年12月被派往该地。作为外交部的特使，他的任务是“代表德意志帝国向罗马尼亚政府提供技术上的顾问”。其中包括主管国际贸易和外汇管理的帝国银行经理沃尔夫，以及他下属的政府咨询员克雷布斯博士和古尔斯基。后者后来领导了前已述及的塞尔维亚的“去犹太化”运动。诺伊巴赫上任的真正原因可以从1940年10月的会谈记录中找到：“我们首先想要对石油经济产生影响。帝国元帅（戈林）指示过，必须确保德意志帝国获得300万吨石油（合300万帝国马克）的收益。而通过等价交换还暂时做不到这一点，国家银行必须预借资金。这可能会导致通货膨胀。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罗马尼亚政府将获得德国顾问团的支持。”除了诺伊巴赫，还有经济和财政部的最高官员们参加了会谈。会谈最后，他们明确地表示：“总有一天，犹太人的雅利安化问题也会按照我们的方式来解决。”

264 根据1939年8月的德苏条约，1940年夏天，罗马尼亚将北布科维纳和比萨拉比地区划归苏联。不久，在德国和意大利的压力下，北特兰西瓦尼亚地区割让给了匈牙利，南多布罗加地区割让给了保加利亚。领土失据引发逃难狂潮，导致大约有26万人流离失所，需要得到赈济。为了阻止这种情况蔓延，帝国政府将一部分具有德国血统的人从罗马尼亚领土内迁移出来，即所谓的德国农民和在南布科维纳和北多布罗加地区密集居住的德意志少数民族——共77 000人。同时，罗马尼亚

在1940年10月至1942年6月间颁布了一系列没收本国犹太少数民族财产的法律。他们首先按直接的难民救助进行分类,之后,当罗马尼亚积极投身于对苏战争时,越来越多地按战争财政进行排序。

1940年10月4日,所有的犹太人地产被收归国有;10月10日开始对犹太人获得的、犹太医院和福利机构等拥有的抵押契据进行没收。在此期间通过的法律,在短期内明显地降低了公共债务的负担。因为国家必须为难民提供生存必需的借款,以这种方式政府就可以在不威胁国家财政平衡的情况下负担新的债务。同样,它能如同柏林要求的那样向德国提供资助。为了把犹太乡镇和福利机构都改造成难民的临时收容所,它们在这个时候也都被国有化了。

1940年12月12日,罗马尼亚政府无偿地从本国公民犹太债权人手中夺走了林木财产,以及与农业和林业相联系的加工企业。1941年3月27日,紧随着的是犹太人动产的国有化。5月2日,为这些财产的罗马尼亚化建立了负责统筹的中央机构。"这些物质因素"为罗马尼亚本土企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在此期间,260 000公顷由于德意志人的再定居和对犹太财产的没收而来的农田进入了国有的土地范围。而且,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犹太人必须为具有罗马尼亚血统的难民提供工作岗位。

265

很明显,帝国政府并不是无偿地将罗马尼亚德意志人留下的不动产和企业财产转交给新的所有人。和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一样,罗马尼亚为"回到祖国"的德裔向帝国账户支付总括性的赔偿。所有的评估委员会对每一笔费用进行计算。它们总计77亿列伊,相当于1.3亿帝国马克。这笔费用分期支付。其中大部分的钱款在1942年夏天进了驻罗马尼亚的德国国防军的账户。这些钱款的未来用途普遍是:为军队购买食品,支付军人的工资,在该国市场上进行私人购买。

这些钱原本属于那些重新回到德国定居的德裔，他们本应用这些钱在德国开始新的生活。不过，他们从被没收的波兰财产中获得了补偿。为了无偿获得居住所必须的农舍，艾希曼的手下在短时间内用暴力的方式驱逐了62 000名来自瓦特高的波兰人。被驱逐的人必须被安顿在总督辖区华沙以西的地方，住在那些直到当时还住着犹太人的房子里。他们总共72 000人，比进驻的波兰人多10 000人。他们被没收了所有财产，并于1940/41年冬天徒步走进了那个拥挤的、被称为饥饿的代名词华沙犹太区。

1942年年末，希姆莱的委员们很骄傲地报告了迄今为止500 000名外国籍德意志人的迁移和安顿情况："本质上难民的再次安顿是通过将以前的外族人的财产无偿变现——也就是说并没有占用国家财产——来资助的。"这是很夸张的。毕竟1941年财政部为了安置难民花费了超过3亿帝国马克。然而因德国占领罗马尼亚或者苏联、意大利和克罗地亚而产生的总括性赔偿变多了——这些赔偿费成了国家财政的公共管理收入，并催生了将难民逃出国的货物买入的需求。当罗马尼亚的德意志人越过多瑙河进入德国境内后，希姆莱在帝国银行的代表人赫尔曼·瓦尔德黑克尔声讨说，罗马尼亚必须支付"因为迁移而产生的"特定债务。 266

这种设计的程序被人们称为自然偿还，在迁移链的最后一环由犹太人来埋单，而德国士兵在罗马尼亚几个星期或几个月的时间就把所有迁移回国的德裔财产挥霍一空。因为这些必须用波兰人的财产进行赔偿，而对被驱逐的波兰人必须用犹太人的财产进行赔偿，所以军队最后只好动用那些被关押在华沙犹太区的犹太人的财产。这些犹太人因为饥饿和寒冷死在了那里；如果他们直到1942年夏天还活着的话，他们就会被送进特雷布林卡的毒气室。

1941年夏天，罗马尼亚加入德国的对苏战争后，布加勒斯特的进一步侵吞犹太人财产的法律有了新的基调。1941年7月底，罗马尼亚财政部强迫布加勒斯特的犹太教会认捐价值100亿列伊的战争捐款。9月，军队为了给野战医院配置设备，要求犹太人拿出铁床、床垫和床上用品。10月，法律宣布所有犹太债权人手中的抵押债权无效，由国家替代犹太人成为债权人，从而使国家收入获得增长。同时，罗马尼亚 267 的犹太人必须将黄金、白银、首饰等贵重物品上交给国家，并且缴纳各种各样的罚款和超出一般水平四倍的特别税。1942年1月3日颁发了捐献衣服的法令，5月16日颁布了支付40亿列伊战争捐款的法令，1942年7月人们将犹太人公墓的财产转给其所在乡镇。没收犹太人的财产给罗马尼亚带来了收入，减少了战争对罗马尼亚多数人的压力。罗马尼亚战争贷款中的25%至33%都必须由本国的犹太人来认购。

前已述及，从赫尔曼·诺伊巴赫在布加勒斯特上任伊始，德国便开始了对这个国家的掠夺行径。德军同时进驻这个国家。借用一位财政部官员的话，“不能叫做占领军”，应该是“教育之师”。不论他们叫什么，他们总归都需要钱。因此帝国银行经理鲁道夫·扎特勒于1940年12月31日“带着外交部殷切的希望”飞往布加勒斯特，为了支持“特使诺伊巴赫与罗马尼亚政府关于德军资金供给问题的谈判”。扎特勒曾驻扎在奥斯陆，从那里他可以对挪威和丹麦的国家银行进行监控并使占领资金汇流到这里。现在他要把“在奥斯陆和哥本哈根积累的经验”运用到罗马尼亚。这一目的显然达到了，因为几个星期后罗马尼亚元首安东内斯库就抱怨说：“如果德军每10天就要10亿列伊，你们觉得我还能担任多久的国家元首呢？”

此前，卡尔·弗里德里希·格德勒就注意到，德军一驻扎进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的“公共财政就崩溃了，因为人们要求罗马尼亚缴纳他们根本不能负担的占领费用”。主管经济谈判的使者卡尔·克洛迪乌斯

也预测到“对货币的威胁”，因为军队要求每年从“仅仅 300 亿列伊”的 268 国家预算中获得 70 亿至 80 亿列伊——而这与后来的消费额相比，预测得实在太低了。

在诺伊巴赫的委托下，卡尔·布莱辛这位后来的德国联邦银行主席，于 1941 年 9 月底开始对罗马尼亚的货币状况进行调查。根据他的鉴定，从 1939 年起货币流通和价格差不多增加了两倍，原因是“以国家目的而产生的信贷资金，特别是因为军事上和经济上扩充军备”。罗马尼亚加入对苏战争使得“向国家银行支付更多赔偿变得必须”。“在罗马尼亚驻扎的德国部队，为了达到其客观上和个人的目的，也需要列伊的贡献，这些钱是国家银行从在柏林的清算账户中兑换相应的贷方凭证而来的。”1941 年 9 月 13 日，在柏林的罗马尼亚的结存款已经达到了 155 亿列伊。根据布莱辛的预计，1941 年的前九个月，由于德军的要求罗马尼亚的国家债务增长了 41.4%。德军“直到 1942 年 1 月又要求了大约 160 亿列伊”。因为那时所有对犹太财产罗马尼亚化的收益全部进了罗马尼亚战争账户，从而使国家债务的增长速度能够减慢，但是最后 41.4% 的收入都进了德国人的口袋。当 1942 年春天罗马尼亚向犹太人要求 40 亿列伊捐献时，德国一个月不用为钱着急了。

布莱辛在他的鉴定书中抱怨罗马尼亚的政府机构。鉴于迅速高涨的通货膨胀率，他称“犹太人应承担部分责任”。货币“几乎势不可挡地”贬值，他警告说，这样会产生危险，而且必须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个危险，“因为它可能不仅使社会局势紧张，还会使罗马尼亚的生产力倒 269 退”。因而作为鉴定者，他要求征收更高的税费，开放国家账户并减少罗马尼亚一切非战争必需的支出。

相反，罗马尼亚政府想要掣肘德国的要求。所以军需官必须每十天就与罗马尼亚的财政机构就资金补给进行一次协商。单个的单位并不能平衡开支，仅因为罗马尼亚方面——受诺伊巴赫支持——强调，大

量的资金消耗会“威胁货币，甚至导致通货膨胀”。根据德军的判断，安东内斯库政府试图“通过拒绝支付列伊而使德军缩小部队规模”。这与希特勒的观点相左，希特勒在给安东内斯库的信中写道，通过对苏战争，罗马尼亚不仅可以收回北布科维纳和比萨拉比亚地区，还可以管制德涅斯特河沿岸并从中获益。很快在北布科维纳和比萨拉比亚地区就开始对犹太财产进行没收。德军在和罗马尼亚军队的协议中写道：“将犹太人迁移出德涅斯特河沿岸。迁移出布格地区目前还不太可能。这些犹太人之后会被关到集中营从事劳动，直到根据军事行动决议可以向东部迁移为止。”

1941 年夏天，德军在罗马尼亚的膳食限额平均为 50 000 到 60 000 人。但是，德军经常违背原则地尝试“将罗马尼亚的物品”作为“军队物资”用船和货车秘密运出这个国家。不是运往苏联就是运往德国。但这一做法并非总能成功。“根据相关条例，罗马尼亚人把所有运送食物的运输工具和所有的车辆都停靠在罗马尼亚。所有包括军队物资在 270 内的无障碍运输，都是在长达几天的等待之后才有几次被放行”。原因很简单，德军管理者不能无视生活资料在罗马尼亚的匮乏。

在这种情况下，基于本国政策对货币体系的威胁，纳粹领导层决定以运送黄金的方式作为权宜之计稳定货币市场。从 1941 年 7 月起，罗马尼亚政府一直强调，要求柏林应该至少用黄金来支付一部分的物资，从而使国家银行能够“证明其货币黄金储备金的改善”。希特勒的一些顾问也认为这个要求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他们预感到了危险，“如果不能解决货币难题，那么德国最终将把自己的货币带入罗马尼亚”。因此诺伊巴赫也支持罗马尼亚政府的要求。实际上一直到 1942 年初——之前一次是在 1940 年 7 月——为了使列伊稳定，大量的黄金被

运送到罗马尼亚。两次运送的黄金总量达到了18吨。

大量黄金使安东内斯库开始感到十足的自信,并不再满足军队的所有要求。确切地说,罗马尼亚的谈判者与主管军队的管理者开始为每一个列伊而争吵。因而1943年1月1日,罗马尼亚军队总司令部的对德事务负责人认为十分有必要将持续的"列伊短缺情况"报告如下:"我们的目的必须是使在罗马尼亚的德国军队尽可能地减少,利用各种方法继续降低物质上的支出且不动摇罗马尼亚的货币体系。"

同时,战况不利迫使德国进一步将部队迁移到罗马尼亚并维持其野战医院和供给基地。在这种情况下,里宾特洛甫和罗马尼亚外交部长米哈伊·安东内斯库于1943年1月11日在指挥总部狼穴签订了一个关于运送30吨黄金(价值约8400万帝国马克)的秘密协议。经济部长和帝国银行行长丰克也参与了协商。根据协议,帝国政府必须在六个月内向罗马尼亚支付4300万瑞士法郎。这场交易的目的是"避免对德国战争十分重要的罗马尼亚物资被出口到瑞士"。罗马尼亚政府用这些钱至少可以使货币体系稳定一段时间,并用法郎为自己因在东部战线损失惨重故而需要重新装备的军队购买武器和其他物资。 271

安东内斯库和他的随行人员乘火车去拉斯滕堡拜见了希特勒。旅途中,布加勒斯特的主管军官打电话给陪同罗马尼亚代表团前往拉斯滕堡的德军驻布加勒斯特委员会主席通报"列伊获取上的问题"。同时,以赖内克元帅为代表的军方首脑在对"列伊问题相关情况"进行解释时说:"要吸引罗马尼亚人更多关注共同的战争利益。"当罗马尼亚的拜访者准备回国时,他们给德方负责陪同的军官留下了"相当令人满意的印象"。

但是安东内斯库一回到布加勒斯特,德方的这种满意就消失了。2月2日,安东内斯库再次拒绝向德军支付作为"罗马尼亚长期开支"的费用,并要求:"直到德国职能机构对运送黄金及其时间进行承诺并事

实上运送了黄金,罗马尼亚方面才会给予军队商定的费用。”因而布加勒斯特的德国职能机构要求“尽快至少运送一次部分的黄金”。1943年2月15日,帝国银行第一次向布加勒斯特运送了黄金。在运送的最后时刻,如同会议记录修订书中写到的那样,19 998 820.57帝国马克272 的对价物被减少了三分之一——大概只有商定数量的四分之一。结果罗马尼亚财政部长在一个月后再次拒绝向德军支付其想要的款项。直到4月15日、4月18日和5月2日,帝国银行才将剩余部分运送过去。

帝国银行副行长普尔在商谈之前就已经尝试阻挠罗马尼亚的要求。之后他愤慨地发现,安东内斯库“成功地达到了德国方面容忍的极限”。戈培尔认为,罗马尼亚已经预感到了军事上的失败,所以“努力为自己创造一定的黄金储备”。

罗马尼亚国家银行用这些黄金稳定了过于疲软的货币体系。由于这个原因,也因为对大量犹太财产进行了罗马尼亚化,1943年5月罗马尼亚财政部长宣称:“从1942年10月1日起不再动用国家银行的钱款。”利用这些黄金和瑞士法郎,德国获得了石油和食品;罗马尼亚财政部长准备好了列伊纸币,用来支付和给养在罗马尼亚驻扎的每个德国士兵。黄金交易的目的,如同在会议记录中记载的那样,是为了稳定罗马尼亚“为了德国利益而附加货币支出的”货币体系。作为对价,在德国的建议下,罗马尼亚1943年对德国和意大利的石油出口增加到了400万吨,同时出口德国主妇需要的烹饪用油“至少15 000吨油渣饼以及大约90 000吨油料果实”。应驻罗马尼亚德军的需要,从1942年10月1日起每月支付525列伊给每个德国士兵以提高其军饷。

1944年2月9日,在希特勒的支持下(“元首肯定是有其政治原因273 的”),德国保证将来的“粮食供给也通过黄金来支付”。10.3吨黄金被运送到瑞士国家银行的罗马尼亚国家银行账户。这一切尚未结束,

1944 年 8 月,布加勒斯特的相关负责人就要求"以外汇或黄金作为对价物",如果德国希望他们在这个国家驻扎的大批士兵获得军费的话。这一点是德国的谈判代表想要避免的,他们很早就表明,如果这个国家向德国人民提供粮食和荚果的话,"将继续向罗马尼亚以黄金形式支付 2000 万瑞士法郎"。

尽管与罗马尼亚的黄金交易是最高机密,邻国匈牙利的帝国代理官员米克洛斯·霍尔蒂还是知道了其中的内幕。当德国 1944 年 3 月 19 日占领匈牙利的时候,他于同一天在枢密院强调:"如果要拿走所有的财产,不要像对罗马尼亚一样用黄金支付,而要用你们不值钱的纸币!"所有这一切都在匈牙利发生了,而德国人并不是用帝国马克,而是用匈牙利帕戈支付的。除此之外,如同前文所提到的,他们还帮助匈牙利进行财政管理,使部分财政压力通过犹太人财产得到了缓解。而这并不与霍尔蒂的想法相悖。

黄金的踪迹

希腊的通货膨胀

1944 年初，将大约 8000 个犹太人从雅典迁移到奥斯威辛集中营的计划失败了。根据估计，弱小的德国军队只能逮捕大约 1200 人；相反，1943 年初开始的将大量的犹太人驱逐出塞萨洛尼基的行动却十分成功。在这里，希腊的军官与德国占领军进行了合作。

塞萨洛尼基几百年来都是一个土耳其、保加利亚、希腊、犹太多种文化互相融合的城市。20 世纪最初的十年中，塞法迪犹太人的拉迪诺语一直被作为当地的通用语。1912 年至 1941 年间，塞萨洛尼基的犹太人聚居区减少了几万居民，他们因为不断升温的民族主义和经济上的困境而移民了。1927 年的《犹太辞典》中写道："当塞萨洛尼基属于希腊之后，就开始了将犹太人排挤出他们现有地位的运动。……与土耳其进行的难民交换也促使大量的犹太人迁移，他们必须为来自土耳其的希腊难民们腾出地盘。"对于在当地居住的犹太人来说，似乎是"移民们带来了反犹太主义运动"。1912 年，新的希腊政府就尝试对市中心的犹太公墓进行征用。当时的那次行动失败了，但 1942/43 年在德国占领军的帮助下征用取得了成功。那里现在坐落着一所大学。

希腊的政府官员们至今都不愿提及当年政府的所作所为，1998 年希腊外交部用英语发表的一份长达几百页的关于他们的犹太国民命运 275 的虚假文件中表明了这一点。文件开头称韦尼泽洛斯的政府是“对犹太人友善的”，因为它在 1917 年作为欧洲第一个犹太国家的政府被建立起来。1927 年的《犹太辞典》言简意赅地说明了这一点。韦尼泽洛斯也是那位“努力将塞萨洛尼基去犹太化和进一步希腊化”的希腊总理。

关于德国与希腊合作对塞萨洛尼基的犹太人进行驱逐的事件，我们在下文中将不会涉及，因为它已经被今天的人们所广泛了解。但这一事件的另一方面至今却在大众中，甚至在关于种族清洗的学术性文献中被忽略了——将被驱逐者的所有财产再利用。这里再一次涉及到了德国向被占领的希腊要求的天价占领费和在雅利安化的背景下稳定通货膨胀的德拉赫马（希腊货币单位）两者之间的联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塞萨洛尼基的犹太人共有 12 吨的黄金被洗劫一空。德国和希腊在战后清算时，都对这件事情只字不提。他们留下了错误的线索，隐藏了真实的内幕。因而在下面的“史海钩沉”中，一些琐碎的考据工作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1941 年希腊有 700 多万居民。1930 年至 1940 年的十年间，老百姓的生活开支在持续性地上涨，每年达到了 5%，但是尚在可以忍受的范围之内。在德国入侵之前，国民收入为 600 亿德拉赫马，仅相当于 10 亿帝国马克。当时的希腊还很贫穷，深受希腊—土耳其战争以及与战争相伴的驱逐行动与战后移民的影响。在一次短暂的战役之后，德国于 1941 年 4 月 27 日占领了雅典。德军与其意大利和保加利亚盟友一起将希腊整个国家分为三个占领区：最大的部分由意大利管理，几个北部的地区被保加利亚占领，较小的但重要的地区由德国占领——它们 276

是围绕在塞萨洛尼基北部的地区、阿提卡和克里特。在意大利占领区只有13 000名犹太人，在德国占领区有55 000名，且其中绝大部分来自塞萨洛尼基。一直到1943年9月意大利与盟军签订停火协议，并由盟军占领了这个地区，此前德国一直统治着整个希腊——除保加利亚占领区之外。

卓有成就的外交官京特·阿尔滕堡直至1943年11月一直作为帝国在希腊的全权代表行使职权。1942年10月5日，希特勒在东南地区的特别代表赫尔曼·诺伊巴赫获得了与阿尔滕堡平行的，尤其是在经济和财政决策上的权力。他因而获得了"元首在希腊的特别代表"的称号。但他们两人领导的这两个部门最终还是合并了，并由外交官汉斯·格雷费尼茨领导，他于1943年秋天将阿尔滕堡解职，实际上合并后的部门是处在诺伊巴赫的特别控制之下。

希腊的重要意义在于其地理位置。从这里可以很容易窥视英国皇家海军。克里特于1941年5月的最后几天被德国空军部队占领之后，对德军来说，占领马尔他和塞浦路斯就变得指日可待了，随后英国海军和空军将失去他们在东地中海的基地。如果占领塞浦路斯不成功的话，至少德军还可以保住克里特。战争进入转折期后，德军自1942年起将精力集中在了将小岛扩建成军事要塞的工程上，这些工程得用希腊德拉赫马支付，且造价高昂。

从经济角度来看，希腊的烟草作为德国战争道德的兴奋剂具有重要作用。截至1942年春天，希腊已经向德国运送了27万吨烟草。外交部宣告了另外60万吨烟草的到来。这个数量明显超过了德国烟民一年的需求，向帝国国库提供了约25亿帝国马克的烟草税收入。除此之外，全部的矿石，特别是铬金属被运送到德国，其他被运送到德国的物资还有橄榄油和无核葡萄干以及生产降落伞用的蚕丝。希腊运输业的垄断者负责组织这些物资的运输，他们同时也为帝国保安部兼职。

277

早在和平时期希腊的生活物资就全靠进口,但战争切断了所有进口。因为德国人将特别富饶的北部地区划给了保加利亚,并且整个军队"从国家外"得到给养,因此市场很快就发生了动荡。几个月之后货币开始贬值。1942 年中,帝国财政部发出了警告。

帝国财政部长什未林·冯·克罗西克给战争经济部门的同事写了一封长达十页的信,主题是"为了保证战争经济的最优化,有目的地对德国以外地区的财政经济关系进行干预",并以希腊为例进行了说明。他描述了以闪电战为基础设计的财政和占领政策的危险后果:"通货膨胀会使整个国民经济土崩瓦解。通货膨胀一方面使生产出现严重的倒退,另一方面又要尽可能保留所有的物资(比如罗马尼亚农民的粮食情况),通货膨胀最终会使相关国家的经济计划化为泡影。"

7 月,墨索里尼将他的焦虑告诉了希特勒,因为希腊"面临着财政上以及经济上、政治上的灾难"。9 月,帝国财政部长再次警告货币体系即将崩溃。如果人们任由这种情况发展下去,"那么不仅是希腊的经济将要崩溃",甚至占领军的每一个"普通的购买货物和获得服务的可能性"都将丧失殆尽,因而"在那里完成战争所需的任务将变得十分困难"。最终,希腊的工人、官员和职员将爆发大规模的罢工。在罗马以及在柏林的人要明白,"我们必须采取行动"。9 月上旬,鉴于希腊"令人无法容忍的购买力下降",希特勒下令"立即查明主要原因"。元首的命令无非来自其身后的专业人士的建议。 278

通货膨胀的迅猛发生,其原因也在于这个国家整体经济规模的弱小,缺乏常规性的财政管理,并且他们重要的收入来源——商船贸易,也因为战争而瘫痪了。最主要的原因当然是因为德国和(不那么全面的)意大利占领势力双重的、不加合作的掠夺。根据 1941 年希腊军事经济组织的报告,他们需要"希腊实际收入的 40%"。一年之后,"占领

费用和国家支出几乎占了实际国民收入的90%”。

进一步的货币贬值使农产品从其常规的、贸易价格受到控制的市场上消失了,又重新出现在了黑市上。这影响了农业生产。1941/42年就已经在较贫穷的希腊城市居民中出现了饥荒。戈林评论道:“我们不能对希腊的饥民抱有太多的同情。将有更多的人会饱尝饥饿之苦,这是一种不幸。”报纸的报道也是同样的轻描淡写:“上千个孩子死了,街道成了他们的坟墓。孩子们在大街上的垃圾堆中寻找残留的食物,父母们向官方机构隐瞒他们孩子死亡的消息,母亲在晚上悄悄地把他们死去的孩子丢进公墓的围墙,这一切仅仅是为了让他们的食品配给卡仍然能够给生存者使用。”

尽管德国的政客试图掩盖战争中的这一页,但他们还是要面对自279 己军队的“困境”。他们用德拉赫马支付的军饷很快就“丧失了购买力”。士兵们小声抱怨,很多人开始变卖军事物资,以便在黑市上购买其他生活用品。1942年1月,在一次对士兵私人书信的检查中发现,将近“60%的信”提及,他们是怎么样获得物品和资金的,“从而用他们交换或出卖得来的收入购买价格高好多倍的生活用品”。

鉴于经济局势的恶化,1942年10月初,希特勒任命赫尔曼·诺伊巴赫为驻希腊的帝国特使。一般来说,德国只会在必要时才会进行短期干涉,此次任命是“因为他们预计到1943年在地中海地区将会有一个新的军事和政治状况出现”,而这一状况显然对德国有利。墨索里尼同样也为意大利占领区任命了一位特使达戈斯蒂诺,他是具有高级头衔的银行主管和资本重组专家。经过之前在罗马的一次商议后,他与诺伊巴赫于1942年10月24日在雅典会晤。之后的几天时间里,他们对“轴心国部队在希腊市场上的购买行为进行了限制”,“暂时性地停止了所有来自希腊的食品出口”,并“鼓励向希腊运送食品”。他们还

进一步拒绝了“迅速改善向大众供应食用油的要求”和——对下面的行动步骤来说也是十分重要的——临时停止向占领军支付费用。

诺伊巴赫保证“以各个阶层都能承受得起的价格”,供应“居民们必需的生活用品”。紧缩通货政策的意义就在于紧缩信贷,废除那些没有作用的价格条款,使自由市场上的价格能有些许下调。除此之外,一部希腊的法律强制股份有限公司增加20%的资金——这样,公民拥有的流动资金就全部进了国家账户。在生产方面,任何人都负有劳动义务。 280

为了实现他的诺言,诺伊巴赫推行了各种各样非同寻常的措施。他让被占领的塞尔维亚运送食品,也成功地强制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运送食品。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德国统治集团的稳定使新的特使如愿以偿,他说服了国际红十字会,并在英国的同意下,在瑞典和瑞士的支持下向希腊运送资助物资。很快,瑞典的船队就经常性地满载着小麦开进了希腊的港口。诺伊巴赫也在德国为希腊购买了价值800万帝国马克的糖和土豆。他把德拉赫马的收益留给了军队。不久之后,帝国财政部将费用提高了320万帝国马克。什未林·冯·克罗西克更是批准了430万帝国马克用来扩建具有重大经济战略意义的道路,当然这些钱不再由这个国家来出。尽管诺伊巴赫没有减少德国士兵们的收入,但是他们不能再让家里汇钱;不久之后他们的一半军饷用德拉赫马支付,而另一半则用所谓的餐券,即不能在市场上流通的、只能在随军商店使用的货币替代物来支付。

因为“从任何地方,如德国、意大利或者第三方国家弄来物资满足军队的需要”这个决定也属于诺伊巴赫对希腊的干涉,因此,从即将开始的对塞萨洛尼基犹太财产的没收中我们可以理解:那时候装载着物资的货车开往希腊,但却是空着回来——不考虑偶然装载的铬矿和烟草。运送物资与没收希腊犹太人财产并不冲突。

281

塞萨洛尼基的犹太人

总体来说,诺伊巴赫的干涉对德拉赫马的相对稳定是有贡献的。然而这些措施中还包括了伴随着这位驻希腊全权特使进行干涉的犹太区划分、犹太人财产的征用和没收。占领军政府在希腊采取的行动是罕见的,因而驱逐犹太人和对抗通货膨胀两者之间的联系远远不足以作为例子来说明。第一个证据,我们可以从外交部处理"犹太问题"的法律委员会委员埃贝哈德·冯·塔登的旅行账单上找到。当诺伊巴赫获得"元首关于稳定希腊经济关系的特别授权"后,冯·塔登就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到了雅典。外交部相当保密地告诉帝国银行,"一位法律委员将陪同诺伊巴赫特使前往"。冯·塔登是专为"解决犹太问题"的。

之后的几个月,冯·塔登多次往返于雅典、布加勒斯特、罗马、维也纳和柏林之间:"上述地方"都出现在了冯·塔登的旅行费用账单中。他"将以在希腊的帝国特使行动的利益为指针,在各地进行协调"。可见,特使的行为与犹太问题专员的行为从头一天起在本质上就是相连的。

塔登旅行的日期尤其耐人寻味。1942 年 10 月 19 日至 21 日,诺伊巴赫在罗马与意大利外交部长进行会谈,23 日抵达雅典,并于 24 日在那里发表了第一次公开的官方声明。冯·塔登 10 月 18 日从柏林出发飞往罗马,同样在 23 日乘坐飞机抵达雅典。然后他在希腊待到 11 月 30 日,中间在罗马作过短期停留。11 月 11 日,冯·塔登从柏林飞往诺

282 伊巴赫的常驻地布加勒斯特,从那里再到雅典并于 22 日返回柏林。

1943 年 2 月 4 日至 8 日,他坐着卧铺火车到了“主要营地”。这里指的是希特勒的老巢狼穴。

费力克斯·哈特劳布在他的战争日记中记录了在那里达成的商谈结果。这次会晤关系到军队在希腊的钱款需求,以及由此产生的一方面是军队指挥部另一方面是诺伊巴赫和阿尔滕堡之间的问题。“为了弄清这个问题,2 月 5 日在外交部和军队的代表之间进行了一次会谈。这次会谈确定,军队每月获得 203 亿德拉赫马,免除军队 180 亿的债务,并且这些钱将被用来继续进行扩建项目。”

诺伊巴赫和冯·塔登参加了会晤。诺伊巴赫答应由他批准的军队支出可以用德拉赫马支付。就在几个星期前,他还向希腊政府保证,“放弃”收缴占领费用。诺伊巴赫这两个许诺存在的明显矛盾,说明了外交部的犹太问题专员出席此次重要商谈的原因。

答应军队每月的 200 亿德拉赫马相当于当时英国的 140 000 黄金英镑[1]。萨洛尼基的犹太人总共被剥夺了大约价值 170 万黄金英镑的黄金,这些我们在后面还要讲到。1942 年 10 月,德国开始在诺伊巴赫的掌控下对塞萨洛尼基的犹太人财产进行大规模的没收行动。1943 年 1 月 3 日,艾希曼的代表罗尔夫·京特飞往塞萨洛尼基,同时外交部副国务秘书路德给在雅典的阿尔滕堡写信道:“京特明显将与他一起行动。”1943 年 1 月 26 日,阿尔滕堡将没收计划全盘告诉了希腊总理康斯坦丁诺斯·洛戈塞托普洛斯。这位富有经验的外交官记得总理回答说:“不会有问题的。” 283

1943 年 1 月初,艾希曼向他的同事迪特尔·维斯利策尼就他现在的任务进行了描述,“与在马其顿的德国军事政府联合起来解决塞萨洛

① 1816 年起金本位下的英镑的非正式名称。——译注

尼基的犹太问题”。一个月后，维斯利策尼和作为艾希曼使者的阿洛伊斯·布伦纳抵达塞萨洛尼基。1943 年 2 月 6 日，在当地军事政府负责的军官马克斯·默滕要求犹太人佩戴星形标志，并划分了犹太区，然后对出入交通工具进行了封锁。1943 年 3 月 15 日开始没收塞萨洛尼基犹太人的财产，并且“整个行动”应当“在大约六个星期的时间内完成”，这一目标几乎实现了。这次行动，总共有 43 850 名犹太人被赶出塞萨洛尼基，还有 2134 人被赶出附近被德国占领的地区；几千人逃往意大利占领区。3 月 16 日，维斯利策尼必须按照阿尔滕堡的要求，向希腊总理洛戈塞托普洛斯“就反犹太主义行动作一个报告”。然而这只是关于这次报告的德国版本，根据这个版本，“他把总理完全地说服了，并打消了他的疑虑”。在这段至关重要的时期内，冯·塔登从 3 月 2 日至 4 月 4 日也逗留在希腊。

从 3 月 1 日开始，所有的犹太家庭被要求为了所谓的统计的目的对其全部的财产进行申报。相关人必须使用德语和希腊语填写表格，并把除了所有其他实物以外的资产列在标题“f) 黄金、贵金属、外汇和首饰”下面。3 月 8 日，希腊政府建立了“管理犹太财产的机构”，由法官埃利亚斯·杜罗斯领导。这个部门最初隶属于德国军事政府，后来隶属于希腊财政部，由部门主管马夫拉加尼斯进行监督。购买了犹太财产的希腊人必须将货款存入希腊国家银行塞萨洛尼基分行的第 707 号账户。德国方面由检查员埃贝哈德·库恩进行监督，并注意“优待那些以任何方式表达其对德国的友善或者向德国提供了各种服务的希腊人”。

284

这一机构将部分的房子和动产分配给了那些从希腊北部被保加利亚占领地区驱逐的和逃跑过来的希腊人。拆毁塞萨洛尼基古老的、坐落于市中心的犹太公墓，也属于没收犹太人、犹太协会和宗教机构的财产的行动。357 796 平方米大小的场地在最短的时间内就成了建筑用

地，并被划分成小块出售了。就连墓碑也被低价变卖。

如同在希特勒德国的其他被占领国和附庸国一样，军队抢夺财产的暴力行动的目的只有一个：利用发行银行集中账户的出卖收益获得的贷方凭证，使得因为德国贪财而引发通货膨胀的货币变得稳定。这些特别的收入减轻了印制纸币的压力。出卖犹太人财产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因物资匮乏而导致的购买力下降。在短时间内，这种财产的转变形式给买受人以及国家账户带来的好处是很小的。因为这个程序太过迟缓。但是诺伊巴赫需要并获得了快速的结果。军队征用塞萨洛尼基的黄金，其结果是明显的并被证明是好的。从这个角度来看，诺伊巴赫为了稳定希腊财政而进行干涉与将 46 000 人赶往奥斯威辛集中营，两者之间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

2000 年，塞萨洛尼基犹太大会主席海因茨·库尼奥对曾经决定这个城市命运的军官马克斯·默滕作了如下评价："默滕是当时这个城市最有权力的人。他对我们说：'金条就是税收！'"犹太人在被驱赶到奥斯威辛之前，被关押在一个临时仓库里。"在那里他们必须把所有的东西交出来，尤其是首饰和所有含金物。首饰当时就不翼而飞，被默滕和他的同伙中饱私囊了。"同样在 2000 年，塞萨洛尼基犹太教会主席安德烈亚斯·塞菲哈斯也讲述了相似的事情："我自己就交了 1000 黄金英镑，希望我的父亲能从军队的劳教所里放出来。" 285

1942 年 10 月 17 日，默滕就已经从犹太祭祀教区那里拿了10 000 黄金英镑，这些钱是为了将犹太人从强迫劳动中解放出来而支付的。黄金在诺伊巴赫到达希腊之前的几天就已经被征收了；然而 10 月 21 日，他在罗马面对希腊财政部长减少占领军费的要求时解释说，从他这里开始就会采取一系列的行动了。实际上，10 月 15 日他就发布了命令，要求迅速并有效地减少军队的开支。

直到 7 月，默滕才将数千个被强迫劳动的犹太人释放出来，并安排

他们到机场和道路建设工地、铁轨制造厂以及矿场去工作。这些工作由托德组织进行管理;他们需要那些被征用来强制劳动的犹太人,因为通货膨胀使他们没有能力支付那些希腊普通工人的工资。由于缺少宿营地,“大部分的人只能睡在露天”,而且也没有足够的食物,所以“相当多的人死于肺炎”。因为工作的无效率,1942 年 10 月 17 日,默滕再次废除了强制工作义务,取而代之的是用赎金来替代劳动义务,但赎金得用黄金支付。尽管存在通货膨胀,但是他可以把黄金储备起来,某天按照现时的利率卖给交易所,然后再将这些钱付给那些必须支付工钱的工人。

当默滕成功地强迫犹太劳工缴纳黄金后,他于 11 月初向犹太教区主席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他们直接向德国军队支付 35 亿德拉赫马。后来虽然他把数目减少到了 25 亿,但是他强调必须用黄金支付。根据由 286 他签字的与犹太教区达成的口述和约,这笔费用以每期 5000 黄金英镑的形式分期付款,直到 1942 年 12 月 15 日付完。

1942 年 11 月至 12 月,军队总共要求塞萨洛尼基的犹太人支付下一期的费用 25 000 黄金英镑,根据希腊国家银行德国委员保罗·哈恩的说明,相当于 50 万帝国马克。这些黄金如同前文所述被卖给了交易所,变成纸币然后支付德国士兵的薪水或者支付给那些在军队里领工资的希腊工人。托德组织 1943 年 1 月 11 日的建筑报告中说:“如同我已经说过的,塞萨洛尼基的艾加爱斯区答应,当他们从犹太人祭祀教区获得足够多的钱的时候,会支付我们 5 亿德拉赫马,但是他们无法就此给出一个确切的时间。”根据默滕自己的说法,他利用出卖塞萨洛尼基犹太公墓的收入来给为德军提供服务的工人发工资。为了 1942 年底希腊北部的铬矿场周围的道路建设,1943 年帝国经济部命令,“从当时尚不为人所知的来源筹集工资款。就像后来大家都知道的那样,这些钱来自对希腊犹太财产的掠夺”。

我们都还记得,10 月 24 日诺伊巴赫抵达雅典之后,马上向希腊政府作出了立即减少占领费用的承诺。这很好地解释了默滕为什么在塞萨洛尼基向犹太人征收黄金。因为用这种方式两个目的都达到了:希腊只要支付部分的占领费用,而军队从犹太人那里获得其余的钱。这种强制交付与德国(1938)、法国(1941)或者罗马尼亚(1942)的犹太人捐献,斯洛伐克(1941)、保加利亚(1942)的犹太财产缴纳或者在与德国仍属同盟的匈牙利出现的特别费是一致的——匈牙利在 1942 年宣布,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欠下的犹太人的借款全部作废。因为希腊特殊 287 的货币形势,捐献费必须用黄金支付。

第一次抢夺之后,1943 年 3 月开始了大规模的犹太区化。艾希曼的同事布伦纳、维斯利策尼以及他们的手下借助间谍刺探和刑讯逼供,让那些手无寸铁的人说出了他们首饰和黄金藏匿的地方。所以"坐落在韦利萨里欧路上的金库,装满了阿里巴巴的宝藏",如同米夏埃尔·莫尔霍在报告中所述:"桌子上堆满了各种式样和大小不一的镶嵌着钻石和宝石的戒指,各种款式的胸针、军功章、手镯、金链、订婚戒指,各种表,根据图案和年代分类的硬币,美元和加(拿大)币、英镑、瑞士法郎等等。在地上堆满了花瓶、中国瓷器以及其他稀有物品和堆积如山的地毯。房间里堆满的财宝即使凭借大仲马的想象力,他的基督山伯爵也从没有见过这些。"

根据 1950 年代塞萨洛尼基犹太教区的统计,这个城市的犹太人以这种方式一共被掠夺了价值 1.3 亿帝国马克的黄金和首饰。如果转化成黄金相当于 46 吨。根据约瑟夫·内哈马 1946 年 4 月 2 日作出的保守统计,德国从希腊的犹太人手里一共掠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超过 12 吨纯金"。根据 1948 年世界犹太大会更为精确的统计,被抢走的黄金经小心估计("最保守的估计")都有 170 万黄金英镑。

因为韦利萨里欧路国库里面不仅有黄金,还有其他值钱的东西,所以被抢夺的价值肯定要远远高于这些统计数字。其中的一部分物品很有可能被卖给了希腊换成黄金。但我仍然采纳最低的数额为 12 吨的
288 估计。支持我的观点的是德国的统计,这在后面会讲到。根据 1944 年希腊国家银行列出的单子,1942 年 6 月的占领费用换算成黄金英镑为 250 000。如果把这笔数目作为军队下面 12 个月的平均需求的话,那么希腊在这段时间内必须支付整整 300 万黄金英镑作为占领费用。实际上,根据希腊国家银行的说法,只向德国支付了价值为 126 万黄金英镑的德拉赫马。这就是说,还剩下 174 万黄金英镑,这些钱是为了支付在希腊的军队的不断支出的。这几乎与 1948 年世界犹太大会计算出来的数额相符。

一直到驱逐行动发生后的几个星期之后,即 1943 年 6 月 15 日,默滕才发布命令,要求将"所有在塞萨洛尼基—爱琴地区找到的和仍然在这个地区的全部犹太财产转交给由马其顿总督代表的希腊国"。根据 1964 年默滕的证词,这些黄金仍在德国人手中。据此,帝国全权特使阿尔滕堡下令将黄金都运送到雅典的德国使馆。一般情况下会更为准确的维斯利策尼的证词也将这批黄金指向雅典方向。据此,默滕把"黄金和首饰以及首饰等价物等存进了希腊的银行"。根据维斯利策尼的证词,即使是现金——大约 2.8 亿德拉赫马——也首先"进了希腊银行中的一个集中账户",然后到了军方的手里。这两份战后的证词都与同时代的艾希曼的同僚洪舍的证词相符合。存在争议的是为了偿还塞萨洛尼基的运送开支而将 46 000 人赶往奥斯威辛集中营涉及到的 1 938 488帝国马克,洪舍坚定地认为,"那些被没收的犹太财产"不是到了党卫军的手里,而是到了驻塞萨洛尼基的国防军统帅部的手里。

289 保守估计,德军负责人很可能将一小部分贵金属运送到了维也纳。

可能运的是白金,这是工业急需的;也有人觉得是银,这些是德国繁荣的电影业急需的。我没有找到德国有关这方面的文献,但是,雅克·施特龙萨——他和他的家人必须在1943年4月30日前往奥斯威辛——在他的自传中写道:在一个临时停靠点,"大概在维也纳附近的一个小火车站,门突然被打开了"。阿洛伊斯·布伦纳向施特龙萨和他的兄弟招手,示意他们出来。"他命令我们到一节普通的火车车厢中去,将一只很重的木箱子搬到火车站的大门那边去,然后是第二只箱子,也一样的重。"然后火车立即开走了。

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塞萨洛尼基的大部分黄金要被运送到雅典。我的论点是,这样做是为了将陷入通货膨胀的德拉赫马——在希腊财政部和国家银行的同意下——稳定到1943年8月。证据是三份履历表:货币政策干涉之初,法兰西银行的德国委员卡尔·舍费尔于1942年10月至1943年2月被派往雅典,隶属于哈恩。这个人具有在法国积累的调控通货膨胀的相关经验。1月,国家银行的管理者被迫退职;他被更愿意与德国合作的人代替,最为突出的是银行的副总裁哈德基里亚科斯。即便如此,诺伊巴赫还是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了一位财政负责人:赫克托·齐罗尼科斯,"他对德国的友好使他可以战胜任何疑虑"。很快,诺伊巴赫把这个人转交给了社会、健康、经济、劳动和农业经济部。这个人"拥有特使的完全信任"。

我认为,在齐罗尼科斯和哈德基里亚科斯的同意下,希腊的经纪人将那些从塞萨洛尼基犹太人那里掠夺来的黄金卖给了雅典的交易所。他们从那里获得了大量的德拉赫马纸币,用这笔钱他们就可以跟军队把军费结清。这样,通货膨胀可以在几个月内停止,或至少减缓并且价格水平能保持稳定。通过这次交易,被谋杀的塞萨洛尼基犹太人的黄 290

金绝大部分都到了希腊商人和投机者的手里。同时,德国用当日汇率获得的德拉赫马购买希腊的物品和服务,并给德国士兵发放军饷。为了证明这个论点,就必须列举出一系列的证据。我们以 1943 年下半年帝国银行向希腊运送黄金的讨论和决议开始。

雅典交易所的黄金

1943 年 6 月中旬,戈林的代表、部长格拉姆施在"希腊职能部门商谈会"中说,他认为"这个时候为了在希腊获得利益而投入黄金和外汇是不合时宜的"。与会的诺伊巴赫保留了自己的观点:"在以后的、现在还没有决定的发展过程中,必要时可以再回到这个问题上来。"1943 年 9 月,自上一年 12 月开始有些稳定的货币形势又开始迅速恶化。10 月 5 日,格雷费尼茨给诺伊巴赫打电话,请求有关黄金的明确指示:"为了使干涉能够产生效果,也许暂时让与更多的资金更有利。"需要说明的是所谓"更多的资金",因为按照后来的保护理论,此前并没有投入任何黄金。作为暂时稳定德拉赫马的支持措施,在"外交部东南地区特使的同意下",国防军统帅部对 8000 名雅典犹太人的财产进行了没收并且交由希腊政府进行管理。

291

最初,柏林并没有投入任何黄金,于是通货膨胀进一步加剧。对此最好的证据就是德国士兵军饷不够的呼声。1943 年 11 月 13 日,东南地区空军司令部向戈林的副官发电报说:"德国士兵发现,这里的食品涨价了,他们买不起。并且那些用于购买的钱被非法扣留了。就像 11 月 11 日那次一样偶然的增加军饷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他们希望最迟在圣诞节以前,那些因为战争在本国比希腊公民遭受更多损失的人能获得一些食品。因为他们买不起,最恶劣的黑市交易就成了必然的结

果。”戈林要求采取“有效的措施”，达到使他的人至少能“在圣诞节向家里寄送礼物”的目的。

在戈林了解士兵们的抱怨的前几天，即1943年11月8日，在一次希腊职能部门的商谈会上，诺伊巴赫现场听取了由最高层面的长官所作的形势分析。与会的有帝国经济部长、帝国财政部长、帝国银行主管业务的董事长和戈林派遣的亲信格拉姆施。为了稳定货币，会上又制订了一系列应对方案，其中包括1943年已在罗马尼亚实施过的“帝国黄金介入法”。实际上从这个时候开始，德意志帝国银行已经开始通过其维也纳分行，规律性地通过飞机向雅典运送黄金，总量超过8吨。通过出售这些黄金，通货膨胀的德拉赫马大致稳定了下来。

这些发生在11月8日商谈的十天之后。价格上涨得到了遏制，军需官得到命令：“附期限推迟非必须的购买活动。”这些节省下来的钱被发放给那些不满的士兵，增加他们12月的军饷。通货膨胀并没有停 292 止，但是却减慢了速度。诺伊巴赫虚伪地允诺，虽然希腊必须先预付一部分费用，但这些费用最终将会“从占领费用中扣除”。实际上他后来很少再提及，他的承诺“太笼统（没有说明扣除的时间，没有规定利息）”，所以帝国没有受到“多余义务”的威胁。在德国统治末期，物价涨幅据说达到了5 500 000%。

尽管超级通货膨胀导致了1984年夏德拉赫马的崩溃，监控希腊发行银行的帝国银行经理保罗·哈恩还是在他的总结报告中说，他成功地“在最大限度内维持了德拉赫马的支付功能”，这些“对德军来说关系到他们的生存，具有重大意义”。

1945年后，相关负责人毫无顾忌地对他的黄金行动自鸣得意，认为自己是真正的人类之友。“[1943年]11月中旬我开始，”诺伊巴赫写道，“在雅典交易所进行黄金交易。……希腊人非常惊讶，没有人会想到德国在市场上抛售黄金。”哈恩也同样歌颂自己：希腊人把“来自

于德国占领军的大量黄金的涌入”当做政治手段，这种手段有效揭露了“以前外国的财政援助措施的真面目”——这里指的是英国。这在“希腊的经济和财政界得到了重视和尊敬”。

希腊财政界作为中介买卖雅典和塞萨洛尼基交易所的黄金，一小部分交易也在帕特雷进行。根据哈恩的说法，这些黄金被存放在可靠的希腊经纪人那里，“绕开希腊银行”进行交易。

293　1944/45 年冬天，保罗·哈恩在他的总结报告中，对他在希腊银行作为德国银行委员三年来的业绩作了描述。1957 年，他对报告的形式稍加修改就出版了。其中一节详细讲述了黄金行动。如果人们翻阅一下哈恩对黄金行动起始时间所做的表格的话，就会发现：行动并不是像哈恩在文章中叙述的和一些研究者根据他的描述所认为的那样开始于 1943 年 11 月 18 日，而是开始于 1943 年 2 月 4 日。此外，哈恩还将黄金行动的开始分为两部分来写。其中第二部分包括了事实上从 11 月开始进行的行动。这时涉及的是那些从帝国银行向雅典“运送”的黄金（帝国银行在这段时间几乎用的全是抢夺来的黄金）。

如同哈恩在第一部分中指出的一样，系统的以黄金换取货币支撑开始于 1943 年 2 月 4 日并一直持续到 1943 年 9 月 21 日——从 5 月开始每个月的数额就减少了。对于这第一个阶段，哈恩含糊地说，它与柏林和维也纳“列在单子上的任务”一致，并且黄金运输是从雅典“开始”的。但它并没有像第二个标题那样说是从“柏林的帝国总行……向雅典”运送的。黄金的来源一直不为人知。对哈恩报告第一个草稿复读时就发现了明显的不一致。他把时间圈定在 1943 年 2 月至 9 月，令人充满疑问地把“1944 年”搁置一旁。

但是哈恩在他后来的版本中保留了这个部分。他那值得研究的报告和其他总括性的对 11 月 18 日之前出卖黄金事件的否认让人不得不

猜想,哈恩在第一个清单中谈及的黄金来自于塞萨洛尼基的犹太人财产。帝国银行从 1943 年 11 月开始合计运送了 324 000 黄金英镑和 5 112 570黄金法郎的黄金,估计之前的黄金数额明显更高。在被引用的清单中,哈恩在 1943 年 2 月至 9 月间记录了 455 000 黄金英镑和 9 340 290黄金法郎。根据总结报告,帝国银行"一共运送了价值 2400 万"帝国马克的黄金。如果按每吨黄金 280 万帝国马克计算,总计约 8.6 吨黄金。如果人们把 1943 年 2 月至 9 月运送的黄金数额进行换算的话,德国财政专员之前一共拿出了 12 吨黄金用来支持德拉赫马的稳定。这些黄金是他们在塞萨洛尼基抢夺来的。这个数额与之前引用的内哈马的估算十分接近。除此之外,帝国银行计算得出,自1943年8月开始,大约66%至75%的占领费用都是用黄金支付的。这些黄金来自于德国,不是1943年上半年从塞萨洛尼基运送出去的数额更大的黄金。 295

在从犹太财产中获得的黄金的帮助下,诺伊巴赫和哈恩的干涉行动很快使货币稳定了下来。帝国银行的国民经济学家表示满意:"价格的上涨在本质上被遏制住了。"1943 年 5 月 19 日,1 黄金英镑只相当于 249 000 德拉赫马,到逐渐减弱的干涉政策进行到尾声的时候,则相当于380 000德拉赫马了。忽略一个短暂的高峰,德拉赫马在 1943 年 8 月底的时候超过了其 1942 年 10 月达到过的最高值。对于这几个月,军需官可以报告说,经济局势已经"大幅度地平静下来",并且在 1942 年末已经出现了大规模的价格下跌。诺伊巴赫也配合地把军队对钱的需求减少了三分之一。然而到 1943 年 9 月 21 日,从塞萨洛尼基犹太人那里抢夺来的最后一点黄金也被消耗了,被卖给了希腊的交易所。当用黄金换来的德拉赫马也被军队耗尽了的时候,黄金的价格从 1943 年 9 月 21 日的474 000 德拉赫马增长到了 1943 年 11 月 17 日 1 900 000 德拉赫马。当帝国银行向其运送了第一批黄金后,11 月 24 日金价又短时间地下降到了 900 000 德拉赫马。

296 与哈恩在表格中对 1943 年 2 月至 9 月发生的经常性的黄金干涉措施作说明而在整个报告中否认了这部分内容相反，诺伊巴赫在他的回忆录中对此完全避而不提，并在事件发生时就极其谨慎地对此作评价。一封没有公开的由帝国财政部部级主管弗里茨·贝格尔于 1943 年 4 月末关于"希腊驻军经费问题"而写的快件信证明了这一点。他气愤地指责诺伊巴赫从 1942 年 12 月 1 日起将希腊的占领军费减少了不止七分之六。这是"往死胡同里赶"，最后这些费用都会转嫁到德国来。比这封信更有趣的是答复。东南地区总指挥部的军需总长在三个星期后通过电话得到了答复并注意到："通过特使与柏林的主管机构之间的商议，我们发现这封信过时了。"很明显，帝国财政部在此期间被告知，诺伊巴赫考虑到了希腊国家账户采取这种措施的背景和——作为最高机密的内容只通过电话转告的——技术，要求军队用从塞萨洛尼基犹太人那里获得的黄金来支持其财政。1943 年 7 月 15 日贝格尔公开承认："军队全部重要的需求诺伊巴赫都满足了，那些抱怨是没有事实基础的，是不公正的。"

连这种需求诺伊巴赫也是通过向雅典交易所出售黄金来满足的。1943 年 7 月，雅典经济司令部的军官们注意到："直到 6 月底由于投机买卖，黄金英镑的汇率上升到了 540 000 德拉赫马。特使诺伊巴赫将在短期内到达雅典的消息就使汇率下降到了 400 000 德拉赫马。通过有限的黄金出卖汇率又降低到了 340 000 德拉赫马。"仅仅是希特勒的特使到达这样一个消息就能使汇率下降，说明 1943 年 7 月交易所已经 297 为这种形式的干预行动作好了准备。实际上那个时候已经进行新的干预行动了。诺伊巴赫在他的回忆录中也叙述了这段历史，只不过他把这段历史搬到了官方的"黄金行动"年代去了。

德国—希腊的沉默

根据这些线索我们可以得出下面这样一个顺序:从 1942 年 10 月到 1943 年 9 月,德国暗地里用那些从塞萨洛尼基犹太人那里抢夺来的黄金支撑着德拉赫马——在希腊财政部长、发行银行和一些“忠诚的经纪人”的帮助下。他们以此直接给德军提供财政资金。“黄金行动的意义在于,”诺伊巴赫回忆道,“大量收购来的纸币被用来满足占领开支,以此减轻纸币的压力。”所以希腊的货币尽管受到严重的通货膨胀影响,但仍作为支付手段维持着。希腊国家财政也间接地减轻了占领费用带来的压力。

没收犹太人财产也直接满足了驻塞萨洛尼基军队的财政需要。如同德国银行委员哈恩所说的那样,“黄金行动”的主要目的是“供应军队所需要的现金”。因为这个行动——至今仍被德国和希腊方面的负责人隐瞒着——所用到的至少五分之三的黄金来自希腊犹太人,所以一场直接的以占领者利益为目的的、在简单的证券交易遮掩下的对被占领国公民进行财产没收的行动开始了。

1957 年哈恩撰写的回忆录中证实了这一显著的违法行为。他在结束语中写道:“所有用黄金进行干预的措施都掌握在银行委员会手中,他们还随心所欲地对黄金储备进行管理。”——也就是塞萨洛尼基犹太人的黄金。根据德军的说法,施行黄金行动期间,占领军费的“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可以通过黄金收益得到满足”。这个比例与非官方黄金行动的第一个时期是一样的,只不过那时用的是 46 000 名后来几乎全部被杀死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希腊北部犹太人储蓄的黄金而已。 298

德国和希腊参与此事的人无须再为了相互的利益而否认此事,因

为这件事情是如此保密,以至于战后没有人会再过问。相反,公众几十年来一直相信一个强盗讲的故事,即1957年默滕在一所希腊的监狱短暂服刑期间告诉一个狱友的。之后默滕还多次提到塞萨洛尼基犹太人埋藏在海底的"尼伯龙根的黄金"。很明显,他为他那个根据诺伊巴赫、哈恩和阿尔滕堡的国防战略而进行的伪装也获得了西蒙·维森塔尔的帮助。他于1971年向一个维也纳法庭要求"为他帮助找到德军二战中从希腊抢走的黄金和白金而支付他100 000马克的回扣"。被告可能是希腊的代表人,他获得了法庭的支持,于是法庭宣布"维森塔尔的证词是没有价值的"。一直到2000年默滕留下的假线索还被人当真。那时候专业的潜水员在伯罗奔尼撒西南角寻找默滕所谓的沉没的渔船,这个渔船上有"塞萨洛尼基犹太人的珍宝"。甚至很快就产生了一个极具争议性的问题:如果渔船在内海或是公海水域内被发现的话,财宝将属于谁?和这个故事相同的还有2000年8月被BBC和CNN广为宣传的"价值高达20亿美元"的财富。

战后很久,人们本应能从雅典财政圈人士口中得知1942年和1943年消失的犹太人黄金的去向。它们既没有被埋藏也没有被运送到德国。实际上,它们绝大部分都留在希腊并通过转手变更了主人。1998年希腊外交部出版了关于财富去向的名为《关于希腊犹太人财富历史的档案》一书。这本书的内容来自于外交部从1944年才开始作的记录。

如果该书的素材来自财政部、国家银行和重要的合谋部门的办公室文件,结果将会怎样?如果最终1942/43年没收犹太人财产的总决议,包括希腊政府成员为了稳定德拉赫马与高级官员哈恩、舍费尔、诺伊巴赫和阿尔滕堡订立的全部协议都公之于众的话,结果又会是怎样?

由于赫尔曼·诺伊巴赫的辞世,1960年7月18日的《法兰克福汇报》出版了历史学家佩尔西·恩斯特·施拉姆以读者身份写来的信。

他在标题“回忆诺伊巴赫博士”之下写道:“现在的世界比以前更穷困,是因为我们中的一个人去了,他虽然与纳粹狼狈为奸,但却没有放弃自己的人格,甚至在最艰难的情况下捍卫了它,并在最后还找到机会证明自己确实是有用之才。”

从罗得岛到奥斯威辛

就在大部分德军从希腊撤军之前的几个星期,1673 名罗得岛犹太人和相邻的科斯岛的 94 名犹太人被驱逐了出来,并被强迫坐船经过比雷埃夫斯。这次可怕的旅行从 1944 年 7 月 24 日开始一直到 8 月 16 日结束于奥斯威辛。如果谁读了犹太人从标准化劳工到大屠杀的悲惨经历,就会经常发现——但不是从劳尔·希尔贝格那里——相同的概括性说明:恰恰是这种行为证明了丧心病狂的种族歧视,它使德国士兵硕果仅存的安全利益和撤退利益也丧失殆尽了。

“在某个时候,”比如哈根·弗莱舍尔在由沃尔夫冈·本茨出版的书籍《大屠杀的规模》中写道,“当红军准备将东南方向的轴心国占领地像推倒多米诺骨牌一样攻陷的时候,E 部队已经作好了第一步撤离准备,强制将值钱的军用物资留在希腊半岛上,但这个注定要超载的车队不愿放弃哪怕最小存储空间的斤斤计较的做法,却成了每一次战略布局的大忌。”莱亚·罗什和埃贝哈德·耶克尔认为,德国权力集团于 1944 年 7 月在这一点上的做法说明了“纳粹的荒谬”。 300

前述事例可以代表主流的观点,但在军队史实和决策中,人们找不到佐证。首先用小的船只然后用货车将超过 1750 名犹太人加以驱逐的行动,并没有与军队的其他必要物资的运输产生冲突。更确切地说,驱逐行动存在着军事上的利益。这些将在下面几页中讲到。

罗得岛当时在国际法上属于意大利十二群岛中的一部分，拥有45 000居民。德国是在意大利1943年9月倒戈之后占领该岛的。意大利在当地的管理仍被保留下来，对德军的财政补给由意大利银行在当地的支行负责管理。1944年5月10日，已经相当孤立的罗得岛突击师的指挥官接到拥有东爱琴海地区最高军事头衔的威廉·凯特尔的指令。同时发出的驻防指示对于岛上军需官的角色作了如下说明：“他负责军事上的管理，特别是为了三个部队的需求包括对金钱的需求对整个岛屿进行利用。军需官在专业上从属于希腊驻军总司令部。”

6月初，克里特的司令员向希特勒报告，如果要这个岛上的贮备“满足四个月的需求”，只需要提供每个月1500吨的供给。因为希特勒希望库存有六个月，因而每个月必须从比雷埃夫斯向克雷里特岛通过船只运送6000吨物资。罗得岛的境况与此相似，这个岛也被视为“坚固防区”。同时绝大部分德国军队从爱琴海地区迁出来了（如同那些德军领导人说的那样，是暂时的）。

301

6月下旬，克里特和罗得岛上的军队一共70 000人被切断了所有供给。他们的军事任务就是“在被孤立之后尽最大可能抵抗敌人，通过自我牺牲的方式赢得时间并牵扯敌方力量”。很显然，这需要数周的时间尝试将食品、货车、武器和军火通过船只运送过去。倘若成功了，运送船只就可以在8月28日之前空着开回比雷埃夫斯。然而缺少燃料，再加上英国战斗轰炸机和潜艇的优势力量以及对比雷埃夫斯、塞萨洛尼基港口的严重空袭，这一切使可能的物资运送越发艰难。短暂的而且经常月光明亮的夜晚也并没有使运输行动变得简单些。克里特大约300名犹太人在6月8日被赶向了比雷埃夫斯并且与将近200名其余被囚禁者一同溺水身亡，因为运送犹太人的船只在敌军的袭击下沉没了。

7 月的头几个星期,爱琴海海运主管就从希腊西部港口调出了船只,"为了向十二群岛进行紧急补给"。此外6 月中旬到7 月10 日又通过船只向克里特运送了4000 吨物资,向罗得岛运送了5000 吨;之后又有几次给前哨部队的供给。7 月16 日至31 日之间,罗得岛和科斯岛的犹太人也被驱赶到了比雷埃夫斯,(在雷欧斯岛旁边的)波多拉戈岛海运总局局长在工作日志中记录道,关键词为"全部运输"。"1)陆地补给:1599 吨,4 卡车,14.7 厘米的包裹,2 名士兵。2)向陆地运送:216 吨,1750 名犹太人。"(对运输具体数字的说明在下面的论述中总是会有一些偏差,这是由于运输过程中的伤亡和每次计算时的不精确造成的。) 302

7 月31 日,希腊总军需官维尔纳·克斯滕博士要求将修理"对岛内物资供应不可或缺的船只"列入紧急计划之内;8 月,3626 吨补给物资运送到了十二群岛,其中大部分是运送给罗得岛的;1944 年9 月6 日,"佩利坎"号从比雷埃夫斯出发,载着补给物资驶入了罗得岛的港口。所有的船只几乎都空载着驶回了大陆。

一直到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投降,1944 年8 月底,在将罗得岛的犹太人驱逐了一个多月之后,希特勒命令占领了希腊本土的军队撤退。他们必须清理南部地区并据守克基拉岛—约阿尼纳—克拉巴卡—奥林匹斯山一线。那个时候并不存在从希腊带走尽可能多的武器和物资的问题,正如哈根·弗莱舍尔强调的那样。但事实却恰恰相反:由于南北向铁路和公路之间的脆弱衔接地带经常受到游击队的袭击并且要害部位又被炸毁,所以在希腊本土从北到南也存在大规模的补给问题。直到希特勒发布命令,这个命令在8 月27 日作为"具有优先权的军事机密"向希腊各级部队传达后,部队才开始撤退。在距驱逐罗得岛犹太人已经一个多月的现在,命令要求:"空车驶向北部用来运输撤退物资。"请注意,是空车!在希腊特使的总结报告中说的是"运送到德国":因

为数量相对较小所以“没有困难”。后来不少历史学家所说的缺乏运输空间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303 鉴于罗得岛和克里特岛的情况，爱琴海地区统帅部于8月28日下达命令：“对该岛继续进行不间断供应。”然而这道命令只是一纸空文，就像报告中说的那样。几天之后即9月初，希特勒允许部分减少罗得岛和克里特岛的占领军费。鉴于安全原因，供应物资将继续通过飞机运送并持续到10月初。飞机上装载的是给克里特岛上剩下的将近12 000人和罗得岛上的6300人运送的物资。根据电报的内容得知，他们的任务是：如果“不可能被接回来，那么就必须斗争到最后一刻”，以便“为在大陆进行战斗和减轻家乡的防卫负担创造条件”。

德军自从1943年9月占领罗得岛之后并没有采取特别的反犹太主义措施。直到1944年7月13日，驻扎在罗得岛上的东爱琴海地区司令乌尔里希·克勒曼中将才命令关押犹太人，且行动必须在四个星期内完成。同日，从波多拉戈岛向雷罗斯岛开出三艘船，这些船是用来运输犹太人的。但“由于敌军的袭击”船必须返航，直到20日至21日晚间才与军事补给物资一起成功摆渡了过去。德国士兵曾对7月13日发布的命令表示抗议。克勒曼是如何平息这场风波的我们不得而知，但是7月16日克勒曼被迫签署了一道命令，用来消除大家的“疑惑”。为此他寻找了在困境中能说服他的部队的“极端的处理犹太问题的方法”，以士兵们狭隘的视角是没有能力判断这个方法的好坏的。实际上岛上的所有犹太人在几天之内都被逮捕了，并于7月24日开始了驱逐行动。

波多拉戈海运主管机构对护航船队进行管理并报告运输情况。7

月24日从科斯岛运来了96名犹太人，第二天晚上又从罗得岛上运来了犹太人。战争期间的工作日志记录道："7月25日，西北风，强度6级；海浪高4到5米；警报等级2级。"一直记录到"四点整从罗得岛运送犹太人的'斯多特贝克尔号'、'霍尔斯特号'、'水星号'船队驶入。"接着："用于运送1750名犹太人所需的口粮和水立即准备好了。"因为天气的原因出航推迟到7月28日，到那时又增加了两艘运输船只并且配备了军队的随航保护。他们出发了："晚上八点半'霍尔斯特号'、'斯多特贝克尔号'、'水星号'、'海鹰号'和'海星号'向比雷埃夫斯进发。51吨废铁，空容器和1700名犹太人。在萨摩斯岛中转。" 304

米夏埃尔·莫尔霍的描述与被驱逐者讲述的事实一致："7月24日，囚犯们被塞进了三艘远洋船，由一艘纵帆船领航。经过一次地狱般的旅行，他们到达了比雷埃夫斯。在那里他们受到了非人的待遇。看守如果认为谁没有快速离开船舱，谁就会被残忍地虐待。一名老妇人被左轮手枪打死了，头骨被击碎，血飞溅到周围的人身上。在运输途中死了七名囚犯，十二名则濒临死亡——他们饱尝饥饿、口渴、无力的折磨，最终衰竭而亡。在比雷埃夫斯，他们的东西被洗劫一空，甚至他们的皮带和鞋底都被搜查，藏在那里的东西亦无法幸免。那些残忍的家伙甚至用侮辱的方式去搜查那些无助的手无寸铁的妇女。假牙、假牙架和牙冠都被粗鲁地从嘴里扒下来。这些东西都被作为赃物放进了四只箱子。这些箱子一般是用来运输煤油罐的。而那些被用做首饰盒的箱子则装满了首饰、金条、金币和其他任何值钱的东西。"

比雷埃夫斯运输处的主管在他的十四天概况中对十四条带着下列（容量极小的）装载的内燃机船进行了登记："8吨无核葡萄干，37吨弹药，82吨煤，37吨器具，298吨空容器和废铁，33名士兵和1733名犹太人。"8月1日还有"一个犹太女人"坐"佩利坎"号到达这里。不久之后，那些被驱逐的人被迫登上通往奥斯威辛的火车。根据对幸存者的 305

调查,一共有1673名来自罗得岛和94名来自科斯岛的犹太人被驱逐。21名死在运输途中,1145名死在奥斯威辛,437名死在劳教所。在被驱逐的人中只有151名来自罗得岛和12名来自科斯岛的犹太人幸免于难。在罗得岛上54名犹太人逃脱,科斯岛上6名。1947年,罗得岛居民中还有60人信犹太教,科斯岛1人。

当罗得岛的犹太人到达比雷埃夫斯的时候,军队早已消灭了用罗得岛上通用的意大利里拉购买东西的可能性。相同的情况也发生在邻近地区的希腊德拉赫马上。出于对黄金的渴望,德国人甚至从活人口里直接拔掉金牙。那时在希腊,黄金是除物物交易之外唯一的支付手段,罗得岛上也是这样。7月初,爱琴海地区司令部要求"用黄金支付占领费用",因为他们害怕"对防御势力发生灾难性的反作用"。1944年10月,德国信贷银行的明细表明:"在军队服务机构从希腊撤退之前的最后日子里,用黄金支付获得了成功。"

那些值钱的东西于7月31日在比雷埃夫斯被德国占领军通过暴力占为己有。这些只是罗得岛犹太人财产的小部分,绝大部分的财产都留在了岛上。直到1945年5月8日,它们一直留在岛上——确切地说:被英国军队忽视了。

划分犹太区之始,来自塞萨洛尼基的希腊籍犹太人、帝国保安部线人雷卡纳蒂劝诱其他犹太人:"给你们食物,你们就交出所有值钱的东西吧:首饰、黄金和有价证券等等。"德国军队在其劝诱之后没收了所有犹太人的财产。"为了找到那些被藏匿的财产,在这位告密者的指引下,安全警察对被遗弃的所有房屋进行了搜查。凡是能够被运走的东西,包括商品、衣料、家具、玻璃、书本……所有的东西都被小心地打包。"犹太人迁移之后,克勒曼立即成立了"回收犹太人遗留物委员会"。犹太人被送到罗得岛飞机场的营地,7月20日早晨,一个身着白

306

衬衫的德国军官从他们身上搜走了轻便的可以携带的值钱物品。根据维奥莱特·芬茨的研究报告,他有一名翻译在场,而这个翻译说的是塞法迪犹太人的拉迪诺语(此人很可能是雷卡纳蒂)。这一次,德国人一共搜走了四袋子的首饰。而这些措施的所谓目的竟然是"想方设法养活犹太人"。(在抢夺罗得岛黄金的同时,他们也对突尼斯的杰尔达进行了抢夺。那里有两个古老的犹太区,居住着大约4500名犹太人。国防军司令部向当地的最高拉比强制要求50公斤黄金,并用轰炸犹太人生活区来威胁。最后他们得到了47公斤的黄金。)

没收犹太人财产的决定并不是自发产生的,确切地说,负责战争财政的军官对这种可能性讨论了很长时间。被掠夺的财产到了岛上的德军占领者手里后,1944年7月31日,军需总长克斯滕对讨论进行了总结。他在《关于驻扎在希腊的军队需求》这份机密文件中写道:"1944年7月底海军总司令部报告说,运往克里特岛和爱琴海其他岛屿的补给受到严重威胁,为了保卫岛屿必须交出黄金和外汇,并且从根本上制定新的货币政策。"虽然在这里并没有直接提到犹太人,但是从整篇文章来看当然也包括了犹太人的财产。为了履行不断的支付义务,1942/43年军队早在塞萨洛尼基就已经把当地犹太人的黄金给霸占了。但1944年夏天,军需官废除了这种可能性。 307

鉴于越来越快的通货膨胀,当时也负责罗得岛的国防军统帅部建议将"在当地被没收的物资(犹太人财产)"用来作为军队供应物资。这个建议关心的只是克基拉、约阿尼纳、克里特和罗得岛犹太人的财产。已经提及过的7月16日克勒曼的密令也指的是相同的方向。这个密令清楚地向他的士兵们证明了"在指令范围内的政治和经济关系"中驱逐罗得岛犹太人的行为是正确的。

岛上的不动产被转交给了岛上的意大利政府,目的是变卖它们从

而获得纸币,并用来资助岛上的军队士兵。那些抢夺来的容易搬迁的东西则都掌握在德军手中。一位曾在罗得岛刑罚营服役的士兵埃尔文·伦茨在证词中说,1944 年秋天发生了饥荒,“仍然驻扎在岛上的德军”也深受其害。在中尉普伦施(耶拿)的办公室中,伦茨见到了新上任的驻岛司令瓦格纳少将的一封密信。在信中瓦格纳说,他已经给海军上尉京特下令,让他用几个月前从被驱逐的犹太人那里没收的财产与当地的商人交换食品。但是无论如何“必须非常有技巧地进行”,否则就会受到向岛内运送救济物资的国际红十字会的威胁。“此外”,伦茨在他的证词中推论,瓦格纳下令“每一个参加此事的人必须严格地对交换物资的来源保密。然而我还是从德国士兵那边知道了此类交易”。

乍一看,对罗得岛犹太人的驱逐似乎仅仅是毁灭某种罪行的幻想。但是如果厘清来龙去脉就会发现:军队策划了驱逐行动,因为这符合他们的军事目的并可从中获得直接的利益。如果人们要问那些被驱逐和被谋杀了的人的财产在哪里,答案是:他们的首饰、手表、黄金和他们的有价证券、衣物、家具以及车间和商店设施都通过交换到了罗得岛当地居民的手里——交换来的东西则成了食物到了德国士兵的肚子里。

第四部分

为了人民的福祉而犯罪



罪恶之果

对犹太人的劫杀

德国在塞尔维亚的托管机构在其最后的报告中声称,出卖犹太人的财产符合价格规律。这一声称表面看来似乎合理,实际上却无耻之极。当犹太人的家庭财产和犹太商人被没收的商品在欧洲被到处出售的时候,虽然由于战争和德国人的疯狂掠夺所造成的供应短缺状况不可能得到改变,但毕竟在短时间内在特定的地区有了显著的改善。因此价格水平下降了或至少在短时间内保持了平稳。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德国人在宣传口号中经常提到的一种简单的市场经济的基本机制,即犹太人的非法买卖和黑市交易通过隔离和驱逐而被禁止了。

屠杀犹太人对市场经济的影响,一方面在于对被屠杀者财物的全面征收,它们促成了对急需的消费品特别是衣服、家具和厨具的供应。供应方面推动力——而非所谓受到禁止的黑市交易的陡然减少——使得价格稳定下来。此外还有第二个基本的经济机制:城市居民中很大的一部分被驱逐,缩小了购买者的圈子;这也在供应增长的同时导致了需求的大量减少。

事实上,不是犹太人在进行黑市交易,而是德国的士兵以及德国军

312 方和民用的采购机构在从事这些勾当。他们摧毁了整个欧洲的价格结构。他们为了自己获利,将债务都转嫁给了其他人。

德国军事管理机构的军官和官员们一直都以前文中提到的原因为借口,在很多地方直接组织了掠夺行动,如在比利时、塞萨洛尼基、突尼斯或罗得岛。在其他被占领地区,他们迫使当局没收犹太人的财产以增强纳粹国防军的力量,如在塞尔维亚、法国和意大利。克勒曼将军、战争管理顾问默滕以及 1940 年强调要全面排挤犹太人的陆军总司令冯・布劳希奇的上台排除了各种怀疑。这些人四处宣扬一条反犹太人的口号:"金条就是税收!"

要紧接着将被掠夺者驱逐出被占领地区,必须要得到军方的同意并事先准备好各种运输工具。军方也确实如此行动了。但这一行动过程并不是简单地因为军方憎恨犹太人,或者因为他们早在所谓的德国式的盲目服从中丧失了最后一点良心。他们更多地是对驱逐产生了一种专业兴趣。

如果要问国防军在多大程度上投入到了种族清洗的行动中,那么要回答这个问题,也许就会对某些细节问题纠缠不清,如:有多少士兵参与了单个的谋杀行动或了解这些谋杀行动,或至少是了解部分方面。但发人深省的是,这个问题可以让人想起这样一个关键性时刻,即其时在纳粹德国国防军内部已经滋生出一种强烈的超出普通民众种族思想之外的希望犹太人灭绝的情绪。"种族隔离"和掠夺食品政策加速了"最终解决",这是不言自明的。此外,犹太人是敌人的第五纵队这样一种具有持续蛊惑性的宣传思想,至少助长了对大屠杀的消极抵制。

313 在专业文献中描述的三种灭绝动机之外还有一种:军需部想要获得尽可能多的捐款的兴趣。这一兴趣不是出自私人占有的贪婪欲望,而是来自经由军事知识分子专业论证过的一种企图,即要让战争在其战略

和军队的士气尽可能少受财政压力影响的情况下进行。

乍一看，似乎从“去犹太化”中获得的物质资源并不多。如果跟德国 1939 年至 1945 年进入战争国库的战争总收入来比较的话，它们不会多于 5%。这样的一个量化容易导致对雅利安化运动收益真实价值的低估。首先，不管是发生在民主制度中、体育协会里或者是在专制政体中的权力所有者之间，每一项预算的讨论都关系到最高负债。在财政方面，人们的最大承受能力是多少始终是争论的话题。由于德国的战争财政专家最多只愿用贷款支付 50% 的战争费用，所以每一项收入都扩大了相同金额的贷款额度，因此效果也是翻倍的。在此前提下，很少的百分点都意味着很高的财政支持。它们很不正常地缓解了持续的货币危机并遏制了如德国饮料税的提高或军饷的减少。

更为重要的是第二种观点。由没收犹太人财产而聚集的金钱，其主要部分都在 1942 年至 1943 年这样一个危机年度里，即在 1942 年夏季进攻开始到 1943 年库尔斯克会战期间，被德国战争机器吞噬掉了。德军首先应于 1942 年越过高加索山进入伊拉克并将英属苏伊士运河切断，并计划于 1943 年长驱直入打到苏联，借机改变前景黯然的战争格局。为此需要动员所有的储备。当时，在塞尔维亚、希腊、法国、荷兰、比利时、波兰甚至德国由没收犹太人财产而获得的巨额资金能够给 314 德国的战争财政以支持。在希腊，甚至在几个月时间内通过这种方式填补了 70% 的占领军费。类似的情况在 1941 年和 1942 年之间也发生在附庸国斯洛伐克、克罗地亚、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从这个角度来审视雅利安化运动，或可将其视为广泛战争动员的一部分。

在 1942 年至 1943 年这个战争财政年度里，德国的房东们支付了 18% 的国内战争收入；而在国外战争投入方面，出自“去犹太化”的收益占据了类似的比例。这些额外的财源减轻了德国大部分纳税人的压

力，对被占领国家（如希腊）大范围盘剥的步骤相对放缓，并能给德国士兵发放可观的军饷，建造新的军事设施和购买新武器也成为可能。在战争的困难时期，没收欧洲犹太人的财产给德国财政带来了巨大的收入，从而使德国避免了高额负债。这促进了德国国内的稳定和与被占领国家的合作，也减少了军事危机的反作用。

只要德国或非德国的财政专家将犹太人的财产价值转换成战时公债，它们在形式上就不违反如《法国宪法》或《海牙陆战条约》中的没收禁止规定。表面上，他们将被没收的财产简单地分成不同部分，并使得犹太人成为战争发起国并被占领国的债权人。但另一方面，德国人却将这些债权人杀死在毒气室里。不管这些财政专家怎样将对犹太人的驱逐理解成"东部地区的就业安置"，他们都将这些被强迫成为债权人的犹太人算做永远消失的那一部分。这样他们就成了谋杀的既得利益者和最终受益人。仔细考量一下在欧洲不同地区的具体"去犹太化"政策就会发现，正如法国、罗马尼亚以及保加利亚所奉行的做法，持续的没收行动并非必须跟大规模的屠杀同时进行。战争进程的影响，以及国家或地区团体或仅仅是个人应准备对受害者进行帮助这样的政治思维，会相对容易地导致灭绝逻辑的产生。

315

1938 年，借助国家命令将私人财产变成国债的战争融资方法就已经在德国出现，但没有受到那些在法律、道德和历史编纂学等方面进行雅利安化的人的重视。这一状况符合德国领导层的意愿，他们试图悄无声息地避开所掠夺的经济收益。对将犹太人的财产强制性地转变为战时公债的报道也是禁止的，有关收益的具体数字更是秘密。取而代之的是，对犹太人的迫害应作为纯意识形态问题来看待和宣传。这些在残忍的迫害之下毫无还手之力的牺牲品应被作为不值得同情的敌人来对待。1943 年，纳粹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罗列了十九个在士兵中

容易引发争议的问题，并要求军官们以尽可能统一的答案灌输给士兵，从而避免士兵们在政治和军事的原则问题上出现偏差。其中的一个问题是："难道我们在犹太人问题上没有走得太远吗？"标准答案是："错误的提问！国家社会主义和世界观的原则是毋庸置疑的！"显然，将历史事实跟纳粹教条宣讲者运用的理由混为一谈是毫无根据的。

如上文所述，被掠夺物品的大部分总是在当场就按原样被立刻瓜分了。只有变成了金钱的等价物才通过或大或小的途径进入德国战争国库。就此而言，当如下的论证依据被用在德国赔偿委员会的公文中时，对和错都是一样的：不是德国占领军，而是被占领国或附庸国的政 **316** 府或行政机关没收了犹太人的财产。以这样的一个总是被用到的事实为依据，法庭对数以万计的案件作出了判决："返还请求被驳回。判决不产生法庭费用和开支。法庭外费用不获补偿。"

由于犹太人的财产被出售，因此这一流程就满足了两方面的需求：一方面在资本市场、不动产市场和旧货市场上就像在零售业中那样，增加了额外商品的供给并因此使各方面对日常用品和有形资产日益增长的需求得到了满足。由此而获得的收入改善了被占领国家和附属国家的流动资金状况。这样，这些货币就通过不同的途径全部或部分流入德国的战争预算中去了。财产的转换使很多人获利：即便货物的主人是以市场价格买来这些货物的，货物通常也是低于市场价格而被出售的。这样购买者就会知道，在不稳定时期尽可能多地用他们面临贬值危险的货币去购买有用的日常用品和耐用的有形资产对他们未来实际的经济状况来说有多么重要了。

在被占领国家，每一项流进国库的销售收益都最终整个地落入了德国人手中，因为这些国家所有的额外收入都被算进占领费用预算里了。而在其本身也参战的附庸国家，则只是那部分新的国家负债中的

受德国人强迫而投入的战争费用部分。在罗马尼亚,根据1941年9月布莱辛所作的评估的结论,这部分费用占41%。这部分在罗马尼亚没收的犹太人的财产都流入德国人的口袋中了。

尽管如此,这一方法对被占领国的政客来说还是很有吸引力的,如317 在希腊、法国或最后在匈牙利。德国人要求收取大量的并最后导致毁灭的占领军费。另一方面,德国人也带领这些国家一起去掠夺第三方,即犹太人,甚至使其消失,以减轻负担。这一层关系甚至在新的有关雅利安化的文献里以及有关驱逐犹太人的国家历史学家委员会的详细报道中常常被忽略了。而这一层关系对同时代的人来说实在是太普通了。因此《新苏黎世报》在1944年8月3日这样分析:"在[匈牙利]对犹太人的企业进行雅利安化的过程中,官方确定的价格很快就能得到现金的支付,这就表示,这一行动就像当时在德国那样具有一定的财政方面的作用(减轻战争的融资负担)。"

当问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从没收犹太人的财产中所获的收益总共有多少时,现在能得到的只是一个不太令人满意的粗略的答案。我的建议是,以后应该以海伦·B.容茨所设计的方法(《所有的钱都去了哪里?——前纳粹时期欧洲财宝的价值》)为基础进行进一步的更为准确的计算。在此过程中,应在对一些欧洲国家的雅利安化进行计算时考虑到已有的调查结果并进行相应的调整。暂时只能说,包括1939年9月1日后在德意志第三帝国内所获得的雅利安化的收益在内,这部分收益有150亿至200亿帝国马克。这些收益来自欧洲犹太人的财产并以货币的形式流入德国战争国库内。

由于出售犹太人财产变现的金钱或多或少地在各被占领国变成了德国士兵的军饷,因此那些被运往科隆的黄油,或来自比利时安特卫普的无袖套衫和每一支香烟,都或多或少地由那些被没收了财产并被谋

杀了的犹太人的遗产部分地得到了支付。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出自被占领国和附属国的食品供应方面。它们也部分地由那些来自出产 318 国——法国、荷兰、罗马尼亚、塞尔维亚或波兰——的由出售犹太人财产而变现的金钱获得了支付。即使黄油是来自瑞士,它们实际上部分也是用那些从集中营里掠夺来的黄金和外汇来进行支付的。再看一看对被强迫的犹太劳工的剥削。从 1940 年起他们工资的 50% 都进入了德国国库,并从那里作为一个小的组成部分变成了德国妇女和儿童的生活费用,当然也变成了武器生产的费用。这一体系对德国各方面都是有好处的。最终,每一个统治阶层的人,即不仅仅是某些纳粹机关工作人员,而是 95% 的德国人,都获得了部分由战利品变现的金钱,或在被占领国用掠夺来的货币或黄金购买的食品。轰炸的受难者穿着被谋杀者的衣裳躺在床上长长地舒了口气:感谢上帝,又一次逃脱了!感谢上帝,国家和政党如此快速地就帮助了我们!

只要大屠杀不被作为现代历史上一贯的种族清洗来分析,它就不会被深刻理解。

1939 年至 1945 年的战争收入

在前面的章节里提到了很多财政数字,如为了进行剥削所投入的款项、资产负债表、配额和税率等等。在此之后有趣的是最终结果。因此,接下来要尝试分析一下德国战争收入的结构并回答两个问题:

1. 由德国人那里所筹措的连续的战争收入部分,跟从被占领国以及附属国家那里获得的收入部分的关系是怎样的? 2. 德国人是怎样在不同的纳税人应缴纳的税目上分配负担的? 319

德国从对欧洲其他国家进行压榨所获得的战争赔款总值,其计算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后来产生的四个彼此相关的由帝国银行和帝国财政部的官员们出具的文件为基础的。最重要的一些其后又通过其他途径或借助可信的如最后一个月的估算而补充进来的数据,也以这些文件为依据。最后还有一个包括从外界所获得的战争收入的总体核算,它跟维利·伯尔克所计算出的基础数据在很大程度上相吻合的。

由于德方企图不偿付所谓的被占领国(和附庸国)的清算预付款,而打算用虚构的外部占领费用来替代它,戈林的顾问直接就将战争债务计算到收入中去了。在这一点上,当德意志第三帝国已经从相关国家购进跟清算预付款等额的商品和服务的时候,这一算法跟实际情况是吻合的。此外,帝国的预算者没有对被征服国家的赔款和附庸国的战争投入进行区分,而是总括性地将它们都算做出自占领军费的收入,而且这一原则也被运用到下面的表格里了。

为了避免夸大不实的报告,我在确定每一个项目时都优先采纳最小数额。在阅读下面的表格时我们必须时刻记住,有关财政剥削收益的数目只包括了德意志第三帝国给欧洲被占领国和附庸国所造成的战争损失的一部分。

320

1939 年至 1945 年来自被占领国和附庸国的收入

单位:十亿帝国马克

	占领费用 1944 年 3 月 31 日至 8 月 31 日	清算 1944 年 8 月 31 日	总体估算
比利时	5.31	4.99	11.00
保加利亚	0.35	0.82	1.17
丹麦	2.40	1.41	3.50

法国	31.60	8.54	40.14
总督辖区	1.49	4.12	5.50
希腊	0.50	0.24	1.00
意大利	5.19	0.15	10.00
克罗地亚	0.19	1.05	1.20
荷兰	9.29	5.59	14.50
挪威	5.04	0.14	7.00
保护国	2.31	2.43	5.00
罗马尼亚		1.13	3.00
瑞士		0.65	0.65
塞尔维亚	0.31	0.51	1.00
斯洛伐克	0.03	0.80	0.80
西班牙		0.11	0.11
苏联	4.50	0.54	5.40
匈牙利	1.00	1.35	2.50
战利品	1.00		1.00
小计			114.47
+多纳要素			17.16
总值			131.63

需要对表格倒数第二行的多纳要素的定义进行解释。当人们看这个清单时,第一眼就会注意到苏联和战利品这两栏明显偏低。1944年,戈林的财政顾问奥托·多纳也看到了这一点。因此,他建议给那些统计学上不可测量的数额设立一个单独的要素栏。他认为该要素约占总额的9%至18%。鉴于前面章节中所提到的数据,我预计未计算到

的德国所统治的欧洲地区的供应和服务的价值占所算出的总额的
321 15%。包括表格上部的三分之一在内,该数字在1944年的估算范围内是有波动的。因此,出于我认为有两栏偏低的看法,我加入了多纳要素。

这样算出来的总数,是二战开战前一年大德意志帝国国家常规税收的九倍。但该数额也仅仅是1939年至1945年掠夺到的外部收入的一部分,虽然是较大的一部分。而且这其中至少还要算入被强迫劳工的直接工资所得税以及他们的社会保险和强迫劳动辅助情况下的农业补贴。跟其他各种各样的类似收入一样,从东部劳动者节约计划和形式上支付给家庭成员的工资转换过程中所获取的公共管理收入,也同样要算入以其他国家的代价购买的家庭用品中去。

我无法对公共管理收入的各个预算项目作出更为准确的区分,但借助于帝国财政部的统计处在1944年所出具的一份资产负债表可以作出一个粗略的说明。首先,应该将已经算入的总督辖区以及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的赔款从原始数据中抽出来,因为我在前面的表格中已经将他们作为外国赔款看待了。(与此相反的是,纳粹的统计员将波兰和捷克作为国内收入的来源。)第二,要将向帝国缴纳的在战争中明显增加的帝国邮政、帝国铁路和帝国银行的赢利完全作为国内收入来看待。德意志各省和乡镇交到帝国国库的收入不应作为额外的战争收入来计算。由于在战争期间不能投资于乡镇建设,因此一共有大约100亿帝国马克流入了帝国国库。这一款项作为额外的、影响公众舆论的战争负担并不起决定作用。

如果将这些项目从公共管理收入中分离出来,那就形成了一块财
322 政部的统计员稀里糊涂作为"其余收入"看待的款项。需要弄清楚的是,这其中哪一部分能够被看做可靠的收入。由于我没有任何材料可供参考,所以我从1938年至1939年的常规预算出发考查这项"其余收

入”。由于雅利安化、对犹太人的掠夺以及对奥地利、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及其后对波兰的入侵,那一部分跟有组织的掠夺紧密相连的额外收入在这两个年份里减少很多。但无论如何,每年可以从被认为是可靠的收入来源那里获取 15 亿帝国马克。如果将这一款项按五年半来重新计算一下,就可以这样认为:在预算项目公共管理收入/其余收入中,大约 82.5 亿帝国马克来自常规的德国内部收入,而其他的来自借助掠夺而获得的外部收入。下面的表格对 1944 年至 1945 年度的估算因地区损失的原因而偏低,但也可能明显太低了。

公共管理收入/其余收入

单位:十亿帝国马克

	常规预算	非常规预算	金额
1938	2927.5	—	2927.5
1939	3410.7	310.8	3721.5
1940	2980.1	1480.2	4460.3
1941	3939.8	1928.2	5868.0
1942	4169.5	2443.0	6612.5
1943	4744.1	3222.6	7966.7
1944 和 1945			4000.0
除 1938 年之外的金额			32629.0
1939 年至 1945 年的“可靠收入”			-8250.0
掠夺来的收入			24379.0

因此可以把通过掠夺获取的、被帝国财政部长作为公共管理收入 323

入账的约245亿帝国马克整个计算进来。这其中包括外国强制劳工往他们家里汇款用的贷方凭证,以及1939年后从德国犹太人那里夺取的约40亿帝国马克,还有驻比利时的国防军统帅部从雅利安化收益中支取的费用、德国公司用帝国马克在德国统治的国家中进行的购买以及其他。

如果将来自强迫劳动的收入和公共管理收入跟来自直接的赔款、清算预付款以及附庸国的战争费用相加一下,就得到下面一个总表:

外部战争收入

单位:十亿帝国马克

占领费用加清算(结转金额)	131.50
不包含在公共管理收入中的来自强迫劳动的收入(包括社会保险和间接农业补贴)	12.00
公共管理收入(结转金额)	24.50
外部战争收入的金额	168.00

在掠夺的会计收支中,对几十亿帝国马克进行了在同时期预算过程中发生的双重计账。这种情况之所以会发生,是由于精心组织的国家掠夺的成果在特定情况下被支付了两次:在购买时已经从占领费用预算中支付了购买商品的费用,为此应该相应提高该部分的预算,因此例如法郎也流进了帝国国库。在出售时,这样买来的商品再一次创造了收入,因为德国消费者和圣诞节的购买者再次为购买这些商品付了钱。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那些为生产大炮、飞机或货车而购买外国原材料、机器和半成品的企业家身上。由于德国的购买者从这些虚假生意中只会获利,而不会受到损失,因此这些财政结果都被算做“外部收入”。

324

另一方面，这里计算出的外部战争收入的金额并不包含某些项目。首先一些源自强迫劳动这一生产因素和掠夺的工厂、原材料和半成品的税收部分没有从德国的企业税收和企业家税收中剔除出来。对此以及对某个已有数字和估算的异议是有争议的，但整体情况并不因此而改变。

可以确定的是，在保守计算的情况下，德意志第三帝国从外国大约获得了1700亿帝国马克的连续的战争收入。这笔收入是1938年帝国收入的十倍，在今天值大约1.7万亿至2万亿欧元。这一掠夺政策为德国人的富裕生活，而且首先是他们实际上的政治忠诚奠定了基础。民众和领导层之间的团结一致不是主要来自精心设计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宣传，而更多的是通过掠夺手段和在德国民众中进行的“公平的”社会福利方面对战利品的再分配而建立起来的。

如果要厘清国内战争收入和国外战争收入之间的关系，那就理所当然地必须关注市民常规支出的基本负担情况。它们不属于战争负担。为了将这一块排除在外，每年要给大德意志帝国投入200亿帝国马克以涵盖普通的国有企业的费用、社会福利方面的基本负担和保卫军的费用。通过这一途径形成了被帝国国库作为国内战争收入看待，并在二战期间通过直接或间接的税收途径进入帝国国库的值得关注的一小笔款项，约770亿帝国马克。在这之中，必须将已谈到的那些款项提取出来，即来自强迫劳动的工资税收入、总督辖区和保护国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赔款，以及通过掠夺而获得的算入公共管理收入中的那部分收入。下面就是这一计算的结果：

325

帝国战争总收入

单位:十亿帝国马克

除去来自强迫劳动的工资税收入之外的收入	70.50
公共管理收入(可靠部分)	13.50
总额	84.00

在前列的清单中,对从外国掠夺来并被吸收的财产价值算的是最小值,而对来自德国自己的战争收入部分则算的是最大值。因此可以断定,来自德国的收入部分最多占支付的战争负担的三分之一,而来自外国的收入则最少占三分之二。

在国内税收收入中,低收入者和普通收入者(占全体有收入者的三分之二)缴纳的税收被用来支付烟草、啤酒和汽油等战争附加费用。这一部分总共约120亿帝国马克,约占投入到战争中的国内税收收入的16%。这其中还要算入这样的一笔收入,即由于增加付工资劳动而产生的不是出自强迫劳动的工资税而是出自付工资劳动的工资税的预算款项。另一方面,由于超时工作的津贴,如1940年秋季的夜间和节假日工作的津贴,是不需缴税的,因此单个工资收入者的工资税负担减小了。与此相反的是,来自所得税、法人税和营业税的收入大幅增长。在1939年,来自工资税的国家收入是26亿帝国马克,来自特定税额的独立经营者的所得税是44亿帝国马克。如果将前面提到的这个数字放到和平年代来看的话,就可以看出,德国战争国库在1939年9月至1945年初通过对独立经营者附加征收个人所得税最少获取了160亿帝国马克。通过法人税而支付的战争附加费可能约120亿帝国马克。要算上至少有40亿帝国马克的战争营业税收入和80亿帝国马克的房

326

租税收收入的话，富裕的德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总共贡献了最少400亿帝国马克的收入。

德国低收入者和普通收入者（包含家庭在内约6000万人）承担了帝国连续的战争支出的10%。收入较好的德国人承担了约20%，而外国人、强制劳工和犹太人约承担了德国在战争中投入的70%。在这样一个双重的借助种族和阶级意识组织起来的利益面前，德国大众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半段都保持着不错的情绪。但他们由社会帝国主义和种族帝国主义供养的，并通过战时社会主义获得好处的富裕生活，其罪恶的另一面一直压迫着他们的内心。

最后有两种很明确的观点：第一，最少三分之二的德国战争收入是从外国或外种族那里获得的；第二，剩下的另外三分之一的战争收入来自德国不同的社会阶层，并且分布极不均衡，即所有有纳税义务的人的三分之一承担了多于三分之二的战争负担，而大多数人则只承担了该负担的一小部分。

如果再看看传统的拿工资的劳动者和企业家所承担的不同的战争税负担，那区别就更明显了。如在前面章节中提到的，直到1945年5月8日，一般的德国工人家庭没有需要直接支付的战争税。而那些间接支付在啤酒和烟草上的消费税，也通过支付给士兵家庭以供其生活的额外费用和支付给士兵的军饷得到了补偿。总体来说，当时还不是相当富有的绝大多数德国人在战争期间比在战争开始前的和平年代更有钱。 327

投机政策

悄无声息，而又难以贯彻

与一战相比，二战期间财政收入与贷款之间的比例合适得多，尽管如此，帝国财政部长仍然不得不在国内进行大幅战争贷款。这种贷款方式在专业领域被称为“悄无声息的”，有时也被称做“看不见的”融资。与1914—1918年不同的是，它放弃在民众中进行长期战争贷款，而不经任何法律及批准程序，直接借信贷机构之手借贷短期储蓄存款 —— 对这一切储户都不知情。

从1936年开始，储蓄所、建房储蓄信贷社、合作社银行、人寿保险公司以及商业银行就已经悄悄成为政府的资本聚敛部门。这一队伍中还有当时仍掌握巨额公积金的养老保险公司。银行家们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就将帝国证券纳入他们的投资组合中。实际上，他们将储户往往是短期存入的资金以这种方式进行长期投资。悄无声息的融资方式所取得的成功离不开表面上的自愿，因此早在1940年1月，政府已经禁止媒体对强制性以及战争储蓄进行讨论。“至少应该让工人们保留这个印象：他在对自身工资收入的支配权上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无意“以任何方式剥夺其收入”，因而，这样一条法律规定被视做“完全错

误,在政治上让人无法容忍”。戈林的财政顾问奥托·多纳将该体系看做封闭的资本循环,大为推崇。它建立的基础是:“获得收入者将无法合法使用的收入存入银行,而信贷机构以认购国库券的方式,将这些资金送入财政部长之手。”

大约4000万德国存折存款和几百万其他储蓄存款“悄无声息”地转化为帝国债券,资金连续不断流入帝国中央银行,被消耗得干干净净。前文说到,现有的资金如何在被占领区被国防军士兵等换为商品和物资;这部分弥补了德国国内失衡的商品供给和流动资金的关系,但存款金额仍有巨大缺口。为了保持储蓄积极性,必须进行严格的工资和价格控制,同时,必须尽量有效地取缔国内黑市。

这一措施不单单涉及到德国大小储户。帝国的银行专员还竭尽所能,迫使各个被占领国的信贷机构认购德国国家债券,以筹集作战经费。最后,捷克金融机构超过70%的存款被用做德国战争贷款。如前文所述,法国的银行存款被当做敌国财产,法国政府必须用其认购国库券,支付德国的占领军费。因为被占领国所付的巨款绝大部分必须是各国国库券的形式,中央银行和财政管理机构不得不调整国家货币市场,以便全面为德国作战融资。对此进行组织是各国家银行德国专员的重要任务之一。

这种金融方式始于1939年9月12日通过的一项正式法规,该法规对1939年会计年度的追加记账进行规定,授权帝国财政部长,为战争目的“以信贷方式筹集最高达150亿帝国马克的款项”。1945年帝国在德国银行负债1100亿帝国马克,在储蓄银行和保险公司的负债分别达540亿和250亿帝国马克。此外还有330亿美其名曰“清算债务”的负债。这实际上是空头支票,如果德国战胜,则转嫁给被占领国和附庸国;如果德国战败,则必定无从追查。帝国银行的印钞机日夜不停地 330

运作,以填补剩余的帝国债务,尤其是在战争尾声,帝国银行更是债台高筑。

该体系的优点是运作无声无息,但随着国债中短期借贷所占比例的不断提高,国家财政逐渐陷入危险境地。正如一位财政专家 1944 年所警告的:“很大一部分人手中掌握高达几十亿的存款,甚至纸币,在某种程度上随时可能抛向市场。”

与德国相反,英国和美国主要用长期战争贷款来融资。这通过全民“大力宣传法”得以实现,例如英国的“胜利之翼”周,又如美国为七大战争贷款发起的如火如荼的海报运动“万众一心”。他们向每一位公民宣传自由之战,呼吁为战士提供经济支持。1943 年 4 月 25 日,阿图罗·托斯卡尼尼、弗拉迪米尔·霍罗维茨以及 NBC 交响乐团联袂出演著名的“同心战斗”演唱会时,纽约卡内基音乐厅连站票也销售一空,短短两小时内募集 1100 万美元。那次演奏了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

331

截至 1942 年年底,英国在贷款运动中筹集的 46 亿英镑中,高达 17 亿出自小储户。如果按照人口数折算,相当于德国的低收入者同时期贡献了 235 亿帝国马克的战争贷款,以及纳粹党领导层在德国证券市场筹集了 610 亿长期贷款。对这样巨大的民众物质支持,希特勒不敢妄想。难以想象威廉·富特文勒、埃德温·菲舍尔和柏林爱乐乐团会在 1943 年 4 月举办贝多芬第五交响音乐会,为购买夜间战斗机、冲锋枪和重型坦克筹集帝国战争借款。

在英国和美国,战争以及必胜的信念建立在广泛的社会觉悟的基础上,而在德国并非如此。经济学家伯恩哈德·本宁 1943 年初失望地问道:“我们为什么还待在德国?对于宣传,本无须缩头缩尾,德国却表现得如此克制。”这一点还印证在影响广泛的税收中:在英国,税收快速

并显著增长的同时，通货膨胀得到控制，减轻了财政负担。英国二战期间税收增长336%，而德国仅增长196%。

如果考虑到帝国税收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侵略吞并的地区、对强制性劳工的剥削以及公共管理收入，建立在非法掠夺、欺骗性财政操作以及种族屠杀的基础上，那么可以说，英国的税收负担比德国高出一倍以上。其中英国税收85%以上出自年收入低于500英镑的民众，332 这一点也与德国形成鲜明对比。

1942年10月，一位帝国银行高级官员对德国政府的无能表示强烈愤怒，对帝国马克"无可挽回的衰败"深感忧虑。他不无敬佩地指出，英国人"通过逐步而持续地旋紧税收这枚螺丝钉，控制通货膨胀的危险，而未对经济造成任何损害，没有引起任何不良影响"。

德国的财政政策与闪电战策略相吻合。它与快速获胜休戚相关。帝国银行副行长普尔1942年年底称，对比一战，这种方法导致极其严重的"危险点"，因为它以战争末期购买力的枯竭作为转嫁货币问题的代价。其时，失败在斯大林格勒已渐露端倪。这一事件必定对"悄无声息"的战争融资方式造成动摇。纳粹政府在整个公共和私人贷款管理体系的协助下，利用此方法，扮演了骗子的角色。只有及时用一个有利可图的胜利掩饰，才能够不露出马脚。这一胜利必须能够满足国内浮动的消费要求，并偿还战争欠款。依据这一逻辑，战争持续时间越长，吞噬的金钱越多，对被占领国人民的剥削越残酷，待遇也更加不人道。

从内政上看，悄无声息的战争融资方法显露出权力战术的特征。纳粹领导层逃避了对战争的公开表决，因为长期战争贷款的任务可能带来的结果不言而喻。一位参与其中的经济学家后来说道："希特勒不愿同公众讨论帝国的融资问题，因此他在备战阶段和战争期间都禁止 333 发表有关贷款的言论。"他不具备路德维希·艾哈德的品格，后者能在

1944 年用谨慎而明确的语言“告诉民众他们必须承担必要的牺牲”;希特勒还缺乏“担负责任的勇气”,惯于“躲躲藏藏”和“遮遮掩掩”。他不敢对德国人提出严肃的物质要求,这一点与他的同盟者墨索里尼相同。1944 年,德国占领军评论说,意大利“领袖”“一直不能决定以贷款来考验人民的忠诚度”。

纳粹政府不敢冒险向德国人民说明战争的费用,即使是用逐步公开的方式。政府将这种做法归结为德国已经见怪不怪,甚至是约定俗成的习惯,即人民生活在美化和粉饰过的经济表象下。与邱吉尔不同,希特勒无论如何不可能冒险在演讲中称:“我所能奉献的,只有血和汗、苦和泪。”这位处处为欢呼包围、似乎无所不能的独裁者从未能公开向他的人民要求,为一个号称辉煌的未来将他们的积蓄作为贷款托付给他五年、十年,甚至二十年。这样看来,人民与元首的共同体是一个巨大的幻象,缺乏任何切实的政治基础,不能经受任何实际考验。因而必须对我提出的概念“随时获得多数人赞同的独裁”作如下具体阐述:人们在多数情况下并非由于意识上的信服表示赞同;更多的是独裁者借助社会福利,通过系统的贿赂不断重新购买人民的赞同意见。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所谓“人民公敌”的包袱,而最终成为了受贿者的包袱。

334

储蓄与信任

与食品问题相同,在税收和货币政策中也不能保证德国人民对其领袖的长期坚定信任。今天人们会谈到可信度,从戈培尔的日记和希特勒的许多政治决策过程中经常可以看出,政府每天都面临重新获得可信度的问题。历史学家通常会追溯到帝国保安部密探的报告(尤其是帝国报告)、信函、纳粹党官员在日记和其他信息源上所作的注释等,

以展示第三帝国时期的社会气氛。

准确地说，所谓气氛可以通过储蓄率的浮动，如急剧或平缓的增长来测量。以往还未用这样一个社会历史参数来作为研究该问题的工具。收集这一方面的信息不难，从中可以轻易得出根据时间和地区的差异而有所不同的结果。另外可以重绘纳粹时期不同社会阶层公共道德变化的图景。这可以通过研究邮政储蓄所、大银行和人寿保险公司储户的不同行为方式来进行，将其与希特勒讲演和政治或军事事件相联系，从中得出比较全面而正确的政治观点概况（例如 1944 年 7 月 20 日，希特勒在狼穴侥幸逃过刺杀，奇迹生还后，本已普遍降低的储蓄率在几天内显著上升；但这个奇迹的威力仅仅持续到 8 月 1 日）。

正如纳粹党领导层统计退出教会的人数，作为对政府政策支持率提高、停滞或下降的指示标，它也将储蓄率高低作为民意的写照。1943 年，帝国保安部对此进行了一次专门调查，其依据是舆论界印象，而不 335 是有关实际储蓄行为的切实数据。当时无法对二战中实际储蓄率进行准确研究，但仍可以得出一些一般性结论，并确定希特勒政府在何时失去公众支持。

总的来看，德国储蓄率 1940 年和 1941 年间每月达 10 亿帝国马克，1942 年每月超过 15 亿。这是战争中消费限制的结果，也是对希特勒领导艺术信任的表现。短短几年内，德国人的储蓄总额增长了两倍以上。1942 年，公共储蓄所的存款增长了 152 亿，达到 512 亿帝国马克。这是“德国储蓄所历史上最大幅度的增长”。如果将新投入的人寿保险作为高收入者对前途信任的指示标，那么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全年缴付的保险费从 1939 年的 17 亿帝国马克增加到 1941 年的 42 亿帝国马克。

自愿储蓄支付了日常战争费用的很大部分，至少某些纳粹战略家

认为，战争胜利以后，自愿储蓄应该“促进财产结构的均衡”，“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财产秩序”。这里也确证了纳粹政府在德国社会实现社会均衡的趋势。此外还可以看到以下意图（对不少经济专家来说肯定是主要意图）：推进战后劳动者手中财产的积累，以便为投资积累尽可能大的购买力。当然，人们是为各自不同的目的储蓄的，例如建房互助储蓄、附加养老保险或大众汽车储蓄。许多个人努力存储金钱，希望在战后实现不同的人生梦想。

336 所有这些人生计划体现在储蓄率上；无论低收入者拥有的流动资金有多少，他们半有意识地将资金交付给了纳粹政府。弗里茨·赖因哈特在1942年满意地说：“储蓄率的巨大增长，是公民对国家社会党领导和货币安全信任的最有力证明。”银行业代理人将数以百万计储户的意愿归结为“在战争期间进行更多的储蓄——为胜利储蓄”。“战斗，工作——储蓄！”是德国银行的口号。为了便于债务清偿和付息，利率一降再降，在这一背景下，自愿储蓄运动的巨大成功意义更为重大。即使储户未看到存款被悄无声息地变为大炮，他们也一定隐约相信德国必胜。

但怀疑还是在滋长。1943年第二季度，存款金额的增长首次低于上一年同期。帝国财政部将信任下滑归结为空战的后果，因为德国西北部城市储蓄率显著降低，而东部地区未受影响。这种情况令人担忧，由于军事反击限制了消费可能性，储蓄率本不应降低，反而应该同比急剧上升。

正当财政部于1943年12月从当前统计中得出信任危机的结论时，帝国保安部——也许是出自财政部长授意——开始进行一项课题，题为“人民的信任与购置有形资产”。帝国保安部人员发现在“富裕人群中”首先滋生出了不信任。密探观察到，许多富人“肆无忌惮地抛出

现金”。如果在拥有财富较少的群体中调查这一行为的影响,可以发现,在对币值的信任问题上,资本家成为了影响大众的“极坏的例子”。337 帝国保安部得出下列令人警醒的结论:“各个阶层对币值的信任度已明显降低,这无论在言语或实际行动上都随处可见。但作为一般意义上对币值信任的表现,可以说人民还是有储蓄的意愿的;过去几月内的存款与整体上收入的上升和增长绝对不成比例,特别是对某些社会阶层而言。”

1944 年 3 月,经济部长丰克不得不安抚德国小储户,公开保证帝国“不会动用存款来偿还战争债务”。尽管已经人心惶惶,但根据银行类型和地区的不同,1944 年上半年,存款的增长仍保持了很高的水平。但“到年末,增长速度明显减慢”。1944 年 8 月,德国中等收入者开始积聚现金。富人们反应更快一步:1944 年 3 月,新投保人寿保险的保户已经大大降低。

9 月 15 日,帝国银行遭遇“人民大量提取现金”。当时的帝国经济部国务秘书奥托·奥伦多尔夫于 1945 年 1 月声称:“人民手中的现金急剧增加”,帝国不得不“越来越依赖印钞机”。仅仅 1944 年 9 月至 12 月,流通货币就从 386 亿增加到了 485 亿帝国马克,增长速度比前十二个月平均水平高出两倍。一位财政专家用专业而枯燥的语言评论道:“政治军事局势的激化决定了普遍意义上对流动资金的需求。”

顾客的态度直接影响银行的商业政策。帝国经济部长抱怨说:“贷款机构认购长期帝国国库券的积极性有所降低,这与我们的期待背道而驰。”338 因此,从 1944 年开始,政府不得不多次动用帝国银行的“大量储蓄存款,以维持帝国贷款”。例如,1944 年 8 月 3 日,一向亲政府的萨尔茨堡银行管理委员会决定,“考虑到对现金不断增长的需求”,暂时“不考虑给帝国贷款”。帝国银行立刻觉察到,这一决定反映了对德国政府的国库券的普遍保留态度。银行的态度取决于顾客:德国人现在

才拥向柜台,明确表示反对战争,收回给国家政府的贷款。

1944 年 8 月,盟军登陆诺曼底,红军在东部战线击溃德军。在 7 月 20 日试图颠覆政府的努力失败后,民众对当局以及帝国马克的信任在几天之内荡然无存。如果以储蓄率为指示标的话,对帝国马克的信任早在 1943 年春天已经开始逐步下滑。总的来说,富人阶层比低收入者更快对帝国马克失去了信任。考虑到人民对政府的普遍怀疑态度和可能引起的共鸣,1944 年 7 月 20 日反对希特勒的暴动并非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毫无获胜的希望。

如前文所述,普遍赞许建立在相互幻想的基础上,但纳粹政府仍然一次次成功地复活了人民对其领导艺术的信任。为此,政府以史无前例的方式发展了现代福利国家这一工具。与此密不可分,但也不可过高估计的是登峰造极的恐怖组织。它们在战争下半阶段迅速增加,矛头指向每个公民。在 16 000 例死刑中仅 1941/42 年冬季危机后执行的就有 15 000 例。对战时司法权的统计显示了同样的结果。例如,战争 339 期间对第 253 步兵师的士兵执行了 18 例死刑:1939 年至 1942 年间死刑数为零,1943 年 8 例,1944 年 6 例,1945 年 4 例。在战争期间共有大约两万名德国士兵被施以死刑。

鉴于普遍的福利措施和对所谓人民公敌施加的登峰造极的暴力,大多数德国人虽未成为纳粹信徒,但也随波逐流,为社会体系提供给他们的小恩小惠欢喜。由此形成的被动忠诚足以使纳粹政府的执政能力维持到 1944 年夏天。

虚拟的战争债务

纯粹投机的战争融资方法决定了德国政府必须取胜。希特勒政府不能承受任何妥协，它们必须排除战败的可能性。因此，从开战第一天开始，德国政府便把赌注下在“德国不耗费本国人民一分一厘，而能从被占领地区额外榨取的巨大能量上”。在战胜法国以后已是不言而喻：“从北角到比斯开湾的权力范围内几乎整个欧洲的财富”现在都归负债累累的德国所有。

德国政府通过这种方式，用丰厚的政府福利安抚甚至取悦德国人民。在创造氛围的背景下，政府于 1940 年秋天减免了工人的税收，在 1941 年提高养老保险金，并在随后几年放弃了影响深远的直接战争税。只有在入侵苏联后，德国国内军备和战争债务切实存在的观点才占了上风。在为公众写作的《我们的钱去向何方》一文中，国务秘书弗 340 里茨·赖因哈特对公众进行了安抚。他提出“东方那些事物的新秩序”，谈到最终胜利的果实，他这样蒙蔽公众：“提高的战争负债的光明面将数倍于负债的价值和利润来源。”

德国的主要经济学家也持此观点。在 1941 年秋季战争融资问题工作会议的结束报告中，鲁道夫·施图肯在会议厅反问：“战后还会有债务问题吗？不会有某个仍有供给能力的敌国在赔款等主要问题上对我们进行支援吗？”（当然，施图肯 1945 年后装作是纳粹党财政政策自始至终的反对者。）财政经济学家赫罗·默勒指出要“出售赢得的自由土地和其他无偿获得的新的国家财产”，以便“明显减轻负担”。

他的同事伯恩哈德·本宁也在 1942 年夏“对合并的东部地区的帝国财产进行重新私有化”表示赞同，并且“在引进被占领的东部地区的

廉价商品时收取‘通行费’,作为额外的偿还途径”。在以以上引言为基础的报告中,他更加清楚地表达了“借助外国国民经济”的观点:“此外还有通过占领敌国——尤其是原波兰和俄罗斯——成为帝国财富的各种重要固定资产。”

通行费指的是俄罗斯粮食的购买价和在德国的销售价之间的差额。赖因哈特这样向帝国强盗们解释:“例如俄罗斯国内黑麦销售价为341 每吨80帝国马克,德国销售价为180帝国马克,这样,每吨黑麦中180帝国马克和80帝国马克以及运输仓储费用之间的差价就要作为通行费收入帝国的腰包。”根据会议记录,当时政府会议上赖因哈特的听众来自德国国防军、粮食部、经济部和东部事务部,他们“一致表示必须采取以上措施”。

内政部国务秘书不顾海因里希·希姆莱(时任帝国移民委员)的反对,坚持将获得的敌国财产交付到帝国国库,而不作为德国人迁移的储备金。毕竟是“全国人民用刀剑在征战中夺取了这些土地,因而胜利的果实也应由所有德国民众来分享”。他的观点获得了财政部的支持。在财政部官员看来,“帝国通过占领敌国领土夺取了财富”。出于同样的理由,他们与四年计划局的同事们一起,让被占领国波兰的地方官员合乎民意的意愿落空。柏林的“管家们”坚持认为,“获取的波兰的财富的等价物属于德意志帝国”。

出于经济现实主义的考虑,经济官员们始终强调,帝国应得的不是夺取的资产,而仅仅是它的等价物。自始至终,这里关系到战利品的(重新)私有化。赖因哈特等已经考虑到出售人民股票,以便在战争胜利后迅速掌握普通德国人手中的积蓄,保护消费品市场免受无法控制的购买狂潮的冲击。这样看来,军备支出并非血本无归,德国刀剑征服了巨额物质财富。因此,新的帝国财富的一部分应该归储户使用——342 例如,被占领的东部地区的工厂或矿井的股份。

1941年11月8日，在戈林的主持下，通过了“新占领的东部地区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该基本原则估计是由财政顾问奥托·多纳起草的，其中进一步强调了以利用为目的的整体方案：“通过廉价的（农业）生产，并保持当地居民的低水平生活，为帝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供给取得尽量多的生产盈余。这样，在尽量保证欧洲的食物和原材料需求的同时为帝国创造收入源，偿还发动战争欠下的债务的绝大部分，保护德国纳税人。”

几周以后，戈林的国务秘书保罗·克尔纳宣布：“新占领的东部地区必须为偿还战争负债作出贡献。出于这一原因，东部地区的工资和价格必须维持在最低水平。”不难看出，说这话的人带着点创新者的自豪，不过帝国财政部反应冷静：克尔纳此番不过是把国务秘书赖因哈特“一直代表的观点”作为戈林的方案推出。

事实上，财政部长什未林·冯·克罗西克也向戈林解释过他对东部扩张在财政经济方面的想法。他在1941年9月与负责苏联问题的下属发生争执，他认为：“当时的俄罗斯国家财产——多少得感谢共产主义——应该全部作为帝国财产移交帝国支配。”1942年，他催促有关方面，应该通过“帝国与东方的价格差偿还战争负债的绝大部分，尤其是帝国的利息负担”。国务秘书赖因哈特不久以后对其表示支持：“帝国的债务是因为备战和进行战争而产生的。如果要保持我们现有的生活水平，不应该让德国人民来承担偿还利息和债务的重担。……这威胁到东部地区相应的工资和价格政策。”据他估计，后来通过出售占领的苏联土地、森林、矿产和工厂，给帝国带来的总收益“达几千亿帝国马克”。 343

1942年1月，帝国农业委员汉斯·德特廷在被占领的乌克兰旅行

数月之后，在柏林德国绅士俱乐部一部分事先选定的公众面前说：“根据最高方面的意见，乌克兰必须‘支付战争费用’。人口政策根据这一目标而制定。乌克兰的廉价劳动力必须为帝国以及乌克兰自身的农业和原材料经济发展工作。……乌克兰只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因为只有如此，它才能给欧洲贡献必要的盈余。”

1941 年 12 月 12 日，希特勒对纳粹省党部头目发表演说时，不仅提到“最终解决”，还提到战争负债和社会问题。关于战后的年月，他宣布“果断贯彻一个慷慨而又具创造性，不仅覆盖德国工人，而且覆盖德国农民的福利方案”。他设想的方案执行者是捷克的百万奴隶工。唯有如此，才能实现社会政治目标，并偿还战争贷款。如果放弃“这样的新途径”，必然重现“通货膨胀和由此引发的经济灾害”。

1942 年 3 月，希特勒指出：“我们强大的军备迄今吞噬了数不尽的资金。”他认为偿还债务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法：“由帝国的德国公民逐步偿还，或者用被占领的东部地区可能获得的收益来偿还。毫无疑问，必须采纳第二种方法。”1942 年 8 月，乌克兰帝国委员及省党部头目科赫在希特勒总指挥部接见其下属后强调：“如果该国人民（乌克兰人）每天工作 10 小时，那么必须有 8 小时是为我们工作。不允许任何感情用事。”财政部官员早就规划以这样一种帝国主义方式来偿还债务，为德国公民谋福利，而此时在希特勒的支持下提出“元首的财政经济远期目标”，认为乌克兰“在这一意义上是一个‘剥削对象’”。

344

引用德国知名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的言论，可以发现其中不断出现的只有一个中心主题：在苏联被占领区的占领政府以饥饿、贫困、强制劳动和死亡为导向，统治极度不人道，唯有如此，才能保证德国人将来的生活标准。长远来看，据此进行的实际操作并不适宜。从中获得的收益差强人意。被侵略国人民的反抗日益激烈，不可收拾。1943 年 1 月，戈培尔不安地确认：“俄罗斯人民传言，德国人鄙视斯拉夫民族，

欲将其灭族。"斯大林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宣布："宁可站着死，不可跪着生！"

苏联军队和游击队的反击粉碎了德国全面彻底剥削东欧的计划。从中期来看，必须用敌国资源来重新支付战争费用，使全体德国人的生活水平有质的飞跃。短期来看，必须尽量满足战争期间的食物需求。345 真正实现的只有最后提到的这部分目标，而且也只是部分实现。但这并未改变历史分析的结果：对全体德国人民族利益的担忧是所有恐怖、奴隶和灭绝政策的决定性推动力。

国家社会主义

专业知识与政策

早在1939年9月1日之前，帝国政府已经转变了政策，仅仅依靠即将到来的帝国主义掠夺战争的赃物进行公共融资。绝大部分专家、帝国银行官员和部委官员支持这一论调。他们乐此不疲地为德国的强盗事业添砖加瓦。1935年年底，保守的帝国财政部长已经自认为他工作"勇敢而又满怀信念"，"目光直指这个时代里令人窒息的伟大事件"，不为日常琐事所蒙蔽。"党派思想家"奋不顾身地扑向犹太人及其财产，而什未林·冯·克罗西克及其官员以君子自称，思量着"自卫"——这不过是古文献中提到的分歧，此时可以抛诸脑后。

前几章中对没收财产的行为的描写诚然不够完整，有一部分只是粗枝大叶式的，但这仍然足以对政府组织大规模抢劫的技巧以及它所带来的政治收益作一个扼要描述。帝国财政部持有多个账户，用来来回折腾资金，并与其他资金混合，以最大限度掩盖资金来源。什未林·冯·克罗西克伯爵和他的高级官员的基本任务是用反国际法的方法，347 不断造钱和洗钱，维护强盗政府的利益。这一点与德意志帝国银行、德国信贷银行以及国防军军需部领导层和专家的想法是一致的。

政府在德国实施包括冻结价格在内的严格的配给政策，看似公平。但德国士兵应该而且也希望在外国大发横财。如果他们能够将国内积压的购买力部分转化为外国货币，并挥霍得精光，这在帝国财政部长看来是再好不过了。“把你们手头的积蓄都寄给我，”海因里希·伯尔在战争初期这样对父母写道。许多家庭通过这种方式花掉了在德国配给经济下毫无用处的闲置资金，有时甚至花光最后一枚铜板。这给战争财政学家们开辟了一条途径：借助外国的商品供给，消化“只是相对较少的几十亿帝国马克，这些资金在特定方式下可能造成祸害”，滋生不满。纳粹政府从中获益匪浅：无论帝国公民与政府关系远近（关系远者如海因里希·伯尔和沃尔夫·格特），总体来说都对现状持满意态度。

在德国战争融资的过程中，专家与政治领导层之间的关系显露了出来。它体现在激进的专业意见和政治所容许的界限之间的紧张关系中。有时，志同道合的参与者们为共同目标奋斗，例如在塞萨洛尼基、比利时、法国等没收犹太人财产的行为。无论是像对比利时那样直接搜刮，或像对法国那样通过占领费间接聚敛，国防军军需部和帝国财政部官员们都为额外收入感到高兴。和帝国银行经理们一样，他们希望迅速战胜被占领国自发产生的通货膨胀，以此稳定帝国马克。 348

同时，专家和政治家们还一致认为，被征服国人民必须承担战争开支的绝大部分。他们都企图日后利用战败国偿还额外的战争贷款。帝国银行官员这样言简意赅地说道：“为了保护德国货币，帝国银行在根本上坚持……在被占领地区通过使用各国支付方式……来满足德国的资金需求。”

从 **1941** 年秋天开始，政府对增加工资税和一般消费税中的战争附加费问题进行讨论，最后未经通过，但政府通过了对富人征税的决定。

在房屋利息税问题上,帝国价格管理委员会与德意志劳动阵线、希特勒的政党办公厅以及保守的普鲁士财政部一起,将原已对房屋占有者造成沉重负担的税费翻了一番。纳粹官员们企图借此来保证人民的忠诚。少数专家表示赞同以这种政治上切实可行的方式来应对增长的战争债务。

在其他问题上,主要的提议来自于专家,纳粹政客的政策和专家愿望之间始终保持心理上的平衡。例如,帝国财政部和帝国银行的官员创造了完全自主地出具帝国贷款票据的制度。正如布莱希特所说:"抢劫银行与建立银行相比,有什么区别?"德国信贷银行成了对欧洲进行"极其优雅的"劫掠的中坚。其官员几乎全部由帝国银行干将中招募而来,他们基本用德国以外的资金来推动数十亿的业务。他们打着货349 币政策的幌子,巧妙进行抢劫(例外情况是苏联的被占领区,在这里,这些资金与强制和暴力方法相比,处于次要地位)。

此外,财政部长在没有任何政治规定的情况下,扣留强制劳工汇给国外亲人的钱款,折算成被占领国货币,汇给收款人。他还在没有任何指令的情况下,对在国外购买股票或货物的金融机构和企业采取了同样方法。这些机构和企业按当时市场价格以帝国马克支付的款项消失在德国的钱袋里,被用于帝国人民——而被占领国家人民不得不支付这肮脏的政府交易。在这方面,希特勒无须下达任何具体指令。他无须开绿灯;不成文的规定是:不管采用何种方法,对德国人有利的就是好的;帝国银行在部分信纸上装饰了纳粹十字标记和"国家社会党模范企业"的美誉,这并非浪得虚名。

专家和政府偶尔也会产生分歧:究竟应该以哪种方式,在多长时间内洗劫欧洲?专家们主张剥削中期最大收益。他们认为一定的可持续性是必要的,在将母牛赶往屠宰场前,想多挤牛奶,生些牛犊。在这一

点上，什未林·冯·克罗西克主张所谓的“战争经济的最优化”。他意图“避免为我所用的国家的过早衰竭”。但与处于意识形态空想阶段的专家们截然不同的是，纳粹首领们首先考虑的是政治生存问题。他 350 们所作的决策是为了多支撑几个星期，或几个月。

前文对希特勒手下志得意满的强盗行径和德国平民在乌克兰的大规模腐败进行了描写，从这里可以看出专家和政治家之间的矛盾。同样的问题出现在对德国民众的收入进行征税这一点上。在上述两点上，政治机会主义最终都战胜了专家意见。

但还是回到一开始所提的问题上：纳粹在内政上如何长期巩固其统治？在这里，高度发展的专业知识和以民众利益为指向的政策之间紧张的联盟是卓有成效的。其结果是，纳粹政客在德国人中收买人心，向他们施以小恩小惠。另外，财经专家竭尽所能弥补负面影响。他们在德国提高对富人的征税，并非因为他们认为这样是正确的，但他们至少实施了这些税收附加费。他们在被占领国家推进非现金的付款方式，以制止现金流增长，并推出新的税种。为了制止通货膨胀，他们也在欧洲没收犹太人财产。

此外，专家还建议通过了食品定量供给政策。在挪威、希腊甚至荷兰等被征服国家，突然出现食品短缺，而且国外不再能够输入食品。一支作战部队需要的食品供给大大高于同样数量的平民。突然之间有数百万强制劳工要给养，而在战争以及通货膨胀影响下，欧洲大部分地区收成减少。

专家们对食品进行定量配给，并改变德国的分配情况。另外，他们 351 决定哪些人群不应得到或只应得到极少量的配给。这里主要牵涉到犹太人、被关押的苏联士兵、精神病人以及特定的遭到封锁的大城市的居

民。专家从实际角度考虑了政治和军事上的可执行性。

通过一个小例子的作用可以看出一般机制的运作。1940年,帝国粮食部负责平民食品供给的相关官员想要在全德国范围内禁止饲养宠物,除非是像农庄上的猫等必需的宠物,这一禁令目的是节约粮食和肉食。借此可以省出可供给几十万人的食品。但希特勒未通过这一禁令,他不想给德国人造成这样的情感伤害。但这一禁令在犹太人中得到推行。由此产生了一条日后被广为引用的规定:禁止犹太人饲养金丝雀、猫和猎犬。

粮食部官员禁止犹太儿童饮用牛奶,给犹太人配备差得多的专门食品卡,而让德国人获得尽量高的配给。在被占领的波兰,他们将大规模屠杀犹太人当做盘剥食品的手段。1942年,出于对德国平民和他们的战争情绪的考虑,帝国粮食部长巴克拒绝给德国驻苏联军队提供额外食品供给。在前方和后方食品储备的冲突中,他选择了保护德国平民的利益。这样做的直接后果是,戈林在被占领的苏联地区的德国农业委员会上呼吁:“以战养战!当前重中之重!”

352 赫伯特·巴克及其下属肆无忌惮地在口头和笔头上宣传大规模屠杀。什未林·冯·克罗西克是否赞同,我们不得而知。也许没有。在一个现代的分工协作的政府机构中,这样一位知名专家无须为此类事件操心。可以肯定的是,帝国财政部长个人特别重视将被害者的一切财产国有化,包括金牙和最后一件衬衫。无论财富多少,一律出售,甚至包括只能用做纺织材料的遗物。他将这些收益作为一般管理费用纳入帝国财政。

无论什未林·冯·克罗西克怎样看待犹太人,他都考虑让被剥夺了财产的犹太人永远消失。早在通过谋杀欧洲犹太人的决议前,什未林·冯·克罗西克、弗里茨·赖因哈特和财政部的高级官员就总能发

现新方法，将犹太人剥夺得一文不名，以“减轻国家的负担”。财政部和经济部官员用加强的外汇规定和没收财产技巧，剥夺了许多犹太人出逃的可能性。在犹太人被迫迁徙到政府规定的犹太区时，他们禁止犹太人携带大额款项，在犹太区进行必要的安顿。

纳粹统治的基本架构摇摇欲坠，专家在几个中心点上对其进行了均衡，虽然只是必要而临时的措施，但足以让军备的破坏和灭绝行为持续几乎十二年。当老百姓公开反对政府时（例如“拖拉许可”一例），专家的行为还挽救了人民和政府之间时时受到威胁的关系。这样看来，国家社会主义的优势不仅仅，而且主要不是来自所谓的“权力机构的 353 协调”。

将政府视为由权威控制的元首政府的观点是错误的。在用政治和武力手段划分的国界内，纳粹体系保持着政治和专家建议之间显著而鲜活的区别。由此产生了紧张关系，或称意识对立。如果没有专家们不时的纠正，政治家们必定立刻陷入货币和债务的混乱中。而如果不是政治家约束专家，执行政策优先权，大众的忠诚度必定也很快被摧毁了。

两股力量相互作用，才保障了时时受到威胁的均衡。专家们的专业知识趋向于理性主义的自我实现，在政治上不确定，它与民族的一福利国家的造福意识形态结合在了一起。这两种元素在自身看来威胁性并不大，但国家社会主义通过这种互补的结合，赢得了毁灭性的能量。

如在戏中

内政上，纳粹政府依靠开始时不太严重，而后则是犯罪式的预算政

策。从 1935 年开始，希特勒禁止公开政府预算，因为他的政策从 1936 年起寅吃卯粮。这就强迫他发动战争和抢劫。所有有关没有土地的人民、殖民地、世界范围、东部扩张、经济补充区域以及所谓灭绝犹太人的流言最终都只有一个目的：依赖外力，使德国财富在短时间内迅速增长。

纳粹首领在宣传中吹嘘，将为千年帝国打下根基；实际上，他们不354知道怎样支付第二天的账单。据帝国财政部的备忘录，戈培尔 1938 年 1 月在一阵粗俗的掌声中说道：“情况比我想象的要糟。但没有哪一个国家是在债务中衰败的，只有由于武器不足衰败。”两个月后，他在帝国财政草案中写道：“我们有一个巨大的财务缺口。但这里用得上奥地利。”1939 年 12 月，一位证人这样说到希特勒的中心战略原则：“元首看到，不可能长期坚持作战……必须孤注一掷。”

但是，在开始时迅速有效赢得的胜利背后，潜藏着财政和食品的老问题。无论收益和征服的领土面积大小，结果始终滞后于期望值。因而，纳粹政府不能局限于目前赢得的土地的给出和内部扩建。无法支付的支票、短期内到期的帝国国库券、“浮动的帝国债务”，整个财政经济的运行像一个欺骗性的雪球制度，这让德国政治家在组织上无力承担妥协。纳粹头目必须推进扩张。每一个停顿都可能意味着反动政府的即刻终结。他们不能承受任何停顿，即使是在 1940 年获胜，将从梅斯到罗兹的“德国人民的领土”——包括所有有争议的边界地区、煤矿储藏和波兰西部的谷仓——归入帝国领土后。

即使是这样的胜利也只意味着，以这种方式统一的德国民族必须自己偿还所有贷款，其中包括为购买劳动力、扩军备战、建造形象工程以及扩展疆土所背负的贷款。通过没收犹太人财产、购买“敌国财产”并谋杀数十万“吃白饭的闲人”，这个文化上满足，但仍有局限的大德355国固然可以渡过一些财政瓶颈，但不能偿还巨额负债。1940 年夏天德

国战胜法国后，卡尔·弗里德里希·格德勒预测，帝国在这种情况下仍然不得不向财政紧缩的残酷自然法则低头。但格德勒预计这不会再重演，因为希特勒政府当权者已经决定继续采用自欺欺人这条方便的途径。

在这种政治背景下，战争不仅是最方便的途径，也是德国政府1940年夏天可以采用的唯一方法。1940年秋天，邱吉尔打破了德国的中非殖民帝国计划后，德国唯一的出路就是袭击苏联。开始这一抢劫行为的几天前，戈培尔针对人民、犯罪和政府的关系写道："元首说，无论是否正当，我们必须胜利。这是唯一的出路。这是正当、道德而且必要的。取胜以后，有谁会追问方法？我们已经负债累累，除了胜利，别无出路。否则我们的人民，我们的所爱，都将被彻底摧毁。行动起来吧！"1941/42年冬天以后，政府将背水一战的情绪渲染给了大部分民众。在具体措施方面，他们越来越意识到已经选择的方向不可更改。这导致1944/45年，许多人倾向于主动投降。

毫无疑问，德国有大量怀疑者。大部分信仰国家社会主义的人是出于纲领中某个模糊的一点。有人因为反对德国的世仇法国而跟随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有人因为国家青年团灌输的道德观念；天主教神职人员为十字军武器祈福，反对无神论的布尔什维主义，反对从修道院强行征兵，并反对安乐死；与此相反，主张社会主义的公民为国家社会主义反对教会干预政治以及反对特权的特点所振奋。数百万德国人对纳粹的追随带来严重后果，他们都有部分相似性，其后则是互相间的矛盾。 356

前文描写志得意满的希特勒强盗行径时引用了演员沃尔夫·格特的话。格特与海因里希·伯尔一样，对纳粹意识形态保持着距离。他认为德国政治"令人作呕"，每次遇见"黄色标记"，他都觉得"极度羞

愧”。与伯尔相反，格特将宣传安乐死的电影《我控诉》看做一部有着“纯净、正直的观点”的纪录片，一部令人警醒的艺术作品，“以电影形式极好地展示了安乐死在特定绝望情况下的必要性”。后来他质疑，“如果一个专制政府宣传这一想法”，后果会如何？但是无论格特在个别政治问题上看法如何，他珍惜暴力统治在“安乐园”布拉格为他提供的职业和消费机会。他忙于个人利益，在政治上保持中立。

此外，在各种变化各异、林林总总的利益和政治立场中，希特勒唯一保持稳定的就是行动的速度。这就是他统治的政治秘籍。他单纯增加决策和行动过程的密度，来阻止分崩离析。他在运动中保持纳粹党的鲜活性。他强化老战士、省党部头目和帝国领导的积极性远胜于部长。1933 年以后，他的统治取得成果的原因就在于未将单独执政的党派当做政府的附属品。他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动员国家机器，为民族崛起积极行动，将国家的力量使用到极致。大多数德国人一开始为之欣喜，随后为历史的高速发展心醉神迷，后来随着大面积轰炸、国内登峰造极的恐怖活动以及斯大林格勒战役，他们处在一种麻醉状态。空袭并未引起恐慌，而是导致了一种漠视的态度，人们听天由命，泰然处之。前线的伤亡使后方的人们万分担忧，他们渴望得到前方的儿子、丈夫或恋人平安的消息。

357

1933 年至 1945 年间的短短十二年里，德国人时时经历例外时期。走马灯般发生的事件使他们头晕目眩，不知就里。“一切仿佛在戏里，”维克多·克伦佩雷尔的出版商弗格尔在 1938 年的苏台德危机后这样说道。一年之后，远征波兰开始后九天，戈林对柏林莱茵金属公司的工人们保证，他们可以信赖政府，“我想说，政府正在蓄势待发”。1941 年春天，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从早到晚处于高速运行状态”；

"现在疯狂的进攻生活重又开始"——或在对抗英国的心醉神迷中——"我一整天都幸福得发狂"。

希特勒经常在一个小圈子里暗示自己将死,以此保证政治平衡所需要的极速。他正如业余走钢丝演员,只能以越来越快、渐至疯狂的运动来保持自身平衡。因此,尽管希特勒对未来进行了轰炸式宣传,在分析希特勒的政治和军事决定时,仍必须研究和整理它们的短期企图和意图在不久的将来达到的目的,这样才能作出正确的分析。

种族和阶级意识 358

除了开头提到的对凡尔赛和平专制的彻底复辟外,当时并不为人所知的、未经过成熟考虑的政治决定和行动的提速成为了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获得胜利的第二个重要原因。战争加速了这两个时刻的到来。它从军事上促成了对主权的复辟并使得这一趋势显得不可逆转。因此,德国历史学家在1941年就在考虑重新取回从帝国联盟中被割让出去的自由郡勃艮第和"低地地区"。而且在闪电战的那两年里,进攻的速度越来越快,每一次大的军事行动都是跳跃着进行的:在华沙之后是纳尔维克和鹿特丹,在法国之后是克里特岛、高加索地区和北非。

希特勒的第三个重要支持产生于人民平等的许诺。很多德国人从1939年9月1日开始实行的战争社会主义中看到了某种可信的、有一定阴暗面的较公正的社会制度的雏形。战争加速了德国阶级壁垒的瓦解。对纳粹领导层来说,需要保障的是,在短缺时期,对每一个国民的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在不受他们的社会地位和收入影响的前提下是相同的。只有特别辛苦的工作或有特殊需要的时候,才允许有例外。1940

年初，一名社会民主党的观察员从柏林报道说：“对于那些‘较富有的人’事实上的减少，工人阶级是完全赞成的。”定量供给政策提高了政府富于同情心的形象。

希特勒不断地鼓吹，他的目标是让那些即使是既出身贫寒也没有受到教育但有能力的人获得社会成就。他的信条是，禁止对持续性成359 长的牵制。他将国家政治教育机构和阿道夫·希特勒学校作为在身体上和教育上弥补社会赤字的机制。这样，只要具备了一定的前提条件，就是最穷的年轻人也能够提高其社会地位。后来，联邦德国领导层的很多人都是这些较高层次的、不需付任何学费的——这在当时很不寻常——学校的毕业生。希特勒在 1938 年的一次演讲中说：“从现在起，每一个受主保佑和祝福的工人和农民的孩子，在新的德国都应该获得通过我们组织的方法和帮助并借助于慎重的领导选拔而上升到国家最高领导层的机会。”1942 年 10 月，东线前线的阵亡消息促使军队的高层不再考虑教育背景而向年轻人敞开军官选拔这扇大门，德国人都热情地响应。他们把这看成政党程序中一个重要方针的实现。依据同样的程序，在 1933 年之后，一个所谓的雅利安男人不允许跟一个所谓的犹太女人结婚，但在德国历史上首次允许一个军官跟一个工人家庭的女孩结婚，只要他们双方根据遗传卫生学的标准被正式认定是适合结婚的就可以了。

当第三帝国最终被盟军打败并变成一片废墟时，弗里茨·赖因哈特在 1945 年 1 月 16 日还对已经几乎无望的未来作了一番展望。他对公众声称，政府每年在儿童津贴和教育津贴方面的投资多于 10 亿帝国马克。这一数额在当时来看是非常高的。他还继续表示，下一步是减轻家庭的负担，很快战争结束之后，所有学校和学生的学费、书本费和

学习设施费用以及上专科学校和高等学校的费用都要被免除。通过这些方式，一个政治、经济和财政方面健康和强大的大德国将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福利国家出现在人们面前。 360

这种尽管在方法上不同但也是以他人的代价为基础的大众社会动员属于20世纪政治思想的核心部分。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国家社会主义就属于这个范畴。人们可以把这种种族主义的平等思想作为一种扭曲了的平等思想来看待。但首先，这种对个体自由的蔑视和对个人道德的忽视表明了财产平均主义的不同形式。其次，纳粹运动代表了一种不仅仅在德国很有影响的构想，即将社会平均和民族平均联系起来的构想。这样就可以解释，希特勒的民族国家是在什么样的国内政治和社会政治状况下获得其罪恶的力量的。

由于德国人不想再一次因为单纯的爱国主义而导致战争，因为他们在1939年秋天对此表示了怀疑，因此在政治上重要的就是，他们要立即并明显地参与到众多侵略活动的经济投入中去。社会政策和种族政策的统一，以及在当时来说没有任何先例的社会政治方面的姑息，一次次地巩固着大众信仰。因此，第三帝国的政治投机泡沫能够坚持那么久；因此，那些投机者能够破坏如此多人的幸福和生活。

在前面描述过的多种多样的公共贪婪和国家社会主义的获利形式，使得通过交错使用宽松的税收政策、富裕的供应和有选择地对社会边缘人员实施恐怖等手段促使人民大众保持最起码的安静成为可能。那种纳粹首领所追求的得到人民认可的政治状态理所当然地促使了德国人好心情的产生。戈培尔说："它是一种战争信条，在很多情况下，它不仅对战争来说是重要的，而且是决定性的。"尽管是短期的，但这种以他人付出代价而对德国大众情绪进行实质刺激正是当时统治的重要目标。

361 如果这样考量的话,纳粹首脑并没有将德国人的大多数变成狂信者或被说服的嗜权成性的人,而是更多地使他们成了受惠人。很多人都产生了一种进人到堆满黄金的墓穴中的感觉,感觉好像在不久的未来就能看到钞票满地一样。当国家在总体上变成了一部侵略机器的时候,普通老百姓就变成了受益者和被动的受贿者,士兵就成了武装着的运送黄油的司机。

普通人占有了某样东西,但他们事前却并不知道有这样一个东西存在。他们参与了据说应该很伟大的战役,其伟大之处是会迎来一个遍地流淌着牛奶和蜂蜜的未来德国,但这对他们自己来说并不是一个有说服力的动机。战争本身通过这样一个简单的"我们今天怎样占领,我们明天就怎样生活"的口号促使人们去期待,战争之后的生活会有多么舒适,它将会提供怎样的享受。这个口号蕴涵了一种负面的不好的想法,即只能获得胜利,不然就是灭亡。1943 年末,帝国保安部就这样概括那些跟数百万其他人一样还定期储蓄的德国人的观点:如果我们赢得了战争,我们将能够很好地花掉我们的钱……如果我们输掉了战争,那我们现在是进行储蓄还是购买商品或土地都是一样的,因为那时我们将失去所有东西。

1945 年,英国军官尤利乌斯·波泽纳回到了他的德国故乡。他从下莱茵地区走到了被炸成废墟的科隆。之前,他曾在意大利前线待过。"在 1944 年到 1945 年的那个寒冷的冬季,数以百计的那不勒斯人饿死街头,包括社会上的较高阶层在内的所有人都衣衫褴褛、脸色苍白而且完全绝望。"在法国,战争没有如此彻底。"但跟那边相比稍好的是,在德国,穿着白色衫裙的少女在城市的废墟前作夜间的散步。"

362 尽管破坏的规模超出了他的想象,作为建筑师的波泽纳还是预料到了战争对城市的破坏。但人们的外表却使他感到意外:"他们跟这破

败的景象并不相符。他们看起来很好,美丽、健康、整洁并且穿得也不错。一种依靠数百万陌生人的工作并通过对整个世界的掠夺而一直保存到最后的经济制度在这里展示了它的结果。”

如果要谈论纳粹主义和种族清洗,那就不可避免地必须提及数百万普通德国人从中所获得的好处。

参考文献

Aalders, Gerhard: *Geraubt! Die Enteignung jüdischen Besitzes im Zweiten Weltkrieg*, Köln 2000.

Abelshauser, Werner: Kriegswirtschaft und Wirtschaftswunder. Deutschlands wirtschaftliche Mobilisierung für den Zweiten Weltkrieg und die Folgen für die Nachkriegszeit, in: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47(1999), S. 503—538.

Abschöpfüngsprobleme auch in der Slowakei, in: *Bank-Archiv*, 1943, S. 114 f.

Adler, H. G.: *Der verwaltete Mensch. Studien zur Deportation der Juden aus Deutschland*, Tübingen 1974.

Albrecht, G.: Bericht über die deutsche Kriegsfinanzierung, in: *Finanzarchiv* N. F. 7(1940), S. 517—532.

Albrecht, G.: Die Unterstützung der Familien Einberufener. Entwicklung und gesetzliche Grundlagen, in: *Jahrbücher der Nationalökonomie und Statistik* 151(1940), S. 66—84.

Aly, Götz (Hg.): Das Posener Tagebuch des Hermann Voss, in: *Biedermann und Schreibtischtäter* (Beiträge zu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Gesundheits- und Sozialpolitik, Bd. 4), Berlin 1987, S. 15—66.

Aly, Götz/Heim, Susanne: *Vordenker der Vernichtung. Auschwitz und die deutschen Pläne für eine neue europäische Ordnung*, Hamburg 1991.

Aly, Götz: *》Endlösung《. Völkerverschiebung und der Mord an den europäischen Juden*, Frankfürt a. M. 1995.

Aly, Götz: *Macht, Geist, Wahn. Kontinuitäten deutschen Denkens*, Berlin 1997.

Aly, Götz: *Rasse und Klasse. Nachforschungen zum deutschen Wesen*, Frankfurt a. M. 2003.

Aly, Götz: *Im Tunnel. Das kurze Leben der Marion Samuel 1931—1943*, Frankfurt a. M. 2004.

Ancel, Jean: Seizure of Jewish Property in Romania, in: *Confiscation of Jewish Property in Europe, 1933—1945*. New Sources and Perspectives (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 Symposium Proceedings), Washington, DC 2003, S. 43—56.

Angel, Marc D.: *The Jews of Rhodes. The History of a Sephardic Community*, New York 1980.

Apostolou, Andrew: 》The Exception of Saloniki《: Bystanders and Col-



laborators in Northern Greece, in: *Holocaust and Genocide Studies*, 14(2000), S. 165—196.

Arnoult, Pierre u. a.: *La France sous l'occupation*, Paris 1959.

Arnoult, Pierre: Les finances de la France sous l'occupation, in: Arnoult u. a., *La France*, S. 39—56.

Assa, Aaron: *Macedonia and the Jewish People*, Skopje 1994.

Azzolini, Vicenzo: Die Technik der Finanzierung der italienischen Kriegswirtschaft, in: *Bankarchiv*, Jg. 1942, S. 44—47.

Bajohr, Frank: *》Arisierung《 in Hamburg. Die Verdrängung der jüdischen Unternehmer 1933—1945*, Hamburg 1997.

Bajohr, Frank: 》... dann bitte keine Gefühlsduseleien.《 Die Hamburger und die Deportationen, in: *Die Deportation der Hamburger Juden* 1941—1945, Hamburg 2002.

Banken, Ralf: Die deutsche Goldreserven- und Devisenpolitik 1933—1939, in: *Jahrbuch für Wirtschaftsgeschichte*, 2003/1, S. 49—78.

Bankier, *David: Die öffentliche Meinung im Hitler-Staat. Die 》Endlösung《 und die Deutschen. Eine Berichterstattung*, Berlin 1995.

Bark, Harry: *Quellen und Methoden der Deutschen Kriegsfinanzierung im Weltkriege und heute*, Wirtschaftswiss. Diss., Göttingen 1941.

Bayrhoffer, Walther: Die alte und die neue Reichsbank, in: *Deutsche Geldpolitik* (Schriften der Akademie für Deutsches Recht. Gruppe Wirtschaftswissenschaft, Nr. 4), hg. vom Präsidenten der Akademie für Deutsches Recht, Reichsminister Dr. Hans Frank, Berlin 1941, S. 88—102.

Beer, Wilfried: *Kriegsalltag an der Heimatfront. Alliierter Luftkrieg und deutsche Gegenmaßnahmen zur Abwehr und Schadensbegrenzung, dargestellt für den Raum Münster*, Bremen 1990.

Benning, Bernhard: Der Anstieg von Besteuerung und öffentlicher Verschuldung im Ausland und in Deutschland, in: *Bank-Archiv*, Jg. 1940, S. 39—41.

Benning, Bernhard: Abschöpfung durch Anleihebegebung, in: *Bankwirtschaft*, Jg. 1943, S. 117—121.

Benning, Bernhard: Expansion und Kontraktion der Geldmenge, in: *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 58(1943,2), S. 205—244.

Benz, Wolfgang (Hg.): *Die Juden in Deutschland* 1933—1945. *Leben unt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r Herrschaft*, München 1989.

Bisky, Jens: Wenn Jungen Weltgeschichte spielen, haben Mädchen stumme Rollen, *Süddeutsche Zeitung*, 24.9.2003.

Bissinger, Edgar (Hg., Zentralbüro der DAF): *Das musst du wissen!*

Arbeitsrecht, Sozialversicherung, Familienunterhalt usw. im Kriege (2., vollst, umgearb. Aufl.), Berlin 1941.

Blank, Ralf: Ersatzbeschaffung durch 》Beutemachen《. Die 》M-Aktion《- ein Beispiel nationalsozialistischer Ausplünderungspolitik, in: Kenkmann, Alfons/Rusinek, Bernd-A. (Hg.): *Verfolgung und Verwaltung. Die wirtschaftliche Ausplünderung der Juden und die westf?lischen Finanzbehärden*, Münster 1999, S. 87—101.

Blümich, Walter: *Körperschaftsteuer-Gesetz vom 16. Oktober 1934 in der Fassung der Änderungsgesetze von 1936 und 1938, mit Durchführungsverordnungen und Verwaltungsanweisungen*, Berlin 1939.

Blümich, Walter: *Einkommensteuergesetz. Mit Durchführungsverordnungen und Verwaltungsanweisungen*, 5. Aufl., Berlin 1943.

Boberach, Heinz (Hg.): *Meldungen aus dem Reich* 1938—1945. *Die geheimen Lageberichte des Sicherheitsdienstes der SS*, Herrsching 1984.

Böhler, Jochen: *Auftakt zum Vernichtungskrieg. Die Wehrmacht in Polen* 1939, Phil. Diss., Köln 2004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2005).

Boelcke, Willi A. (Hg.): *Wollt Ihr den totalen Krieg? Die geheimen Goebbels-Konferenzen 1939—43*, Stuttgart 1967, hier: Herrsching 1989.

Boelcke, Willi A.: Kriegsfinanzierung im internationalen Vergleich. Globale Wesenszüge der Kriegsfinanzierung unter theoretischen Aspekten, in: Forstmeier, Friedrich/Volkmann, Hans-Erich (Hg.): *Kriegswirtschaft und Rüstung 1939—1945*, Düsseldorf 1977, S. 14—72.

Boelcke, Willi A.: *Die Kosten von Hitlers Krieg. Kriegsfinanzierung und finanzielles Kriegserbe in Deutschland 1933—1948*, Paderborn 1985.

Boelcke, Willi A.: Die Finanzpolitik des Dritten Reiches. Eine Darstellung in Grundzügen, in: Bracher u. a. (Hg.), *Deutschland*, Düsseldorf 1992, S. 95—117.

Boelcke, Willi A.: Veränderungen im Aktivgeschäft der Sparkassen während der Zeit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in: *Zeitschrift für bayerische Sparkassengeschichte* 13(1999), S. 29—51.

Böll, Heinrich, Werke, Bd. 7: *Essayistische Schriften und Reden 1, 1952—1963*, hg. von Bernd Balzer, Köln 1978.

Böll, Heinrich: *Briefe aus dem Krieg 1939—1945*, 2 Bde., hg. und kommentiert von Jochen Schubert, mit einem Vorwort von Annemarie Boll und einem Nachwort von James H. Reid, Köln 2001.

Bohn, Robert: *Reichskommissariat Norwegen. 》Nationalsozialistische Neuordnung《 und Kriegswirtschaft*, München 2000.



Bongs, Rolf: *Harte herrliche Straße nach Westen*, Berlin 1942.

Bracher, Karl Dietrich/Funke, Manfred/Jacobsen, Hans-Adolf (Hg.): *Deutschland 1933—1945. Neue Studien zu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Herrschaft*, Düsseldorf 1992.

Bräutigam, Otto: *Überblick über die besetzten Ostgebiete während des Zweiten Weltkrieges*, Tübingen 1954.

Buchheim, Christoph: Die besetzten Länder im Dienste der deutschen Kriegswirtschaft während des Zweiten Weltkriegs, in: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34(1986), S. 117—145.

Bundesarchiv: *Der Verbleib der Unterlagen der Deutschen Reichsbank. Ein Rechercheberecht, MS*, [Berlin], August 1998.

Burkert, Hans-Norbert (Hg.): 900 *Tage Blockade Leningrad. Leiden und Widerstand der Zivilbevölkerung im Krieg*, Teil II, Text, Quellen, Dokumente, Berlin 1991.

Burkheiser, Karl: Quellen und Methoden der Kriegsfinanzierung, in: *Finanzarchiv* N. F. 8(1941),S. 29—69.

Busch, Alfred: Finanzaufgaben der Banken im Kriege, in: *Bankwirtschaft*, Jg. 1944, S. 4—8.

Carpi, Daniel: *Between Mussolini and Hitler. The Jews and the Italian Authorities in France and Tunesia*, Hanover, NH 1994.

Chary, Frederick B.: *The Bulgarian Jews and the Final Solution, 1940—1944*, Pittsburgh 1972.

Chemnitz, Walter: *Frauenarbeit im Kriege*, Berlin 1926.

Ciano, Count Galeazzo: *The Ciano Diaries 1939—1943*, hg. von Hugh Gibson, New York 1946.

Clausen: Deutsches Vollstreckungswesen im Dritten Reich, in: *Deutsche Gerichtsvollzieher-Zeitung* 54(1934), S. 360—362.

Correspondentie van M. M. Rost van Tonningen, deel I: 1921-mei 1942 (Rijksinstituut voor Oorlogsdocumentatie. Bronnenpublicaties Documenten; Nr. 1), ingeleid en uitg. door E. Fraenkel-Verkade in samenwerking met A. J. van der Leeuw, 's-Gravenhage 1967.

Correspondentie van M. M. Rost van Tonningen, deel II: *Mei 1942-mei 1945* (Rijksinstituut voor Oorlogsdocumentatie. Bronnenpublicaties Documenten; Nr. 1), ingeleid en uitg. door E. Fraenkel-Verkade in samenwerking met A. J. van der Leeuw, 's-Gravenhage 1993.

Dennler, Wilhelm: *Die böhmische Passion*, Freiburg i. Br. 1953.

Deutschlandberichte der Sozialdemokratischen Partei Deutschlands (Sopade), Bd. 7 (1940), Frankfurt a. M. 1980.

Deutsches Geld- und Bankwesen in Zahlen 1976—1975, hg. von der

Deutschen Bundesbank, Frankfurt a. M. 1976.

Dietrich, Hugo: Zur Verordnung über den Aktienbesitz und ihre Durchführungsverordnungen, in: *Soziale Praxis*, Jg. 1942, S. 519—531.

Documents on the History of the Greek Jews. Records from the Historical Archives of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Hg.: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Greece, Univ. of Athens, Dep.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ed & edited by Photini Constantopoulou 8c Thanos Veremis, Athens 1998.

Dörner, Bernward: 》*Heimtücke*《. *Das Gesetz als Waffe. Kontrolle, Abschreckung und Verfolgung in Deutschland 1933—1945*, Paderborn 1998.

Donner, Otto: Grenzen der Staatsverschuldung, in: *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 56(1942), S. 183—266.

Donner, Otto: Staatsform und Staatsverschuldung, in: *Bankwirtschaft*, Jg. 1943, H. 1 (1.4.1943), S. 1—5.

Donner, Otto: Valutapolitik im Kriege. Ein Beitrag zur auβenwirtschaftlichen Problematik fester Wechselkurse bei unstabilen Kaufkraftparitäten, in: *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 58 (1943), S. 27—50.

Donner, Otto: Die deutsche Kriegswirtschaft, in: *Nauticus*, *Jahrbuch für Deutschlands Seeinteressen* 27(1944), S. 397—431.

Doorslaer, Rudi van: Raub und Rückerstattung jüdischen Eigentums in Belgien, in: Goschler/Ther (Hg.): *Raub und Restitution*, Frankfurt a. M. 2003, S. 134—153.

Dreβen, Wolfgang (Hg.): *Betrifft*: 》*Aktion* 3《. *Deutsche verwerten jüdische Nachbarn. Dokumente zur Arisierung*, Berlin 1998.

Dreyfus, Jean-Marc: *Pillages sur ordonnances. Aryanisation et restitution des banques en France 1940—1943*, Paris 2003.

Dreyfus, Jean-Marc: Die Enteignung der Juden in Westeuropa, in: Goschler/Ther (Hg.), *Raub und Restitution*, Frankfurt a. M. 2003, S. 41—57.

Dreyfus, Jean-Marc/Gensburger, Sarah: *Des camps dans Paris. Austerlitz*, *Leviatan*, *Bassano*, *juillet 1943 – aoüt 1944*, Paris 2003.

Driβner, Ulrike: *Die Deportation der Thessaloniker Juden während der Zeit der deutschen Besatzung von April* 1941 *bis August* 1943, Geschichtswiss. Magisterarbeit (MS), Universität Stuttgart 1990.

Ebbinghaus, Angelika/Kaupen-Haas, Heidrun/Roth, Karl Heinz (Hg.): *Heilen und Vernichten im Mustergau Hamburg. Bevölkerungs- und Gesundheitspolitik im Dritten Reich*, Hamburg 1984.

Eckert, Rainer: Die wirtschaftliche Ausplünderung Griechenlands durch seine deutschen Okkupanten vom Beginn der Besetzung im April 1941 bis zur Kriegswende im Winter 1942/43, in: *Jahrbuch für Wirtschaftsgeschichte*, Bd. 36 (1988), S. 233—266.

Eckert, Rainer: *Vom 》Fall Marita《 zur 》wirtschaftlichen Sonderaktion《. Die deutsche Besatzungspolitik in Griechenland vom* 6. *April* 1941 *bis zur Kriegswende im Februar/März 1943*, Frankfurt a. M. 1992.

Eggenkämper, Barbara/Rappel, Marian/Reichel, Anna: Der Bestand Reichswirtschaftsministerium im 》Zentrum für die Aufbewahrung historisch-dokumentarischer Sammlungen《 (》Sonderarchiv《) in Moskau, in: *Zeitschrift für Unternehmensgeschichte* 43 (1998), S. 227—236.

Eheberg, Karl: Finanzen im Weltkrieg, in: *Handwö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 4. Aufl., Bd. 4, S. 75—86.

Eichholtz, Dietrich (Hg.): Die Richtlinien Görings für die Wirtschaftspolitik auf dem besetzten sowjetischen Territorium vom 8. November 1941, in: *Bulletin des Arbeitskreises 》Zweiter Weltkrieg《*, Nr. 1—2/1977, S. 73—111.

Eichholtz, Dietrich: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Kriegswirtschaft 1939—1945*, Bd. 1, Berlin 1984.

Eichholtz, Dietrich: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Kriegswirtschaft 1939—1945*, Bd. 2, Berlin 1985.

Eichholtz, Dietrich: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Kriegswirtschaft 1939—1945*, Bd. 3, München 1999.

Epmeier, Ernst: *Das finanzielle Kriegspotential Deutschlands und Englands. Ein Vergleich und seine Problematik*, Diss., Innsbruck 1942.

Erhard, Ludwig: *Kriegsfinanzierung und Schuldenkonsolidierung; Faksimiledruck der Denkschrift von* 1943/44, Frankfurt a. M. 1977.

Etmektsoglou-Koehn, Gabriella: *Axis Exploitation of Wartime Greece, 1941—1943*, Ann Arbor, Mich. 1995.

Der 》Fall Koppen《 und seine Lehren, in: *Deutsche Gerichtsvollzieher-Zeitung* 54 (1934), S. 341—343.

Familienunterhalt, hg. vom Oberbürgermeister der Stadt der Reichsparteitage Nürnberg, Abt. für Familienunterhalt, Mai 1940.

Das Familienunterhaltswesen und seine praktische Handhabung. Systematische, erläuternde Darstellung, hg. vom Deutschen Verein für öffentliche und private Fürsorge, Leipzig, Berlin 1943.

Fasse, Norbert u. a.: *Nationalsozialistische Herrschaft und Besatzungszeit. Historische Erfahrung und Verarbeitung aus*

niederländischer und deutscher Sicht, Münster 2000.

Faulstich, Heinz: *Hungersterben in der Psychiatrie 1914—1949. Mit einer Topographie der NS-Psychiatrie*, Freiburg i. Br. 1998.

Federau, Fritz: Kriegsfinanzierung aus dem Geldmarkt, in: *Der Deutsche Volkswirt* 14(1939/40), S. 1912 f.

Federau, Fritz: Die deutsche Geldwirtschaft in der Jahreswende 1940/41, in: *Deutsche Sparkassen-Zeitung*, Jg. 1941 (20.2.), S. 1 f.

Federau, Fritz: *Die deutsche Geldwirtschaft*, Berlin 1949.

Federau, Fritz: *Der Zweite Weltkrieg. Seine Finanzierung in Deutschland*, Tübingen 1962.

Fleischer, Adolf: *Kriegsfinanzierung unter Einschluss des totalen Krieges*, Berlin 1939.

Fleischer, Hagen: *Im Kreuzschatten der Mächte. Griechenland 1941—1944 (Okkupation, Resistance, Kollaboration)*, Frankfurt a. M. 1986.

Fleischer, Hagen: Griechenland, in: Benz, Wolfgang (Hg.): *Dimension des Völkermords. Die Zahl der jüdischen Opfer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München 1991, S. 241—274.

Franco, Hizkia M.: *The Jewish Martyrs of Rhodes and Cos*, Harare 1994.

Friedenberger, Martin/Gössel, Klaus-Dieter/Schönknecht Eberhard (Hg.): *Die Reichsfinanzverwaltung im Nationalsozialismus. Darstellung und Dokumente*, Bremen 2002.

Friedrich, Jörg: *Der Brand. Deutschland im Bombenkrieg 1940—1945*, München 2002.

Gedanken zur Neugestaltung des Vollstreckungsrechts, in: *Deutsche Gerichtsvollzieher-Zeitung* 54(1934), S. 147—153.

Ein offenes Geheimnis. 》Arisierung《 in Alltag und Wirtschaft in Oldenburg zwischen 1933 und 1945, hg. von Werkstattfilm e. V., Oldenburg 2001.

Genschel, Helmut: *Die Verdrängung aus der Wirtschaft im Dritten Reich*, Göttingen 1966.

Gericke, Bodo: *Die deutsche Feldpost im Zweiten Weltkrieg. Eine Dokumentation über Einrichtung, Aufbau, Einsatz und Dienste* (Archiv für deutsche Postgeschichte, Heft 1,1971).

Gerlach, Christian: *Krieg, Ernährung, Välkermord. Forschungen zur deutschen Vernichtungspolitik im Zweiten Weltkrieg*, Hamburg 1998.

Gerlach, Christian: Kalkulierte Morde. *Die deutsche Wirtschafts-und Vernichtungspolitik in Weißrussland* 1941 *bis* 1944, Hamburg 1999.

Gerlach, Christian/Aly, Götz: *Das letzte Kapitel. Ideologie, Realpolitik und der Mord an den ungarischen Juden 1944—1945*, Stuttgart



2002.

Gilbert, Martin: *The Holocaust. A History of the Jews of Europe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New York 1987.

Gillingham, John: The 》Deproletarianization《 of German Society: Vocational Training in the Third Reich, in: *Journal of Social Histoy* 19/3 (1986), S. 423—432.

Goebbels, Joseph: *Die Tagebücher*, hg. von Fröhlich, Elke, Teil I und II, München 1996 ff.

Goerdeler, Carl Friedrich: *Politische Schriften und Briefe* , 2 Bde. , hg. von Gillmann, Sabine/Mommsen, Hans, München 2003.

Göttel, Heinrich: *Steuerrecht*, Leipzig 1939.

Goldtransaktionen im Zweiten Weltkrieg: *Kommentierte statistische Übersicht. Ein Beitrag zur Goldkonferenz in London*, 2.–4. Dezember 1997, ausgearbeitet von der unabhängigen Expertenkommission Schweiz – Zweiter Weltkrieg, Bern, Dezember 1997.

Goschler, Constantin/Ther, Philipp (Hg.): *Raub und Restitution. 》Arisierung《 und Rückerstattung des jüdischen Eigentums in Europa*, Frankfurt a. M. 2003.

Grimm, Jacob/Grimm, Wilhelm: *Deutsches Wörterbuch.* Erster Band, Leipzig 1854.

Grosa, Karl: *Die wirtschaftspolitischen Zielsetzungen der deutschen Steuergesetzgebung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ihrer betriebswirtschaftlichen Auswirkungen*, Wien 1942.

Guillebaud, Claude W.: *The Social Policy of Nazi Germany.* Cambridge 1941, New York 1971.

Handbuch über die Beamten der Deutschen Reichsbank 1941, abgeschlossen mit den Personalveränderungen vom 12. Juni 1941, Berlin 1941.

Hachmeister, Lutz: *Schleyer. Eine deutsche Geschichte*, München 2004.

Hahn, Paul: *Die griechische Währung und währungspolitische Maßnahmen unter der Besetzung 1941—1944* (Studien des Instituts für Besatzungsfragen in Tübingen zu den deutschen Besetzungen im 2. Weltkrieg, Nr. 10), Tübingen 1957.

Halder, Franz: *Kriegstagebuch. Tägliche Aufzeichnungen des Chefs des Generalstabes des Heeres 1939—1942*, bearb. von Jacobsen, Hans-Adolf, 3 Bde., Stuttgart 1962—1964.

Hamann, Brigitte: *Hitlers Wien. Lehrjahre eines Diktators*, München 1996.

Hansen: Nationalsozialistische Rechtsgestaltung in der Zwangsvollstreckung, in: *Deutsche Gerichtsvollzieher-Zeitung* 55 (1935), S. 262—265.

Hansmeyer, Heinrich-Karl/Caesar, Rolf: Kriegswirtschaft und Inflation (1936 bis 1948), in: *Währung und Wirtschaft in Deutschland 1976—1975*, hg. von der Deutschen Bundesbank, Frankfurt a. M. 1976.

Hartlaub, Felix: *In den eigenen Umriss gebannt. Kriegsaufzeichnungen, literarische Fragmente und Briefe aus den Jahren 1939 bis 1945*, 2 Bde., hg. von Gabriele Liselotte Ewenz, Frankfurt a. M. 2002.

Hassell, Ulrich von: *The Von Hassell Diaries 1938—1944*, Garden City, N. Y. 1947.

Hauser, Josef: *Einsatz-Familienunterhaltsgesetz vom 26. Juni 1940*, München 1942.

Heiber, Beatrice/Heiber, Helmut (Hg.): *Die Rückseite des Hakenkreuzes. Absonderliches aus den Akten des Dritten Reiches*, München 1993.

Heilmann, H. D. (Hg.): Aus dem Kriegstagebuch des Diplomaten Otto Br? utigam, in: *Biedermann und Schreibtischtäter. Materialien zur deutschen Täter-Biographie* (Beiträge zu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Gesundheits- und Sozialpolitik, Bd. 4), Berlin 1987, S. 123—187.

Heim, Susanne: 》Deutschland muss ihnen ein Land ohne Zukunft sein.《 Die Zwangsmigration der Juden 1933 bis 1938, in: *Arbeitsmigration und Flucht. Vertreibung und Arbeitskr》fteregulierung im Zwischenkriegseuropa* (Beitr《ge zu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Gesundheits-und Sozialpolitik, Bd. 11), Berlin 1993, S. 48—81.

Heim, Susanne/Aly, Götz (Hg.): *Bevölkerungsstruktur und Massenmord. Neue Dokumente zur deutschen Politik der Jahre 1938—1945* (Beiträge zu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Gesundheits- und Sozialpolitik, Bd. 9), Berlin 1991.

Heim, Susanne/Aly, Götz: Staatliche Ordnung und 》organische Lösung《. Die Rede Hermann Görings》über die Judenfrage《 vom 6. Dezember 1938, in: *Jahrbuch für Antisemitismusforschung*, Bd. 2, Frankfurt a. M. 1993, S. 378—405.

Henning, Friedrich Wilhelm: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Steuerpolitik. Programm, Ziele und Wirklichkeit, in: Schremmer (Hg.), *Steuern*, 1994, S. 197—211.

Herbert, Ulrich: *Fremdarbeiter. Politik und Praxis des 》Ausländer-Einsatzes《 in der Kriegswirtschaft des Dritten Reiches*, Berlin 1985.

Herbert, Ulrich: *Best. Biographische Studien über Radikalismus, Weltanschauung und Vernunft, 1903—1989*, Bonn 1996.

Hillgruber, Andreas: *Hitlers Strategie. Politik und Kriegsführung 1940—1941*, Frankfurt a. M. 1965.

Hillgruber, Andreas (Hg.): *Staatsmänner und Diplomaten bei Hitler.*

Vertrauliche Aufzeichnungen über Unterredungen mit Vertretern des Auslandes 1942—1944, Frankfürt a. M. 1970.

Hillgruber, Andreas/Hümmelchen, Gerhard: *Chronik des Zweiten Weltkriegs. Kalendarium militärischer und politischer Ereignisse* 1939—1945, Bindlach 1989.

Hirschfeld, Gerhard/Krumeich, Gerd/Renz, Irina (Hg.): *Enzyklopädie Erster Weltkrieg*, Paderborn 2003.

Hitler, Adolf: *Mein Kampf*, München 1934.

Hitler, Adolf: Rede am 10. Dezember 1940 in Berlin vor Rüstungsarbeitern, in: Ders.: *Der großdeutsche Freiheitskampf. Reden Adolf Hitlers*, Bd. 2, vom März 1940 bis 16. März 1941, hg. von Bouhler, Philipp, München 1941, S. 333—362.

Hitlers Tischgespräche im Führerhauptquartier 1941—1942, aufgez. von Henry Picker, hg. v. Ritter, Gerhard, Bonn 1951.

Hitler, Adolf: *Monologe im Führerhauptquartier 1941—1944. Die Aufzeichnungen Heinrich Heims*, hrsg. v. Jochmann, Werner, Hamburg 1980.

Höffinghoff, Hellmuth: Die griechische Wirtschaft im Kriege, in: *Deutsch-Griechische Wirtschaftsnachrichten. Mitteilungen der Deutschen Handelskammer in Griechenland* 1(1943), H. 1 (Juni), S. 4—6.

Hoffmann, Walter: *Probleme der englischen Kriegsfinanzierung, in 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 51(1940), 570—594.

Hohrmann, Johannes/Lenski, Edgar: *Die Körperschaftsteuer* (Bücherei des Steuerrechts, Bd. 24), 2. Aufl., Berlin 1941.

Holzhauer, Georg: *Barzahlung und Zahlungsmittelversorgung in militärisch besetzten Gebieten, mit einer Einf. von H. Rittershausen*, Jena 1939.

IMG = *Der Prozess gegen die Hauptkriegsverbrecher vor dem Internationalen Militärgerichtshof. Nürnberg* 14. *November 1945—1.* Oktober 1946, 42 Bde., Nürnberg 1948.

Ioanid, Radu: *The Holocaust in Romania. The Destruction of Jews and Gypsies under the Antonescu Regime*, 1940—1944, Chicago 2000.

Janssen, Hauke: *Nationalökonomie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Die deutsche Volkswirtschaftslehre in den dreißiger Jahren*, Marburg 1998.

Jecht, Horst: *Kriegsfinanzen*, Jena 1938.

Jecht, Horst: Stand und Probleme der deutschen Kriegsfinanzierung, in: *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 51(1940), S. 464—489.

Jecht, Horst: Über einige grundsätzliche Fragen der deutschen Kriegswirtschaft und Kriegsfinanzierung, in: *Ananele economice si statistice*, Bukaresti 25(1942), S. 293—232.

Jessen, Jens: Kriegsfinanzen, in: *Wörterbuch der Volkswirtschaft*, 4. Aufl., Jena 1932, S. 674—682.

Jessen, Jens: *Deutsche Finanzwirtschaft*, Hamburg 1938.

Jessen, Jens: *Die Kriegswirtschaftsverordnung vom 4. September 1939. Erläuterungen*, Berlin 1939.

Jüdisches Lexikon, 4 Bde., Berlin 1927 [Reprint, Frankfurt a. M. 1987].

Junz, Helen B.: *Where did all the money go? Pre-Nazi Era Wealth of European Jewry*, Berne [Bern] 2002.

Kaemmel, Ernst/Bacciocco, Eduard: *Einkommensteuergesetz vom 16. Oktober 1934 unter Berücksichtigung aller einschlägigen Vorschriften, Veranlagungsrichtlinien und Verwaltungserlasse*, München, Berlin 1936.

Kaiser, Johann: *Die Politik des Dritten Reiches gegenüber der Slowakei 1939—1945. Ein Beitrag zur Erforschung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Satellitenpolitik in Südosteuropa*, Phil. Diss., Bochum 1969.

Kaiser, Johann: Die Eingliederung der Slowakei in die deutsche Kriegswirtschaft, in: *Das Jahr 1945 in der Tschechoslowakei*, hg. von Bosl, Carl, München 1971, S. 115—138.

Kasten, Helmut: *Die Neuordnung der Währung in den besetzten Gebieten und die Tätigkeit der Reichskreditkassen während des Krieges* 1939/40, Rechts-und Staatswiss. Diss., Berlin 1941.

Keiser, Günter: Spareinlagen der Banken, in: *Bankwirtschaft*, 1943, S. 77—79.

Keiser, Günter: Das fünfte Kriegsjahr der Banken, in: *Bankwirtschaft*, 1945, S. 29—33.

Keller, Robert v.: *Von der Kriegswirtschaft zur Friedenswirtschaft*, Stuttgart 1940.

Klein, Thomas (Hg.): *Die Lageberichte der Justiz aus Hessen* 1940—1945, Darmstadt 1999.

Klemperer, Victor: *Ich will Zeugnis ablegen bis zum letzten. Tagebücher* 1933—1941, Berlin 1995.

Klingemann, Hellmuth: *Die Biersteuer* (Bücherei des Steuerrechts, Bd. 46), 2. Aufl., Berlin 1943.

Klinkhammer, Lutz: *Zwischen Bündnis und Besatzung. Das 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land und die Republik von Salò 1943—1945*, Tübingen 1993.



Kolonomos, Zhamila/Veskovich-Vangeli, Vera: *The Jews in Macedonia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1941—1945). Collection of Documents*, 2 Bde., Skopje 1986.

Kretzschmann, Max: Reichskreditkassenscheine als Truppengeld, in: *Die Bank* 33(1940), S. 584—587.

Kretzschmann, Max: Deutsche Währungshilfe in den besetzten Gebieten, in: *Bank-Archiv*, 1941, S. 1—3.

Kretzschmann, Max: Die Reichskreditkassen, in: *Deutsche Geldpolitik* (Schriften der Akademie für Deutsches Recht. Gruppe Wirtschaftswissenschaft, Nr. 4), hg. vom Präsidenten der Akademie für Deutsches Recht, Reichsminister Dr. Hans Frank, Berlin 1941, S. 113—139.

Kriegstagebuch des Oberkommandos der Wehrmacht (Wehrmachtführungsstab) 1940—1945, geführt von Helmuth Greiner und Percy Ernst Schramm, hg. von Schramm, Percy Ernst, Frankfurt a. M. 1961—1965.

Krüger, Alf: *Die Lösung der Judenfrage in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Kommentar zur Judengesetzgebung*, Berlin 1940.

Krug von Nidda, Carl Ludwig: *Familienunterhalt der Angehörigen der Einberufenen*, Berlin 1941.

Krumme, F.: Der Spareinlagenzuwachs im Kriege, in: *Deutsche Sparkassen-Zeitung*, Jg. 1940 (12.9.), S. 1.

KTB, siehe *Kriegstagebuch.*

Kundrus, Birthe: *Kriegerfrauen. Familienpolitik und Geschlechterverhältnis im Ersten und Zweiten Weltkrieg*, Hamburg 1995.

Kwiet, Konrad: Nach dem Pogrom: Stufen der Ausgrenzung, in: Benz (Hg.), *Juden*, München 1989, S. 545—659.

Lanter, Max: *Die Finanzierung des Krieges. Quellen, Methoden und Lösungen seit dem Mittelalter bis Ende des Zweiten Weltkrieges 1939 bis 1945*, Luzern 1950.

Laskier, Michael M.: *North African Jew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Jews of Marocco, Tunisia, and Algeria*, New York 1995.

Latzel, Klaus: *Deutsche Soldaten – nationalsozialistischer Krieg. Kriegserlebnis – Kriegserfahrung 1939—1945*, Paderborn 1998.

Leeuw, A. J. van der: Der Griff des Reiches nach dem Judenvermögen, in: Paape (Hg.), *Studys*, 's-Gravenhage 1972, S. 211—236.

Leeuw, A. J. van der: Reichskommissariat und Judenvermögen in den Niederlanden, in: Paape (Hg.), *Studys*, 's-Gravenhage 1972, S. 237—249.

Lemkin, Raphael: *Axis Rule in Occupied Europe. Laws of Occupation.*

Analysis of Government. Proposais for Redress, Washington, D. C. 1944.

Lindner, Stephan H.: *Das Reichskommissariat für die Behandlung feindlichen Vermögens im Zweiten Weltkrieg, Eine Studie zur Verwaltungs-, Rechts-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des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Deutschlands*, Stuttgart 1991.

Lipscher, Ladislav: *Die Juden im slowakischen Staat 1939—1945*, München 1980.

Longerich, Peter: *Politik der Vernichtung. Eine Gesamtdarstellung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Judenverfolgung*, München 1998.

Lütge, Friedrich: Die deutsche Kriegsfinanzierung im ersten und zweiten Weltkrieg, in: Voigt, Fritz (Hg.): *Beiträge zur Finanzwissenschaft und Geldtheorie. Festschrift für Rolf Stucken*, Göttingen 1953, S. 243—257.

Maedel, Walter: *Das Reichsbewertungsgesetz*, 3. Aufl., Berlin 1941.

Margairaz, Michel (Hg.): *Banques, Banque de France et seconde guerre mondiale*, Paris 2002.

Mason, Timothy W. (Hg.): *Arbeiterklasse und Volksgemeinschaft. Dokumente und Materialien zur deutschen Arbeiterpolitik 1936—1939*, Opladen 1975.

Matkowski, Alexandar: *The History of the Jews in Macedonia*, Skopje 1982.

Mazower, Mark: *Inside Hitler's Greece. The Experience of Occupation, 1941—1944*, New Häven 2001.

Meimberg, Rudolf: Kaufkraftüberhang und Kriegsfinanzpolitik, in: *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 58(1943), S. 98—132.

Meimberg, Rudolf: Die Gewinnabführung in Deutschland als Kriegsgewinnsteuer, in: *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 60(1944), S. 349—364.

Meinen, Insa: *Wehrmacht und Prostitution während des Zweiten Weltkriegs im besetzten Frankreich*, Bremen 2002.

Meyer, Fritz: Die finanzielle Neuordnung in Serbien, in: *Bank-Archiv*, Jg. 1942, S. 310—312.

Michel, Henri: *Paris Allemand*, Paris 1981.

Milward, Allan S.: *Der Zweite Weltkrieg. Krieg,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1939—1945*, München 1977.

Mischaikov, D.: Bulgariens Wirtschafts-, Finanz-und Kreditsystem unter dem Einfluss des Krieges, in: *Bank-Archiv*, Jg. 1942, S. 49—52.

Moellenhoff, Gisela/Schlautmann-Overmeyer, Rita: *Jüdische Familien in Münster 1918—1945, T. l: Biographisches Lexikon*, Münster 1995.

Moellenhoff, Gisela/Schlautmann-Overmeyer, Rita: *Jüdische Familien in*

Münster 1918—1945, *T. 2,2*: *Abhandlungen und Dokumente 1935—1945*, Münster 2001.

Moeller, Hero: Aktuelle Grenzprobleme kreditärer Mittelaufbringung in der Staatswirtschaft, in: *Finanzarchiv*, N. F. 9 (1943), S. 95—116.

Molho, Michael (Hg.): *In Memoriam. Hommage aux victimes juives des nazis en Grèce*, Tessalonique 1948.

Molho, Michael (Hg.): *In Memoriam*, *gewidmet dem Andenken an die jüdischen Opfer der Naziherrschaft in Griechenland*, Essen 1981.

Moll, Martin (Hg.): 》*Führer-Erlasse*《 1939—1945. *Edition sämtlicher überlieferter*, *nicht im Reichsgesetzblatt abgedruckter*, *von Hitler während des Zweiten Weltkrieges schriftlich erteilter Direktiven aus den Bereichen Staat*, *Partei*, *Wirtschaft*, *Besatzungspolitik und Militärverwaltung*, Stuttgart 1997.

Neubacher, Hermann: *Sonderauftrag Südost* 1940—1945. *Bericht eines fliegenden Diplomaten*, 2. Aufl., Göttingen 1957.

Oberleitner, Gerhard: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Feldpost 1937—1945*, Innsbruck 1993.

Oermann, Josef/Meuschel, Hans: *Die Kriegssteuern* (Bücherei des Steuerrechts, Bd. 22), 2. Aufl., Berlin 1939.

Oermann, Josef: *Die arbeitsrechtliche und steuerrechtliche Behandlung der Ostarbeiter mit den ab 1. April 1944 gültigen Lohnsteuertabellen*, Berlin 1944.

Oermann, Josef: *Die Sozialausgleichsabgabe* (Bücherei des Steuerrechts, Bd. 47), 2. Aufl., Berlin 1944.

Oertel, Manfred: *Über die Deutsche Reichsbank im zweiten Weltkrieg* (MS), Gesellschaftswiss. Diss., Rostock 1979.

Oertel, Manfred: Besteuerung von Zwangsarbeitern als Mittel der Kriegsfinanzierung, in: *Fremdarbeiterpolitik des Imperialismus*, Heft 19, 1988, S. 71—73.

Oertel, Manfred: Die Kriegsfinanzierung, in: Eichholtz, *Geschichte*, Bd. III, München 1999, S. 681—737.

Ostermann, Josef/Meuschel, Hans: *Die Kriegssteuern* (Bücherei des Steuerrechts, Bd. 22), 2. erg. Aufl., Berlin, Wien 1939.

Paape, Abraham H. (Hg.): *Studies over Nederland in oorlogstijd*, deel 1, 's-Gravenhage 1972.

Pätzold, Kurt/Schwarz, Erika: 》*Auschwitz war für mich nur ein Bahnhof*《. *Franz Novak – der Transportofifizier Adolf Eichmanns*,

Berlin 1994.

Palairet, Michael R.: *The four ends of Greek hyperinflation of 1941—1946*, Copenhagen 2000.

Pantlen, Hermann: *Krieg und Finanzen*, Hamburg 1936.

Petrick, Fritz (Hg.): *Die Okkupationspolitik des deutschen Faschismus in Dänemark und Norwegen (1940—1945)* (Europa unterm Hakenkreuz, Bd. 7), Berlin 1992.

Petrov, Vladimir: *Money and Conquest. Allied Occupation Currencies in World War II*, Baltimore 1967.

Petzina, Dietmar: Soziale Lage der deutschen Arbeiter und Probleme des Arbeitseinsatzes während des Zweiten Weltkrieges, in: Dlugoborski, Waclaw (Hg.): *Zweiter Weltkrieg und sozialer Wandel. Achsenmächte und besetzte Länder*, Göttingen 1981, S. 65—86.

Pichler, Walter: *Zur Rolle der Sparkassen, Sitzungsprotokolle des Verwaltungsausschusses der Sparkasse*, Salzburg 1941—44.

Pfleiderer, Otto: Reichskreditkassen und Wehrmachtsbedarfsgeld, in: *Bank-Archiv*, Jg. 1942, S. 385—387.

Posener, Julius: *In Deutschland 1945 bis 1946*, Berlin 2001.

Präg, Werner/Jacobmeyer, Wolfgang (Hg.): *Das Diensttagebuch des deutschen Generalgouverneurs in Polen. 1939—1945*, Stuttgart 1975.

Prion, Willi: *Das deutsche Finanzwunder. Die Geldbeschaffung für den deutschen Wirtschaftsaufschwung*, Berlin-Wilmersdorf 1938.

Probleme der Kriegsfinanzierung. Vorträge, gehalten auf der ersten Arbeitstagung des Vereines deutscher Wirtschaftswissenschaftler, Jena 1940.

Puhl, Emil: Reichsbankarbeit im Kriege, in: *Die Staatsbank* 10(1941), S. 13—19.

Puhl, Emil: Währungsaufbau in Serbien, in: *Der Vierjahresplan* 58 (1941), S. 643—646.

Ranetsberger: Der Gerichtsvollzieher im Dritten Reich, in: *Deutsche Gerichtsvollzieher-Zeitung* 54(1934), S. 115—117.

Rass, Christoph: 》*Menschenmaterial*《: *Deutsche Soldaten an der Ostfront. Innenansichten einer Infanteriedivision 1939—1945*, Paderborn 2003.

Rath, Klaus: Sch? pferische Kriegsfinanzierung, in: *Wirtschaftsdienst* 25 (1940), S. 6—9.

Rath, Klaus: Sozialistische Kriegsfinanzierung, in: *National-Zeitung*, Ausg. A (Groβ- Essen), Nr. 47,16.2.1940.

Ray, Roland: *Annäherung an Frankreich im Dienste Hitlers. Otto Abetz*

und die deutsche Frankreichpolitik 1930—1942, München 2000.

Die Rechtsstellung der Juden in Frankreich, in: *Deutsch-Französische Wirtschaftszeitschrift* (La revue 6conomique Franco-Allemande) 1 (1942), Nr. 2 (Juni), S. 12—14.

Recker, Marie-Luis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Sozialpolitik im Zweiten Weltkrieg*, München 1985.

Reinhardt, Fritz: Grundsätze nationalsozialistischer Steuerpolitik, in: *Reichssteuerblatt 1934*, S. 1229.

Reinhardt, Fritz: *Die neuen Steuergesetze. Einfuhrung in die neuen Steuergesetze, Übersichten über die wesentlichen Änderungen gegenüber dem bisherigen Recht, Wortlaut der neuen Gesetze*, Berlin 1934.

Reinhardt, Fritz: Gemeinschaftsbedarf und seine Finanzierung nach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Grundsätzen, in: *Die Deutsche Volkswirtschaft* 10 (1941), S. 985—992.

Reinhardt, Fritz: *Passauer Vorträge, Teil II: Körperschaftsteuer*, Berlin 1941.

Reinhardt, Fritz: *Passauer Vorträge* 1942, *Teil I: Einkommensteuer* (Bücherei des Steuerrechts, Bd. 49), Berlin 1942.

Reinhardt, Fritz: *Was geschieht mit unserem Geld? Finanzen, Kaufkraft, Währung*, Nürnberg 1942.

Reisel, Berit/Bruland, Bjarte: *The Reisel/Bruland Report on the Confiscation of Jewish Property in Norway during World War II.* Part of Official Norwegian Report 1997: 22, (Oslo), June 1997. (Minderheitenbericht der am 29. 3. 1996 vom norwegischen Justizministerium eingesetzten Kommission.)

République Francaise: *La spoliation financifcre*, vol. II (Ouvrages de Mission d'étude sur la spoliation des juifs de France), Paris 2000.

Ritter, Harry R.: *Hermann Neubacher and the German Occupation of the Balcans, 1940—1945*, (MS) Ph. D., Univ. of Virginia 1969.

Roediger, Conrad: Die internationale Hilfsaktion für die Bevölkerung Griechenlands im zweiten Weltkrieg, in: *VfZ* 11 (1963), S. 49—71.

Roesle: Die Geburts-und Sterblichkeitsverhältnisse, in: Bumm, Franz (Hg.): *Deutschlands Gesundheitsverhältnisse unter dem Einfluss des Weltkrieges*, 2 Bde., Stuttgart 1928, Bd. 1, S. 3—61.

Rondholz, Eberhard: Eine längst vergessene Geschichte. Warum Johannes Rau um die Jüdische Gemeinde von Thessaloniki einen so großen Bogen gemacht hat, in: *konkret*, H. 8/2000.

Rosh, Lea/Jäckel, Eberhard: *》Der Tod ist ein Meister aus Deutschland《. Deportation und Ermordung der Juden, Kollaboration und*

Verweigerung in Europa, Hamburg 1990.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Occupied Europe. German Exploitation and its Post-War Consequences*, London 1944.

Rüther, Martin: Köln, 31. Mai 1942: *Der 1000-Bomber-Angriff* (Kapitel 》Reaktionen und Folgen《), Köln 1992.

Rummel, Walter/Rath, Jochen: 》*Dem Reich verfallen*《——》*den Berechtigten zurückerstattet*《. *Enteignung und Rückerstattung jüdischen Vermögens im Gebiet des heutigen Rheinland-Pfalz 1938—1953*, Koblenz 2001.

Safrian, Hans: *Die Eichmann-Männer*, Wien 1993.

Schachtschnabel, Hans G.: Frankreichs Finanzwirtschaft, in: *Bankwirtschaft*, 1(1943), S. 74—77.

Schielin, Irma: Der Familienunterhalt. Anwendung und Bewährung, in: *Jahrbücher für Nationalökonomie und Statistik* 157 (1943), S. 435—459.

Schlarp, Karl-Heinz: *Wirtschaft und Besatzung in Serbien 1941—1944. Ein Beitrag zu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Wirtschaftspolitik in Südosteuropa*, Stuttgart 1986.

Schmid, Heinz: *Kriegsgewinne und Wirtschaft. Die Aufgabe einer deutschen Kriegswirtschaftspolitik im Hinblick auf den Kriegsgewinn*, Oldenburg i. 0. 1934.

Schmidt, E. W.: Bilanz der Hauszinssteuerablösung, in: *Bankwirtschaft*, 1(1943), S. 72—74.

Schmitt, Bruno/Gericke, Bodo: *Die deutsche Feldpost im Osten und der Luftpostdienst Osten im Zweiten Weltkrieg* (Archiv für deutsche Postgeschichte, Heft 1, 1969).

Schmitt-Degenhardt, Hubert: *Die Vermögensteuer* (Bücherei des Steuerrechts, Bd. 26), 2. Aufl., Berlin 1941.

Schmölders, Günter: Probleme der Kriegsfinanzierung (Literaturbericht), in: *Finanzarchiv* N. F. 8(1941), S. 203—209.

Schöllgen, Gregor: *Willy Brandt. Die Biographie*, Berlin 2001.

Schönknecht, Eberhard: Die Ausbildung in der Reichsfinanzverwaltung 1933 bis 1945, in: Friedenberger u. a. (Hg.): *Die Reichsfinanzverwaltung*, Bremen 2002, S. 186—243.

Schöpf, Andreas: Fritz Reinhardt, in: Friedenberger u. a. (Hg.): *Reichsfinanzverwaltung*, Bremen 2002, S. 253—259.

Schremmer, Eckart (Hg.): *Geld und Währung vom 16. Jahrhundert bis zur Gegenwart. Referate der 14. Arbeitstagung der Gesellschaft fü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vom 9. bis 13. April 1991 in Dortmund*, Stuttgart 1993.

Schremmer, Eckart (Hg.): *Steuern, Abgaben und Dienste vom Mittelalter bis zur Gegenwart. Referate der 15. Arbeitstagung der Gesellschaft für Sozial- 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vom 14. bis 17. April 1993 in Dortmund*, Stuttgart 1994.

Schwerin von Krosigk, Lutz: *Nationalsozialistische Finanzpolitik* (Kieler Vorträge, gehalten im Inst, für Weltwirtschaft an der Univ. Kiel, Bd. 41), Jena 1936.

Schwerin von Krosigk, Lutz: Wie wurde der Zweite Weltkrieg finanziert? in: *Bilanz des Zweiten Weltkrieges. Erkenntnisse und Verpflichtungen für die Zukunft*, Oldenburg 1953, S. 313—328.

Schwerin von Krosigk, Lutz: *Staatsbankrott. Die Geschichte der Finanzpolitik des Deutschen Reiches von* 1920 *bis* 1945, *geschrieben vom letzten Reichsfinanzminister*, Göttingen 1974.

Sebode, Dr. (AGR): Einheitliche Regelung des Pfändungsschutzes für Arbeitseinkommen ab 1. 12. 1940 auf Grund der Lohnpfändungsverordnung vom 30. 10. 1940 (RGBl. I, S. 1451 f.), in: *Deutsche Gerichtsvollzieher-Zeitung*, Jg. 1940, S. 185—192.

Seckendorf, Martin (Hg.): *Die Okkupationspolitik des deutschen Faschismus in Jugoslawien, Griechenland, Albanien, Italien und Ungarn (1941—1945)* (Europa unterm Hakenkreuz, Bd. 6), Berlin 1992.

Seydelmann, Gertrud: *Gefährdete Balance. Ein Leben in Hamburg 1936—1945*, Hamburg 1995.

Statistisches Handbuch von Deutschland 1928—1944, hg. vom Länderrat des Amerikanischen Besatzungsgebiets, München 1949.

Steinberg, Jonathan: *Die Deutsche Bank und ihre Goldtransaktionen während des Zweiten Weltkrieges*, München 1999.

Steur, Glaudia: *Theodor Dannecker. Ein Funktionär der 》Endlösung《*, Essen 1997.

Stöber, Rudolf: *Die erfolgverführte Nation. Deutschlands öffentliche Stimmung* 1866 *bis* 1945, Stuttgart 1998.

Stroumsa, Jaques: *Geiger in Auschwitz. Ein jüdisches überlebensschicksal aus Saloniki 1941—1967*, hg. von Wiehn, Erhard Roy, Konstanz 1993.

Stucken, Rudolf: *Deutsche Geld- und Kreditpolitik* 1914 *bis* 1963, Tübingen 1964 (2. Aufl.; die 1. Aufl. erschien unter dem Titel 》Deutsche Geld-und Kreditpolitik《 1937 in Hamburg).

Terhalle, Fritz: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Finanzwissenschaft vom Beginn des 19. Jahrhunderts bis zum Schlüsse des Zweiten Weltkrieges, in:

Handbuch der Finanzwissenschaft, hg. von Gerloff, Wilhelm/Neumark, Fritz, 2. Aufl., Bd. 1, Tübingen 1952, S. 273—326.

Tönsmeyer, Tatjana: *Das Dritte Reich und die Slowakei 1939—1945. Politischer Alltag zwischen Kooperation und Eigensinn*, Paderborn 2003.

Tönsmeyer, Tatjana: Der Raub des jüdischen Eigentums in Ungarn, Rum? nien und der Slowakei, in: Goschler/Ther (Hg.): *Raub*, Frankfurt a. M. 2003, S. 71—91.

Umbreit, Hans: *Der Militärbefehlshaber in Frankreich 1940—1944* (Militärgeschichtliche Studien, Bd. 7), Boppard 1968.

Umbreit, Hans: Auf dem Weg zur Kontinentalherrschaft, in: Kroener, Bernhard R./Müller, Rolf-Dieter/Umbreit, Hans: *Organisation und Mobilisierung des deutschen Machtbereichs, Erster Halbband: Kriegsverwaltung, Wirtschaft und personelle Ressourcen 1939—41* [Militärgeschichtliches Forschungsamt (Hg.): Das Deutsche Reich und der Zweite Weltkrieg, Bd. 5,1], Stuttgart 1988, S. 3—345.

URO [United Restitution Organization] (Hg.): *M-Aktion. Frankreich, Belgien, Holland und Luxemburg 1940—1944*, MS (Kurt May), 2. erg. Aufl., 30.10.1958.

Varon, Laura: *The Juderia. A Holocaust Survivor's Tribute to the Jewish Community of Rhodes*, Westport, London 1999.

Verwaltungsbericht der Deutschen Reichsbank für das Jahr 1942, Berlin 1943.

Völld, Ekkehard: *Der Westbanat 1941—1944. Die deutsche, die ungarische und andere Volksgruppen*, München 1991.

Voβ, Reimer: *Steuern im Dritten Reich. Vom Recht zum Unrecht unter der Herrschaft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München 1995.

Wandel, Eckhard: Die Rolle der Banken bei der Finanzierung der Aufrüstung und des Krieges 1933 bis 1945, in: Schremmer (Hg.), *Geld*, Stuttgart 1993, S. 275—288.

Wappler, Anke: *Grundzüge der Okkupationspolitik des faschistischen deutschen Imperialismus gegenüber Griechenland vom März 1943 bis zum Oktober 1944*, Phil. Diss.,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der DDR, Berlin 1986.

Wehrmacht. Dimensionen des Vernichtungskrieges 1941—1944. Ausstellungskatalog, Hamburg 2002.

Wette, Wolfram/Bremer, Ricarda/Vogel, Detlev (Hg.): *Das letzte halbe Jahr. Stimmungsberichte der Wehrmachtpropaganda 1944/45*,



Essen 2001.

Wiel, Paul: *Krieg und Wirtschaft*, Berlin 1938.

Peter Witte: 》... zusammen 1 274 166《. Der Funkspruch des SS-Sturmbannführers Hermann Höfle liefert ein Schlüsseldokument des Holocaust, in: *Die Zeit* Nr. 3 vom 10. Januar 2002.

Woitkowski, Hans-Peter: Graf Schwerin von Krosigk, in: Friedenberger u. a. (Hg.), *Reichsfinanzverwaltung*, Bremen 2002, S. 246—252.

Xydis, Stephen G.: *The Economy and Finances of Greece under Axis Occupation in 1941—1942*, Pittsburgh 1943.

Xydis, Stephen G.: *The Economy and Finances of Greece under Occupation*, New York 1945.

Yahil, Leni: *Die Shoa. Uberlebenskampf und Vernichtung der europäischen Juden*, München 1998.

Zeidler, Manfred: Die deutsche Kriegsfinanzierung 1914 bis 1918 und ihre Folgen, in: Michalka, Wolfgang (Hg.): *Der Erste Weltkrieg*, München 1994, S. 415—433.

Ziegler, Karl: *Erinnerungen an die Feldpost im Kriege 1939—1945*, MS, Bonn 1950 (BA-MA Bibliothek, N II c/4).

Ziehe, R.: Das neue Zwangsvollstreckungsrecht seit Kriegsbeginn, in: *Deutsche Gerichtsvollzieher-Zeitung*, 60(1940), S. 33—35.

Zimmermann, Michael: Die Deportation der Juden aus Essen und dem Regierungsbezirk Düsseldorf, in: Borsdorf, Ulrich/Jamin, Mathilde (Hg.): *Über Leben im Krieg. Kriegserfahrungen in einer Industrieregion 1939—1945*, Reinbek bei Hamburg 1989, S. 126—131.

Zitelmann, Rainer: *Hitler. Selbstverständniseines Revolutionärs*, Hamburg 1987.

Zuckmayer, Carl: *Geheimreport*, Göttingen 2002.

Zülow, Kurt/Gaus, Hermann/Henze, Max: *Die Mehreinkommensteuer* (Bücherei des Steuerrechts, Bd. 17), Berlin 1939.

Zumach, Ernst-Günther: *Die wirtschaftlichen Kriegsmaßnahmen Deutschlands im II. Weltkrieg in völkerrechtlicher Betrachtung*, Jur. Diss., Erlangen 1955.

Zumpe, Lotte: *Wirtschaft und Staat in Deutschland 1933 bis 1945*, Vaduz 1980.

索　　引

（条目后的数字为原书页码，见本书边码）

感 謝

（浙江）angeliq

（海外）walkerpeng

（上海）yangbos8246

（北京）hcqenjoy

（浙江）蛋爸 1975

（上海）**thriller_wu**

（江苏）changcheng2005

（上海）kihoon_kim

（北京）grassgreensun

（上海）吴敏灵

（海南）molaw1

（四川）贝妮 600

（江西）zhangfeijun

（上海）icysilence

（河南）zdwcwx

（浙江）肖上霖

（上海）zeyang1990

（福建）lqz1129

（广东）xxbbusiness

（广东）我爱辉辉 1314

（北京）**tommyjiangbb**

（浙江）m2008101

（北京）飘凌的风雨

（甘肃）绝壁 whitechamber

（湖北）第五文修

（广东）shirleyhan117

（四川）骆驼傻傻

（辽宁）ac148w32546er

（上海）hongfei_009

（广东）sipinan

（福建）wadagaga

（天津）cherryofmay

（山西）xixueguei88

（陕西）黄黄的猫

（上海）沙罗双树 sun

（辽宁）dragon4ce

（山东）匿名

（上海）chenyunie

（上海）ophire

（北京）itapple1992

（浙江）kalikaba

（上海）lqsfsf

（广东）huo304

（上海）bovey8922

（辽宁）匿名

（上海）卖玉米的熊

（陕西）envoyoung

（江苏）hx9999_nj

（天津）junichen1986

（北京）badbear2008

（江苏）fdsa0751

（北京）doggymona

（安徽）max2abe

（吉林）zmkdayueliang

（吉林）ronagain

（四川）lixijmylh

（江苏）tb_1800858

（山东）匿名

（湖北）与雪飘

（云南）深语涧

（西藏）沧海微茫

（广东）yuandaoyang1986

（上海）tbcwlk

（山东）tesla2

（山西）k_3028446

（辽宁）st*****ne

（浙江）ceciliarian

（天津）tb3124421

（广东）anderslane

（湖北）woodrow88

（海南）匿名

（河南）syzdxq

（上海）aolygc

（山东）skyxzp

（重庆）tb_3332083

（安徽）小跑不停

（江西）zengxingab_2008

（海南）ahchou

（浙江）felixlee

（河南）kengpianz

（吉林）xellos1080

（广东）tb1692320_2012

（江苏）zh670223

（安徽）子珏 wnh222

（山东）纳兰赋

（山西）阳春一面

（北京）hhyyhhyy_007

（天津）**alansmith282**

（湖南）chhxjx

（山东）kkhunterster

（北京）ken6527

（山西）andymum2008

（湖南）九命猫 1999

（山东）root123456789

（北京）枯木堂主

（黑龙江）fanghaochen90

（北京）合鸟尔

（辽宁）letusshare

（海南）lkjnm1

（浙江）落花剑影

（浙江）海军王子

（广东）szmichaelchen

（浙江）myqqhero058

（云南）青马大桥

（北京）cxwoyaoying

（广东）ykyk11188

（广东）tb88561_22

（广东）zcwtop

（河北）六额驸

（云南）米线米线 5

（北京）yuan7009

（山西）lm476229074

（安徽）妞妞爸 1129

（浙江）tb8wjy

（上海）jxg77jun

（甘肃）tb_9071954

（江西）bacy98

（北京）jasonhao

（广西）24312bill

（北京）fanlibuaa

（广东）pasacal

（北京）tarnival

（辽宁）wangce881204

（山东）凡夫 2008

（浙江）jjdjjdjjd007

（河南）kaifengzq

（安徽）dfq0810

（天津）gauss00

（江西）我就是他哥

（上海）nocturnetian

（江苏）zhangyixi

（上海）huasheng19***2

（山东）暴福龙

（河北）蝴蝶小鸟

（安徽）allstarshine

（四川）newlifechou

（上海）ifancy21st
（江西）九阳神功的秘密
（广东）windowl9174
（内蒙）疯狂阿特
（辽宁）yudi46****75
（北京）natao2988
（上海）aquaticbotany
（北京）qy20***27
（江苏）zg6768
（北京）deathtroll
（河南）杨孝忱忱绛
（广西）山高情长
（江苏）jiaozijing
（甘肃）vincentheaven
（浙江）林澄心
（上海）xi_xiang_er
（上海）zlopiery
（上海）李娟橘子1984
（辽宁）山风 olive
（上海）frankso
（北京）handianyu
（安徽）tezukay
（浙江）小斌来淘啦

（广东）lgy72
（内蒙）tb_****716
（天津）cailz2008
（安徽）liuran246
（上海）salzq
（山东）tb****595_11
（上海）hsske
（广东）老熊维尼 33
（广东）deng_凡
（四川）ricoh1
（山东）翩然蝶舞 prdw202
（上海）金融大资本家
（浙江）江梁琪
（山东）胖头鱼 1230
（浙江）ninuodx
（广西）浮生不语
（广东）亚桦 1987
（江苏）gao23h
（重庆）幽兰草心
（云南）wglyfhb
（广东）柳星君
（四川）wyc2hope
（陕西）docie
（北京）自由左翼
（浙江）若爱你

（上海）fangyto1
（天津）realbargin
（甘肃）王晓斐 6***0
（天津）神勇小白鼠 1 号
（湖南）yake_floyd
（广东）hwjchung
（陕西）windchanting2009
（河北）原来非同
（浙江）wo 诚信走天下
（上海）moux4
（四川）xjhjk
（江苏）xu501_51
（江苏）benjilimi
（广西）胡海 2011
（湖北）半夜鸡不叫
（广东）w27****359
（福建）**侠 lee
（湖北）流传香港
（广东）当时明月在 1989
（广东）pan****10
（山东）ybzhao1
（吉林）rubyz66
（四川）米兰小王子

（江苏）陈向阳 01
（北京）xqh***5
（陕西）tb_****273
（吉林）谢正华
（上海）wsh31****045
（江苏）kennel32
（四川）jeremyxu333
（重庆）牛嚼大牡丹
（上海）gongyi****1
（湖北）syberia2005
（江苏）吕杰森
（北京）夜市的萝卜
（上海）lotuszhu2012
（上海）wxy1815
（重庆）流彩年华
（浙江）nx002
（湖北）千秋雪 6
（湖北）eclipse179
（广东）liuxingbei5
（湖南）老虎桶子
（山东）zhong***qiang
（上海）candlechen
（北京）kaokaokao110

（河南）简 jane007
（江苏）jslylq88
（广东）colourful777
（天津）和 80 长大的 90
（广东）hxmei292
（上海）crystalljbj
（黑龙江）cxkuno
（浙江）米兰很迷茫
（广东）jeff 杨 7
（吉林）liushuang****967
（上海）miaoyuan01
（天津）灰机上面儿
（上海）yu37***23
（江苏）hnzjp_2005
（湖南）sqlclln
（湖北）rongrong315
（云南）swkxzz
（内蒙）btlwd
（山西）leechinaler05
（江苏）smyf3307
（北京）cwxdesign
（浙江）ja20****38
（江苏）lyfeng9023

提供的贊助

再次謝謝你們的支持！

（截止日期：2012/07/11.以上赞助排名不分先后）